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国际影星成龙倾情推荐



毒雾毒幕

郭毅◎著

首次披露明星涉毒真相

揭露少数公安、司法干警涉毒黑幕

震撼心灵的惊世之作

中国吸贩毒真相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明星”在何方?

娱乐圈“毒”家报道！拨开重重迷雾，带你走进暗流汹涌的“幕”后……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毒雾
毒幕

上架建议：畅销书 / 侦探 / 纪实



微信扫描（ID：cctphome）



ISBN 978-7-5117-1831-0

定价：48.00 元

毒雾毒幕

郭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雾·毒幕：中国吸贩毒真相／郭毅 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17－1831－0
Ⅰ．①毒… Ⅱ．①郭… Ⅲ．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454号

毒雾·毒幕：中国吸贩毒真相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615（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目　录



序一

灵魂的写手

阅读《毒雾·毒幕》，作家郭毅的文字带给我的是心灵上的强烈震撼：泣血的呼唤摄人心魂。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愚昧、尊严与耻辱，在吸毒成瘾者的世界里是混沌的；文化与信仰，在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里更是严重缺失。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家全国性禁毒专业报纸的编辑部主任，多次深入“虎穴”，面对面地与吸贩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亲密”接触，一桩桩血迹斑斑的吸毒者灵与肉的毁灭事件，一声声绝望的呼嚎，一个个家庭的破裂，在吸贩毒者血与泪的交织中，生命以最残酷的方式凋零。

作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用良知去感悟、用理性去思索、用潜心去探险，用心灵去书写，所有的一切，并非猎奇，而是以自己艰辛而痛彻心扉的写作，将吸贩毒与艾滋病所酿成的人间悲剧，以客观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带给人们深深的思索与警醒：毒祸猛于虎，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毒品与艾滋病对人性、人伦的的毒害与毁灭，岂能“哀之而不鉴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6年多来，作者先后赴全国几乎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禁毒部门、司法劳教部门、强制隔离戒毒所、自愿戒毒所进行采访。为了获得一手的新闻，作者甚至随警作战，取得吸贩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信任；为了更多地获取最真实的资料警示人们，作者沉寂

于劳教所或强制隔离戒毒所，常常从“知音”的角度倾听他们的诉说。每一位涉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郭毅始终是一位忠实的听众，吸贩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吸毒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过程，如锥刺般刺痛着作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虚幻的情节——那是十年前我在拘留所工作时，派出所民警送来一个小男孩小强执行拘留。如果不是民警送来，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满16周岁了。裁决书上显示，该男孩因殴打他人被处以行政拘留。由于年龄尚小，民警对他颇有怜爱之意。在对他的教育中，我知道了他的故事：父亲因吸毒贩毒被判刑，母亲离家出走，幼小的他只能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爷爷奶奶的宠爱，使他养成了骄纵的天性，放荡不羁、巧取豪夺；与人交往中，稍不如意就拳脚相向。稚嫩的脸庞与他的暴戾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他的凶狠，周围不少同龄人对他畏惧三分。

在被执行拘留的5天时间里，民警对他可谓用心良苦，希望他出去后好好做人。大概是六七年后，民警得知他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刑，而他的父亲因为在北京抢劫毒资再次落入法网。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瓦解了，在毒品的烟雾中，在家长的吸毒、贩毒中，孩子成为了牺牲品，法律的利剑无情地刺向这个被毒品毁灭后又将悲剧移植到原本不幸的小强身上。这时，遏制毒品的蔓延、拯救吸毒者、远离艾滋病，就成为当下迫切而现实的关注点。

作者独具匠心，用静穆之心数次“潜入”吸贩毒现场以及“收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以最真切的感悟告知人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作家的疾呼是发自肺腑沉痛的呐喊。一个生命的个体在社会的呵护和家人的关爱中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于家庭而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家人的企盼和依托，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平等而珍贵。一旦吸毒甚至被染上艾滋病，无异于整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死亡与毁灭成为吸贩毒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不可回避的话题。

把毒品当成礼物的习俗，虽然只是在极其个别地方出现，但危害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相对集合的全体。文化的落后、愚昧的观念，共用吸毒工具和通过性的接触，艾滋病病毒在这里传播。在颓废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悲情弥散，即使有些“明智者”，也难以从苦难的渊薮中挣扎出来。心理的暗示、生活的无情、肌体的损耗，无时不吞噬着吸贩毒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灵魂。吸毒、戒毒、坐牢，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常态，即使在社会、家人的劝诫中不乏有脱胎换骨之人，但在无情的现实中超越周遭的环境，回归正常生活，融入社会确实困难重重。

在更多的人注重功利、陶醉“快餐文化”的当下，像郭毅这样纵横数省，用真情去讴歌缉毒工作者、与吸贩毒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距离接触，用真情感动他们，用大爱去净化他们，得到了他们讳莫如深的生活过往，镌刻出撼天之作。对吸贩毒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灵魂的再现，只有用生命的感悟和在漫长的幽暗之路上的艰苦卓绝的探索，才能还原他们生活的场景和最真实的痛苦。

关注吸贩毒者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疑是对弱者的关注，是对民生的关切。每一个当事者所经历的苦难，是局外人很难体悟的。心灵的感悟并非猎奇与哗众取宠，而是以生命的虔诚温润弱者，将“零距离”目睹的悲剧回放，给人以警醒和启迪。关注吸贩毒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成为当下社会、公众最为迫切的任务。

作家郭毅的《毒雾·毒幕》，透过一个个苦难的吸毒者、财迷心窍的贩毒者和悲怜的艾滋病感染者，揭示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及在毒品面前爱情、亲情、友情的珍贵。呼吁人们关注吸毒和艾滋病群体的生存状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物质的、精神的、人文的角度给予他们帮助。

关注吸贩毒人员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需国人携手共进。用抗拒灾难的勇气和毅力、用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怀、用无尽的关爱倾情关注他们，让望而却步的人们对吸贩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群体不再恐惧和拒绝，而是以真诚、耐心和毅力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服务他们，让禁毒防艾的知识深入人心。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更需要全体公民的努力。

读郭毅的作品，可谓字字垂泪，句句钻心。力透纸背的文字，凝聚着作

家的心血。这些作品，将在我国禁毒及防艾工作上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迪的意义，必将成为我国禁吸戒毒最佳通俗读物之一。这些报告文学面世后受热捧，说明作家郭毅的作品与读者的心灵达到了一种共鸣，同时标志着郭毅在禁毒及防艾宣传工作中的重大突破。感斯人言，欣然命笔：

沉寂深渊探幽灵，
带血篇章铸忠魂。
苍生有泪悔欲壑，
嫣然罂粟着血痕。
洞开心扉两泪行，
啼鹃含悲别毒品。
携手沧海擎风雨，
共操千音眪祥云。

刘曼云（著名诗人、散文家、警官）
2014年3月10日

序二

五双泪眼

那是触动我灵魂的五双泪眼。

那时我还在北京武警某部服役，一天，部队军事法庭召开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嫌犯是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惋惜的刘姓小伙子，他是我的战友，来自江苏某市，一米七八的个子高大伟岸，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两年后他就在部队里入党立功，并准备第三年报考警校，然而，他的人生之帆不幸触礁了：一次与毒贩在北京一公园进行毒品交易时，他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后来在审讯时得知，小刘在执勤时被毒贩相中，几次被对方以帮人送东西为名传递毒品，由于他身着军装，他的所有行为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每次成功之后，都会得到对方交给的数百元“烟钱”，这对当时只有几十元津贴费的他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小刘乐此不疲，直至东窗事发。早在审判的前几天，远在江苏的刘父、刘母接到部队儿子出事的通知，心急火燎赶到部队，得知儿子出事的真相后，气得刘母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得知，小刘是刘母在四十岁时才怀上的、唯一的儿子，当时还难产，差点丢掉性命。当刘父、刘母看到摘掉领章、帽徽的儿子被全副武装的战士押上审判席时，几欲晕眩，特别是当法官宣布判处小刘有期徒刑三年，即将押出法庭时，刘父、刘母发疯似地冲上前去想抱住儿子，在被现场的武警战士劝阻后，刘母更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悲恸，刘父、刘母的两双泪眼、声嘶力竭的干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

动容，而刘父更是趁武警战士不备时，冲到儿子跟前，抡起右臂，狠狠地抽了儿子一耳光……

有悲愤，更多的恐怕是自责。

2006 年，我在赴昆明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采访时，戒毒所亲情会见室里的一幕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两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男子痛哭的画面，旁边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在无忧无虑地玩耍着，从年龄上我初步判断那两个女人中，年龄大一些的是戒毒学员的母亲，年轻的女人可能是戒毒学员的妻子，在旁边顾自玩耍的男孩则是他的儿子。年长的老妇人一只手抚摸着年轻男子的头，右脸贴在男子的肩膀上，暗自垂泪，年轻女人的双手勾着男子的脖子，头深埋在他的胸前，由于痛苦抽搐身子不停地颤抖。我的出现引起了老妇人的注意，老妇人不停地向我所在的方向张望，那是一张犹如麻网织就的脸，写满生活的艰辛与悲伤，脸上毫无血色，眼窝深陷，许是悲伤过度，老人的泪不多；许是老人的动作引起了年轻女人的警觉，她缓缓地抬起头，随着老妇人目光的方向张望，这时我发现她的眼里尽是生活的绝望，无助、失落，痛苦哭泣后，她的眼睛变得发红，那张年轻的、写满痛楚的脸上有泪水刚刚冲刷过的印迹……正如我的猜测一样，陪同采访的管教民警告诉我，男子身边的两个女人分别是他的母亲和妻子，小男孩是他的儿子，因为反复地吸毒、戒毒，戒毒、吸毒，该男子已是第 7 次被家人送进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可每次一出所他都很快复吸了，因为吸毒，他已经家徙四壁了……

当世界上最亲的两个女人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法阻止自己的亲人赴毒渊时，留给她们的只有悲怆的眼泪，无尽的绝望。

小强惊愕的泪水来得有些突然。

小强是西南某省一个县城里的一名普通中学生，那是 2008 年 3 月的一个夜晚，当一阵急促而忙乱的声音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时，他起床后发现屋里已经挤满了人，而母亲的双手被一左一右两个壮实的男子控制着。看着儿子睡眼朦胧的样子，小强的母亲一脸惊愕。那些男男女女在他的家里翻箱倒柜，

显然在寻找什么东西，而母亲对此却并不加以制止，小强越发疑惑。突然，一个男子高声叫道："这里有钱!"只见他从一个装衣服的壁橱里拿出一包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成捆的人民币，经过清点，有三十多万元，看着那么多钱被拿出来，小强更加疑惑，而母亲的脸色变得越发难看……

从他们与母亲断断续续的对话中，小强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那些身着便衣的人都是警察，原来父亲和母亲在贩毒，那30多万元是父母贩毒赚取的一部分，父亲听到风声后闻风而逃，母亲被抓获，小强这才明白他一直以来吃的、穿的、用的还有每天接送他上学的法拉利跑车都是父母靠贩毒赚来的钱，已经上初中二年级的小强感到很耻辱，屈辱、愤懑，不解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母亲最终被警察带走了，后来家里也留下两个便衣警察蹲守着，有好几个电话预约来"取货"的人被抓获……

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市报及市电视台刊登和播放了本市查获一特大贩毒窝点的消息，小强及其母亲的画面也赫然出现在电视镜头里，虽然面部做了马赛克处理，但熟悉的人还是能一眼认出来。父亲在逃，母亲被抓走，小强也因为父母贩毒而成了"名人"，家也被暂时查封回不去了，最后小强连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心一下子跌到冰窖里，根本无心上学，他只好到同在一个市但距市区有四十多公里远的姥姥家里……

小强的班主任说，小强父母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十点多，眼睛红肿的小强才到学校，明显是因为休息不好的原因，小强的脸色很难看，到校后小强对老师和同学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简单地收拾了几样东西就走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小强的父母贩毒。小强的成绩很优秀，他们对小强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辍学感到很惋惜。

……

五双泪眼直达我的灵魂，让我痛彻心扉。"人往往溺死水中而很少葬身火海，是因为水常常给人以温柔的假象"，而毒品犹如带毒的糖丸，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死……五双被毒品折磨、戕害的泪眼，让我执著探究毒界的真相，毒品对人性、人伦的折磨与摧残。

我知道，自从步入禁毒防艾宣传工作以来，生命和灵魂已经深深地被五双泪眼所牵绊，道义与责任让我无力挣脱；我知道，为了人世间不再有更多

的泪眼出现，禁毒防艾宣传工作，将是我毕生的事业。

一个真正的记者或作家，就应该投身生活的最底层，投身火热的生活一线，呼吸到泥土所散发出的生活气息，触摸到生命的脉动，而不是闭门造车进行所谓的纪实文学创作，因此，八年多来，我的足迹几近踏遍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只为尽可能多地与基层的禁毒工作者做朋友，深入到戒、缉毒一线捕捉到弥漫硝烟味道的吸贩毒真实个案，平视那些走上歧路的吸贩毒人员。因为我深信，只要你做有心人，就一定能了解到真相；只要你拥有勇气，你一定能写出真相；只要你真情投入写作，你笔下的真相就一定能带给读者感动或震撼。笔者2010年年底出版的纪实报告文学作品《毒殇——中国吸毒艾滋病调查》，短短数个月就已经发行上万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读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在为写“真相”叫好，在支持“真相”面市。

为了透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给人以警醒，为了告诉人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也为了让更多的家庭不再有泪水，笔者写下了这部《毒雾·毒幕——中国吸贩毒真相调查》。

是为序。

作　者

2014年5月2日

引 言

断想——历史与现实

“……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我们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者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在彼此竞争着向那祭台上贡献牺牲品……”这是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今世界，毒品与艾滋病、恐怖活动并称为世界三大公害，困扰着整个人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旧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痛的灾难之中，“东亚病夫”这一屈辱的称谓像一座大山压在国人的头上，让人抬不起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开展禁绝鸦片大烟的斗争，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使危害中国上百年的鸦片烟毒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根绝，中国被国际舆论赞誉为“无毒国”达三十多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毒潮的猖獗泛滥，境外毒品对我国已经形成“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态势，我国毒情在蔓延，毒害在加剧，禁毒形势十分严峻。

云南告急！

四川告急！

广东告急！

湖南告急！

甘肃告急！

……

先是靠近边境的省份，再后来就是沿海内陆省份甚至西部欠发达省份吸毒者骤然增多，纷纷告急。

据联合国通报，“金三角”“金新月”等毒源地每年生产加工毒品海洛因上百吨，其中大部分通过中缅边境陆路或古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我国消费的海洛因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地区。为逃避打击，境外贩毒集团采用“大迂回”方式开辟了新的贩毒路线，通过印度、尼泊尔将毒品转运至我国。国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贩毒人员聚集云南边境地区贩毒，通过车辆运输、人体藏毒、邮寄等方式把毒品贩运至内地消费市场。近年来国内合成毒品需求量俱增，“金三角”生产的冰毒片剂也大量向我国走私贩运，并在我国东北地区形成一定的消费市场。西北境外，阿富汗2003年鸦片产量超过3600吨，对我国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继续扩大。据2013年度《中国禁毒报告》，2012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2.2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3.3万人；缴获各类毒品45.1吨。其中，海洛因7.3吨、冰毒类毒品16.2吨、氯胺酮4.7吨、大麻4.2吨。

毒害袭击下，我国截至201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209.8万名，并且据专家估算，一名瘾君子背后有4～6名甚至更多的隐性吸毒者，因此我国的吸毒者数量已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之众，并且呈不断蔓延之势。在这些吸毒者中，青少年占到74%（绝对数近百万）。广东、四川两省制造贩卖合成毒品犯罪突出，其冰毒缴获量和捣毁制毒窝点数超过全国总数的80%。同时，国内制造冰毒的地域已从广东、四川向山东、辽宁等地区蔓延，进而向全国扩散，从麻黄素提炼发展到利用化学方法合成。我国国内生产的冰毒被走私到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国。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毒品问题的“内忧”、“外患”不会得到迅速扭

转，国际、国内毒潮对中国危害加剧的状况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可以说，我国的禁毒工作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能否有效地控制住当前毒品问题发展蔓延的势头，进而逐步解决毒品问题，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毒品问题已事关国家倡盛、民族兴衰。

吸毒与卖淫并称为孪生姐妹，它们都能使艾滋病病毒在短期内呈几何级数增长。在一个吸毒的群体当中，只要共用针具的现象发生，伴随着的必定是艾滋病的大流行，有专家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只要吸毒群体中艾滋病一进来，在三五个月之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可能从不到 5% 一下上升到 40%。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全球来看，我们并没有完全控制住艾滋病的流行。中国从 1985 年到现在，艾滋病仍然在蔓延。2010 年是 84 万，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到 2020 年我们可能会突破一千万，它造成的社会危害相当大。

打响新“鸦片战争”已迫在眉睫！时代在呼唤，人民在呼唤！

“三年禁毒人民战争”的提出，缘于两个男人——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原局长杨余和全国人大代表曹明强。这两个男人也因过人的胆识，将自己推到了中外各大媒体的中央。

2003 年下半年，曹明强和其他人大代表到德宏的一些少数民族村寨考察时发现，德宏州禁毒和防治艾滋病工作形势严峻。

不久，曹明强就被杨余提供的《德宏毒品危害现状调查报告》深深地震惊了。2004 年，曹明强带着这份《德宏毒品危害现状调查报告》，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决定以人大代表提案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提交给全国人大代表会议。

在曹明强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前，他对调查报告提及的地方逐一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最终形成了更加详实的调查报告。

2004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天休会时，大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会场，曹明强则忙着把信交给主席台上的两位领导，想请他们转交温家宝总理，但被工作人员制止了。曹明强回头之际，忽然看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正与一位领导交谈，他鼓足勇气走上前去说道：

“首长，我有一封信要交给您！”王兆国副委员长当场看完曹明强半页信纸的简报，收下了他的议案和杨余的调查报告。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曹明强就接到了全国人大办公厅的电话：“你提的问题中央很重视，今天将由公安部有关领导来听你们的汇报。”曹明强大喜：“啊，有戏，德宏禁毒问题有希望解决了！”当天他被排在第八个发言，会前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牛绍尧鼓励他：“一定要汇报好！”曹明强说：“我决不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要让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了解这些情况！”

曹明强的发言，像一发发炮弹，在与会代表心头炸响。300多人的云南团会场，悄然无声。曹明强的话音刚落，公安部领导就明确表示：“曹明强的发言，一针见血。”部长说：“我这次来云南团来对了！”

曹明强的眼睛湿润了，他说：“北京就是想听真话！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新一届党中央对危及人民生命和民族兴亡的事是相当关注的！”

2004年6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省卫生厅等有关领导深入德宏、保山毒情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研。呈现在面前触目惊心的惨状，让这些主政一方的高级官员们心情沉重。白恩培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使云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成为一句空话！”德宏的毒品问题，终于正式摆到了决策者们的桌面上。之后，白恩培将毒情写成16页的调研报告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后，呈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2004年10月23日，胡锦涛同志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道：“家宝同志，看了这份调研报告，深感云南一些地方受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触目惊心，而且呈蔓延趋势。如不下大气力抓好禁毒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不仅会严重影响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影响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云南省一次专题汇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并给云南省以必要的帮助，部署真正打一场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确保取得明显成效。”

2005年，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在云岭大地继而在神州大地打响！

中国，向毒品宣战！中国，以实际行动拒绝毒品！中国，用行动在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中国能办好自己的事，中国能禁绝毒品！

第一章 蔓延全国的毒流风暴

引子——疯狂的毒品海洛因、冰毒

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谈到鸦片的毒害时曾这样评价："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焉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必须禁绝，以强国保种。"而今天，毒害甚于鸦片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正肆虐华夏大地，从南到北。

1、毒患重灾村无壮男

曹明强的话绝不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说者一脸严肃，听者一脸凝重，现场一片沉寂。

2004 年 3 月 7 日，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云南德宏州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曹明强向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以及众多云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云南德宏州有个村子，村里的青壮男子几乎都因吸毒、贩毒或进戒毒所，或进劳教所和监狱，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

因吸毒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个真实的故事让周永康部长及全场的代表深感震惊。

曹明强讲的并不是故事。那是他在2004年2月或搭乘拖拉机、或徒步山间小路，走村串户，历时27天调查云南省德宏州毒害的真实见闻。

曹明强说："我在第一站就见到不祥之兆！那不仅仅是德宏的不祥之兆，也是全国的不祥之兆！"德宏芒东村几户吸毒村民的包产田，有的卖了，有的荒了。其中一户，父子3人因吸毒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死亡，在他们荒废的房屋中长出一棵树，树把屋顶都顶穿了。一个寨子本有10来户人家，因吸毒而导致5户人家绝户，满眼所见，到处是残垣断壁。

时任德宏州公安局长杨余给采访他的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村子调查时，他发现抬棺材的只有4个人而不是传统的8个人，一问，才知道村子里其他男人或入狱、或劳教、或等死、或患病，只剩下这4个有劳动能力的男子了。再看看村里那些破烂不堪的房子，杨余说："让人掉泪啊！我连父亲去世都没有这样哭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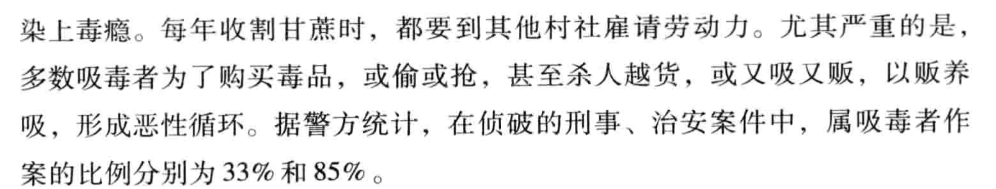
杨余还讲述了几个悲惨事例：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共有29户72人，其中兄弟或叔伯吸毒的有1户25人，一家两代或三代都吸毒的有17户47人。因祖孙三代吸毒或父母带动子女吸毒而"死绝"的有7户，另有多户濒临绝境。

该州水库社村民郭云显父子4人吸毒，媳妇不堪忍受，将幼小儿子亲手掐死后，自己喝农药自杀。

该州章金社村民杨发强一家5口，人人吸毒，两个儿子已吸毒致死，小儿子杳无踪影。

杨余说，截至目前，德宏州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5285人，占全省吸毒人员的四成，是全省乃至全国吸毒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据介绍，截至2004年底，德宏州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已达8124例，9成以上是吸毒者。随着吸毒的低龄化及因吸毒造成的家庭破落、经济衰退，一些地方青少年失学、辍学现象严重；有的村寨因吸毒者过多，劳动力匮乏，出现土地无人耕种，或变卖或荒芜的情况。该州陇川县謇号乡芒洪景颇族社是个只有230人的小山村，吸毒者就有56人，大部分青壮年都



染上毒瘾。每年收割甘蔗时，都要到其他村社雇请劳动力。尤其严重的是，多数吸毒者为了购买毒品，或偷或抢，甚至杀人越货，或又吸又贩，以贩养吸，形成恶性循环。据警方统计，在侦破的刑事、治安案件中，属吸毒者作案的比例分别为33%和85%。

在吸毒严重的少数民族村寨，姑娘不愿嫁本地人，大多外出打工、嫁人；已婚年轻妇女抛家弃子，远嫁山东、河南。在个别少数民族村寨，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2、为治儿子肺结核，她买毒品给儿子吃

德宏州人把吸毒者叫做“四号客”。“四号”是纯度最高的毒品海洛因。

84岁的杨东芝老妇，身体蛮硬朗，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她是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吸毒者。她的丈夫、两个儿子都因吸毒而死，她靠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寄钱回家维持生活。

杨老太说，很早以前，她的大儿子得了肺结核，她就买毒品海洛因给儿子吃，谁知买回来的却是洗衣粉。从此以后，她每次买毒品海洛因的时候，都先尝一口，尝着尝着她就上瘾了，再也戒不掉了。

她说，经民警劝说，她曾到村里的戒毒所戒毒，中途毒瘾发作，她又偷跑出来，躲到附近的小山上吸毒。后来，是派出所所长找到了她，那时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是镇上派出所所长把她从山上背回戒毒所。

如今，杨老太每月做一次尿检，几年下来尿检全部合格，事实证明她已成功戒除毒瘾。她说：“我现在不想‘四号’了，我还想多活几年。”

权威分析显示：我国正由传统的毒品通道，变为既是毒品通道又是毒品消费市场，两害并存的局面。据统计，云南德宏州，每41人中就有一名吸毒者，吸毒消耗的费用加上政府禁毒经费，已经接近全州财政收入。按照全国现有吸毒者估算，每年因吸食毒品海洛因就至少耗费270亿元人民币，政府每年需要投入几十亿元用于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戒毒康复。

“精疲力尽啊!”谈起禁毒工作，杨余丝毫没有掩饰工作的艰巨性和面临的困境。“我刚给各县区的公安局长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立项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好，否则一律撤职。”

根据公开的材料统计，与云南德宏州毗邻的缅甸北部地区，每年种植罂粟仍在30万亩以上，估计年产鸦片400吨，绝大部分加工成毒品海洛因贩运。按照鸦片与海洛因提炼制造4：1的比例，海洛因的产量在100吨左右。

金三角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毒品进入中国并通过中国进入世界毒品市场。

杨余算过一笔账，德宏州因吸毒造成的损失近2亿元，政府用于禁毒的经费达1亿元，两者相加，接近德宏州每年的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德宏州因毒害失去了许多发展机遇，曾经红火的旅游和边境贸易已成明日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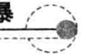
2005年1至4月，德宏州共收戒吸毒人员8746名。杨余有个规划，将全州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25000多人中，16000人强制收戒进入戒毒所集中管理，再将5000人劳动教养，余下4000老弱病残吸毒者交派出所、社区、居民委员会监管，这样，社会层面上的吸毒者将全部实现有效管理。

杨余说，社会上每10个吸毒者一年发展1名新吸毒者非常容易，这样德宏州每年将新增2500名吸毒者。吸毒的人本身是毒品受害者，但同时也是贩毒者。如果没有新的吸毒者，那就等于断了旧吸毒者的财路，这条吸毒“发展链”也就因此中断。

采取集中收戒行动后，德宏州2006年第一季度新增吸毒人员仅为56人，效果相当明显。

要建造收容近2万名瘾君子的戒毒所，需要资金约2亿人民币。国家没有那么多拨款，州政府也拿不出这笔资金，怎么办?杨余说：“我们已经成立了禁毒基金会，下一步准备到沿海发达地区、效益好的大企业及北京各部委募捐。”他说：“为了群众，我个人下跪讨钱又怕什么?”

2005年5月下旬，东南亚最大的综合性戒毒所——“德宏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建成，该戒毒所预算投资1.05亿元，设备先进、齐全，可同时收戒2500人。德宏州强制隔离戒毒所是融生理脱毒、心理矫治和戒毒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戒毒机构。当年5月23日，戒毒所顺利收戒了首批学员，按州政府的要求，到年底收戒500名学员。



到2011年，德宏州强制隔离戒毒所已成功收戒戒毒学员4500人。

3、“背毒第一村”几乎家家都背过毒

贩毒人员的急剧上升让李国臻都有些不知所措。

李国臻时任云南省永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数字，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省临沧市，临沧的毒品有一半来自永德县，而永德县最近5年抓获的本县贩毒人员中，有85%是班老村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班老村的村民为什么要背毒、贩毒呢？班老村那里的真实状况又是如何呢？笔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在云南进行毒情调研的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以下是她的自述：

五月的永德县处处透着春的气息。

我从永德县城乘车，经过一路颠簸，来到距县城43公里外的小勐统镇，在小勐统镇，当地的老乡告诉笔者，我要去的班老村不通公共汽车，要去的话只能坐私人的三轮车，听说笔者要租车，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刚才还在路边玩牌的三轮车司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笔者花90元钱租下了一辆家用三轮车前往十多公里外的班老村。

上车后，李姓司机告诉我，“你们是从大地方来的人，不是我们乱要钱，是因为那个地方确实不好走，加之最近油价涨得厉害，我们也只是挣个日工钱。”一路上，现实确实如李师傅所说的那样，路很窄，布满乱石，而且由于前一阵子下雨，路上有很多车轮辗压过的一道道坑，坐在三轮车上的我如同坐过山车。

班老村距县城十多公里，泥泞不堪的山路，让三轮车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当日上午十一时许，在班老村委会门口，通过村民的指引，我找到了村委会主任杨林强。据杨林强介绍，班老村管辖14个自然村，98%是山地。2003年，班老村人均纯收入380元，人均占有粮食259千克，因为各种原因，

这些年经济一直靠“打工经济”来支撑，村里的青壮年男女劳动力都到昆明等大城市打工去了。他还告诉我，交通闭塞、道路不畅一直是困扰村民经济发展的大难题。接着，杨林强苦笑着说：“我们村是因‘背毒’而出名的。”

“我先后接待过来自全国的多名记者，每陪同一次，那些吸贩毒者家人的诉说都让我痛苦一阵子。”陪同我采访的杨林强表情显得很是沉重。

在杨林强的带领下，当日下午2时许，我来到班老村崩龙寨（全寨35户人家中有一半参与过背毒，16人被捕，9人被判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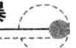
“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爸爸，从未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背毒被枪毙了。如果爸爸活着该有多好！在梦中，爸爸抱着我，还把我放在脖子上……”这是该村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小福在一篇作文中的一段话。

去的时候，小福不在家。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了他的奶奶——67岁的穆后娣。她告诉我：“昨天，小福放假回来后，就到大山那边的村子里帮人家放牛去了。人家管吃管住，他要过两天才回来。”

眼前的情景让人心酸：三间土坯房由于风吹雨淋显得很破旧，堂屋里空空如也。小福和奶奶住的“卧室”里摆放着的两张木床，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床上摆放着两条已经露出棉絮的薄被子，叠放的衣服成了她们的枕头。在小福家的厨房里，我看到灶台上两个黑乎乎的罐子里，正冒着热气。铁锅里是水煮洋芋。奶奶说：“政府定期给我们粮食，基本上够我们祖孙俩吃。”

杨林强说：“小福的爸爸背毒被枪毙后，妈妈改嫁了。2003年7月底，小福的爷爷病死了。只剩下小福和奶奶相依为命。小福上学的费用全免，学习成绩中上水平。2004年，学校组织观看《禁毒宣传讲座》的电影，小福当场哭了起来。”小福在作文中写道，“影片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就是我家的真实写照：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爸爸，从未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背毒被枪毙了……”

见到李太朝时，他正在自己的铺子里修车。杨主任说：“他是村里第一批因背毒被判死刑（缓刑）的村民。”当听说我是从北京来此调研禁毒工作时，李太朝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一再表示他已经好多年没再碰那个东西了，为了平复他的心情，我和杨林强一再告诉他只是想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听了我们的述说，李太朝的表情变得自然了："我真的只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是一个在地里刨食的人。我背毒是因为辛辛苦苦攒的4000多元，被骗子骗光了，那钱是我打算用来娶媳妇的。当时，我想到了死，想跳楼。后来我又想，反正也是死，还不如通过背毒贩毒挣钱，把被骗走的钱挣回来。"

李太朝清了清嗓子接着说："第一次背毒是在1980年。我和另一个村民背着几十斤鸦片，从缅甸果敢县背毒到巍山，一天一夜就走了80多公里山路。第一次我们俩赚了1000多元钱。后来，只要外地大毒枭到巍山收购毒品，我们就到缅甸的果敢县背毒卖给他们。我没计算过，3年多时间自己究竟背了多少毒品，只是清楚地记得，挑80公斤炭只能赚3元钱，而背几十斤大烟壳就能赚几百、上千块。1983年2月14日，我和女友结了婚，当年8月，我就被抓了。一审，我被判死刑。"

"二审时，我知道妻子怀孕后，我突然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欲望。我在自我辩护时说，'给条命吧！我想见到尚未出世的孩子！'二审，我被改判为死缓。后来，在狱中表现好，我获得了减刑。1997年6月27日，我出狱时，妻子早已改嫁，孩子已经13岁了，我理解她，她还年轻，不可能一直为我等下去。"

杨林强告诉我，"我们村一些农户，生活贫困思想愚昧，到缅甸去打工，上老板的当，经受不起老板的诱惑，人家给钱就冒着生命危险帮别人背毒品。在民国期间，村民就开始把帮毒枭背毒运毒当为谋生的手段，并形成了传统。"

……

向春玲的见闻，笔者同时也从李国臻的话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村民主要以'马仔'的形式帮境外的毒枭毒贩背毒品，再贩运到保山、巍山等地。据群众举报，背毒最猖獗时，班老村几乎家家都在贩毒，而贫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那么，班老村究竟贫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李国臻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县班老村60%左右的人都吃不饱，老人孩子连汽车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在2002年前，人均年收入仅300元，而村民为毒贩背毒运毒，一次就能获利几百到上千元人民币，对于连玉米饭都吃不饱的村民来说，背毒运毒的报酬无疑对他们充满了诱惑，于是班老村的村民不惜铤而走险去背毒

谋生。"

班老村中心小学的李校长的话充满着辛酸，由于背毒被枪毙，全村有30多个单亲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的缺失，也使这些原本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更加贫穷。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部分性格孤僻，有强烈的自卑感。虽然当地政府给予了相关的资金补助，但是仍有三四个孩子因为经济、家庭疏于管教等原因中途辍学。

班老村究竟为什么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背毒第一村"呢？仅仅是因为贫困吗？尽管当地公安禁毒部门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背毒贩毒，为何仍无法摘掉班老村"背毒第一村"的"帽子"呢？

李国臻也曾有过与笔者一样的困惑。为了彻底弄清班老村为何会成为"背毒"村，其实，早在2004年6至12月，李国臻就花费了半年时间，深入班老村，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李国臻认为，特殊的地理条件，是班老村成为"背毒"村的最主要原因。班老村处于云南省西南部，濒临怒江南岸，距离缅甸果敢县仅40公里。("金三角"中的缅甸果敢属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管辖，1989年果敢被缅甸政府确定为掸邦第一特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果敢同盟军实行"以毒养军、以毒护军"，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大量毒品迂回北上，加之那里长久以来存在大规模毒品种植、加工销售等原因，使得果敢作为北"金三角"已成为毒贩的"根据地"。)

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从境外到内地的主要贩毒通道有7条经过班老村。由于山间的道路错综复杂，道路并不像公路那样容易辨别，一般人进入山区很容易迷路，只有当地的村民才熟悉这样的道路。所以，村民们通过山间贩毒通道"背毒"的"成功率"相当高。

班老村由于历史及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成为交通落后闭塞的死角。从班老村通往永德县小勐统镇政府驻地的18公里山区土路，通往镇康县石桥村的11公里土路，以及通往小勐统镇湾甸村的35公里土路，均是旱季通车，到了雨季根本无法通行。即使是旱季，这种路况普通客车也无法通行，所以村民在旱季出行，只能坐拖拉机。

"要想富先修路，而村民们根本拿不出修路的钱。"班老村崩龙寨村民李



正源接受采访时说，“2000年以前，崩龙寨能顿顿吃上苞谷饭，就算是好的人家了。谁不喜欢过好日子？谁愿意去背毒，去冒险？关键是我们穷。当年，我们村的村民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还是有一半以上人家都吃不饱。所以，很多青年人都结伴，到缅甸去背毒。”李国臻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贫困的班老村农民被毒贩利用了。

班老村中心小学的李校长告诉我，整个班老村至今没有一名大学生，全村的高中生只有5名，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占90%以上。很多家长认为“读书无用”，而更多的家庭迫于生计，让适龄孩子在家放牛、割草，不愿让孩子读书“浪费钱”。李校长说，上一代人的素质，必然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素质。正是这种恶性循环，使整个班老村村民整体素质偏低，思想简单、愚昧。造成的后果是：他们贪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同时，对法律一无所知，屡屡被毒枭所利用。

由于村民文化水平低，不具备科学知识，虽然有部分农民想靠养殖业发家致富，但该村无人懂养殖知识。崩龙寨村民沙某，有一年养了5头猪、40多只鸡。因为猪、鸡不幸患上传染病，未能得到及时医治全部死亡，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刚过去的一年，全村因为猪、鸡因病死亡造成的损失超过数万元，这对于并不富裕的村民来说，打击非常大。杨林强说，全村富余劳动力为1100多人。虽然政府多次组织民工到深圳、广州等地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不会讲普通话，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差，效果不太理想。更多的人宁愿在家附近“打工”或赋闲在家里。

为了让班老村村民早日富裕起来，当地政府依托附近的糖厂，鼓励扶持村民大力发展甘蔗种植业。村民郭晓敏说：“我们家共有12亩山地，过去是种玉米，每亩地收入只有400元，从去年开始，政府扶持我们改种甘蔗，每亩地收入700元。现在我们寨子有70%、80%的人都在地里种了甘蔗。”郭晓敏告诉笔者，崩龙寨村民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靠种甘蔗，政府除扶持他们种甘蔗外，还帮助他们发展养牛、养猪等副业。早在2006年，政府还无偿给村民们提供了早熟核桃新树种，每亩山地栽种40棵，她们家共种了132棵，现在有的已经开始挂果了。永德县小勐统镇扶贫干事李建昌说：“当年，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了班老村的情况后，县、镇两级政府立即给班老村拨付了

40 万元扶贫款。村委会用这些钱修通了到芒兑自然村的简易蔗区公路，买来了 1.33 万株早熟核桃树种（免费发放给 90 户村民，3 年就能产生效益），另外还为村民建成了 4 个沼气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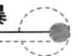
经过禁毒部门的大力宣传，一些村民们已经有了和贩卖毒品斗争的意识。近几年来，班老村村民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举报有人吸贩毒的事例不时出现。有一年，小勐统派出所接到村民举报，有人利用汽车油箱贩毒。在村民的带领下，民警在老都街对面山路上的吉普车油箱内查获毒品海洛因 1462 克。另外，村子里还自发形成了一批禁毒积极分子，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都会迅速地向当地派出所报告。

杨林强说：“自从 2000 年云南省把班老村列为全省毒品重点整治村以来，临沧市相关部门多次派工作组到班老村，帮助村民改变靠背毒运毒生存的方式，为村民寻找新的经济来源，现在崩龙寨再没有人出去运毒背毒了，整个班老村的贩毒情况正逐渐减少，但要完全杜绝‘背毒’这种恶习还需较长一段时间。”

4、睡在桥下，卖淫吸毒

2007 年 4 月 12 日，笔者在广东采访时，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郑东向笔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2004 年收戒吸毒人员 72434 人次、2005 年收戒吸毒人员 74438 人次、2006 年收戒吸毒人员 72627 人次，目前全省公安系统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床位 37654 张，仅去年收戒率在全国就排名第三，全年月均在所戒毒人数 29732 名（高峰期在所人数高达 34000 多名）……这还不包括司法系统所属戒毒所，以及民间力量开办的自愿戒毒所的与之相当的戒毒床位。

广东禁毒，已迫在眉睫！在广东，制、贩毒品犯罪和吸毒现象在全国较为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仅全省在册的吸毒人员一年就至少吸掉毒资 40 亿元。由吸毒引发的各种刑事案件、社会悲剧在不断上演。为了割掉这一社会



“毒瘤”，广东开展了“禁毒03”工程，禁毒严打整治获得了累累硕果，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禁毒宣传，使禁毒观念深入人心。

现实中，广东的毒潮让人触目惊心，已经到了必须出重典的地步了。

李昌浩老伯再也不敢走那条街了。李昌浩是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名国家退休干部，他所说的那条街是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春风街。

在广东深圳，瘾君子当街注射毒品，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春风立交桥下，十多名瘾君子男女睡在桥底下，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每天他们或偷或抢或出卖色相，非法所得都是为了图一时之快——购买毒品，买到毒品后，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将毒品进行简单勾兑后用针管扎向自己的大腿。

笔者赴深圳采访的那一年正逢春风路立交桥附近进行路政改造，笔者发现靠佳宁娜广场旁边的桥底已被拦板隔住，形成一个“包围圈”，只有一扇临时木门可以直接进入拦板内。在“包围圈”外面，一些妇女怀抱小孩在向路人推销着黄色光盘，在桥下的几个石墩上，还有一些年轻人围坐着打扑克牌。

进入“包围圈”，是一片绿化带，里面正在进行施工。“包围圈”里面有一个较大的配电房，周边的环境极差，大小便经日光的暴晒散发着难闻的气味。配电房旁边的走道上，摆放着一些异常污秽、肮脏的棉被，上面横七竖八躺着一些男女，有的已经熟睡，有的在悠闲地抽烟。当笔者从配电房旁边的路上经过时，发现睡着的几名男女手臂由于长年扎针留下的疤痕。配电房周边和绿化带附近，也随处可见注射用过的针管、针头和带血的卫生纸。

据一名自称在桥下做绿化工作已达4年之久的龚姓男子介绍，桥下的男女大多是吸毒人员。这些人整天都神出鬼没，几名女子原来在桥下招嫖，专门找一些老年男人，将他们带到绿化带进行性服务，完事后拿钱离开，然后买回毒品或吸或注射。而那些男的白天大部分时间除了睡觉外就是注射毒品，晚上很少见到他们的踪影。“这些人有时也会男女同时出发，一般都是由一名吸毒女子带着两名吸毒男子离开，几个小时后再回到桥下，然后各自拿出针管注射。”该男子说。

据附近执勤的一名治安员介绍，桥下的这些吸毒人员已有很长时间了，都没办法管理，也不知道他们的毒品从哪里来的。虽然公安机关会不定时对

他们进行清理，但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又会回来。

周围的居民反映，立交桥下这些人的存在，给周围的治安带来很大隐患。附近罗湖新村社区的几名居民说，因为这些吸毒男女长期住在桥下，那里经常发生抢劫事件。同时，罗湖新村社区内也经常发生自行车和三轮车被盗事件。

该社区的一位民兵说，社区内90%以上的房子属于出租房，里面居住的人较杂，来自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管理难度比较大，虽然整天都有民兵在社区巡逻，但还是经常发生偷盗事件。当笔者问其是否知道附近的春风立交桥下群聚着很多吸毒人员时，该民兵称“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对这些吸毒人员是否有到社区内作案的情况，他表示不能完全确定。

据市民介绍，这里原本是一个开放的小型公园，现在因为要实施路政改造，公园四周被围了起来，成了一个工地“包围圈”。

工地大门写着“工地重地，闲人勿近”，但大门并没有上锁，也没有人把守，路人可以随便出入。刚一推开门，笔者就闻到一股强烈的尿骚味，让人几近窒息。“包围圈”内一个大配电房旁边的过道上，放着多床被褥，一名男子在上面熟睡，笔者几次从他身边走过，他都没有醒来。在这条过道旁的灌木丛中，笔者发现了众多丢弃的注射用针筒。

据一名自称在附近工作的老环卫工人介绍，大约七八年前，这里便成了吸毒人员的落脚点，他们人数不固定，但都会在这里吸毒，大白天也毫不遮掩。这名环卫工人说，他以前负责打扫公园卫生，一天下来可以清理出几十支针筒。

笔者来到春风立交桥下时发现，有一些男女在聊天，这些人都自称是在立交桥施工的工人及家属，他们说自己白天工作后，晚上一般都会在桥底下聊天到晚上11时左右再回住处。

据“包围圈”外面的工人介绍，这些人晚上7时左右就陆续出动，不知道他们到外面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回来时，都会分别在配电房旁边的棉被上和绿化带中，拿着带针头的针管扎自己的腿部和手臂。

笔者来到紧挨“包围圈”的一个两层高的工棚。透过工棚的窗户，正好可以观察工地内的吸毒人员。工棚内的工人显然已经对窗外的住客很熟悉，



笔者一说明来意，他们便心领神会，一口答应让笔者进去。

此时有 7 名男女睡在公园的过道上。不久，他们陆续醒来，笔者注意到有两名男子是残疾人，一个要靠拐杖辅助走路，另一个瘸腿而且一只手臂没了。随后，几个人起床后离开。笔者跟随拄拐杖的男子到附近的一条小巷，那里有一群回收废旧电器的人在闲聊，该男子一到就与他们有说有笑，并在小店买了瓶白酒，与他们对喝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那两名残疾男子喝完酒回来了，此时工地内一名女子也醒了过来，坐在地上吃了一个苹果，不久便拿出一支针筒，跪在地上，脱下裤子，一针扎在大腿内侧。

笔者走进草丛，想从远处观察，却发现离笔者几米远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他把皮鞋脱下，裤子也脱到脚跟，裸露出双腿。他的双腿明显比常人细小，上面布满了黑斑。该男子正从各个方向观察自己大腿的每一寸皮肤，他身边放着一支装有溶液的针筒和一张纸巾。也许，对他来说，要找到适宜扎针的部位已经不容易了，然而他很耐心很细致。

大约几分钟后，他发现几米外笔者正注视着他。他瞟了笔者一眼，然后又埋头寻找，仿佛正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20 多分钟后，他拿起针筒，扎进了大腿内侧。

睡在工地“包围圈”内配电房旁边的一名红衣女子起来，她拿起一个绿色的皮包背上，和周围的几名男子聊几句后，独自一人走出“包围圈”。

红衣女子加快步伐，走到附近的罗湖新村社区门口时，两名女子正在等她。3 人一阵说笑后，一名中年妇女从裤兜中掏出一包东西，交给红衣女子后又聊了几句，红衣女子又加快步伐走回工地，把东西交给一名男子。

该男子接到东西后，从被子里拿出一个针管，将红衣女子给的东西吸入针管，对着自己右手背扎了下去……

2011 年，深圳市召开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该市采取了一系列大收戒、集中严打整治专项行动，禁吸戒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街面上的毒情形势得到了较好遏制。

5、毒品套餐

在广州工作达6年的张小姐想起那一幕至今还心有余悸：2006年6月的一天，广州市一名“吸毒仔”因吸毒身体出现严重病变，走着走着一下子颓然倒地。张小姐就走在他的身后，她从及时赶到的110警察那里知道了那个倒地的小伙子是名吸毒仔。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从而揭开了由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等组成的“毒品套餐”，已成为新的毒品犯罪在广州及其他一些大中城市泛滥的新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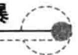
据侦结此案的广州市王警官介绍，“吸毒仔”名叫小刘，两年前，小刘在朋友的怂恿下，在广州市三水区某出租屋购买“毒品套餐”，从而患上药物依赖症，两年来先后花掉5万多元。据小刘介绍，因吸食这种毒品价格相对于传统毒品海洛因要便宜得多，因此类似他这种吸食“毒品套餐”的瘾君子在广州越来越多。

据小刘说，两年前，他因吸食白粉曾去戒毒所成功戒毒，戒毒两个月后，有一位朋友骗他说：“有种东西是提神的，不是毒品，但也可同样享受爽的快感，很便宜，对身体没害处，你不妨试试。”在朋友的怂恿和带领下，小刘去三水区医院附近某出租屋花了15元钱购买了一套“药”，回家注射后，确实和吸白粉的感觉一样。

小刘当初不知道，这一套“药”其实是软性毒品，它是由国家一类精神药品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简称丁丙片）与二类精神药品地西泮注射液及盐酸异丙嗪注射液、盐酸莱海拉明注射液组成，连续使用会使人形成瘾癖，而一旦成瘾，比海洛因更难戒除。

小刘说，他开始时是每天注射一次，后来是两天3次，现在每天要注射4次甚至5次才能过瘾。两年来，小刘为此花掉了5万多元。

由于父母下岗，他只好去偷，去抢，去骗！每天挤公交车伺机行窃，或伙同他人去抢别人的包、项链，得逞后就去买“套餐”过瘾。他因此成了居



住处所属派出所里的常客。

如今，在小刘的胳膊和大腿上，到处伤痕累累，几乎找不到下针的地方。加上盐酸丁丙诺啡舌下片是固体药片，需捣碎成粉末溶入注射液后才能注射，而粉末不能完全溶入药液中，细微颗粒直接进入静脉血管很容易发生血管堵塞。“静脉都堵死了，我只好在动脉上切口注射。”小刘说话时充满悲哀和绝望。

小刘脱下裤子，笔者看到，其两条大腿惨不忍睹，血管已明显硬化，多处有腐烂的伤口，且虚肿得厉害。“如今我的体质越来越不行了，经常感到胸口剧痛，头晕目眩，全身乏力。毒瘾一犯，就难受得在床上滚来滚去，感觉生不如死。”

这是一家媒体记者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自述：

在我赴广州的第二天下午 15 时 32 分，就径直坐出租车来到“线人”提前告知的这间出租屋附近，小刘临时却不敢带我去买药。“卖药的这次见我带陌生人来买药，以后会怀疑是我举报的那我肯定死定了。他们都是些亡命之徒。”小刘告诉我，“我现在两手空空进去，买了药出来，不就证明我所言不虚了?”

我看到，所谓的“毒窝”是一间没有门牌号的民房，门口有铁闸门紧锁着，小刘用力敲门，过了好久，才见到一个青年女子开门。见小刘进去后，我慢慢从门口经过，看到里面小刘正和那女人在交易。见我在门口张望，女子忙放下手里的货，警惕地朝外盯着我，我只得赶忙快步离开。

不久，站在远处的我见小刘手提一个黑胶袋出来，到达会合地点后，我果然见小刘黑胶袋里是“毒品套餐”的 4 种药和一支一次性的无菌注射器。

小刘脸上冒汗，责怪我：“差点出事了，你老往里看，那卖药的怀疑我被公安跟踪，还问了我好久呢。”离开时，小刘补充说：“这出租屋至少原地不动地卖了 3 年‘毒品’，每天起码有 50 人来买这种套餐。”

第三日下午，我决定亲自进入出租屋买货。下午 5 时左右，我来到出租屋，刚好碰上铁门半开，屋里有两个男子正在交易，却不见上次那名女子，我稳住气、壮着胆走了进去。

屋里很小很暗，摆设乱七八糟，除了客厅，还有两间小里屋。见我进来，

其中一个有胡子的男子手拿黑色胶袋匆匆离去，另一个20多岁、身高有1.85米以上的男子向我大声怒喝："你是干什么的?"

我平静地回答："大哥，我想帮朋友买点药水。"

男子打量了笔者几眼，突然说："没有没有，你找错地方了，快走快走。"一边说一边将我推出了门。

事后我与小刘联系，小刘说："他们警惕性很高，加之最近广东一些媒体报道很多，他们变得很敏感，现在不是熟人不出货的，最起码也要有熟人带过去才卖。如果没熟人带，试着多去几次，脸熟了他们也可能会卖给你。"

我只好无功而返。

第4天上午，我冒险再探毒窝。为了安全起见，特意约了现在广州某公司任保安队队长的战友小周同去。

下午1点多钟，我和小周来到出租屋，小周扬手敲铁闸门，不久此前我见到的那名女子开了门，她见到两个陌生人感到很奇怪，我忙假称是来帮朋友买点"丁丙"片的。

"谁介绍你们来的?"该女子20来岁、1.65米左右，操一口难以听懂的外地口音，表情很严肃地盘问我。

"是线上的朋友介绍的，我们一手交钱一手拿货走人。"我和小周寻找借口。

女人迟疑了一会后，走入里屋迅即拿出一装着药品的黑胶袋递给我。果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该女子相当警觉，一收钱，就立即下了逐客令，催促我和小周赶快出屋离开。

6、"在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

她不是战士，却比战士更勇敢；她不是警察，却比警察更忠诚!

"我们很渺小，可我们是第一道屏障，如果我们的工作失职，艾滋病会更加泛滥，那我们就成了罪人。我会坚持一辈子。"她的话朴实无华，但却让几



年来一直采访禁毒与防艾工作的笔者感到温暖。

眼前的她说不上漂亮，但在了解到她的故事后你会发现她竟是那样的美丽。她叫过团，云南瑞丽姐勒乡姐勒村卫生室治疗艾滋病病人的傣族女村医。10年前，她第一次听说艾滋病。她所在的村子与毒品“金三角”地区接壤，全村近120人感染艾滋病病毒，8年前就开始陆续有人因病死亡。她不忍目睹乡亲们等死和对艾滋病防护知识和措施的无知，导致艾滋病病毒的大面积传播而选择了防艾抗艾之路，因为歧视，她从备受尊敬到被拒同桌吃饭，甚至连丈夫也离她而去……

过团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频繁地随访病人，免费发放抗病毒药品，免费咨询与检测。由于不是卫生部门的正规编制，刚开始时每月仅拿着200元补贴，现在虽说略有增加，但还需靠自己的村卫生诊所治些其他病症补贴家用。

让她最感自豪的是，在药物的作用和精心照料之下，村里的许多艾滋病人病情有了好转。

2006年5月8日中午，过团刚参加完瑞丽市疾控中心举办的防治艾滋病的培训，她接触到了一个新名词“鸡尾酒疗法”。“这个疗法能有效延长病人的生命。”过团已经将鸡尾酒疗法用在了姐勒村那些艾滋病病人身上。

“毒品太容易弄到手了，村寨与‘金三角’直接相连，瑞丽河水浅时，村民们挽起裤腿跑过去就可以买到便宜毒品。”过团一见面就对笔者说，“在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样，毒品泛滥导致艾滋病病毒交叉感染严重。”

瑞丽市姐勒乡姐勒村位于云南最西部，与境外毒源地缅甸“金三角”接壤。村寨里，谁家的房屋最破，这家准有人在吸毒；谁家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这家准是因毒品或艾滋病而家破人亡。全村5000余人，12个寨子零零散散分布在广阔的边境线上，村民90%以上是傣族。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120人，“可以算是中国防艾形势最严峻的地方吧。”

1989年，在姐勒村一个叫芒良的村寨发现了我国第一批HIV感染者。“以后的10多年，我们都不能说出现了艾滋病病人，事情被捂了起来，连几个70多岁的人都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我们失去了防治的最好时机。”过团的神情中有些遗憾。

“我是医生，不能看着乡亲们等死！”

草草咽下几口午饭，过团急急地提着包去一个病人家发放免费药品并做随访，“他的药已经吃完了，正等着送药。”

给全村的艾滋病人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品、做随访，成了过团每天的主要工作。接受防治艾滋病工作前，在村卫生诊所，过团收入可观、生活富足。现在的生活充满挑战，但过团认为：清贫而不可或缺。

过团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是在1996年。当时上级疾控中心给村里的吸毒人员免费验血，全村仅过团知道这是秘密任务——检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从那时起，她开始关注艾滋病的相关报道，后来她惊讶地发现，村里有不少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出于职业敏感，她认真观察并搜集相关资料。那时，她只知道这个病有5至15年的发病期，而当她有意上门调查时，骂声常常追着她，谁都不愿意受歧视。

5年后，村里有艾滋病人死去，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可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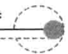
2001年，德宏州组织艾滋病蔓延区的村医进行相关培训，过团作为防艾村医接受重点培训。2002年，姐勒村成了中英艾滋病关怀项目的首个试点村，项目组让过团负责整个村项目的开展。

过团是傣族村医，能与傣族村民无障碍交流，所以比其他医生更容易完成抗艾任务，但她依然觉得阻力重重。艾滋病人因免疫力下降易引发其他病症，可有些人穷得连最廉价的治疗费都付不起，最后只得由过团垫付。丈夫因为她干这个既危险又累、没钱赚还不讨好的工作频频与她吵架。过团淌着泪对丈夫说：“这乡里乡亲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让他们等死，我这个当医生的看不下去！”

2003年底，丈夫与她离了婚。顶着经济和感情的双重压力，过团坚持了下来：“我的生活已与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你天天跟艾滋病打交道，别也有那病吧。”

为了方便让村民随叫随到，过团专门买了一部“小灵通”手机，联系她



的小灵通 24 小时开机，只要村里的艾滋病人一个电话，她都会及时赶到。

起先，村民们并不知道艾滋病是啥病，有人发病身亡，都以为是吸毒吸死的。“最难的就是让村民们从不知道艾滋病到了解防治艾滋病，从畏惧到坦然面对，从拒绝到接受治疗。”过团为此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刚开始做防艾工作时，村民们见过团成天念叨艾滋病，以为她染了病，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愿意进她的卫生所治病，令其陷入经济困境。而当她给病人发放抗病毒药品时，甚至被人放狗赶出门。她到哪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到哪家，就证明那家有艾滋病人，染病的村民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更受打击的是自尊。以前乡亲们家里有喜事或来了贵客都会请过团吃饭。可她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一个乡亲贺喜的场合，有个老乡对她说：“你天天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别也有这个病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从此爱热闹的她很少参与这些场合了。

有一年，过团接到一项新任务：协助省市卫生部门开展艾滋病母婴阻断项目。她的具体任务是给村里的每个孕产妇抽血样送市疾控中心做 HIV 检测。一次，她给汉族寨子的一位孕妇检测后发现是阳性，孕妇的丈夫立即对着老婆咆哮起来。

“她只是哭，我陪了她一整天，就怕她想不开去自杀，我反倒成了杀手。”给这对夫妇做工作、讲道理后，过团第二天陪着孕妇去市里进行了母婴阻断生产。

艾滋病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哺乳期母婴阻断项目提供免费奶粉。“她婆婆总问为什么，我只好骗她说‘孕妇出血太多不适合’。”按规定，她丈夫应接受 HIV 检测，但他怕受歧视死活不肯。原本对小孩和艾滋妈妈的跟踪检查，也因这对夫妻出外打工放弃了。

很多人检测出来是阳性时，都立即叮嘱过团不要透露出去。而直到现在，每次去那个汉族寨子发放药品和随访，过团都要遭到白眼甚至辱骂。“即使这样，你也得去，这是你的工作。”

过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她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僧侣的帮助把一些村民集中在佛塔下，然后详细讲述使用

方法。"傣族人信奉佛教，这样能让村民更重视。"过团说，"可许多老人当场就骂我'亵渎神灵'，我只能苦口婆心地讲使用安全套的好处。"

"村寨一些傣族姑娘谈恋爱，也不管对方是否染病，结果结婚后双方都感染了，生的小孩也可能感染。"过团为此没少花心思，却被说成"多管闲事，破坏婚姻"。"可这是防治艾滋病最起码的知识啊！"过团一提起这些就显得相当激动。

"村里的寡妇一个组竟有30多个"

村里艾滋病最严重的寨子是贺肥。全寨700多人，吸毒的占80%，有记录的艾滋病病人有35个，大部分是青壮年。有一年就发病死了20个。"男人死了，家就毁了，最不忍心看艾滋孤儿的眼睛。最怕去一个叫棒蚌的寨子，那里艾滋病家庭的寡妇非常多，有个组竟有30多个，屋子连成一排，让人见了就想哭。"然而，每年她都得为几个病人送终。

对于病危艾滋病人的发病情况，过团都会详细记录，每一次经历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痛。"作为医生，最无奈的莫过于看到病人病危而无能为力。艾滋病人生命垂危时全身溃烂，惨不忍睹。"

为艾滋病人治病时，过团也曾碰到危险。"去年给一位艾滋病人输液，他的针头把我的手弄出血了。遇到这样的职业暴露，很多村医都不会正确处理，上次参加培训时，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过团说到这里，竟有些自豪。

让她更自豪的是，在她的协助下，姐勒村新平寨成功诞生了德宏州首例母婴阻断的婴儿。这个成功病例对德宏州乃至整个云南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医护人员有能力控制艾滋病病毒的母婴传播，艾滋妈妈可以生出健康娃。

"我不过是个农民医生，对艾滋病人的照顾是份内事。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我从不后悔。"过团说，每当自己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见到病人的笑脸，就会很满足。"有个卖菜的艾滋病人在接受帮助后病情好转了，每次他卖菜经过我家时，都会送上一条鱼或几个鸡蛋，那份心意真的让我感动。"

采访结束时，过团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先



进个人”的荣誉证书，证书里还夹着200元奖金。这是2006年3月由云南省卫生厅和德宏州卫生局联合颁发的。“那天领奖的都是防艾专家、大医院的医生，只有我一个是村医。”

阳光下，笑起来的过团显得越发美丽。

7、400元一瓶的饮料

2006年6月7日，在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采访时，警官陈开明告诉笔者，早在20世纪，有关专家就预言“到21世纪，世界毒品将是冰毒的天下，它将替代海洛因成为重要的毒品。”专家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仅2005年，云南省破获的冰毒案件就达938起，缴获冰毒3.15吨，占全省缴毒量的29.3%，冰毒犯罪呈剧增趋势，合成毒品正在云南乃至全国迅速蔓延。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两禁处警官胡玉仲告诉笔者，“在云南少数歌厅，客人只要说‘要400元一瓶的饮料’，服务台的‘妈咪’就知道客人需要什么服务。”

这在昆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冰毒就在我们身边

“如果当时窗户不是封死的，我就直接从13楼跳下去了。”在京从事钢铁生意的刘老板这样告诉笔者。那一年，他回沈阳老家办事。由于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每次沈阳的朋友来京时，都是他安排“一条龙”接待，而他回沈阳办事，他的那帮朋友也都会大摆宴席来招待他。在一次聚会后，朋友请客让他吸食了冰毒，当时可能是吸毒有些过量，他精神特别亢奋，极度狂躁，满脑子充斥着攻击性暴力倾向，见人就想打，什么事都敢做。后来他在幻觉中，把宾馆的窗帘点着了，好在及时被宾馆服务人员发现，才没有酿成火灾。

他还说，如果当时窗户不是封死的，他连跳下去的念头都有了。

而早在2006年笔者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禁毒处采访时，时任禁毒处

政委的赵金国不无忧虑地说，在他们查获的涉毒案件中，不乏公检法司国家公务员在“溜冰”。普遍的做法是，将冰毒当作嫖娼用的性药。在一些性开放城市，“伟哥”的销量在锐减，几乎被冰毒所替代。

他当时就断言，几年之后合成毒品冰毒将成为中国主要毒患。当时笔者还觉得他的话有些杞人忧天，而在几年后的今天，全国31个省市区均出现查获合成毒品案件的现实，让人不由得佩服他的前瞻性思维与眼光。

在云南这样一个以传统毒品海洛因为主体的吸贩毒省份，每年所查破的合成毒品案件及缴获的合成毒品数量均在高位增长。

不久前，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根据群众举报，仅对昆明市区的两个歌舞娱乐场所进行清查，就查获吸食冰毒等合成毒品的违法人员41人。这部分吸食合成毒品的违法人员中，既有个体从业者，又有宾馆饭店的服务员，还有的竟是在校大学生和医护人员。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从历年破获的贩卖合成毒品案件和抓获的吸食合成毒品违法人员的情况分析、调研来看，合成毒品已侵蚀昆明地区，而且来势凶猛，娱乐场所吸食、贩卖合成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日趋严重。

前几年在昆明破获的一起特大贩卖合成毒品案的主犯之一刘某，在经营歌舞厅期间，不但利用其开设的歌舞厅作为贩卖合成毒品的窝点，还将其开设的歌舞厅的多个包间设为“特区”，供前来吸食毒品的人员专用。

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男女对在歌舞娱乐场所出现的合成毒品只知其能强烈刺激人体的中枢神经，增强娱乐、兴奋度，而对合成毒品的成瘾性、依赖性和对肌体器官的侵害等不甚了解，乱吸滥服。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场所已出现专门陪侍吸食合成毒品的坐台小姐，这不仅助长了吸毒活动，还极易出现淫乱活动，引发性病、艾滋病等疾病的泛滥。

在云南某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一名戒毒学员向笔者讲述了她的吸毒经历：

我叫涛涛，今年23岁，由于家庭和生活的双重压力，2005年从老家湖南长沙来到云南，当时我只有22岁，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幻想的女孩。

由于学历不高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我的工作一直不稳定。一次生活中



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我极度烦躁，这时我的一位好姐妹就告诉我吸食“白粉”可以忘掉烦恼，当时的我，精神空虚而又好奇，对毒品一无所知，就和她们一起吸食，一次、两次、三次，不知不觉中感觉身体得到了放松，精神也好多了，许多不开心的事情也暂时忘记了。可对毒品的依赖性却越来越大，没有它就感觉浑身无力，心情忐忑不安，瞌睡一个接着一个……从此，我卷入了一种地狱般的生活，当我意识到这种无休止重复的严重性后，在家人的陪伴下，我第一次自愿走进了戒毒所。在戒毒期间，我从内心深处告诫自己，必须坚决戒断毒瘾。

几个月的戒毒所生活，我成功地完成了生理脱毒，全家人都跟着我一起高兴，他们都真的以为我戒断了毒瘾。

一天，我的一个好姐妹在家过生日，为了好玩，便提议“溜一下冰”，那些姐妹还对我说，“冰”是提神解乏的，人吸了后不会成瘾，可产生兴奋，不经意间就吸上了。吸毒上瘾后，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又回到了昆明，在那里不仅毒品容易获得，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会管我。在昆明期间，我很快找到在歌舞厅上班的工作，面对歌厅里的灯红酒绿，我慢慢做起“坐台小姐”，老板为了吸引客人，提供不同服务来满足客人的不同消费，在我们内部有“素台”和“哈台”两种不同的服务方式，“素台”就是陪客人喝酒、唱歌、跳舞，每个“坐台小姐”在陪客人过程中将收取200至300元不等的坐台费；“哈台”除了有“素台”的一系列服务外，还要陪客人吸食毒品（主要吸食冰毒、摇头丸），每个“坐台小姐”将收取300——500元不等的台费，在这期间，如果客人有那方面的需要，他还得另外加钱。

在歌厅，只要客人说“要400元一瓶的饮料”，服务台的“妈咪”一听就知道客人需要什么服务。而近年来，由于物价上涨，这个价码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接到客人的服务要求，“妈咪”首先为客人开好一间包房，然后再为每个客人提供一位“坐台小姐”，接着就是提供“哈台”的各项“优质”服务。一般客人都是凌晨才来，一直玩到天快亮时才走。在消费中客人让“坐台小姐”陪同自己一起吸食毒品，陪客人一起兴奋。

据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某派出所李所长介绍：2010年9月18日，该所破

获一起盗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团伙系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员两名，该团伙自2009年以来先后作案146起；同年10月26日，该所又破获一飞车抢夺团伙系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据他们供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抢夺64起。在这两个犯罪团伙中，有10名犯罪嫌疑人为涉毒人员，吸毒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这些都是男性瘾君子。那些女性瘾君子在吸毒成瘾后，几乎无一例外走上靠出卖色相筹集毒资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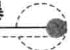
据李所长介绍，因吸食冰毒后驾驶摩托车飚车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不计其数。“毒驾”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不确定因素。2011年6月9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说，国家禁毒委将积极推动“毒驾”等工作的相关立法。

多种原因造成冰毒蔓延

据专家介绍，冰毒，化学名称为甲基苯丙胺，是典型的神经兴奋类药物。外观为纯色结晶体，晶莹剔透，酷似冰块或冰糖，故被吸、贩毒者称为“冰”，其形态有片剂、丸剂、溶剂等。冰毒的特性与海洛因、鸦片等麻醉镇静类毒品恰恰相反，属于精神类兴奋型毒品，通过口服、鼻吸、卷在香烟中或静脉注射的方式进行吸食。过量吸食冰毒可导致急性中毒，头晕、无力、烦躁不安、易激怒，甚至出现幻觉、恐惧、疑心等精神混乱和性欲亢进，变得爱挑衅滋事。

境内外毒贩为了牟取暴利，相互勾结，将毒品贩卖进入我国境内，尤其是冰毒等合成毒品的危害就显得越来越突出。冰毒已经成为了当前销量较大、危害较大的毒品。

长期研究毒品问题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禁毒专家、研究员、作家张西认为：冰毒类合成毒品最早使用的国家为日本，当时主要用于战时士兵连续作战，近年来，随着各国禁毒工作的力度加大，境外先后实现罂粟禁种后，加工传统毒品海洛因的原料鸦片锐减，境外毒品海洛因价格暴涨，使毒贩从中获取利润的空间变小，加之我国对边境管控力度加大，无形中增加了贩毒的风险。因此，境外毒贩转而把制贩毒品活动转向成本投入低于海洛因的合成毒品冰毒上。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冰毒作为合成毒品之一，对大部分毒商来说制造成本低廉，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加之一些人对此类毒品的认识有误区，认为吸食合成毒品不易成瘾，从而在不断尝试中，最终滋生出大量合成毒品的消费群体。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境内外毒枭、毒贩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加工生产合成冰毒时，按照使用原料的质量、比例和价格成本的差异，从而生产出适合不同阶层消费的合成毒品冰毒。

而现在，青少年群体、白领阶层及一些演艺明星已经成为合成毒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据公安部禁毒局有关人员介绍，据近年来查获的大量涉毒案例显示，冰毒等合成毒品替代传统毒品的趋势明显，大宗贩卖冰毒等合成毒品案件逐年增多，贩毒活动国际化、集团化、网络化、武装化特征日益突出。

冰毒犯罪来势凶猛

近年来，世界毒品生产、消费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境外缅甸北部地区毒品生产种类向多元化发展，以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产量逐年上升，我国境内主要毒源地云南查获的冰毒案件数、缴获数及吸食人数逐年增多，目前已初步呈现出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并存的态势。

据云南省公安厅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省公安禁毒部门查获的大宗贩卖冰毒案件逐年增多。据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严尚智说，过去5年云南警方破获4.1万件案件，抓获4.7万人，缴获毒品23万吨。

2010年，云南省缴获冰毒4.7吨，首次超过海洛因，加工冰毒的原料和生产海洛因的部分配剂都是内地省区经云南走私出境的。

同时，毒贩从边境一线向内地组织贩运冰毒的情况突出。冰毒查获地主要集中在云南与缅甸接壤的临沧、德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等五个市州，以及交通较发达的昆明、大理等毒品重点地区。据调查，约占全省缴获量80%的冰毒企图渗透至云南省边境一线伺机贩卖。由于贩卖冰毒藏匿方式诡秘多变，吸食、交易行为较隐秘，打击难度较大。毒品买卖双方在境内外遥控指挥，毒资通过银行或地下钱庄汇兑交易，贩毒活动向国际化、集团化、

网络化、武装化等方向发展，毒贩在组织贩运过程中多采取遥控指挥、单线联系等方法，雇佣“马仔”贩运。同时，作为合成毒品主要吸食、交易地的娱乐服务场所，因人员复杂，控制力量薄弱，零包贩卖形式成交快，现场抓获难；现场查处中对散落的毒品难以确定持有人，从法律、法理上难以定性和处理。

与此同时，传统毒品被冰毒等合成毒品替代的趋势明显。截至2010年12月，全国登计在册的吸毒人员133万人；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趋于稳定，而滥用冰毒等合成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滥用比例已从2001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9.5%。此外，境外冰毒入境后通过多条贩运路线，经昆明中转后流入我国内地部分地区。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冰毒来势凶猛主要是由于它具有生产设备价格低廉、加工技术简单、成本低、周期短、不需要原植物、不受季节限制且不易被发现等特点，加之国际国内毒品消费逐步向吸食冰毒等化学合成毒品方向发展，对冰毒的需求剧增；我国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力度不断加大，致使境外易制毒化学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制造海洛因成本大幅增加等原因。“金三角”地区制贩的海洛因比重有所减少，但制贩冰毒等化学合成毒品的比重明显加大，冰毒的制贩已经在逐步取代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据不完全统计，“金三角”地区现有的109个毒品加工厂（点）中，冰毒加工厂达18个；部分毒品加工厂既生产海洛因，又制造冰毒等化学合成毒品。此外，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的数据显示：泰国从1999年至2004年5年间，共查获来自缅甸佤联军的冰毒40吨，平均每年查获8吨。但近3年来，由于泰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毒行动，导致缅北冰毒“南下通道”严重受阻，于是转而北上向我国渗透加剧。

而国内方面主要由于人们对冰毒的危害性和违法性认识不足。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仅把冰毒作为一种解困的药品，有的甚至还怂恿周围的人滥用而迅速扩散，并且有向低龄化人群渗透的态势。国内吸食冰毒的人群和一些公检法司等国家公职人员甚至将冰毒当作嫖娼用的性药，进行不加节制地吸食，从而导致冰毒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大。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不



无忧虑地说："东北三省已成合成毒品重灾区。"

辽宁吸食合成毒品严重！吉林吸食合成毒品严重！黑龙江吸食合成毒品严重！

整个东北三省"沦陷"——吸食合成毒品泛滥成灾！

8、"陪嗨"妹揭秘：在卖淫贩毒边缘挥霍青春

笔者从东北三省相关省市禁毒部门了解到，近年来，相关省市警方相继展开了"黎明行动"、"狂风行动"、"铁拳行动"等各种禁毒严打行动，旨在持续保持对吸贩毒形成高压态势，警方在定期、不定期地对一些迪厅、夜总会等歌舞娱乐场所采取的专项行动中，每次均有数量相当多的"陪嗨"妹在"陪嗨"过程中被抓现行，她们为了给客人"助兴"，整夜"陪嗨"，有的在药物的作用下脱得一丝不挂，有的集中淫乱……丑态百出！

据调查，这些"陪嗨"妹多数是涉世不深的无业女青年，为了追求梦想，大多从偏远的农村来到城市，也有一些是城市里的"问题女孩"，在"钱"和"毒"的双重诱惑下，从事着"陪嗨"职业，透支着自己的青春与健康。近日，笔者走近了"陪嗨"妹一族，从而揭开了这群另类女孩的神秘面纱……

"陪嗨女"的颓废人生

笔者的案头放着一封封沉甸甸的卷宗：李健、刘欢、姚江、薛丽 4 人因涉嫌贩毒被大连市金州区检察院批捕。其中，刘欢、姚江、薛丽三姐妹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贩卖麻古等毒品百余粒。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三姐妹平均年龄只有 22 岁，由于一起做"陪嗨"妹，并根据年龄大小结成了"拜把姐妹"。据 3 人交代，她们在去年 9 月份的一次"陪嗨"中结识了李健，当时她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在她们看起来长得很帅气的男人会一步步把她们拉下深渊。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她们就被这个出手大方的男人所吸引，在频繁交往过程中，李健逐渐走进了三姐妹的生活，李健让她们陪他一起“嗨药”，不仅免费提供药物，而且还给她们零花钱，由于李健鬼点子多，3个女孩分别与他发生了性关系，李健还成了她们的主心骨儿，她们有什么问题总会找李健商量。交往过程中，三姐妹还知道李健是个毒贩，但已经晚了，在“陪嗨”的过程中，她们已经上瘾了。此时的李健变得非常吝啬，不仅再也不提供毒品，而且也不再和她们一起嗨了。反而是三姐妹已经离不开李健，更准确地说是离不开毒品了，因为毒品的巨大开销，她们三姐妹已经入不敷出了。后来，在李健的指点下，三姐妹也渐渐认同了李健的赚钱道儿，从“陪嗨”妹摇身变成了美女毒贩。一天，她们在将毒品卖给自己“陪嗨”的客人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与刘欢、姚江、薛丽三姐妹相比，陶陶完全是被她的网友拉下水的。

也许是出生在南方的缘故，陶陶长着一张白皙圆润的面孔，还残留着一丝尚未褪去的稚嫩，当笔者见到21岁的陶陶时，文静的外表让笔者无法将其与“毒品”联系起来。陶陶原本是个清纯的女孩，高中毕业后，她既没有上大学也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于是，她开始沉迷网吧，整日里要么跟网友天南海北地一通乱聊，要么打那种男孩子常玩的杀人游戏。也许是内心特别空虚，很快，在一位网友的多次邀请下，陶陶终于背着家人和这位网友见面了，从此，她的生活又多了另外一条轨迹。

2010年年初的一天夜晚，在网友的相邀下，陶陶和他们一起来到一家迪吧，迪吧里光线很暗，里面是震耳欲聋的低音炮发出的声响。包厢早已经被她的那位网友预定好了，陶陶进去时发现里面先于她已经到了好几位，是3男3女，见陶陶他们到来，先来的一个男孩将室内的光线调得更暗，并开始放迪士高音乐，音乐声起，那些男孩女孩都站起身，身体随着音乐疯狂地摇摆起来，边摇边将一颗药片放进嘴里，接着摇得更加疯狂……

眼前的情景陶陶以前只在电影或电视里见过，当真的有一天置身在其中时，她的心中充满着好奇，有一种想尝试的冲动，只想加入到他们那种疯狂的行列中。也许是他们看出了陶陶的心思，“来一片！这个很有效，保证让你happy！”陶陶的网友递给她一粒摇头丸，本来她完全可以很理智地拒绝，因



为她知道那种药丸是摇头丸，并且也知道摇头丸是一种毒品，早在她上中学时就已经从学校的禁毒教育课堂上知道了。然而由于她从学校步入社会后，日子一直过得相当颓废，一直想放纵自己。没有丝毫犹豫，陶陶一下子把药片放进嘴里，由于药物的作用，她坐在那里头就不由自主地摇动起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加入了他们疯狂摇头的行列。

摇了一个多小时，陶陶大汗淋漓，蹦迪后的陶陶又渴又累，她几近跌倒在沙发上，她不假思索地喝自己先前已经喝过的饮料，并且一口气喝了个精光。陶陶根本不会想到，先前她喝的饮料早就被网友动了手脚，陶陶第一次玩到凌晨两点多钟才回家。从此，只要一有时间，那几个网友就邀请陶陶出来玩，并且都是玩那种蹦迪的游戏，为了让陶陶彻底融入他们的圈子，每一次他们都会在陶陶的饮料中下药，几次阴谋得逞后，陶陶终于从被动“嗨药”变为主动要药。陶陶的毒瘾越来越大，朋友的“药”已经不能满足她的需求，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她又无法向家里要钱，毒瘾已经让她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网友这样告诉她：“应聘‘KTV 公主’呀，既能玩，又赚钱!”后来她才知道，网友所说的 KTV 公主就是“陪嗨’妹的代名词，经网友的“友情指点”，陶陶茅塞顿开，从此走上了陪嗨的道路……

陪嗨女命运多舛

据警方介绍，一般到娱乐场所“嗨药”的男人很少带自己的女友，而在“嗨”的过程中，少了女孩气氛也不好。于是，一些想“嗨”又消费不起的女孩，就主动当上了“陪嗨”妹。很多“陪嗨”妹都有着和陶陶类似的经历，她们有的不小心误食了毒品；有的是陪“嗨药”的朋友出去玩，迫于情面不得不一同吸食，慢慢地就吸毒上瘾；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原本打算试试看，孰料深陷其中；有的是被小姐妹诱导，“你吃吧，这药保证不成瘾，还能让你成神仙”，最终在不自觉中成为她的“下家”……

与陶陶一样，萱萱也是一位“陪嗨”妹，只是她的故事比那些吸毒女更悲惨。

2010 年 21 岁的大连女孩萱萱是一名女大学生，她是一个一直梦想过上上层人生活的姑娘，从她懂事起就渴望着自己能够早日成名成家，她常常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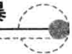
父母没有给自己更加殷实的家境。为了比同龄女孩少奋斗 10 年，她充分利用自己的“先天资源”，一心寻找与“上流人士”的交往机会，希望有朝一日能“麻雀变成金凤凰”。因此，生性贪玩、虚荣心极强的萱萱不惜荒废学业，选择做“陪嗨”妹，以求尽早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的确，正如萱萱自我感觉的那样，她的外形条件不错：皮肤白皙，容貌甜美，然而，她没有珍惜父母给她的天生丽质，误入岐途，干上了“陪嗨”的职业。正是她的这种天生丽质，在娱乐场所里，她从不化浓妆，依然是“头牌”，点她的客人特别多，在那些男人看来，她显得比别的女人更加清纯脱俗。萱萱告诉笔者，最初是听朋友说，有的“陪嗨”妹幸运地被客人看上而嫁入豪门，这使萱萱心生艳羡。因此，萱萱想，自己也没找到好工作，为了自己的将来，她想通过这种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萱萱托朋友帮忙，把她介绍到最豪华的娱乐场所当“公主”。而“陪嗨”时，她总是在客人面前尽量表现得温柔如水，她坚信美貌就是女人最好的资本，只要自己表现出色，有一天也会如愿嫁个有钱人，她在梦想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然而，当“公主”容易，想“嫁人”难，特别是那些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萱萱说，在这里“嗨”一场下来至少也得七八千元，不是什么层次的人都能消费得起的。萱萱无奈地告诉笔者，在两年多的“陪嗨”日子里，的确有很多男士向她献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投入真实的感情，只是贪图得到她的身体，把她们这样的女孩当作泄欲的工具和玩物……办案人员称，萱萱由于常年在娱乐场所兼职“陪嗨”，不但被玩弄了感情，而且由于长期“嗨药”，萱萱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据办理此类案件的民警介绍，现在不少女孩子像萱萱一样想凭借自己娇好的容颜去走捷径，她们白天是商场营业员、在校大生学，夜里是“KTV 公主”，这些女孩不仅努力“修炼”自己变得“狂野又淑女”，有时还会对客人说谎，虚构自己的身世、学历等来博得客人的注意和欣赏。虽然每天都要陪客人“嗑药”，任凭客人们搂着“嗨”到精疲力尽，也仍要保持天使般的微笑，不时为客人擦擦汗什么的……然而，她们的这种“付出”，多数都是爱情、学业两不成，有的还自甘沦落为风尘女子。

开开心心把钱赚，是众多“陪嗨妹”的理想，但事实上，“陪嗨”过程



中兴奋与风险并存。喝酒、唱歌、玩骰子、猜拳……喝得高兴了，就跟着“嗨曲儿”摇头。“陪嗨”妹的作用就是让客人高兴、起幻觉，所以客人给什么药就得吃什么药，并且保证服务到位。

晓敏是个职业“陪嗨”妹。据她讲，她“陪嗨”的目的就是为赚钱。陪一个台（一拨客人）的小费最少要200元，多的时候可拿到上千元，这跟客人的实力与自己的表现都有关系，一个月赚到上万元是很正常的。但这些钱不能不说是用青春、尊严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她告诉笔者：“我们干了这一行根本就没法回头，一听到的士高音乐或者一喝酒，我们就会浑身燥热，如果不‘嗨’就比死还难受。陪嗨不但能解除我们自己的‘瘾’，还能赚钱。不干这个，从事别的工作所挣的钱根本没法维持我们的生活。”晓敏说，客人找“陪嗨”妹的目的无非有两种：一是充场面，二是占便宜。常有客人故意让“陪嗨”妹超量服药，看她们在自己面前尽显媚态，趁机占更多的便宜，而“嗑药”后的人往往都会神志不清，根本不能保护自己，好多女孩就在那种迷离的时候失的身。

据办案人员介绍，“陪嗨”妹大多数都在“嗨”的时候异常兴奋忘乎所以，然而“嗨”完后，等待她们的生活将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空虚。

近年来，笔者采访得知，一些迪厅、酒吧、夜总会、宾馆是“陪嗨”妹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地方公开招聘的“KTV女服务员”、“KTV公主”等其实大部分是“陪嗨”妹。除此之外，朋友间相互介绍，也是“陪嗨”妹入行的主要途径。

从警方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一种名为麻古的合成毒品在吸毒者中广为流传，吸食后很容易将自己的秘密和隐私随意告诉他人，不知不觉受人支配、出现狂想等症状，极易被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该药又被称为“唠嗑药”、“抢劫药”、“强奸药”。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常有一些“陪嗨”妹因吸食量大而直到次日凌晨仍不能将药性完全“嗨”出来，以至于被陌生人带走，她们遭遇抢劫、强奸的事件时有发生。

那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陪嗨”妹出现呢？笔者为此采访了黑龙江省戒毒中心主任毕世梅。

据毕主任介绍，许多年轻人在第一次吸食摇头丸等毒品时都是因为好奇，

当被同伴告知不会成瘾时，便轻信对方所说的，以为仅仅是“找乐儿”，不会出大问题。但事实上，像麻古、K粉等合成毒品，对吸食者可以快速成瘾并危及生命。吸食者一旦成瘾，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来供自己消费，而那些想“嗨”又“嗨”不起的年轻女性很自然地就选择了“陪嗨”这一途经。以陪养“嗨”，既能暂时解除毒瘾，又能赚到不菲的钱，听起来像是不错的“职业”，但却是危害深重。女孩子一旦当上“陪嗨”妹，她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轨迹都将产生致命的转变，最终无力自拔。

9、冰毒等合成毒品的黑手伸向花季少年

2010年年底，面对人民网的专访，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也坦承，冰毒、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已经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泛滥，防范和打击制造、贩卖、吸食合成毒品的行为已经刻不容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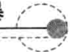
当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当一向乖巧的儿子或女儿因为涉毒被警方抓获，没有什么比这更令家长难堪和悲痛。也许在那时，家长会突然意识到，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是学业如何优秀和身体的健康发育，对于与社会的安全接触竟是如此的重要。

当网络充斥在孩子好奇的世界时，当杀人游戏充斥在各大营利网站时，涉世不深并且意志力相对低下的他们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种诱惑。当歌厅、迪厅、网吧将校园包围，劲歌、火爆的乐曲飘荡进校园，又有多少学生能不为之心动？当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闪烁的霓虹灯，路过的花季少男少女的心怎会不驻足？

近年来，在笔者采访各大强制隔离戒毒所或者社区负责禁毒工作的专干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吸毒犯罪行为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的现象，社会无业青少年和在校学生已经成为吸食合成毒品的主体。

“青春之殇”的话题在笔者近几年来的采访下，变得越发沉重。

种类繁多的合成毒品，越来越多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



对于求新、求变、求逃避、求超越的花季少男少女，完全让他们去拒绝显然并不现实。

据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雄介绍：前不久，成都市公安局曾经做过一次关于吸食合成毒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群体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如果有机会不会拒绝尝试一下，这个结果让他很是不安。

而他们在歌舞娱乐场所查获的吸食合成毒品的少男少女中，不乏多次被查获的熟悉面孔。成都市公安局禁毒处处长周伟不无心痛地说："好多吸毒娃儿的年龄与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有的比她还小，真的很可惜。"

笔者到某省一所中学采访时，曾经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答卷情况很不乐观，笔者在与他们对话时，孩子们天真的话更是让人担忧："摇头丸？它哪能上瘾呢？""听说过摇头丸，好像就是吃上后能跳舞，跳起来还不累"……这就是一个小学生对摇头丸的印象，除此之外，它作为毒品的可怕危害却很少留在孩子们的脑海中。

近年来，吸食合成毒品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每每想到这些，辽宁分管全省的戒毒所的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赵子阳心中充满着忧虑：由于吸毒人员越来越多，加之各地吸食合成毒品成瘾性认定的标准不一样，导致各地收戒不统一，更重要的是那些偶尔吸食合成毒品的，一下子被收戒进戒毒所，与那些吸食传统毒品的戒毒人同住在一起戒毒，自然而然会沾染上那些往常吸食毒品人员的坏习惯。

吸毒低龄化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王林忧心忡忡地告诉笔者，目前四川警方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绝大多数吸食的是合成毒品，吸毒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已经引起家长、学校、社会的广泛关注。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每一个家长、每一个老师都要意识到合成毒品对孩子造成的威胁，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快乐而健康地成长，近几年来，四川省在全力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目的就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禁毒工作。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吸毒是一场死亡游戏，之所以夺人心魄，是因为当事人是在用最珍贵的生命做赌注。"但是当笔者面对这些众多因为吸食合成毒品而走进戒毒所的吸毒女时，在她们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却看不到丝毫的悔

恨，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笔者走进了四川省自贡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她们讲述的故事里，两个吸毒少女让笔者陷入了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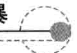
已经17岁的小花还像一个孩子一样，整天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2008年6月3日，她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那一天凌晨，她在和朋友聚会时，吃了一粒摇头丸。当小花讲起这段往事时，一双大眼睛中充满了迷惘。“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要吸毒，只是觉得好奇，很想尝一下。吃下去后，刚开始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就有了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到了戒毒所，小花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后才明白，那就是吸毒的最初感觉，渐渐地毒品会在人身上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让人无法自控，直到一点一点地耗尽生命。

直到民警出现在她面前那一刻，17岁的小花才知道吃摇头丸也是吸食毒品。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在戒毒所，笔者与气质脱俗的小花聊了很久。那天晚上，她和10多个朋友在一起玩，有人提议吃粒摇头丸，跳起舞来有劲。“我吃过好几次了，什么不良反应都没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上瘾。”看起来一脸真诚的姐妹这样骗她。在大家的怂恿下，小花吃了一粒摇头丸。那天晚上，和她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吃了所谓不上瘾的摇头丸。她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不会上瘾的东西，最终把她送进了戒毒所。

“记者同志，能不写我的名字吗?”她怯生生地问。小艳（化名）穿着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发的统一服装，在笔者说明采访的目的后，她试探性地问。

笔者明确告诉她不会写她的真实姓名后，她一直紧张的神态舒缓开来，表情也变得自然。记者与小艳的交流在异常顺利的情况下进行，这得益于小艳的健谈。

“我碰这个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是一个姐妹在我痛经痛得下不了床时，她说有一种药能治这病，就这样我一步步地吸上了，并最终上瘾。”小艳说她的经历与大多数初吸者一样，都是在“好友”的引诱下，并最终成瘾。“大约一年后，我在拿‘药’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被强戒的经历，那时候我女儿才两岁多。”说这话时，小艳始终低着头，像在沉思。



很快，3 个月后，小艳出所了。那天，是小艳的丈夫与可爱的女儿到戒毒所门口接她的。丈夫为了迎接她，还特意到家附近的一家餐馆点了一大桌子菜。看到目光有些陌生的女儿，看到在她入所后既当爸又当妈变得消瘦的丈夫，小艳在出所时就一直忍着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河，一下子奔涌而出……

三口之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欢歌笑语。

不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个平静了近十年的家庭：丈夫肝癌晚期不幸去世。知心爱人的悄然离世，家中的经济支柱一下子坍塌，也一下子击碎了小艳的精神支柱，她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往日祥和温馨的家，笼罩在悲痛与缺少生气的气氛之中。

小艳想摆脱一直压抑得她有些窒息、无法放逐与宣泄的生活。这时，她想起了能给她带来欢悦与快感的神奇东西，很快，她第二次被强制隔离戒毒。“那种‘飘’的感觉真的太短了，更多的时候是‘我很快从空中’回到残酷现实中，又开始重复那种不人不鬼的生活。”小艳坦言，复吸的日子让她非常痛苦。女儿也长到了 13 岁，比她还要高一些。

“现在女儿跟谁一起过？你就不怕她跟你一样吸毒吗？何况现在吸食合成毒品的人很多……”这些问题仿佛是击中了小艳的神经，也许是对女儿的愧疚，当记者一问完，她就一下子抽泣起来，眼中满是泪水。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她今年已经 13 岁了，她要是再学坏，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我去年进来后，她一直跟我妈妈生活，妈妈退休后工资也不高，还要负担女儿的生活费，过得异常艰难。我入所已经一年多了，我都找过好几次所长，想申请早一点出去，照顾一下女儿。”说完这话，小艳求助的目光写满担忧。

“今年暑假，妈妈带着女儿来看我，女儿走时给我留下一封信，我是每看一次就哭一次，女儿在信里这样写道：妈妈，我们班上已经有人因为吸毒被抓走了，我真的有些害怕。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戒掉了，还是我的好妈妈……”小艳说，为了妈妈，也为了女儿给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出去后一定戒掉，她准备出去后带着女儿回福建，脱离毒友圈子，做点小买卖，开始新的生活，因为她最害怕的就是女儿步她后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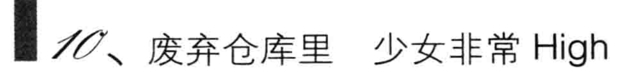
在与吸食摇头丸的孩子们交谈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让笔者格外吃

惊：他们中很多人竟然不知道摇头丸、麻古、K粉是毒品，以为是一种可以让人玩得特别尽兴的兴奋剂！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介绍，摇头丸等合成类毒品与传统毒品海洛因不一样，海洛因一旦吸食，便会像着了魔一样，停下来就会如万箭穿心，痛不欲生，直到倾家荡产，生命耗尽。提起海洛因，人们大多会避而远之，而摇头丸等一些合成毒品则披着一副伪善的面孔，因而有“软性毒品”之称。从理论上讲，摇头丸的戒断症状没有海洛因明显，但是这种毒品并不是不上瘾，而是隐藏起来了，因而更可怕。

摇头丸、麻古、K粉等最能吸引孩子们的原因是好奇，上瘾症状不明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难题，那就是打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粒摇头丸的价格在70元至100元左右，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价格，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它主要集中在一些歌舞场所和聚会场合。一些利欲熏心的娱乐场所老板明知有人在吃摇头丸，但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并不加以制止。从法律上讲，确定店主犯有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需要有证据，目前这方面取证很难。另外歌舞厅内人多复杂，不容易被发现，给警方侦破此类案件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面对毒品正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上海阳光防复吸戒毒指导中心主任秦鸿明为笔者开了三个“方子”。第一个“方子”当然是从源头上堵住毒源，加大对涉毒犯罪的打击力度。在此基础上，对于已经有了毒瘾的青少年，一定要实行强制隔离戒毒。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吸毒成瘾后去戒毒丢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只是口头劝说孩子或者在家中戒毒。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只有到了专科医院、专业的戒毒中心，接受专业的治疗才有可能彻底戒掉毒瘾。另外，孩子通过在戒毒所里的学习，了解毒品的危害，思想上会转变，从而戒毒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的戒毒方法，以及亲人、家庭、社会的接纳和帮助。



10、废弃仓库里 少女非常 High

2006 年 7 月的一天，福州市多家媒体的记者随同福州仓山区城门派出所的民警直奔仓山区某厂房，最终将这一吸毒窝点曝光在广大读者、观众面前。

事发的前一天，仓山区城门派出所的民警在在一个偏僻厂区巡逻时，发现一个由废弃仓库装修成的黑迪吧竟是一个大毒窝。在通知了福州相关媒体后，警方采取了周密的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涉案人员 36 人，其中 22 人尿检呈阳性。

据当地警方介绍，城门镇地处福州城乡接合部，近日来入室盗窃案较多，为了控制这类案件的高发，城门派出所加强了夜间巡逻。

因为在警方行动的前一天凌晨 1 时 55 分，风大雨大路上积水较深，在仓山区城门镇一带，车辆和行人都非常稀少。但当媒体记者和城门派出所民警一起巡逻到城门镇浚边村厂区一个废弃的仓库时，却意外地发现在一条小路上有四五辆出租车停在那里，而且从的士上下来的人不但发型怪异，而且女的还穿得非常暴露。

“这么晚了，这些男男女女去一个废弃的仓库干吗？他们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巡逻民警黄警官忽然警觉起来，并决定先不靠过去，把警车开远后再步行回来侦查一下。

经侦查，黄警官发现那个废弃的仓库前后有两个门，而且走近了还能听到里面有很劲爆的音乐声传出来。

凌晨 2 时 10 分，其中一民警向所里报告并请求人员支援后，多家媒体记者随同城门派出所 4 名便衣警官走进了那个传出音乐声的仓库，穿过两道门后，在一个铺着地毯并且装修比较考究的大厅里有十几个人随着音乐在使劲地摇着脑袋。

大厅的左手边还有两间小包厢，装修得挺豪华。一进门，一阵炫目的灯光晃得人头晕，几个人正在这样的灯光下左摇右摆，玻璃茶几上摆放着许多

白色和紫色的药丸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扎眼，还有几张上面还留有白色粉末的锡箔纸。“原来这群人聚在这里吸毒，我们等支援的人员都到了以后再行动。”黄警官小声地说。

凌晨2时18分，从一辆警车上下来了78名全副武装的警员。几分钟后，警方就控制住了里面的局势，并收缴了全部毒品。

凌晨2时30分，城门警方从这个仓库迪吧里带出来19女和17男，回警局的途中，其中几个人还在不停地晃动着身体。经过尿检，这36人中有22人尿检呈阳性，证明他们吸食了毒品。

据该仓库业主交代，这个黑迪吧刚刚装修完，开业才一天，“很多人感觉市区风声太紧，是冲着市郊可能会安全一些才来的。”

据警方调查，在抓获的30多人当中，有两人是福州市区的，其他都是来自平潭、连江、长乐等地，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6岁。“吸过毒的将被强制送到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仓库业主因涉嫌容纳他人吸毒，将被刑事拘留。”城门派出所张所长对如何处理这些吸毒人员作了这样的说明。

11、“嗨妹”自曝陪嗨内幕

2011年3月中旬的一天，正在报社编辑稿件时，笔者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电话里，该女子吞吞吐吐，半天都没有说清楚打电话的用意。就在笔者准备挂断电话时，她怯怯地问：“我曾经吃过药，了解很多内幕，你有兴趣吗？”“为什么要找我？”笔者谨慎地问道。“朋友推荐的，他说他认识你，接受过你的采访，说你在一家禁毒专业类报社供职，他还看过你的一本书《毒殇》，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世人一个警醒，我的朋友说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她的真诚让我决定见她，我们约定当天下班后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茶室见面。

当晚，在那家我们约定的茶室，她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多小时。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她所说的吸毒多年的痕迹在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显现，眼前



的她时尚、青春，特别是随后与笔者交流过程中，异常健谈！与想像中的瘾君子相去甚远。

姑娘告诉笔者，她叫涛涛，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在度过短暂的局促不安后，她显得随性多了，以下是她与笔者的对话。

涛涛：你也许想不到我曾经吃药吧！好多人刚知道时也不相信！我曾在南方一家城市的迪厅里碰过那个东西，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是那个城市害了我，就毅然离开了，没有一点怀念！走的时候，我把在那座城市穿过的衣服全部扔掉了，我不想让所有关于这个城市的东西再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记。3 年前，我就是在那里面第一次接触到摇头丸的。那天是我 19 岁的生日，正好又是我从中专毕业的日子，为了庆祝我踏入社会，我约了一大帮同学、朋友一起到那里蹦迪，我喝了好多的酒，不停地跳舞，感觉特别开心。这时，朋友介绍了一个叫“四哥”的男人给我，“四哥”30 多岁，说话特风趣，容易让人亲近，他说他是一个传播快乐的使者。

记者：是你崇拜的“四哥”让你吃摇头丸的吗？

涛涛：其实，他们当时并不敢告诉我在酒里下了药，如果我当时知道，肯定和他们翻脸，我平时的酒量不错，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自己并没有喝多少，却有一种飘飘欲飞的感觉，而且，平时很狂躁的音乐，在那天晚上也变得格外轻柔和美妙动听。后来他们告诉我，这种感觉就叫“嗨”了。我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回家后，我感觉自己依然很兴奋，久久不能入睡。起初还以为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不错才会这样，后来才知道，是“四哥”他们悄悄地在我的酒里放了摇头丸。

笔者：如果你当时知道酒里有那种东西，你还会去喝吗？

涛涛：不会。那时，我隐隐约约知道摇头丸也是毒品，心里一直抗拒，担心染上毒瘾后不能自拔，那样，我的一生就完了。不过，那天晚上的感觉的确很好，让人痴迷。

笔者：后来的情况呢，你是否想到如何摆脱这种生活？

涛涛：在我看了相关的书籍后才知道，实际上，摇头丸一类的合成毒品，并不容易产生依赖性，所谓的上瘾，只是心瘾罢了。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嗨哥”、“嗨妹”都认为，摇头丸对身体的伤害远不如海洛因等传统毒品，

于是才使很多人身陷其中。而且，所有这些“嗨友”都不认为自己在吸毒，只承认自己“磕药”。我也想到过摆脱它对我的控制，也努力过，但都失败了。毒品真的太可怕了，沾上了就挣不脱。

笔者：你认识的人中，碰这种东西的人多吗？

涛涛：以前我不在圈内，不清楚。等我进入以后才发现，身边有不少的“嗨友”，她们大多数也是像我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拉进来的。说实话，像我们女孩子，一旦丢掉害臊心，什么都无所谓了，我的那些姐妹们，都在做那个。

笔者：他们都有正当的工作吗？日常的生活靠什么？年龄有多大？

涛涛：我刚才说过，哪里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我们上瘾了的人，没有哪个单位会用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规律，我们日常的收入主要是陪男人做那种事挣钱。我们多是外地来到这里的，基本上是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最小的才十多岁。

笔者：我听说你们中有一种专门陪人“嗨药”的，你清楚吗？

涛涛：我知道，我们行话叫“陪嗨妹”，有点像夜总会里的“小姐”，小姐主要是陪客人唱歌，得忍气吞声让那些不正经的男人在自己身上到处摸，时间一到收小费，客人看上的就可以出台，跟客人到他的房间陪他过夜。而“陪嗨妹”就是陪着客人“磕药”，一般每次收费200到300元，我也当过“陪嗨妹”。

笔者：难道你们不害怕吗？

涛涛：怕！当然怕！害怕上瘾，害怕对身体造成伤害，害怕被警察抓，害怕那些客人像变态似的折磨！很多人不知道，冰毒这种东西就是性药，男人溜完后就想做那个，女人溜了后也会有性方面的要求，几乎溜冰的人最后无一例外地会性乱，有时候几个男人欺负你一个女人，他们会借助药物把你整个半死。

真的，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没有人会把你当人，那些男人都会把你当作下贱的女人，当作很脏的人，谁还会爱护你的身体呢？

但是，当你吃了“药”之后，你的脑子里就只有音乐，只有美好快乐的感觉，就什么都不顾了，当然，要想得到这些感觉是要付出代价的。



笔者：代价？你觉得这种代价值不值？

涛涛：是的，是以牺牲健康的身体为代价。我的体重在“磕药”后的两个月内瘦了整整11公斤，简直瘦得不成人样。我们这里有些小姐妹都把嗑药当作减肥的良方。你想，在高度亢奋状态下，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不停地摇摆、跳动，这哪里是在娱乐，简直就是在透支生命！我身边好几个姐妹在嗑药半年以后，都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都是“嗨”出来的毛病。说不上值与不值，但被药物控制了，就由不得你了。毒品就是魔鬼，能让人走不出它设下的陷阱。

清醒的时候，我特别想戒断，几乎每个月我身边的姐妹就有人没来上班，莫名地失踪了，有的是被人做了（杀了），都是直到警察来调查才知道。这还算好的，最后能把凶手抓住，有的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出台时被人劫了财……唉，人都说红颜薄命，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社会上的人另眼看我们，家里人也不太关心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一踏上这条路，就只想一条道走到黑……

涛涛说，她已经戒“嗨”了一年多，现在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她说她之所以说出自己的故事，只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远离冰毒，远离毒品！千万别等到像她这样上瘾了，身体报警了才后悔。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时，笔者和涛涛又见了一次面，她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的气色还要好，笔者相信她的话：彻底戒“嗨”了。分手时我送了她一本出版不久的报告文学《毒殇》，在书的扉页上我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涛涛接过书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里晶莹的泪光。

12、合成毒品“嗨粉”调查

近年来，由易制毒化学品合成的毒品迅速在陕西省蔓延。摇头丸、K粉、麻古，种种含有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兴奋、致幻类的毒品，正以各种地下渠道，流入迪厅、歌城、夜总会等娱乐场所……

这些合成毒品毒情如何，什么样的人进入这些场所吸食毒品？笔者深入陕西西安、汉中多家娱乐场所进行暗访——

2008年5月20日凌晨零点40分，西安市某大街一家迪厅里，无数道绿光迅速在人们脸上、身上扫过，随着舞曲加快，整个迪厅变得愈来愈令人窒息。直到声浪达到极限的刹那，气氛终于在一片沸腾中升至最高潮——

一进入迪厅，就能感受到白色烟雾四处弥漫，迪厅过道、走廊无不是摇头晃脑的身影，他们恍如漂浮在虚幻的世界里，如痴如醉。一个露着脊背的女孩紧闭双眼，使劲甩着那头簪满小辫的黑发，她痛苦又像是极尽享受地摇着。突然，一个金发女孩冲到她面前，发疯般地摇着头，爬到台上，摇着、脱着，脱着、摇着……不知谁把一根蓝色的充气棒塞给她，她便一边摇头，一边拿着充气棒剧烈地在两腿间摩擦。嘘声、口哨声伴着层层声浪鼓荡着人们的耳膜，台上台下摇得一片疯狂……

身边的知情者小琪碰了笔者一下，原来隔着吧台，包厢里一个红衣女孩正快速往嘴里放东西——她在吃摇头丸，小琪悄声说。这个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女子不到几分钟，便被一名男子半搂着，晃晃悠悠扑进了舞池。

而此刻，不远处吧台边的一个女孩也正咽着什么东西。保安在人群中睃视，却恍若未见。虽一再声明自己不懂摇头丸，可说起它，小琪却如数家珍："摇头丸有蓝的、灰的，大概几十种。有的图案是3个五，有的是王冠，还有太阳、骆驼，名字很多，不过都很漂亮，不像毒品。"

"上高三时有个好朋友过生日，召集大家去聚会，进了包间，一个男生就拿出摇头丸让大家尝，开始不敢，后来见大家都吃了，就跟着吃了，吃后感觉躁躁的，血往外涌，听着曲子，就身不由己要摇头。"小琪漫不经心地说。

隔日，笔者再次约她到解放路附近一家迪厅坐。虽然已过午夜，但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还是不断地走进迪厅。在她们周围，零散地坐着30多岁以上的男子。他们或饮酒、或望着舞池，表情漠然。

一名少爷（男服务生）把酒拿来了，忽然搭腔说与小琪面熟，小琪笑着回应了几句，突然，他便凑到小琪耳边说了什么，然后离开。

很快他再过来时夹了个四方形小塑料袋给小琪，里面是两粒粉红色的摇头丸。他伸出3个指头（意指300元），小琪摇摇头，他便无奈走开了。



“这东西只卖熟客，可能以前在这儿见过我几次吧，要是生客，根本买不来，而且要也不会卖给你。”

如小琪所说，到迪厅玩，不嗑药（意思是吃摇头丸等）就得不到最高刺激。很多年轻人，尤其是25岁以下的女性，把吃摇头丸看作是寻找刺激，让快乐升级的最佳手段。一般四五次之后，嗑药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每周不去high上那么一两次，心里就很难受。

记者从服用过摇头丸的几名大学生处了解到，服过摇头丸后，听觉特别灵敏，心里很快乐，好动，一听到曲子，会情不自禁地摇头，而且摇得越猛烈，感觉越爽。某民办大学一男生甚至说，服了摇头丸之后，会变得比平时有乐感。

“不摇就感觉胸口很憋，很难受，只有摇起来才感觉畅快。”据说，将摇头丸含在舌上，刺激会更快，因为舌上遍布神经末梢。

“一旦服用，就对周围很麻木，不再有警惕性，并期待与人进行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包括陌生人的性要求），可过后什么也不知道。”一位知情者说。

小琪的玩伴童童只有17岁，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同学去迪厅，她们习惯把摇头丸叫“硬”药，K粉叫“软”药。

“你吸过K粉吗?”记者问。“看见过，不过没玩过，听说很过瘾的!”

比之摇头丸，K粉的致幻、兴奋作用更大。童童说，她是在附近一家KTV包间看到的。根据她的指引，笔者来到这家歌城，却未能发现。此后数天，又去了市区内几家娱乐城，可依然没有踪迹。

小琪又联系了她的一位男友小朋，并通过小朋辗转找到一位DJ小权。小权是东北人，曾在数家娱乐场所干过。他告诉笔者，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嗨”的。有时大厅也有，不过都搀了料子（杂质），效果跟普通摇头丸没什么两样。

难道“嗨粉”这么隐秘？为了核实，笔者接连又去了包括西安在内的多家娱乐场所，却依然无果。

12月10日晚11时，笔者得到小权的消息，称一家娱乐城包间内有人要“嗨粉”，于是立即前往。要过包间后，借着上洗手间，笔者迅速寻找小权提供的包间号。由于光线过暗，在拐弯处，差点把一位突然拉开包间门的公主

（女服务生）撞上。恰在此时，透过门的空隙，几张若明若暗的脸出现在灯下，其中一人正侧着头在玻璃板上吸着一道白线。

一名保安拿着对讲机从对面快速走来："哎！你弄啥的？""我找卫生间。""卫生间在那边，你咋跑过来了？"他立即把门拉上，用手指顶了一下笔者的肩膀。"你哪个包间的？""我——前面×××，没来过这儿，找卫生间。"虽是这样说着，心里却忐忑不安。也许听笔者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保安严厉但客气地放过了笔者，随后打发一女服务生带笔者去卫生间。走出三四米远时，笔者听到后面保安用对讲机讲：××号保安，注意过道安全！不要让人再过来了。

据小权说，K粉要比摇头丸贵得多，而且，一般都在夜总会或歌城包间里"嗨"，俗称"嗨包"。"嗨"的时候，门口有少爷或公主伺候，有时，一些老板会带上自己的保镖把守，一来求安全，二来剧烈反应时可以照顾，不致出岔子。

经过数天等待，笔者终于在一家娱乐场所内发现秘密。一个名叫叶蓝的酒水推广员与笔者熟悉之后，听说笔者对"嗨粉"很好奇却从未见过，她答应哪天一定让笔者见见。

12月21日晚9时，笔者在这家娱乐场所里与叶蓝碰面。一直熬至凌晨两点，叶蓝说有了，她示意台子上的两对男女，他们刚刚"嗨"过。看上去他们的确很high，而且大庭广众之下，毫不避讳地搂搂抱抱，做出异常亲热的举动。男的约30来岁，女的看上去不到20岁。过了一会儿，他们摇晃着从台上下来，进了包间。

"'嗨粉'的感觉比摇头丸要爽，飘飘的，而且特别想干那事。"叶蓝说，只要"嗨"了粉，最少要玩上一个通宵。"不过，摇头丸不贵，谁都玩得起，可K粉太贵了，得有一定经济基础。女的'嗨'得多，大都是跟着男老板吸的。"

在她的安排下，笔者终于在距其不远的另一家夜总会见到了吸食K粉的现场。当晚10时，得知嗨包号后，笔者和叶蓝提前订下了与之一墙之隔的包间。凌晨一点，叶蓝果然与几位来"嗨"的朋友见了面。

估摸差不多了，根据事先商量好的，笔者趁上洗手间回来猛然推开了嗨



包的门，因为太突然，门口的少爷一时没反应过来。佯装巧遇好友，笔者大声招呼叶蓝，随即被拉着坐下。那名少爷见状，轻轻关上了门。

寒暄中，一光头男子从兜里掏出两个火柴盒大的纸包。很快，一名公主拿来瓷盘和吸管。男子打开包，将白色粉面倒进盘里，然后用一张 IC 卡轻轻刮，刮出几条细长的粉线。一个女孩窝在光头男子怀里，将吸管一端放进鼻孔，一端对准了粉线。转眼间，吸了一口，仰头，闭眼，惬意地回味着；男子接过吸管，也深深吸了一口，眨眼工夫，一道粉末就从盘中消失了。

先吸的女孩已开始喘粗气，这时，公主进来调出了比迪厅更为震撼的乐曲。光头男子与女孩摇晃起来，而瓷盘则在其余男女手中传递。就在女孩准备站起身时，她看盘子传至面前，又急切地吸了一口，也就几秒钟，这个女孩开始剧烈地摇起头来……

后来叶蓝告诉笔者，吸食 K 粉后不跳就头疼，胸口压得难受，全身像着火。根据她的透露，笔者先后在西安市多家 KTV 歌城、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发现有人“嗨粉”。他们大多群吸，多在 3—7 人之间，女多男少。“嗨”时除了用吸管，或用食指拈吸，还可直接告诉吧员将 K 粉放进酒里。在酒的作用下，K 粉会更容易被吸收，而小费相对掏得也少一些。

当然 K 粉放在酒里，有时还存有险恶目的。有的男子自己并不一定“嗨粉”，却故意哄骗女的饮下被放了粉的酒。一旦女方意识模糊，男子便可施暴。

每当凌晨时分，笔者在娱乐场所附近看着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被同伴或者不明男子扶进出租车的时候，便不禁为她们捏把汗。她们将去哪里？同伴是些什么人？她们的父母亲人知道吗？

在迪厅，如果是熟脸，有人会找你兜售摇头丸，看你吃了药，有人会过来问你要不要“嗨”。此外，除了摇头丸、K 粉，近年来诸如麻骨、墨西哥（均属冰毒系列）等合成毒品也逐渐出现了。

笔者发现，合成毒品的消费对象主要都是 20 岁上下的女性人群。其中很多女性意识上都不认为摇头丸、K 粉对人体有害，更不把这些等同于毒品。其中大部分人，就是在朋友“嗨药有理、摇头无罪”，“不上瘾、无依赖性”的蛊惑引诱下慢慢接受它们的。

而事实上，凡吃过摇头丸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初次服用后心跳很快，头晕，看不清东西，过后头疼、嗜睡，服用多次会感到记忆力下降，但已有了心理渴望。专家介绍，基于冰毒——甲基苯丙胺的化学特性，服用后会增加肝肾负担，造成血压升高，促使内出血、中风等症状发生。长期服用会产生药物依赖性，大量服用易发生精神分裂和猝死。

同样，“嗨粉”也十分要命。服用后，摇头幅度大、频率大，有强烈幻觉，易摇断颈椎并严重损害心、肺器官及中枢神经，过量还会导致猝死。

“嗨”后的强烈幻觉是吸引K粉吸食者的主要因素。吸食后，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金鱼、麻雀，或是在船上、在山顶、在舞台上，种种幻觉都会出现，五花八门。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有时就会发生坠楼等意外事件。

艾婉曾在深圳打过工，已有多年的“嗨粉”史。讲起这些，她笑着说：“现在女娃是‘要大哥不要大款’，光有钱有啥用。”她回忆年初和一群人到某山庄聚会的情景：七八个女孩，两个老板，有摇头丸、K粉，还有麻古……“麻古这药一片要200多元，劲特别大，玩起来两三天不歇，回去睡上一个星期就好了。”

她所说的麻古属冰毒系列，深红色药片，有很强的致幻作用，比摇头丸、K粉的性兴奋度更强，吸食者称之为“万能伟哥”。

据知情人透露，玩K粉、麻古的，除了具备经济实力的男老板，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热衷于此。而依附于他们身边的，是大量茫然的年轻女性。

与艾婉同岁的女孩乐乐2006年只有17岁，她回忆，自2005年和伙伴吃过摇头丸后，还接触了几次K粉，“同伴有很多都‘嗨’过。”

笔者：你们怎么看这些东西（摇头丸、K粉）？

菲菲：没什么，大家觉得很正常呀。至少不排斥。很时尚呀！虽然有点颓废。可服了摇头丸、K粉，人就是更快乐，发泄得更彻底。

笔者：你们为什么喜欢选择迪吧这种光线很暗的场所？你觉得迪吧明朗一些会不会更健康？

菲菲：黑，做什么才不用顾忌，既然是找刺激，当然越暗越好，现在酒吧、咖啡馆不都很暗吗，如果迪吧弄亮了，也就没人去了。



菲菲的话令人震惊，也无疑更让人深思。造成他们吸食合成毒品的因素很多，如生活富裕、精神空虚；情绪波动大；交友不慎。当然，除了追求时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还在于家庭危机。调查中很多女孩不是家庭不和、父母离异，就是教育死板、生活枯燥。由于缺少关爱和沟通，即便她们有了情感上的挫折（如早恋、失恋），也不知该如何来排遣。特别是一些所谓“家教严”的家庭，僵化的说教更容易激发青少年尤其是女生的逆反心理，促使她们尝试不应尝试的“新鲜事物”，刺激其不该有的好奇心。

很多人在朋友的“引导”下吸食了合成毒品，一旦麻醉成瘾，智商就会很快下降（俗称摇头丸、K 粉为“傻药”），很多女性涉足后，紧接着就是失足。

目前，合成毒品的贩卖，主要通过信函邮寄和长途带货两种渠道。相比之下，长途尤以函件运送更为安全。如一封信夹带不到 1 克 K 粉，很难被发觉。而具体的销售体系，则呈长蛇形结构。一般每个头下面有四五层。每层上下级交货并不见面，而是采取了一种叫“挖地雷”的方式。

调查中笔者还发现，尽管娱乐场所内均禁止摇头丸、K 粉的贩卖、吸食，但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地充当保护者的角色。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贩卖吸食人群的剧增。一位既“嗨”同时也出售摇头丸的小伙进行了一个大概的估算，以每个娱乐场所 2－3 人兜售 10 粒摇头丸算，每晚出现在各大娱乐场所内的摇头丸约 200 粒。那么，为什么娱乐场所要对此合成毒品的贩卖、吸食“熟视无睹”呢？

原因就在于吸食合成毒品与酒水消费的内在联系。一瓶啤酒，市场零售不过 5 元多，在娱乐场所就要 25 元到 30 元，而洋酒、饮料也均高出市场价数倍。可以说，酒水差价是娱乐场所的主要利润所在。当消费者在吸食这些合成毒品后，因其化学作用，不光会起到兴奋、致幻作用，而且还会产生大量饮用酒水的需求。如此一来，吸食摇头丸、K 粉的人越多，酒水消费量就越大，生意自然就越好。

陕西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王威介绍，近两年，随着娱乐业在陕西各地的快速扩张，贩卖、吸食合成毒品的行为又有所抬头，并有从西安、宝鸡、咸阳等城市向省内其他地区快速蔓延的态势。

同时，由于该类毒品均系易制毒化学品合成，潜在隐患更不能掉以轻心。早在2003年，公安部就将K粉等列入毒品范畴，并在全社会加强了氯胺酮制剂的管理。此外，丙酮、甲苯等数十种易制毒化学品也被列入了管制范围，不能随意买卖。但记者在对西安市西北化工城、万寿路药材批发市场等地暗访发现，受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丙酮、甲苯、高锰酸钾、盐酸等不仅可以随意购买，有些销售人员甚至愿意帮助找寻配制资料。

此外，我国刑法对合成毒品的处理目前尚不够明确，而且有些缉毒部门至今尚无对服用合成毒品人员的尿检仪器，种种立法与技术手段的缺位及不配套，也都对禁毒工作等造成掣肘。

13、老板用“嗨药”作生日宴请

吸毒产生的幻觉让她眼前一片迷离。

“怎么有看到警察的幻觉了?”当真的警察出现在一群疯狂吸毒者面前时，其中一药性发作的女子竟边摇边叫。

重庆市一老板为庆祝自己40岁生日“大寿”，在南坪一豪华歌城里摆下“毒品大宴”请来25名朋友吸毒狂欢。2006年1月17日晚11时许，南岸区公安分局“春节前夕突查行动”拉开了战幕，由时任南坪区公安分局禁毒支队支队长的文晓渝牵头禁毒。巡警支队20余名民警手持微型冲锋枪，立即扑向了辖区各大娱乐场所。

当突查小组来到南坪某豪华歌城二楼时，听到该歌城V888豪华包房里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劲歌声，民警透过玻璃门看见烟雾弥漫的包房内多名穿着暴露的男女正一边听着劲歌，一边惬意地“嗨药”，而酒桌上摆满了大堆吸管、玻璃盘等吸食合成毒品用的工具及一个庞大的生日蛋糕。

没有丝毫的怀疑，眼前的一切让民警行动变得更加迅速：10余名全副武装的民警迅速冲进包房里，一群人突然见到民警后全部吓得呆在了原地。这时，有3名男子突然起身向门外逃窜，一头撞在堵在门前的民警身上，被当



场擒获。而坐在沙发上的另外几名男子也迅速将酒桌上放着的大量吸管、玻璃盘及毒品残留物往沙发底下塞。

这时民警还发现在包房一角落摆放着的音响旁边还站立着一男子。据该男子称，他是歌城的DJ兼音控师，该包房一中年男子花100元请他从歌城里搬来高级音响及碟机为他们现场吸食毒品K粉助兴。

在民警们对所有在场吸毒人员逐一盘查时，刚才还在沙发上昏睡着的一青年女子摇晃着脑袋醒来，当她看到自己面前站着的民警时，突然大叫起来："怎么我有了看到警察的幻觉呀……"她一边叫着一边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快，快把音响声音再开大点，药性上来了！"

由于涉嫌吸毒人员太多，当地警方只好临时调遣来5辆依维柯大型警车才将该批人员带走。

经审讯，据当晚请客的"主人"王某交代，他是一名做河沙生意的老板，当天是他40岁生日。为了好好庆祝一下，他和老婆事先准备好了毒品K粉、摇头丸、麻古等，请众多朋友吃饭后，再包下歌城豪华包房狂欢。

没有想到，狂欢仅仅进行了一半，就被警方查获。

14、重庆高架桥下瘾君子聚众打针吸毒

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红槽房正街的刘先生一早起来打开窗户就发现不远处的高架桥下，数十个精神萎靡的男女，在众目睽睽下掏出针管往自己腿上扎。几名男子穿行其间，像是在兜售什么东西……而这样的场景近两月来每天都在上演，周先生想到还不到18岁的儿子，非常后怕。情急之下他拔打了当地新闻媒体的电话。

7月27日，当地媒体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在周先生举报的现场，10多名男女东倒西歪靠在高架桥下的木头上。几米外的树阴下，一身材瘦削、戴白帽的男子，与一光头男子耳语几句后迅速离开，"光头"留原地等候。片刻，"白帽"从红槽房荔枝桥方向返回，身后紧跟一手持黑皮包的男子。"黑

皮包”警惕地张望后，迅速从皮包里掏出几盒针剂和装有注射器的塑料袋，递给“光头”，接过“光头”递上的钞票离开。

此后，“光头”依次给那10多名男女发放针剂和注射器，“白帽”在他身后收钱。两名女子接过针剂和注射器，在众目睽睽下脱下裤子，就往大腿上扎，随后面露满足感。另一女子则钻进公路旁停放的一辆桑塔纳轿车上扎针。随后，其他人或就在桥下扎针，或走进附近民房。

在笔者蹲点守候的近三小时中，看见“白帽”先后4次带“黑皮包”从荔枝桥方向前来，由“光头”将其拿来的针剂和注射器兜售给不断前来的人。中午12点，聚集在高架桥下的众人逐渐离去。笔者稍作统计，前后至少有20人买了针剂和注射器。

那些人走后，地上丢弃着大量写有“地西泮注射液”、“盐酸异丙嗪注射液”字样的针剂盒，几支用过的“地西泮注射液”针剂和注射器。

高架桥旁的重庆棉麻公司陈先生说，每天在这里都能看见这样的情景。

“地西泮”、“盐酸异丙嗪”属国家严格控制的二类精神药品。这些药品源自何处？沙坪坝区药监局执法大队陈队长说，目前正在着手调查。

陈称，人长期注射二类精神药品，极易产生依赖性，其效果跟毒品差不多。目前，许多瘾君子聚集红槽房地区，注射二类精神药剂。药监部门曾多次前往打击，但收效甚微。

天星桥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肯定地说，聚集于红槽房高架桥下的扎针者都是吸毒人员。他称，派出所前往突击检查过数次，曾一次抓获10多个人，但每次尿检无一呈阳性。由于他们注射的“地西泮注射液”等属二类精神药剂，只能放人。派出所正准备在高架桥下建治安岗亭，增加巡逻警力。

附近居民均对瘾君子们聚众扎针感到害怕。红槽房正街的刘先生说，自从这些人在高架桥下形成固定的聚集地点后，大家寝食难安。此外，瘾君子还经常强吃强拿，住户财物还不时失窃。

……

据2011年6月26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对外公布的数据，在全国所有县市，均发现有吸食毒品的药物滥用者，这距在中国发现首例吸毒者也仅仅过去了二十几年，并且由于人流、物流的加剧，吸毒人员还将呈现一个迅猛增长的



态势。这股“毒流”所到之处，其社会治安必将受到较为强烈的冲击，这一章节里所展示的14个个案中，吸毒者在药物的作用下放纵自己的行为，浪费自己的青春，不仅害人害己，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的隐患，他们的故事令人警醒与深思。

第二章 毒从哪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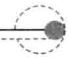
——一场特殊的“生态灾难”

引子——戕害的经济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曾像中华民族那样惨遭鸦片的戕害，几近亡国灭种。对毒品的切骨之仇，使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为禁绝毒品而不遗余力，并形成二三十年基本没有毒品的“真空期”。然而，伴随着国门的洞开，觊觎已久的境外不法之徒趁机而入，企图使中国成为国际贩毒的大通道。中国毒品过境并引发吸毒等种种现象沉渣泛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毒害严重地区，吸毒正侵蚀着当地的经济，从而引发“生态灾难”。

1、“西北第一集”——三甲集

2010年7月7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



三甲集距离兰州86公里，据介绍，这个小镇是兰州通往四川、青海的交通要道，号称“西北第一集”，是西北重要的茶叶、皮毛和牲畜交易之地。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曾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

“20世纪90年代去三甲集卧底抓毒贩，看样品时，毒贩随便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包。”张立峰回忆道，“现在大有改观，但毒情形势依然很复杂。”张立峰曾任临夏州康乐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曾因为禁毒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广河县政法委的官员介绍说，现在的三甲集每年被抓获的毒贩只有几名，这和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少得可怜了”。

值得注意的是，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大的毒枭和贩毒团伙没有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千克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八九是我们临夏人。”临夏州禁毒委官员马小龙说。2006年6月25日，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被执行死刑。

马是临夏东乡人。

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

“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曾经和当地毒贩交锋过的张立峰说。他告诉记者，由于受经费和机制限制，临夏的缉毒工作至今未形成有效的情报获取渠道。

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李波阳教授说，近年来，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情、乡情和内部帮规组成了更为严密的贩毒组织，“枪毒同流”，“毒黑交织”，对抗侦查打击的能力不断提高；毒贩充分利用航空、铁路、公路等进行立体式贩毒；在贩毒方法上，采用伪装身份、人货分离、雇人携带、遥控指挥，藏毒方式非常隐秘，伎俩不断翻新。

甘肃与新疆、宁夏、内蒙3个自治区及陕西、四川、青海3省接界，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从“金新月”毒品产地往中国东部地区的毒品贸易路线，从印度经过西藏的部分毒品，从云南及“金三角”经欧亚大陆桥的毒品都经过甘肃。

“其实，甘肃在解放前就是国际国内贩毒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当时已从丝绸之路沦为鸦片之路，我太爷爷那时就是玉门首屈一指的毒枭。有些毒贩家族几代就是干这个的。”一位当地人对笔者说。

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50℃度之间，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等毒品原植物的生长。由于历史渊源，种植、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四川、宁夏、内蒙等地的许多山区农民中间代代相承。

据初步估算，在甘南和临夏，一亩地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这里的收购价为1亩地2万～3万元。甘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罂粟一年能产三季。也就是说，只要村民一年种上一亩3分地的罂粟，就能进账10万元，这对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巨大诱惑。

知情人向笔者透露，甘南的罂粟主要由临夏人到甘南山区当地收购，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卖到甘谷县和岷县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俗称“黄皮”，然后销往全省各地，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据说，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瘾君子”一直爱抽甘肃产的“黄皮”，戏称它为“绿色食品”。

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村民眼中的“英雄”、“榜样”，使无数贫困农民蹈其覆辙，而吸毒则又导致贫困。

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式贩毒现象。

让张立峰最为忧虑的是，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正在民族地区贩毒，利润被用来资助恐怖和分裂活动。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刚说，“9·11”之前，“东突”80%的资金来源为“基地”等境外恐怖组织；而“9·11”之后，“基地”和塔利班遭到严重打击，“东突”失去了在财政上的靠



山。“贩毒及其他犯罪活动所募集的资金由原来只占20%，猛增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贩毒所得是大头。”他说。

如果将甘肃的毒品犯罪比喻为人身上难以治愈的脓疮，那么，已经有人担心毒素会进一步渗透到它的政治骨架中。

一位当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此深有体会：“康乐县的很多楼都是一些大毒贩盖的。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他们形成一定的经济势力后，必定会进一步建构他们的政治势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的基层政权就危险了。”“有时候，在县城的大街上见到毒贩，我都要上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只能在前期采取韧性的斗争，直到有机会彻底消灭他们。”

兰州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有这样的担心。据他透露，部分甘肃籍毒枭已有了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他举例说了某著名手抓羊肉店和其他企业主的名字，这些人身披“企业家、慈善家、政协委员”等光环，利用合法身份疯狂洗钱，进行更高层次的贩毒活动。

2、3000 人的小镇，100 多人被判死刑和无期

一个所有临泉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实还是发生了：2010 年，临泉县再一次戴上了毒品重点整治县的帽子，而这距上一次摘掉帽子过去还不到两年。

安徽省临泉县，与河南省新蔡县等地交界，人口 180 多万，号称中国人口第一大县。2004 年初，一项人大代表的提案，使这个人口大县引起了媒体的持续关注。安徽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杨涛等多名代表联名提交了第 158 号议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临泉禁毒工作，要求解决临泉禁毒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

该议案指出，作为全国 13 个毒品重点整治县和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因毒品给临泉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 6000 万元，这接近全县 2010 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而 2010 年临泉县为治理毒品的投入只有 60 万元，摘掉“帽子”让他们只想喘一口气。

“我们县里贩毒的人很多。”当记者进入临泉县采访时，三轮车夫指着当地一家最好的宾馆说，“这里住的外地人，很多都是来贩毒的。”

“这条线的生意好做啊，我们发往庙岔镇的车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几分钟一班。这条线上有50多辆车在跑，每个车主每天都能跑四五个来回。”20多岁的车主说，他的车一次能拉6个人，每天有几千人到庙岔镇去，这些人不少是去带毒品的。整个庙岔镇还不到3000人，来这里的人从穿戴到口音都可以看出不是本地人。

“我拉过几次来此贩毒的大毒贩，他们一般是包车走，不讲价钱。当然也拉过吸毒的，这些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无精打采的，不敢多说话，到了地方下车就跑。”小伙子说，在这条路上，公安和缉毒警察经常设卡检查，他认识的一位司机就因为在车上发现了一大包海洛因，在前不久被判了刑。“那肯定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乘车的毒贩慌慌张张丢在车上的。每天都会有贩毒的被查获，但是他们还是来，利润太大了。”

贩毒之家的毁灭

“人家贩毒害死了我的儿子，我也要让他们吸毒而死。”80多岁的张老太因涉嫌贩毒被抓捕时这样说。拘捕她的公安人员说，她算得上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毒贩之一。

张老太是安徽省临泉县庙岔镇人，她的家人不是吸毒而死，就是贩毒被抓。

张老太有3个儿子，1996年，小儿子染上了毒品，白天不干活，晚上乱晃荡，媳妇也负气离去。之后，张家二儿子也染上了毒瘾，不但吸毒而且贩毒。接着，张老太那些已经长大的孙子们，都走上了“以毒谋生”的道路。2001年2月，小儿子在一次疯狂吸毒后死去。

“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就在小儿子死后不久，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胆子越大，经常怀揣“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

最后她被抓获，这个染毒之家也就彻底完结。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临泉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名民警，她说，前几年张老太的故事还上了当地的报纸，好多记者来写这个故事。

3、农民种罂粟可缴纳“特别税收”

从地图上看，安徽省临泉县就像伸进河南地界的一个拳头，它的南面是河南省的新蔡县，西面是平舆县，而北面是项城市和沈丘县。庙岔镇处在临泉县的最西端，也是安徽省的最西边，与河南新蔡县的龙口镇紧密相接。两地在语言、生活方式、经济来源上相近，跨省姻缘几乎发生在每个家庭。

今天临泉县的人说起毒品总忍不住抱怨，似乎是邻居的错误牵连了他们。一位农民对记者说：“毒品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种植毒品原来是没有人管的。”“那边”主要是指河南省新蔡县的龙口镇。

而河南新蔡县则指责他们县的毒品是从临泉县流入的，两县的“口水仗”因为毒品的出现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新蔡县北部几个乡镇的毒品种植是从20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一到七八月份，田里好看得很啊，到处是开得鲜艳的花。”一个当地人对那时的盛景依然充满着无限追忆，“一大片一大片的，没有其他庄稼，其实，这些就是当时的庄稼了。”

新蔡县政府的一位官员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此事：“那几年穷啊，种啥都不行，农民没有钱赚就种罂粟，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说，当时的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农民种罂粟简直跟种正常的农作物一样得到了认可，他们按照正常程序向乡一级政府交纳税收，还要缴纳种植罂粟的“特别税收”。

“要想富，种罂粟。”这是当年河南某县的一位领导提出来的错误想法，至今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位县级领导现在已经高升为某市主要领导。

1997、1998年，新蔡等地公开的毒品种植终于宣告终止。这里的农民开始部分转行。然而，临泉以贩毒为生的人们已不能就此收手。

1、同心县，宁夏百姓的“痛心县”

王中笑言自己恐怕是天底下最难当的县委书记。

王中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县委书记，任上的十年，也是他带领同心人民与毒品较量的十年。据介绍，同心毒品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同心县地处大山深处，沟壑纵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当地多数农村人口长年靠天吃饭，生活比较困难，一些人把贩毒作为省时省力的脱贫捷径。该县韦州镇、下马关镇等一些乡镇的部分外出经商人员，在毒品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开始为人充当“马仔”，将毒品从云南运到广东等地，走上了贩毒道路。

同心县曾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毒品犯罪活动中有一定影响的毒枭，被称为“西北大毒枭”的周彦吉，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2009年7月17日，在王中的办公室里，白天根本抽不出时间的他在晚上10点钟，在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钱玲的陪同下，约见了笔者。他坦言，他最怕到区公安厅开会，他这个“禁毒第一责任人”的党政“一把手”，每一次介绍全县的毒情时，他都抬不起头，浑身大汗淋漓，任内几次“摘帽”“戴帽”，他觉得如同坐过山车。

据王中介绍，同心县贩毒“名声在外”是由同心县像周彦吉这样的几个大毒枭而引起的。

据有关方面介绍，从1989年起，周彦吉就开始参与贩毒活动，由他指挥的贩毒案件5起，毒品重量75.83千克；他参与的贩毒案件总计28起，重量达204.6千克，累计毒资810多万元……2007年6月26日，周彦吉被执行死刑。

在周彦吉等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同心县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众，兄弟联手，父子同行，夫妻、婆媳联袂，纷纷走上了一条外流贩毒的不归路。而宁夏的贩毒活动最早也是从这里发源，呈放射状向四面辐射，逐渐蔓延到全自治区各地的。



因为同心县的毒情持续恶化，1998 年国家禁毒委将之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毒帽子”一戴就是 10 年，期间经历两次反弹，同心县也因此成为宁夏全区创建平安县（市、区）惟一没有达标的县。

笔者从公安机关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同心全县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的达 234 人，因涉毒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有 1382 人，因涉毒被捕后留下孩子无人照料的家庭有 73 户。同心县人员外出贩毒不仅严重危害了全区的社会治安稳定，而且在国内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同心县又被称为“痛心县”，因为严重缺水而贫困，被联合国定为全球 22 个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如今，毒品又给同心县制造了一场比缺水和贫困更可怕的灾难。

根据当地有关部门一份公开资料显示：下马关镇西沟村这几年来，因贩毒被判处 1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 40 多人，1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 80 多人，被枪毙的有 10 余人，总共有 130 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多数涉毒家庭因为男人贩毒，女人只得顶起摇摇欲坠的家，这还是有良心的坚强女人，很多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无可奈何地选择离婚或改嫁他乡。

守“死寡”或“活寡”的女人们

“他打工去了。”在外人问起家里的男人时，这是西沟村大多数女人无一例外的回答。有的家庭，男人确实是到了银川、兰州等外地大城市的建筑工地自谋生计养家糊口，有些则是在服刑的监狱里“打工”，还有人奔走在自南向北、自西向东的毒品长途贩运路线上。

“女人们守的是‘死寡’或者‘活寡’。”姓马的村民说，“死寡”是因丈夫“搞毒”被枪毙了或者刑期在 15 年以上的，也有的是在“搞毒”（体内藏毒，毒品在体内胀裂导致人中毒而死）的路途中意外死亡；“活寡”是丈夫在外“搞毒”（当驮子步行贩毒），一年两年也不会回家一次。

“儿子如果不贩毒，这个家应该是镇上最好的人家。”马老太望着自家的砖瓦院子，感叹她幸福完美的家庭如何走向了败落。

马老太的大儿子20岁就跑单帮、进新疆，不到10年，生意做得相当有规模，雇工20余人，资产过百万。20世纪80年代末，因一笔生意被骗，大儿子百万家财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想到了当地人挣钱最快的方式——贩毒，遂带着几个弟弟跋山涉水远赴云南，从此走上不归路。

邻居家的老太太说："他家里的男人都被'那个东西'害了。"邻居家的遭遇几乎与马家相同，几个男人都在狱中服刑，家中只有儿媳妇支撑，媳妇没走，还值得庆幸。

宁夏东部狭长毒品走廊形成

据王中介绍，历史上，同心人就很聪明，有着经商的传统，比如声名在外的"八宝茶"，就是同心人发明的。本来同心不产茶叶，但他们从外面购进茶叶后，加上本地产的枸杞等，配制成"八宝茶"，由于口味纯正、营养丰富，远销海内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同心县下马关镇西沟村村里的几个生意人受暴利驱使，染指毒品，西沟村逐步走向深渊，昔日红火富足的村子如今变得空旷和凄凉。

随着警方的打击，贩毒地不断转移。下马关镇北25公里的韦州古镇，是另一个毒品集散地，相比下马关，参与贩毒的人数更多，贩毒资金数额更大。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的"替补队员"。

2004年2月4日，同心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海洛因320克。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其影响已经波及同心县所在的吴忠市其他县区。2001年，同心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认为是全国13个毒品重点整治县中惟一的一个三类地区（涉毒现状最重），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同心，这个在革命战争年代曾诞生过著名的回民支队的圣地，因为毒品，



顶上了“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屈辱帽子。

2010年，经国家禁毒委员会批准，同心县由于禁毒工作成效显著，摘掉了外流贩毒的“毒帽子”，而在“摘帽”大会上，王中没有丝毫的欣喜。他知道，摘掉了一顶帽子容易，而一旦党委、政府对禁毒工作思想上的松懈，说不准那天毒情又将反弹，那是最为可怕的。

5、奉节秘密种植的植物

罗启辉直到现在还只能躺在床上，他至今都不明白自已究竟得罪了谁。罗启辉曾任重庆奉节县林业局局长，2006年7月12日下午5时许，在县政府附近，突遭3名不明身份者袭击，头部中刀，送医院后昏迷不醒。

一时间各种议论纷纷出现，而最有可能的版本是：罗的遇刺与他大张旗鼓开展禁种、铲毒工作有关。

重庆市奉节县人大2006年6月提交的调查报告称，1990年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出现罂粟种植，虽经打击但面积逐年扩大，2004年仅奉节县种植面积已近千亩，产值数亿元。报告同时呼吁，奉节县应举全县之力，大打禁毒人民战争。

人大代表的呼吁得到了应有的回应：2006年5月26日，重庆奉节警方组织警力直扑大巴山区，抓获组织收割鸦片的“老板”和种毒农民12人。此时已是当地鸦片收割末期，但在行动之前，“天目四号”卫星扫描发现，当地仍有160亩罂粟田。农民种毒系黑势力利诱胁迫所致，但亦与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失利有关。有关部门力图肃清毒源，却受到经费、人力、地形及更多复杂因素制约。

7月20日，奉节林业局一位职工和一位当地林场工人表示，在大山里禁毒，人、财、物离开哪一样都寸步难行。

林业局这位职工同时表示，近年来，奉节县加大了禁毒铲毒的工作力度，下属各林场都组织了上山踏查，罂粟铲除行动，文件显示，要求在禁种铲毒

工作中确保罂粟零种植、零产量。

而对于山高林密的奉节县来说，“奉节县许多林场都曾经种过鸦片，这不是什么稀奇事，每年我们都有铲除罂粟的任务。”那位林场工人说，罗启辉曾任奉节县新民区区长，任期内，该区天播林场就曾出现过罂粟种植，据知情人透露，“面积还不少”。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当年，天播林场失火，林业人员现场扑火时发现一片青色植物，经辨别为罂粟田。”奉节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说，这是奉节政府部门首次发现罂粟成片种植。

2006 年 6 月，奉节县人大法工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庆奉节、巫山等地开始出现鸦片原植物——罂粟种植。

虽经有关部门打击，种毒面积仍逐年扩大。到 2004 年，仅奉节县的种植面积已发展到以千亩计，产值数亿元。

来自北京的一位调查人士则认为，以重庆奉节、巫山、巫溪境内的大巴山区为源头，一条毒品供应链已经成型，包括罂粟种植、鸦片生浆提取和加工、贩运出境提纯为毒品海洛因，并部分返销国内。

“在 2008 年以前，这个链条并未被有关部门完整掌握和有效摧毁。”

这位人士据称调查奉节种毒问题已有 6 年历史。随后的采访中，奉节知情人士向笔者证实了他的一些说法。

老板雇农民种毒

在经济上，种罂粟对农民的诱惑是现实而巨大的。

“这就是鸦片果壳。”7 月 10 日，夜色下的板仓村，一大箩筐棕黑色的植物果实被放到地上，农户主人拿起其中的一个，“这可是一些火锅店里的紧俏货，”他补充说。

黑色果实略大于鸽卵，顶端留有凋谢后的花蒂，外壳上，8 组纵向刀痕宛如雕刻。

“刀痕是收割鸦片生浆留下的。”农户主人说，这样的割取可以持续一周左右，他手中的那颗罂粟果壳留下了 8 次割浆的痕迹，每次 4 道刀口。

板仓村隶属奉节县岩湾乡。中午时分从县城出发，向东北溯梅溪河进入



大巴山区，车行2小时后至汾河镇；又是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车路终止于一条煤矿便道。穿越密林、崖壑和溪涧，在羊肠小道上跋涉3小时，夜幕下的村庄便出现在奉节、巫山、巫溪交界处的高山之巅。

在板仓村的另一处农家菜园，一块不足3分大的红薯地令户主廖菊清有些难堪，浅绿的秧苗尚不足以覆盖黑色土地——这是铲除罂粟后补种上的。

两个月前，廖家的这块土地和附近的另一些田地里，鲜红的罂粟花盛开，组织种毒的老板带领手下在地头搭起帐篷，半人高的花朵和果实丛间，被雇佣的农民忙着割取鸦片生浆，一种奇特的气息弥漫在山间。

这里的罂粟种植一般在9月以后播种，次年2月开花，3月到5月收割，中间要施两道肥，除两遍草。

廖菊清说，奉节的高山（海拔800米以上）和低岭地带都有种鸦片的，低处收获比高山早一个月，产量也高，但高山所产质量更好，而且不会被发现。

板仓村的村民说，鸦片收割由种毒老板带领手下监督本地农民完成，村里每天会有10多人下地。

收割后，老板或直接带走鸦片生浆，或就地熬制成熟药膏外运，罂粟秆则被藏匿或烧掉。

廖家猪圈旁，拨开茂密的荒草，一堆堆褐色的罂粟秆暴露出来。

种毒只为换几个盐钱

“瞎子见钱眼也开。”廖菊清这样描述他种罂粟的动机。

廖种罂粟的时节是那年的11月，当时邻居家地里的罂粟已经出苗。廖家夹在中间，组织鸦片种植的老板就来找他。

“他们动员了我6次。”廖菊清说，他知道种鸦片违法，但老板表示，邻居都种了他不种，一旦种毒被举报，账就要算在他头上。廖权衡再三，“也想弄几个盐钱，”终于答应拿出那块3分大的红苕地。

“我不敢自己种，讲明是租地给他们，吃饭、住宿我都不管。”廖菊清一再强调。

老板当时答应按优惠价付给廖租金200元，免费提供种籽，播种、除草、

收割按日算工钱，鸦片收割后给钱。而廖菊清的邻居姜福武，据称是板仓村首名种植罂粟者。

“他种的苗子卖给老板，老板又给别处种。”廖菊清说，姜家的种植面积约数亩。他指点着姜家屋前屋后的大片平坡地，这些土地同样薄薄地覆着一层红苕秧。

姜氏夫妇现在已不敢在家中过夜，廖菊清在田边叫了半天，不见回应。“姜家和我们家不一样。”廖说，他们种得早、种得多，又是窝点，种毒老板和手下 10 多人都在姜家吃住。

廖的另一家邻居李应安，继姜家之后开始种罂粟，面积有一亩多地，“最后几天，他家供了几个外地人的饭。”

7 月 11 日，李应安夫妇已双双外出打工。

按廖菊清的说法，他们三家种植的总面积是近 6 亩。但笔者从其他途径获得的数据是“足有十多亩”。

根据举报者向奉节警方提供的情况，板仓村相邻的庙坡村八社，罂粟种植面积达 30 余亩。种毒的历史也比板仓村早两年。廖菊清说，板仓村最初的一包罂粟种子，就是姜福武从庙坡村提上来的。

一山之隔的天池乡轿顶村四社，也被举报种有数十亩罂粟。村妇彭德香的檐下，仍晾着罂粟秆子。彭说，旁边两个社都种了，老板就来找四社，四社有 6 家种，她家种了亩把地。

在种毒现场，这些曾经种毒的土地，一般位于村民的房前屋后，更多的则是种在密林深处，农民开的荒地上。

大老板为贩毒坐过三次牢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管他是谁，我一个出苦力的，只要给钱，我们就干。”农民们说，种毒老板经常换手机，一会普通话，一会家乡话，可谓南腔北调。但也有老板不经意间露出，他们来自奉节本县的草堂、三角坝等地，这些地区有更长久的罂粟种植历史。

老板们有手枪，“五连发的那种。”收割季节，他们时常朝天鸣枪，向周边农民示威，有时则是为了打野兔。



板仓村来的“老板”和手下一共有10多人。据廖菊清讲，老板一共有3个：谭老板、陈老板和幺老板，以幺老板为首，他的势力最大，他的老家是草堂的，其人员最多时加在一起有140余人，分布在奉节县各片区组织种植。

“他们说自己是‘小馒头’的部下。”有村民告诉记者，“小馒头”是奉节县有名的黑帮人物，曾为争夺岩湾乡煤矿和当地农民、矿工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折了腿，煤矿老板为此赔给他25万元。

断腿并未影响小馒头的势力，笔者在奉节县城已闻其大名。而幺老板作为他的部下，“自己说为贩毒曾坐过三次牢。”

到轿顶村组织种罂粟的老板，也是奉节本县人。

罂粟开花时节，岩湾乡一位叫黎华登的摄影者，带着相机到庙坡、板仓拍照。知情人介绍，黎拍下了罂粟花、采割鸦片的大量照片。

在板仓村拍照时，黎华登和种毒老板之间发生了冲突。“老板抽出刀子要砍他。”

黎华登拍照片的目的，说法不一。一位种鸦片的农民说，黎本人是个在社会上混的人，他拿照片去勒索种毒老板以及村干部。庙坡村的老板给了他500元“烟钱”，板仓村的老板则不买账。

轿顶村农民张传贵，起初被老板诱逼种了一片罂粟，后来听在单位上工作的亲戚劝告，自家铲除了，老板来找他，要他赔产量，“先打听我有没有后台，旁人说我有好些亲戚在政府部门，他们就没有来弄我，可能是他们害怕我的‘背景’，此事才不了了之。”

诱逼之外，“老板”们还会坑害替他们种植罂粟的农民。三角坝地区一位农民反映，当地某农家八兄弟种植鸦片，卖给一个姓欧的老板，共得2万多元现金，结果只有1000多元真币，被人坑得不浅，后来那几个兄弟都想自杀。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组织种植鸦片者多为外地黑恶势力，种毒者持有火药枪、管制刀具。

“他们经常持械耀武扬威。”知情人这样说。

81个乡均有罂粟种植

据多位举报者反映，2006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

城很近的地方。

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气候温和，适合种植罂粟。

解放前，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曾遍植鸦片，而死灰复燃则开始于1990年。

奉节县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报告称，起初，罂粟种植多在人迹罕至的林场或森林地带。组织种植者“扼守要道、居高临下，三五个人不能上山”。

近年来，种毒地点由林场扩展到良田，面积由当初的零星种植发展到后来的动辄上百亩。人大调查报告指出，2006年调查组所到的合营乡、前进乡、汾河镇、奇峰乡等14个乡镇，全部有罂粟种植，仅这些乡镇组织铲除的面积，总数即达近800亩，其中前进乡一地达400余亩，汾河镇100余亩。

而这些数据，仅仅是调查组成员与乡镇干部座谈时获知的。

这份报告还指出，2003年奉节县上报重庆市政府的种毒面积仅34亩，即便如此，市政府当时还不相信。

“在政绩面前，毒情的严峻现实当时被瞒报。”知情人透露。

实际上，根据奉节县政府6月14日向县人大所作答复：2001年来全县共铲除罂粟670余亩，其中2001年87亩，2002年110亩，2003年210亩，2006年目前已铲除74亩，农民自行铲除190余亩……种毒面积节节攀升背后，是种毒暴利的驱使。

知情人介绍，人大调查报告出台的原因，是奉节县人大审议政府禁毒工作报告过程中，人大代表对本县多年来的禁毒效果很不满意，要求加大查处力度。

县人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县政府此前的答复和人大的调查报告相比，数据上仍有较大差距。

一位当地警方人士透露，2006年奉节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核实的种毒面积有400余亩，但不敢向上报。这位警方人士称，据多位举报者反映，2006年奉节县81个乡均种有罂粟，甚至蔓延到离县城很近的地方。

关于全县罂粟种植的总数字，县政府有关负责人称，农民说的都不是事实，有夸大的成分。而一些种罂粟的农民估计，全县种毒面积应该为2000到4000余亩。



北京调查人士称，奉节三角坝周边地区种毒历史最早，情况最为严重，面积达千亩，被外地人称为“小金三角”。

岩湾乡原乡长覃斌证实，“小金三角”种毒最多，岩湾乡的种植就是那里传来的。他的话笔者无法求证真伪。

而奉节县政府的报告显示，草堂片区是种毒重灾区。一位草堂区农民说，该区同伴村种植罂粟仅种籽即达30斤，肥料则要了一卡车尿素。

轿顶村与同伴村同处山顶，遥遥相望，轿顶村村长李先高认为，同伴村的种植面积应在百亩以上。

罂粟种植也并非奉节独有。据介绍，奉节周边的巫山、开县都有零星种植，巫山的种植面积大于奉节。岩湾乡乡长覃斌说，毗邻的巫溪县也有罂粟种植。

历史资料显示，重庆云阳、开县等地都曾发生罂粟种植案件，其中2002年开县山区关面乡查获大面积种植罂粟案件，有的山民连粮食都不种，全家靠种毒生活，一些种植户因此脱贫。农妇黄某将自家的自留地全种上罂粟，达3.34万余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02年6月25日，重庆市警方公开焚烧罂粟壳1575千克。

7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一位警员证实，他们早就知道奉节等地罂粟种植的情况，只是不知道有这么多，“我们都被他们蒙了，每年他们的报告谈到这一块时都轻描淡写。”

种毒背后的利益链条

“种一亩罂粟，比种一亩庄稼的收入高出10倍。”板仓村村长刘其学说。

对出租土地给种毒老板的农民来说，收入来自几个方面：土地租金，一亩600元；为种毒出工，包括下种、除草、施肥、收割，白天30元，夜班50元；计算下来，种1亩罂粟可以赚到1000多元。而这亩地假如种玉米，收成300斤，仅能卖得150元。

自行种毒的农民收入更高。在奉节县政府的报告中提到“少数农户受高利润诱惑，私种毒品原植物”。县人大的报告则称，农民种毒“亩收入2万元左右，是种粮的十至数十倍”。

覃斌的说法是，农民种一亩罂粟收入2万－3万元，而种一亩庄稼仅收入

几百元。

种毒收入取决于鸦片生浆的产量和价格。据了解，高山地带1亩罂粟可产鸦片生浆5千克左右，每千克价格在3.6万-4万元，低山的鸦片产量要高一些，但品质稍逊。以此计算，奉节县罂粟种植的产值当在数亿元。

此外，罂粟壳可以卖到火锅店，干货的时价是55元一斤。据报道，前几年重庆火锅行业曾遭遇危机：从业者为吸引回头客在火锅汤里放罂粟壳，为此有关部门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但防不胜防，最根本的还是利益，好多火锅店依然暗地里在调料里加罂粟壳，靠这个来吸引回头客”。知情人说。

一些种毒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知情者介绍，同伴村有人从2002年开始种罂粟，种毒所得在县城买上了房子。

草堂镇林政村一家姓陈的三兄弟，更是5年前就开始种毒，直到被抓获。但农民们得到的只是小利，更大的利润产生在加工和贩卖环节。鸦片生浆熬制成熟膏后，价格即暴涨，而最后提纯为毒品海洛因，价格则上升到每千克数十万元。

警方人士透露，根据调查，鸦片贩运的途径有几种：从奉节、巫山出发，穿越湖北神农架地区，到达襄阳或河南；经奉节、巫山到宜昌，此后的线路则不清楚。一些种植鸦片的农民反映，鸦片加工的毒品贩运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人大报告中描述组织种毒和贩毒者的行为特征为“人货分离、毒款分离、导地交易等”。

前文提到的那位北京人士，接触过奉节县一些吸毒者。“我问他们毒品哪里来的，他们说是自己种的”。这位人士调查发现，部分贩运到境外的鸦片，提纯成海洛因后，又返运回境内，直至销回原产地，形成了一条产供销循环的完整链条。

荒芜的土地呼唤主人回归

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除糊口之外，农民没什么收入，除非出门打工。

在奉节山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微。杨大才也提到，很多当地农民出外打工，那些荒芜的土地，被种毒者低价承包。



前文所述姜福武就是一个承包者。板仓村长刘其学说，姜本是庙坡人，他在板仓村住的房子和种鸦片的地，本属于举家到河北打工的马立君，这种私人的转包造成了管理疏漏。

板仓、天池农民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土豆或玉米，水田收成则要看老天。2006 年干旱，不少水田裂开了口子。天池乡轿顶村农民介绍，他们这里两年没收到谷子。“为了娃儿读书及亲戚间请客送礼，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农民李涛说。

板仓村是重庆市市级特困村。2001 年，村里响应上级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用市里两年的扶贫款近6 万元买回 1.7 万株核桃树苗，共栽种了250 亩旱地，几乎是村里除水田外全部的好地。

3 年过去，这些核桃树都已长到两人高，但尚未挂果。核桃种植影响了粮食产量，不少农民自行砍掉核桃树苗返种庄稼。

刘其学家里挂着一张乡政府颁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先进个人”奖状。但这张奖状使他如芒在背。刘一再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自己“有失误”。究其原因，板仓村的核桃树种植没有纳入退耕还林，农民为此没有粮食补助，“当时买树苗合同是乡里签的，乡党委的答复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后可以列入，后来乡镇结构调整，一换届，落空了。”

奉节县人大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与乡镇干部座谈中，有干部则直言种毒“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好路子”。

岩湾乡乡长覃斌就此表示，他们一直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但不可能鼓励种毒。

奉节县政府的报告提出，认真调查摸底，积极探索禁种铲毒长效机制，采取治穷与治愚相结合的措施，创建无毒村社和无毒社区。

卫星遥感发现罂粟

2006 年 5 月 24 日，奉节当地有公民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种毒问题。两天之后，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到巫山、奉节，督促当地刑警大队出动 11 辆警车，绕道天池到岩湾乡，抓获正在组织收割的“老板”和种毒者共 12 人。

根据奉节人大官员透露，抓捕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动用了“天目四号”

卫星对奉节县罂粟种植情况进行扫描，发现奉节境内尚有罂粟160余亩。

廖菊清回忆，警察到达时，姜家屋里的“老板”们正在打牌，李家屋里的人则在睡觉，手枪挂在墙上，被警察收缴。有3个人在抓捕中跑掉了。姜福武在地里，当时就吓得到外地躲了十几天。

廖本人躲在庄稼地里目睹了整个抓捕过程，“当时我都吓瘫了，脚都挪不动。”

抓捕行动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组织人员铲除了板仓的罂粟植物，并在村里码起柴堆，烧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板仓村长刘其学说，罂粟秆子非常潮湿，烧了两天，用掉40捆柴，最后还浇了五六十斤汽油。

奉节官方人士介绍，此次行动共收缴鸦片油膏2100克、现金2万余元和一批手枪、自制猎枪、砍刀。

山高路险，警方抓捕的路线是从巫山过来，绕道天池乡翻越山顶，黎华登是这次行动的带路人，警方也到他家中提取了照片。事后，黎受到种毒老板的死亡威胁，“很长时间我们一家都不敢回家，怕那些漏网的种毒者报复。”

但5月底已是罂粟收割末期，大部分鸦片生浆或油膏已被运走。板仓村农民反映，村里的罂粟收割当时只需8天就要扫尾，已运走鸦片生浆5.5千克。

就在抓捕行动同时，毗邻板仓的庙坡村8社仍在收割罂粟，最后运走了鸦片，毁掉了罂粟秆子和果实。透露这一信息的农民估计庙坡连同板仓两地，2004年运出约25千克鸦片生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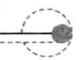
奉节种毒经全国数十家媒体报道后，当地党委、政府先后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严打整治及禁种铲毒行动，行动收到了预期效果。

种毒为何屡禁不止

“连续几年来，在禁种鸦片上，政府有一定打击力度，每年都要判几个。”当地一主管禁毒工作的负责人说。

以往的铲除状况不尽如人意，按县乡村各级干部的说法，主要是由于罂粟种植在高山密林中，又是零星种植，很难发现，发现了也没人认账。

2004年是奉节打击鸦片种植力度最大的一年。“通过4—6月的集中整治，取得了较明显效果。”



据杨大才介绍，2004 年县禁毒委开会，县财政拨了专款，对各乡镇做了严格要求，让“一把手”带人上山去找，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重庆市从 2004 年 2 月起，统一部署各县开展禁毒专项斗争，利用毒品原植物（罂粟）生长的季节特点，在非法种植罂粟严重地区进行公开铲毒。杨大才证实，奉节的集中整治活动是根据重庆市统一部署进行的。

人大调查报告显示，奉节县 2006 年共铲除罂粟近 800 亩，收缴鸦片 4000 余克。这还不包括天目卫星扫描发现的面积。“当地主要领导在听说种毒真相后，也大吃一惊。”有人这样描绘当年的铲毒情景。

报告指出，草堂片区禁毒任务重，派出所人员有限，2004 年用于铲毒的经费大约 1 万元。组织种毒者持有枪械，给铲除带来很大困难，三五人不能上山，聘请联防人员工资无法支付。

知情人分析，以往铲除罂粟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不“逗硬”，不处理，产生县乡脱节现象。县里总结经验，和各乡镇签订禁毒责任书，“如再在某地有发现，追究当地主要领导的责任，先警告、再挂黄牌，仍无改观则撤职。”

另外，奉节对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实行一票否决。

2006 年 6 月 26 日的国际禁毒日，奉节县政法委在县城主持召开禁毒宣传大会，架起大锅，“象征性地烧掉了 10 多千克鸦片，800 多克海洛因”。6 月 29 日，召开禁毒公判公布大会，宣判了 5 名种植毒品和 3 名制造鸦片原油的嫌疑人有期徒刑，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林政村陈氏三兄弟。

种毒者有无保护伞

“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奉节县一名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语气肯定。

一些种罂粟的农民反映，种毒老板来发动他们种植时，都说尽管放心，关系已经走通了。廖菊清说，天池乡铲除罂粟后，这边的老板让他们“稳起，县区乡都弄通了，没事。”

板仓村村长刘其学开始坚称不知道村里有人种罂粟，原因是村子面积太

大，最远的地方来回要走两天，罂粟又种在树林里。“根本发现不了，别说人，那里连鸟都飞不进去。”有人这样形容查毒的艰难。

板仓村的支书郑昌茂则长期住在县城忙于自己的生意，警方抓捕种毒者那天也未到场。参与鸦片种植的农民反映，村干部曾说，老板是城里的黑道，县政府都怕，他们更惹不起。刘其学坚决否认他收过种毒者的任何财物。他也否认乡干部与种毒有涉。“村干部都忙着自己的事，那里顾得上村民的发展。”有村民报怨村党组织泛散，监管无力是主因。

“公务员不可能支持种鸦片，否则就失去起码的觉悟了。”岩湾乡乡长覃斌称，警方行动前，乡里曾安排村干部去查，近半个月都未发现，加上村干部也从未报告过村里有罂粟种植。

而按刘其学的说法，由于山高路狭，乡干部一年能有一次到村里来就不错了。

5 月 26 日抓捕行动后，岩湾乡为李应安的妻子办理了取保手续。覃斌强调这是考虑到该农妇仅为种毒者做饭，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否认乡里为此缴纳过保证金，对取保候审者已出外打工的事，覃称并不知情。

但知情者称，5 月 26 日拘捕的 12 名种毒者中，有 6 名在 5 月 29 日被取保，每人交纳了 3000—5000 元保释金，除李应安妻子外，包括谭老板、陈老板这样的组织种毒者也被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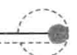
放任的结果让其他村民觉得钱能通神，继而助长了种毒赚钱的邪气上升。

另一举报者称，他曾多次以退伍军人名义向乡、镇、县政府多次举报罂粟种植，一直没有回音。组织种毒的老板如今获释，他随时有危险。

县政法委、人大法工委、县刑警大队一直没有向外界披露被保释者的准确人数，个中原委不得而知。奉节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位民警称，确实有几名被拘者获取保候审，程序是由所住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报县局批准。取保理由有情节轻微、身体疾病等。组织板仓鸦片种植的首犯仍在押。

“5·26”拘捕行动当日，奉节县法院宣判了一批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的罪犯，其中包括 5 名种毒农民和 3 名种植并加工鸦片膏者，均为 2003 年及以前的旧案。

值得注意的是，3 名犯制造毒品罪的案犯（草堂林政村人），判决均在 10



年以下，而一名47岁的种毒农妇李贤琼刑期则为14年。

7月12日，奉节县政法委对外澄清，尽管乡镇干部存在工作不力和脱节的问题，但尚未发现有与种毒者勾结的情况，更谈不上县里有干部充当种毒者的“保护伞”。人大法工委也称他们未曾接到相关举报。

“奉节县在册吸毒者共1400人，实际吸毒人数可能超过4000人。”前文提及的那位北京人士调查得知，这些吸毒者中不少是以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所得供自己吸毒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位调查者说，2001年的夏天，在奉节老城某间租赁房，他看到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两位中年农民斜倚在床上，嘴里含着一杆铜质水烟枪吞云吐雾，烟雾有一种特殊的气息，而烟锅里除了烟丝外，一个大烟泡触目惊心。

当时，一个吸毒农民介绍：在烟丝里掺入绿豆大小一粒鸦片烟膏，可以混着吸。

另外一种吸法是：在一块铜片上放绿豆大小一粒烟膏，拿火在铜片下加热，把鼻子凑近深呼吸，或者用纸筒对着烟膏吸，以免烟雾损失。

自产、自销、自食毒品，奉节“制、贩、销”一条龙告诉人们，治毒当用重典，而自2005年6月26日起在全国深入持久地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来，伴随着禁毒人民战争的不断地推向纵深，奉节的种毒最终湮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据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政委孙胡鼎介绍，在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禁毒严打、严管的高压态势下，奉节种毒已经成为历史，它时刻警醒人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

据中国人民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介绍，吸、贩、种、制毒品，不仅危及“政治生态”，而且危及“环境生态”。在一些吸贩毒较严重的省市县，一些靠毒品发迹的人员，利用贩卖毒品获取的巨额资金，通过贿赂一些当地政府要员，最终走上从政的道路。而在一些较为基层的村级组织，一些毒贩通过贿赂村民，最终当选村级领导干部。他们在成功当选后，并不是把精力用在发展当地经济上，而是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大肆的制贩毒活动，严重影响和破坏着基层政权组织。

而制造合成毒品对环境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视，由于合成毒品多是化学合

成，其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这些气体能够使树木枯萎，而生产毒品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排放在河湖海中后，严重影响渔业生产和养殖。一旦直接排放在土壤上时，会严重破坏土壤分子结构，不仅会使土壤板结，而且长出来的庄稼会含有有毒成份。

第三章 吸毒者灵魂众生相

引子——泣血的呼唤

被毒品控制灵魂的人，他们有的只是黑色心智，为了毒资，去偷、去抢、去骗，其丑恶行径令人不耻。为了吸毒，他们宁可众叛亲离。友情、爱情、亲情，所有这些都在罪恶与良知中交织，最终离他们而去。有毒品相伴的人生是扭曲而悲惨的人生，最终要用疯狂舔食别人的善良。而自身又不得不承受着良知的折磨，挣扎徘徊在罪恶的边缘。毒品就像一个个掠夺者，侵害和践踏着人性的尊严。

1、同居女友被兴奋的“瘾君子”男友掐死

芳芳到死都不相信，自己竟死在同居男友手中。因此当警方起获她的尸体时，她始终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也许她至死都没想到最亲的人会对她下毒手。

检察院起诉卷宗上这样写到：案犯因吸食摇头丸正处于疯狂阶段，身边

的女朋友过来缠绵时，“瘾君子”觉得女友扫兴，竟将女友活活掐死。6天后尸体开始腐烂，“瘾君子”竟把腐尸装进箱子里抛尸，并最终案发……

笔者的追访还原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民警余玉春、邹森根守在太华治安卡口。凌晨2时30分，一辆轿车从广德方向朝卡口驶来。不知道是司机车技不好还是酒后驾车，车子开得歪歪扭扭的。“肯定有情况”，余玉春、邹森根忙示意停车检查。驾车的是一名20岁出头的男青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余玉春一把拉开后车门，一股恶臭味扑鼻而来。他强忍着恶臭，打开手电筒仔细检查，车厢里有血迹，并有擦拭的痕迹。车后座位上横放着一只大号拉杆旅行箱。

“这是什么血?”余玉春指着车厢问。男青年脸色发白，一会说是咸猪肉的血，一会又说是狗血。

“怎么闻着像死人味?”民警看似一句无意的问话把男青年吓得两条腿筛糠似地抖起来，随即瘫软在地。男青年的身份很快查明。此人叫彭旭，现年23岁。在警方的讯问下，最终彭旭交代了杀人抛尸的犯罪事实。第二天，宜兴警方在离广德城不远的马路边水沟里找到了死者芳芳由于浸泡变得肿胀的尸体。

彭旭的家在宜兴张渚镇茶花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视若手心里的宝。初中毕业后，任父母苦口婆心再三规劝，他就是不肯再进学校，到宜兴城里“闯世界”。进城不久，彭旭就沦为一个恶势力团伙的爪牙。在他眼里，血溅肉飞的械斗场面是那么刺激，跟着“老大”进酒吧、住宾馆、蹦迪、上网，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在迪吧，他见识了“神奇”的摇头丸，第一次吸食后，他体味到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从此，他对摇头丸“情有独钟”。浑浑噩噩中，他结识了芳芳。芳芳也是个摇头“爱好者”，毒瘾比彭旭还大。两人不仅一起“摇头”，在偷食了禁果后，两人很快同居。芳芳也是宜兴人，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生活。她的母亲无法摆脱离婚的阴影，整天在外找刺激，打发无聊、寂寞的日子。缺乏家庭的温暖，芳芳因此弃学，走上了邪路。

两人相识不久，彭旭因寻衅滋事被法院判刑一年，锒铛入狱。



一年后，彭旭结束牢狱生活。说来也巧，刚获自由的第二天，他就在宜城一家肯德基店碰到芳芳。两人重续前缘，又走到一起。

一个冬日的凌晨，芳芳带着摇头丸、K粉来到彭旭租住地，彭旭早已把音乐开得震天响。两人迫不及待各自吞下一颗摇头丸，接着吸了K粉。不知怎的，芳芳提起彭旭曾给自己的一个女朋友发短信的事，不禁有些醋意，不依不饶地要彭旭说清楚。彭旭正待解释，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头越摇越快，此时，芳芳也进入状态，闭上眼睛只顾摇晃。许是药物的作用，他们在迷幻中脱光衣服，一对男女很快就滚到一起。

一个多小时的癫狂过去，芳芳累了，躺在床上摇头。彭旭却越摇越兴奋，越摇越快。躺着不过瘾，他猛地跳下床，双手撑着床沿，使劲摇啊摇，周围的一切似乎不再存在。正在兴头上，芳芳旧事重提，又追问短信的事，一定要彭旭解释清楚。“美妙”的状态被打破，彭旭既扫兴又恼怒，他边摇头边凑上前用嘴巴堵住芳芳的嘴。芳芳不买账，依然喋喋不休。彭旭恨芳芳破坏了兴致，伸出双手扼住芳芳的喉咙，越扼越紧。耳边终于没了唠叨声，彭旭全身心投入摇头中。

凌晨4时多，音乐结束了，彭旭从迷幻中醒来，屋里静得可怕，彭旭有一种恐惧感。“芳芳，芳芳！”彭旭大喊道，芳芳横卧在床上却一动不动，彭旭用力拍她的脸颊，毫无反应。“芳芳被我扼死了！”彭旭这才知道闯了大祸，不知是恐惧还是想逃避，他冲出出租屋，躲进一家网吧，呆到天明。

犯下命案的彭旭逃回老家，他一闭眼就梦见芳芳死后的惨状，心惊胆战地过了几天。几天后，他知道如果不处理，房东会知道，最终会查到自己的头上，彭旭幽灵般地回到租住屋。看着芳芳僵硬的尸身，他吓得魂不附体，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极限驱赶内心的恐惧。当天下午，他去商店买了一只特大号拉杆旅行箱，于傍晚回到租住地，把芳芳硬塞进箱子，然后把芳芳的随身物品扔进附近河里。

11月28日，尸体开始腐烂，血水渗透箱体，淌了一地，屋内臭气熏人。29日晚，彭旭以接朋友为名，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把装尸体的箱子搬上车后座，驶上了宜广公路。开车至离广德不远的一个偏僻处，见路边有一条很深的水沟，便把芳芳的尸体抛进水沟。返回时已是凌晨，他自以为神不知鬼

不觉，大着胆一路直行往宜兴开，最终内心有鬼的他还是栽在巡逻民警的手中。

2、丈夫绑架儿子勒索毒资

“那一刻我失去了理智，我假装给他钱，猛地冲上去夺下他架在儿子脖子上的刀，不顾一切地向他头上砍去……”

砍死丈夫，秦娇娇没有一丝害怕，儿子的脖子已被丈夫手中的刀割出了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在对儿子做完简单处理后，她拨打了110，称自己杀人了。

当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的秦娇娇被民警带到笔者面前时，笔者很难把她与一名杀人犯联系起来，并且杀死的是自己的结发丈夫。

秦娇娇是一个曾经获得市级“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女子，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就是因为丈夫“偶尔”的一次朋友聚会，让他染上了毒瘾，从此家庭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我们幸福的家都毁在了毒品的手上。”秦娇娇说。

曾经的幸福一直被他挂在嘴边。1990年，秦娇娇与丈夫在一次郊游时相识。

由于丈夫的家境条件不好，秦娇娇的父母以及亲戚强烈反对。八年抗战后，两人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在1998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彼此拥有的幸福日子让他们俩倍感珍惜，夫妇俩都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两人都争强好胜、勤劳肯干，多次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当时，由于秦娇娇的工作成绩突出，还被单位党组织吸收预备党员。次年，儿子的诞生，给这个小家庭又增添了一份快乐。

谁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夺走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

在儿子一岁的时候，秦娇娇发现了丈夫一些微妙的变化，然而她却没有太在意，只觉得丈夫很少喝酒了，她不禁暗暗窃喜。



秦娇娇说，那时候，她和丈夫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有3000多元，婚后两年多的时间，他们就存了3万多元钱。以前，丈夫一发工资就全额上交。后来，丈夫不但不交工资，反而频繁地向她要钱。

有一次，秦娇娇叫丈夫起床上班，丈夫说胃疼不想去上，说着说着，丈夫一弯腰吐了一地的污物，秦娇娇吓坏了，准备送丈夫去医院看病。丈夫执意不去，说出去走走就会好的。

大约一小时后，丈夫回家了，神情气色好多了，像换了个人似的。

一天晚上，本来告诉丈夫在娘家过夜的秦娇娇从父母家回来，当她打开客厅的灯时，发现丈夫盘腿坐在沙发上，左手拿着一张锡纸，右手用打火机不停地燎着，微闭双眼贪婪地吸着冒出的一阵阵白烟，连秦娇娇推门走进来都全然不知。

“你在干吗?”秦娇娇大声呵斥道。丈夫着实吓了一跳，赶紧从沙发上跳下来，一边慌忙收拾桌子上的残局，一边小声地说：“不是说今晚不回家吗?我经常头疼，朋友给的头疼粉，让我治病。”“你在吸毒?”“别说得那么吓人好不好？什么毒品不毒品的，我只是在抽点粉。”丈夫轻描淡写。但在秦娇娇再三逼问下，丈夫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吸毒的事实。

“我当时气得天旋地转，跟他又吵又闹，让他戒毒。他果然开始戒毒了，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天他受不了又复吸了。”但秦娇娇仍坚信丈夫能戒掉，为此，她把丈夫送到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那段日子，为了给丈夫补充营养，秦娇娇每天挺着大肚子（怀着二胎）给丈夫送饭，丈夫感动万分，发誓一定戒掉毒瘾。然而，走出戒毒所后，丈夫再次复吸，秦娇娇并没有彻底对他失去信心。

在女儿出生后4个月大的时候，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秦娇娇万般无奈地给女儿断了奶，将儿子和女儿都送到了外婆家。

秦娇娇选择了从原单位辞职，跳槽到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多挣一些钱。善良的秦娇娇没有想到，吸毒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伴随着丈夫的毒瘾越来越大，秦娇娇挣的钱根本不够丈夫吸毒所需，因为那时丈夫已从烫吸改为了注射，以满足身体对毒品日益增多的需求。没有钱买毒品，丈夫便将家里的电视、冰箱等值钱的物品低价卖掉，以筹措毒资，甚至

连结婚买的戒指、项链都卖了，整个家变得家徒四壁。

这时秦娇娇才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她无能为力。

每当秦娇娇在外忙碌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看到丈夫无休止伸手向她要钱时、看到每月挣来的钱都被丈夫拿去购买毒品然后一针扎下去时，“我真的想自杀，因为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尽头，但是每次想到年迈的父母亲，想到孩子还小，我真的痛苦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终于将秦娇娇击倒了，这一病就是半个多月，躺在病床上的秦娇娇那时多么希望丈夫能给她端杯水，或者做口饭，然而她失望了：丈夫不仅没为她做一顿饭，还催着她早点去上班挣钱，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也被他翻出来购买毒品了。

秦娇娇的心死了。然而，噩梦并没有停止。

秦娇娇病好的第 5 天，她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去上班了，一天劳累下来，刚进家门，丈夫就冲过来向她要钱买毒品。“工资还没发，前不久我生病没上班还花掉了一大笔医药费，家里哪有钱呀。”秦娇娇的话还没说完丈夫就冲她骂开了：“你这个婊子，整天到外面找野男人去了？钱上那去了？不给老子钱，老子杀了你。”说完丈夫就去厨房拿刀，秦娇娇一看不好，就赶紧抱起前两天才从姥姥家回来的女儿往外跑，她知道，丈夫一旦做起傻事来什么都干得出来，刚把女儿放到邻居家，秦娇娇才想起儿子还在家睡觉，想到这里，她拼命往家跑，唯恐儿子遭受什么不测。

然而现前的情景还是让她惊呆了：熟睡中的儿子被丈夫抱起来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架在儿子的脖子上，儿子拼命地喊妈妈，由于用力过猛，菜刀刀刃已扎进儿子的肉里，血滴到了儿子的衣服上，由于恐吓和疼痛，儿子的哭声越发凄惨。

“快放下刀，我给，我给。”秦娇娇几近哀求，为了救儿子，她一下子跪倒在地。

“快给老子拿，快，快，不然老子就杀了他。”丈夫并没有放刀的意思，而是逼秦娇娇尽快拿钱。丈夫的认真把实在拿不出钱来的秦娇娇一下子逼上了绝路，“好，我这就去拿，这就去拿。”为救儿子，秦娇娇想到了除掉丈夫。她佯装去拿钱，起身、迈步，就在一瞬间，秦娇娇一下子冲到丈夫跟前，疯



狂地夺下刀，不顾一切地向丈夫头上砍去……

由于有邻居证言，防卫过当的秦娇娇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她说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一双可爱的儿女。

毒品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而这样的悲剧，依然在成千上万个吸毒家庭中上演。

3、“白粉女”被嫖客杀死在床上

眼前的一幕让到达现场的警察大吃一惊。

广东省江门市荷塘发生一宗命案，一名赤身裸体的女子被发现倒毙在床上。后经当地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发现其死因是在与嫖客为 200 元发生争执时，被嫖客强扼脖子导致窒息而死。这名叫张梅的女子的死讯传到她生前曾经戒过毒的江门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有认识张梅的管教人员都忍不住发出沉重的叹息：4 次戒毒后复吸，最终还是让这个多才多艺的年轻生命走上了不归路。

时至今日，说起张梅，江门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管教人员印象仍然十分深刻，并非因为她曾经 4 次进入戒毒所戒毒，而是她与一般的吸毒者有着很大的不同，据该所的管教人员谭佩兰说：“张梅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唱歌、跳舞、画画都不错，她的死亡真令人惋惜。”

几年前，中专毕业的张梅从四川老家来到江门。许是天府之国的水土滋养了她，她肤白红润，楚楚动人。然而，一名没有任何背景的中专生想在一个中小城市找份不仅收入好而且体面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省钱，她只好和一位老乡合租一间房。没几天，她就发现老乡很怪，有时候神色慌张地关上门半天不出来，出来就很兴奋，甚至不吃不喝精神也很好。不久后，她才明白老乡为什么那么怪。那是她刚到江门后不久的一天，张梅因为胆结石发作而痛得满地打滚，老乡带她去医院打了止痛针也无济于事，回来后老乡干脆让她吸“白粉”止痛，说：“吸了这个你就不痛了，而且还会很

舒服。”这是她的第一次吸毒，只吸了两口就昏迷着躺了两天，不过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真的很享受这种叫“白粉”的东西了。

仅仅数月，她就把从家里带出来的积蓄全部花光，体重骤减了20多斤。没有钱买不到毒品，她干脆把心一横，在江门市区一些豪华的酒店当“小姐”。年轻漂亮的她“生意”非常好，最高时一月收入达两万余元，但仍填补不了她越来越大的毒瘾。后来父母知道她染上毒瘾后，就叫她回家戒毒，但回家没多久她就因为忍不住跑回江门再次复吸，直至进入戒毒所戒毒。

来自四川的年轻女子周叶（化名）是张梅的生前好友，张梅第4次从戒毒所出来后不久，两人租了间房子一起卖淫，一起吸毒，一起设计偷嫖客的钱……

周叶比张梅大一岁，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两人在市郊租了房子一起住。为了来钱更快，两人想出一条计谋：把两人房间的墙壁打通，用屋内物品把洞口掩盖住。张梅找到嫖客时，马上致电周叶。趁张梅与嫖客发生性关系时，周叶迅速从洞口里把嫖客衣袋里的钱取走，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衣服放回原处，前后所花时间不足两分钟。反之周叶找到嫖客，张梅就负责偷钱。事后嫖客发现钱不见了，往往也不敢声张。

每次当两人偷到钱的时候，都会立即张罗着购买毒品。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无尽的悔恨会袭上心头，那时两人就忍不住抱头痛哭。据周叶介绍，几乎每天深夜，张梅都会在屋子里大哭大喊要戒毒，可是当第二天醒来，她又完全忘记了曾经的誓言，任由毒魔操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两人在痛定思痛后，都下定决心要去戒毒，周叶买了一整箱白酒回来，毒瘾一发作就不断地喝酒，让自己昏醉不醒。而张梅因为毒瘾太深怕出意外不敢喝烈性酒，强撑了半天后还是决定放弃。周叶在强制隔离戒毒3天后，终于被张梅吸毒后手舞足蹈的快感所诱惑，忍不住又吸上了……

此后，两人都知道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戒断了。张梅常常在周叶面前说：“我们快筹钱，筹够2200元就去戒毒（当时江门有自愿戒毒所，一个疗程是7天）。”其实，当时两人要攒够2200元并不是一件难事，要进戒毒所也不是难事，只是因为她们无法摆脱毒魔的诱惑，而为自己找出各种拖下去的理由。

张梅第四次戒毒成功出所后，面对管教人员，她流下了非常感激的泪水，



甚至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再去沾染毒品。为了让她今后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江门市戒毒所与江门市一大型企业取得联系，把张梅安排进企业当了一名工人，每月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为了让她更好地生活，厂领导对外封锁了张梅曾经吸毒的消息，还让一名阿姨负责照管她，以免她再次复吸。生活慢慢走上正轨，张梅脸上也现出了红晕，戒毒所的管教时不时穿上便服去厂里探望她，每次都会为她的改变而高兴。

然而，数月以后，或许因为工厂里的生活太枯燥了，又或许是因为无法安守平淡的生活，一天，工厂致电戒毒所领导，说张梅竟然不辞而别了！她的不辞而别，极有可能意味着她的复吸！戒毒所立即派出几名管教人员前往张梅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寻找她，但是未能如愿。直至她被害后，管教人员才获悉她在离开工厂没多久后就重走了卖淫吸毒的老路，因为嫖资，她被嫖客残忍地杀害了。

四次戒毒四次复吸，最后遇害，这个结果令戒毒所的管教人员至今不愿接受。在张梅第四次戒毒成功出所后，该所曾经为她的工作四处奔走，一度把她扶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令人叹息的是，她最后仍在毒魔的牵扯下走上了绝路。

4、一个“瘾君子”的多面人生

命运不可能掌握在别人手里，只有自己能够主宰。

“白领、酒吧歌女、白粉妹，这不仅是我的三面人生，也是我一步步坠落的人生轨迹。”说这话的人是一名叫娟娟（化名）的女孩。还是在校大学生的她白天在学校昏昏沉沉度日，夜晚却在酒吧纵情声色，最终染上了毒品，生不如死……后来，她根本坚持不下去自己的学业，彻底地离开了学校。

在上海某戒毒所，娟娟表情异常平静地坐在笔者面前，当谈到她痛不欲生的过去时，娟娟没有那种大喜大悲，她说自己的泪早已哭干了，心也早死了……

以下是她的口述实录——

还是在读高中时，我是学校公认的校花。不仅身材高挑而且皮肤白皙，外加一头自然卷的长发，我成了众多男生追逐的对象，然而我对此是一概不理，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最终我得了个“冷美人”的雅号。

不幸是随着母亲的离去而降临到我身上的。16 岁那年，不到 50 岁的母亲在身患癌症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不到半年，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副总的父亲在一天夜里从外面带回一个妖艳的女子。第二天一早，父亲当面告诉我那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并让我管那个女人喊“阿姨”。想到母亲去世不到半年，还处于悲痛之中的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人，我一转身跑回自己的卧室。也许是我的无理激怒了那个女人，厄运从此降临到我身上，当时我已在省城一所高校上学，后妈把原本属于我的学费严格控制起来：生活一下变得窘迫了，我再也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时装，甚至连生活费都成了问题……我也曾告诉过父亲，每次我们见面时他都会给我一些钱，但由于父亲每日忙于公司的事，他很少有时间过问我。

没有办法，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只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使手头上更宽裕一些，好在不到一年我就毕业了。

毕业不久，我进了父亲的公司，成为了一名白领，按理说生活朝着大多数人向往的轨迹前行。

因为叛逆的性格，在一次与我的顶头上司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后，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公司。尽管后来父亲一直劝我回公司，但决绝的我不想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决心自己养活自己。

很快，手头上不多的一点钱花光了，而我根本没打算向父亲要钱，一直与我非常要好的闺密茵茵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后，就对我说：“你长得那么漂亮，又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不如先去酒吧做串场歌手，钱挣得容易。”

想到茵茵一掷千金，我就有些心动。酒吧歌女挣钱“短平快”，不但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如果一不小心被星探发现，岂不一举成名？

经茵茵介绍，我去了“星光大道”酒吧，我的歌唱得不错，人又长得漂亮，老板当场拍板把我留下来，一个挂着“经理”胸牌的女人教我怎样穿露



后背、露胸、露大腿的演出服，怎样描眉画眼涂口红。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台上的我装扮时尚、前沿，散发着特别的气息，鼓点响起，吉他迸发，贝司吟唱……台下众人在我和乐队的激情演绎下，目光都如痴如醉地定格在舞台上，身体情不自禁地跟随节奏左右晃动……偶有“粉丝”还斟满红酒跌跌撞撞上台献酒，激起台下一片掌声、嘘声。

每次至凌晨2时，曲终人散，仅留下满桌酒杯以及服务员惺忪的睡眼……

每晚的激情演唱能为我带来每月8000元左右的收入！这些钱除留一部分存起来外，剩下的我购买高档时装、手机，请同学下馆子，我一掷千金的作派让我在同学面前体面了许多。

有一天凌晨散场后，一个50多岁的影视传播公司的老板带我和其他几个歌手一起去KTV唱歌。老板姓王，很有钱，据说广东某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傅倩（化名）就是他包装出来的。我们在包房里喝酒、唱歌，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包小药丸，给我们每人一颗。

凭直觉，我马上猜到这是摇头丸。有几个人立刻高兴地拿了几颗扔进嘴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没有动。王老板大发雷霆，“连这个都不会还想在酒吧混，你看歌星某某，还不是越吃越红？我和你们老板很熟的，想继续做的赶快吞下去。”

我怕得罪他，就低下头咽了一颗，苦苦的。恍惚中，天旋地转，心跳在加速，耳朵里只有“怦怦”的心跳声，眼前只有鬼魅般的人影在晃动。

谁也没注意到，我一边摇头一边流下眼泪，我凭什么要来受这份羞辱，从小我受的是最传统的教育，现在却被没素质的暴发户羞辱，都是没钱闹的……

没有想到，很快我竟遭遇了“潜规则”。第一次“摇头”后，王老板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想投资拍个新歌的MTV，你来试唱一下，我在某酒店的510房间等你。”

510，连房间号都选得那样黄，我无语。到了房间后，王老板拿出一张写着新歌的纸，叫我先坐，然后自己到洗手间去了。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熟悉着

音乐旋律，一边忐忑不安。大约 20 分钟后，王老板突然从洗手间一丝不挂地走了出来。他一屁股坐到我身边，赤裸裸地告诉我："搞艺术的人思想就要开放，要把束缚都甩开，你看，我都对你坦白了，你还等什么呢?"

那时我真的很惶恐，我明白这个圈子里的潜规则，也经历过很多萍水相逢的爱情，虽说我的初夜早在我读高中三年级时就给了我的初恋男友，可是他的年龄比我爸爸还大——这个让我有心理障碍。我低下头，无意中看见他的手，虽是上了 50 岁的人了，但他的手却保养得很好，指甲被打磨得油光水滑。

王老板笑了起来："我真的蛮想帮你，但没有'付出'哪来'收获'?"说完，就过来搂住我，我犹豫了一下，居然半推半就留下了。

一番云雨之后，王老板捏着我的脸，说："真不错，还是个处女（可能是他的动作太粗野，把我的下体弄出了血），这么漂亮的宝贝，我得把你藏起来独享，好吗?"他塞给我一张银行卡，告诉我里面存有 5 万元，让我搬进他的别墅，"既然成了我的女人，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去挣钱了。"

本来对他极为反感的我听了这话，竟然有些感动。妈妈过世以后，爸爸忙于他的生意对我少有问津，后妈对我整日是横眉冷对。我为了赚钱去酒吧唱歌后，同学都在后面戳着我的脊梁骨指指点点，说我是"三陪女"、"卖唱的"。谁能给我安全感，愿意实实在在地帮助我呢？那时的我好无助。

搬进别墅的第二周，我惊恐地发现，老王吸毒！有一天晚上，他毒瘾犯了，挣扎着要出门去买"药"，我披上衣服陪他上了车，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很难受，浑身上下像有蚂蚁在骨头里咬。买到"货"后，他很满足地吸着，舒服得直翻白眼，说比他妈的做爱要快活上千倍。

也许是怕我离开他，老王在每次吸毒时都让我也来一口，一来二去，自制力不强的我竟也染上了毒瘾！现在，我就在别墅里陪着老王。我也知道吸毒不好，想离开他又有点舍不得，毕竟，在金钱方面，他对我还是满大方的。

后来，我和老王都因为吸毒被送进了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我有一种预感，缺乏自制力的我一旦出所后，迟早会再次尝试毒品。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明天！



5、亦父亦友的畸恋让她走上贩毒之路

刘芳觉得自己的命比黄连还苦。

由于父亲身患肝癌，女孩刘芳（化名）过早地失去了父亲；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在她走投无路、孤苦无助之时，一个整整大她20岁的男子扮演起了父亲和恋人的双重角色，她把这个男子当作了自己今生唯一的托付，不曾想，她倾情托付终生的男子，却带她走上了吸毒之路，并让她铤而走险走上贩毒之路。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让笔者除了同情更多的是心酸。

今年18岁的刘芳，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是内江市某中学高一学生。还是在刘芳刚学会站立时，她曾感受过父爱的温暖：父亲用他那大而有力的手单掌托起她，然后把手伸开，平举着她，让她既惊险又开怀。不曾想，幸福的日子消逝得实在是太快，就在刘芳8岁那年，身患肝癌晚期的父亲离她而去，是母亲含辛茹苦把刘芳从小学供养到高中，并一直未嫁。又不曾想，就在刘芳读高中二年级时，不幸再次降临这个苦命的女孩身上：劳累过度的母亲在下班回家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

父母双亡，刘芳被迫与姥姥一起生活，那个肇事司机的赔偿款很快就花光了，生活变得窘迫起来，加之姥姥年老体弱，根本无心无力照顾她，很快刘芳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性情也发生了改变，她不愿与任何人交流，性格越发孤僻，精神上显得很痛苦，种种痛苦让她学会了“忍受”，学会了打麻将、抽烟。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刘芳的性情由开朗变得忧郁，冷漠让她失去了很多朋友。

就在刘芳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出现了。36岁的王志飞，是一名做管材生意的商人。在刘芳给母亲料理后事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离左右，帮助刘芳打点各种事情。每当王志飞出现，刘芳都会有一种久违的温暖，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父亲般的安全感，无论是年龄还是在外形上。渐渐

的，王志飞成了刘芳的依靠。自从母亲去世后，刘芳的情绪十分低落，失母之痛是很难抚平的。每当她悲伤时，都会找到王志飞倾诉苦闷，刘芳认为这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才能理解自己，王志飞已成为刘芳的心灵港湾。

刘芳告诉笔者："我不知道是将他当成父亲，还是当成了爱人。总之，和他在一起会感到安全和快乐。"

2009 年 3 月，刘芳与相差 18 岁的王志飞确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后，两人住到了一起，王志飞为刘芳租了一套房子，过上了一夫一妻的生活。其实此时的王志飞已有家室，还有一个 11 岁的儿子，但刘芳并不在意。在两人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刘芳将王志飞当成最重要的亲人。

刘芳在与王志飞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王志飞有赌球的恶习，参赌时为提神还会吸食毒品麻古。但刘芳没有埋怨，只是简单地劝说几句。此后王志飞赌球的恶习收敛了许多，但吸食麻古已经上瘾。此时的刘芳少不经事，麻古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好奇而陌生的东西。但由于王志飞在她心里父亲般的形象已经铸成，王志飞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她。一天晚上，刘芳趁王志飞不备，拿出了柜子中的麻古，并像模像样地吸食起来。从此，她开始与毒品接触。

刘芳与王志飞都参与吸毒后，经济逾发紧张。2005 年 8 月，王志飞在一次投资中失手，事业迅速跌入低谷。见到王志飞陷入困境，刘芳十分难受，希望能为他分担一部分忧愁，刘芳告诉笔者："我感觉自己成了他的负担，决定为他做些什么。"

2010 年 11 月 23 日晚，刘芳来到东兴区的一间网吧，打开 QQ 后一名网友上线了，交流中刘芳感觉网友社会气十足，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她心底产生。她在网上留言："你要不要摇头丸，我这有。"没多久对方回应："我不要，但我朋友可能会要。"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网上贩毒交易，最后以每粒 85 元至 100 元的价格成交。但让刘芳没想到的是，她的这次交易已被警方掌控。

就在她与毒贩再次进行交易时，民警将刘芳擒获，并在其身上搜出了 100 粒摇头丸和 35 粒麻古。

目前，刘芳已被警方刑拘，其男友王志飞也被警方抓获。



6、“为筹毒资，女友为我坐台出台”

冲动的代价注定伴着泪水。

坐在被告席上，看着旁听席上受害人家属悲痛欲绝的样子，犯罪嫌疑人刘江静只有悔恨的泪水：吸毒上瘾的他在花光所有的积蓄后，为筹毒资他让女友出台卖淫挣钱，为了100元嫖资，伙同他人大打出手，最终在群殴中将人捅死。

笔者通过各种方式为读者还原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是江南某省一个三间落地房连在一起的宾馆，宾馆位于104国道旁约50米处的大马路边上，生意非常红火。

2010年3月21日凌晨2时40分许，两伙年轻人在宾馆的门前撕打在一起，一会一个青年倒在血泊中。宾馆服务员小良迅速拔通了110报警电话。通过调查，警方很快确定了死者身份：死者江全，男，25岁，江西省人。命案缘由：100元的嫖资。

据与江全一起参与打架的同伙周金反映，3月20日晚11时许，江全在宾馆开了两个房间。朋友周金和缪平两人到附近长途汽车站对面“夜巴黎”娱乐会所以每人450元“包夜”的价格叫了两个小姐，随后带到宾馆房间过夜。21日凌晨2时30分许，两个小姐提出要回去，周、缪两人大怒，说“走可以，必须退200元钱!”小姐则说200元太多，退100可以，就这样，双方发生争吵。随后赶到的按摩店老板等人则声称“不退钱”。就这样，双方便互殴起来，混战中，江全被人砍伤后不治而亡，缪平也被人砍了数刀后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

专案组初步将案情定性为因嫖资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致死案，并立即组织警力到周金所说的娱乐会所抓人，可歹徒早已不知去向。据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娱乐会所老板叫余新，34岁，曾因犯流氓罪和强奸罪分别被判过1年和7年有期徒刑。

将余新抓捕归案，案情将真相大白。

抓捕方案很快被确定，一张抓捕的大网张开了。3 月 21 日，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余新。

也许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起初余新并不配合，没有透露一点与案情有关的情况。但专案组经过一番周折，最终在一家旅馆里将已准备好行李欲逃回四川老家的刘江静、刘军、李小京、尹国、杨浪等 5 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归案。

看着连老板余新都落网了，这个与警方打过多次交道、致江全于死地的刘江静知道再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他一古脑儿把发案经过全盘说出，并说被警察抓住是他最好的归宿，这样他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我知道逃是逃不掉的，只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刘江静被押上警车后，居然只说了一句便呼呼大睡起来。

刘江静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真踏实，我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杀人后，我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在想，怎样才能逃过这一劫？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被你们抓住了，反而轻松了许多，你不知道，逃亡的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

原来，3 月 21 日凌晨 2 时 30 分许，喝了一些酒有些微醉的刘江静接到电话，说他的女朋友小汤在宾馆卖淫的过程中碰到了麻烦。他拿了一把从广东带回来的水果刀便与刘仕军等几个老乡分坐两辆出租车往宾馆赶，心里只想快点把小汤接回来。到了宾馆后，刘江静和余新等 3 人到楼上找，其他人在门口等候。刘江静很快找到了小汤，可是当刘江静拉着小汤往楼下走的时候，对方也跟了下来，其中一个是胖子（即缪平），还有一个是穿短裤的瘦子（即死者江全），总共有七八个人。不一会儿，双方即在宾馆门口吵了起来。开始群殴后，刘江静便从内衣里拔出水果刀砍江全，在他身上捅了两刀……

把对方捅倒后，刘江静显得十分紧张，在逃回东门某旅馆后，他最担心的是那个被他亲手捅了两刀的瘦子会死去，先后两次入狱的他知道置人于死地的后果。同伙建议先住一夜看看动静再作打算，刘江静说要住也得换个地方。于是，他们便到案发地附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里藏身。尽管如此，刘江静还是睡不着，直到上午 10 时许，刘江静接到余新的电话说，对方伤的



比较重，让他们赶快外逃。可是，往哪儿逃呢？最后决定先去仙降躲一夜，明早起身回四川，因为杨浪（“浪儿”）曾在仙降打过工，认为仙降比较偏僻，不易被发现。当天晚上，刘江静等人住进了仙降的一家旅馆，结果刘江静还是睡不着，直到被抓。

上过半年初中的刘江静，父母都是搞建筑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算太差。可是，刘江静说他自己从小就不爱读书，12 岁那年，他便跟着哥哥到广东“闯天下”去了。几年以后，刘江静便成了“老广东”，身上也积蓄了些钱。

2009 年 10 月的一天，刘江静经过一个地下赌场，见一些人在以扑克牌比大小的方式赌钱，非常刺激，从来没赌过的他上去玩了几把，没想到这一上还赢了不少钱。之后，他就经常去，奇怪的是，每次去都没输，一个月下来，竟赢了 5 万多元。刘江静知道十赌九输的道理，他及时收手，从赌场抽身出来。但是空闲下来的他却花更多的时间出入酒吧，也就在那段时间里，刘江静认识了颇有几分姿色的陪酒小姐小汤。

刘江静居然就爱上了小汤！他天天晚上到酒吧找小汤，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追到了在他看来是完美无缺的小汤。小汤告诉刘江静她以前做过“小姐”，本身也并不清白的刘江静说，我只看将来，不管对方过去。就这样，两人同居了。

吸毒加上玩乐，刘江静和小汤很快花光了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和赌博赢的 5 万元人民币。刘江静见在广东再也呆不下去了，2010 年 2 月，他决定带小汤回四川老家。

由于在老家不易购买毒品，加之娱乐场所很少，刘江静很快就感到不适应和厌倦。

不到一个月，刘江静就带着小汤重返江苏。小汤很快找到了酒吧服务员的工作，可是刘江静却没那么幸运，工作没找到，反而拿小汤挣回来的钱开始吸毒了。平常，刘江静和小汤恩爱有加，可每当毒瘾发作的时候，刘江静就口口声声叫小汤去做“鸡”（卖淫）。在男友的逼迫下，小汤只得重操旧业，开始一次又一次出卖自己的肉体。

“每当毒瘾过去之后，我便下决心戒毒，可是，毒瘾一来，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在看守所里，刘江静后悔不已，“我真不该吸毒……”

7、他把刀架在母亲的脖子上

那一刻，小孟满脑子里只有钱。

当小孟的父亲用颤抖的手把500元钱扔在儿子的面前时，小孟扔掉已经架在母亲脖子上并深深切进母亲肌肉的菜刀，狠狠地把母亲推倒在地，疯子般扑上去，贪婪地把钱塞进口袋，夺门而出。

满头白发的孟父赶紧抱起已昏死过去的老伴，悲从心来：“老天呀，你究竟作的什么孽呀？让我们俩活在人间受这么大的罪呀！”

泪眼朦胧中，孟母想起了儿子小时候的种种往事：那时候唯一的儿子是家里和邻里公认懂事的孩子，爱好文艺的儿子每年都是学校的三好生，家里的客厅里贴满了各学年度的奖状，儿子成了孟家的骄傲。初中、高中，小孟一路顺风顺水，并最终考上了福建的一所知名大学，四年大学生涯的熏陶，小孟变得更加俊朗和善谈，毕业后如愿被一家外资企业录用，很快成为一名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如果照此道路走下去，小孟的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孟家至少是幸福和宁静的。

然而，变故却在悄无声息地发生。

孟父、孟母慢慢地发现儿子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与他们呆在一起时间稍长一点时就呵欠连天，行动也变得诡异。终天有一天，当儿子接到一个电话，急匆匆出门后，孟父、孟母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走进了儿子着急外出没有锁门的房间，在一个半开着的抽屉里，一只带血的针筒和几张锡纸证实了他们的担忧：儿子在吸毒！那一刻，他们惊呆了。

救赎儿子！孟父、孟母展开了行动。首先是对儿子的行踪进行跟踪，然而他们失败了。不知是他们年老体衰还是儿子反应机敏，一次次老两口都在不知不觉中把儿子跟丢了。其次他们想从经济上去控制儿子，此法也未能奏效。刚参加工作时儿子每月还把工资都按时交到他们的手中，让他们代为保管，以备结婚时用，现在不仅不交，还时不时变着戏法向他们要钱。最终单



位也知道了儿子吸毒的事，小孟被开除了。

后来孟父、孟母才知道儿子吸毒已经3年了。随着毒瘾的增加，断掉了吸毒主要经济来源的小孟对父母更是变本加厉，开始时以不吃不喝来要挟父母，后来发展到自伤自残来达到索要毒资的目的。看到儿子在毒瘾发作时痛不欲生的样子，父母亲一次次地选择了妥协，就这样，小孟在被单位开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吸毒花光了父母几十年的积蓄。

吸毒让原本英俊硬朗的小孟变得弱不禁风，毒瘾让原本孝顺的儿子忘掉了亲情。只要父母筹毒资稍微慢了点时，小孟对他们就非打即骂，孟父、孟母的身上经常留有儿子施暴后的印记，当有邻居问及此事时，老实善良的他们总是变着法子去掩盖，称是不小心磕碰的，他们觉得如果说是儿子打的，不仅脸上无光，而且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来。能借的亲友和乡邻都借光了，孟父、孟母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已被毒瘾折磨得失去人性的小孟，开始用更加血腥的方式来为自己筹集毒资。

一大早，小孟又阴沉着脸走进厨房，对正在做早餐的孟母说要钱去买"药"，被儿子逼得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续的孟母说："哪里还有钱呀？要不你把我杀了吧，省得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小汤连问几声，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钱后，一下子变得暴怒起来，一把抢过放在菜板上的菜刀，左手挟着母亲的身体，右手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恶狠狠地大声吼叫道："再不拿出钱来我就杀了你。"听到喊救命声的孟父冲到厨房时，当即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看着老伴脖子上已被儿子用刀割出鲜血，孟父心如刀绞，连声喊道："别乱来，别乱来，那是你妈呀！我这就去拿钱，这就去拿。"说完心急如焚出门去找邻居借钱，直到借来500元钱，儿子才放下几欲气绝身亡的母亲，夺门而出。

心已彻底死去的孟父、孟母怀着悲愤的心情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8、为毒资，他卖掉了两个亲生儿子

当接过那3万元钱时，王军一阵狂喜，两个儿子哭成泪人喊着要爸爸时，

他不曾有丝毫的怜悯，在他看来，那只是一桩普通的交易。

在广东某戒毒所，被强制隔离戒毒的王军由于戒毒半年多，气色看起来已经与常人无异，眼前的他很难让人与有着5年吸毒史的人联系起来。因为吸毒及贩卖亲生儿子，王军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后将被送往监狱服刑。

王军也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大学毕业参加工作3年后，他就与一个叫梅的大学同学结了婚，婚后的日子宁静而祥和，婚后第3年，妻子给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儿子的降生为这个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气，下班他总是哪里也不去，直接往家里赶，因为两个儿子和一个美丽的妻子牵挂着他。下班或在家的空余时间里，王军总在逗两个儿子中打发时光。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当初儿子降生时的喜气也被儿子一天天成长过程中的淘气和生活中的重担所冲淡，而恰恰就在那时，王军的单位由于不景气，他成为首批下岗裁员的对象，并且半年后他将离岗。当他从人事部门获知这一消息后，变得格外消沉起来，开始一个人喝闷酒，经常是喝得醉熏熏后才回家。

那是一个与往日无异的周末，然而在王军人生旅途上却注定是一个灰色的日子。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去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酒吧喝酒，他一个人要了一瓶高度白酒在一个角落里闷着喝，半瓶酒下肚后，他拿着没喝完的半瓶酒正准备结账回家，这时一个七八年没见面的高中同学出现了。

王军清楚地记得这位高中同学叫刘浪，一个放荡不羁的名字，在高中的三年里，刘浪的表现与他的名字一样，让人不敢恭维，王军与他的关系一般，高中一毕业他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王军在大学期间听别的高中同学讲刘浪好像被他父亲托关系走门子送到了一家企业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名工人。几年不见，刘浪变得成熟了，衣着也光鲜起来。自然，老同学一见，难免一阵寒暄，看着王军准备离席的样子，刘浪一下子拉住王军："老同学多年不见，就这样走了？今天我请客。"说完就招呼服务员重新上菜，见实在抹不开面子，王军只好坐下来，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本来就不善言辞的王军又半斤酒下了肚，此时，酒精的作用在本来酒量还可以的王军体内发生着反应，他自感有些头重脚轻。在昏昏沉沉中，王军上了刘浪的车，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王军被刘浪半扶半扛着进了一栋气度非凡的别墅。经过一番上车下车上楼的折腾，王军感到难受极了，体内有一种翻江倒海的



感觉，意识还有些清醒的王军赶紧到洗手间去呕吐，大约五六分钟后，王军感到症状减轻了许多，当他再次回到客厅时，王军发现刘浪正对着一个壶里伸出的管子贪婪地吸食，他后来才知道那是“溜冰”人专用的“冰壶”，王军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见过相关的报道，而在现实中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他看呆了。他想上去制止，腿脚却不听使唤，大约只过了一分钟，刘浪整个人大变样，变得精神焕发，王军内心有些好奇，但他听说那东西对人体有害。精神十足的刘浪与王军聊了起来，谈彼此的生活，刘浪告诉王军，他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年收入数百万元，前不久才与老婆离的婚；王军也仿佛遇到了知音似的，一古脑把自己这些年的境遇跟刘浪彻底交了个底。刘浪听完显得很仗义：“老同学，多谢你信得过我，以后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有什么事只要你言语一声，我会全力帮你。”说完他就抱起那个壶吸起来，边吸边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能让你把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老同学要不要尝尝?”鬼使神差，王军不自觉地接过那个壶，学着刘浪的样子吸了起来，说来也怪，只一会，王军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亢奋。

后来，他又到刘浪家吸了几次，他感到越来越离不开那个壶了。再后来，刘浪开始躲着王军，只是在王军的哀求下，才答应让他吸一壶，但得交钱!此时，王军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只想找到那种飘的感觉。

就这样，王军越陷越深，加之他本来已经下岗了，全家的日子越发艰难。

尽管日子越来越艰难，而那个壶的诱惑对他却越来越大，他没有一天能够离开它。没了经济来源的王军最终打上了双胞胎儿子的主意，竟以 3 万元卖掉了。

9、为毒资，她让亲生侄女为她卖淫

接过卖掉亲侄女递上来的钱，她一头扎进沉沉的暮色中。

一个多小时后，她回来了，她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急不可耐地脱下裤子，简单地把买来的毒品稀释一下，抽进针筒里，在艰难地寻找一番后，

对准大腿内侧的大动脉一针扎下去，缓缓推进的过程中，她闭上眼睛，贪婪地享受着……

她叫玲玲，来自广西一个僻静而美丽的少数民族村庄，她不仅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而且能歌善舞，在她那个小山村里，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一度是全村人的骄傲，毕业于广西某民族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在一个同村姐妹的引见下，她来到深圳一家知名的文化公司成为一名白领，由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有天赋，很快就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赏识，并荣升为负责公司外联的一位副经理。

照着这样的发展势头，玲玲的未来无疑是一片坦途。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原本很平常的聚会，改变了玲玲的命运。那天，公司要招待一位来自香港的周姓大客户，本来玲玲身体不舒服，但公司老总点名要她过去陪一陪，后来玲玲才知道是那个香港大客户专门要求让她陪的，对方告诉老板，他很欣赏玲玲的才识和美貌。为了不失掉这个大客户，老板执意让玲玲陪。

宴会与平常的酒宴无异，而正是玲玲的那份含蓄与内敛，让她成了宴会的主角。那天，不知是为了烘托气氛还是刻意而为之，老板有意无意让玲玲频频举杯，为了不让老板没面子，她只得硬着头皮敬酒，但每次都是在老板的提议下，她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也许正是那份淑女的表现，让她越发显得超凡脱俗，浑身上下透着几份高雅。本来那晚老板是刻意叫了几个公司的交际花来应酬的，但她们那些卖弄风情的表现让久经风月场的周老板有些厌烦。到了后来，玲玲成了周老板的主要进攻对象，身体不恙加之不胜酒力，玲玲最终彻底醉了。就像千万个故事的剧情发展一样，意识迷糊的玲玲被周老板带回了他住的那家酒店……

后来玲玲才知道，她的那晚付出，是公司的老总与对方的一份契约：500万美元的交易。而更加可恨的是，周老板在强暴她后，为更好地控制她，竟在她身上注射了毒品。

早晨醒来，头脑已经清醒的玲玲明白了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她恨自己意志不坚定，她更恨夺走自己贞节的那个人。还是在读大学时，酷爱文艺的她爱上一个比她高一届的男生，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大男孩，在学校的文艺汇



演上，他们相识相恋了，校园的图书室、休闲长廊，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伴的身影。每当他们单独相处时，男友总是心急火燎百般哀求要做那事，但玲玲每次都很理智，不肯轻易地付出。骨子里传统的她一直认为，那最美好的东西，一定要在他们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神圣夜晚才付出，后来，男友出国了，她也到了南方发展，她与男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只是她们的这段恋情最终无疾而终，男友与一个外籍女子结婚了。

玲玲怀念那段恋情、珍视那段恋情。

在毒品的控制下，很快，玲玲就与那个香港客户打得火热，她再也没有往日的那份矜持。一年后，她的身体日渐衰弱，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爱她的老板最终离她而去，因为他越来越厌恶她那个已经被毒品折磨得让他没有一点兴趣的身体……

没有了经济来源，玲玲最终将目光盯上了她的侄女，一个不懂世事的女孩。在与多个曾经嫖宿她的嫖客联系后，玲玲将侄女卖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侄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她灌醉后，被扶到早已开好的一个房间里，交给了那个色迷迷的男人，那一年，侄女才15岁。

……

哲学家说，有毒品相伴的人生，他们的整个行为都充满着错乱；

道德家说，有毒品相伴的人生，他们必将道德沦丧，放浪不羁；

一个被毒品控制灵魂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注定都充满着兽性。在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遭受着毒品的惩罚时，作为我们社会、单位、学校、家庭又该进行怎样的反思呢?

第四章　总有一些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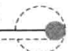
引子——利益的诱惑

在毒品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一些从事禁毒、戒毒工作的人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违背自己的良心，或助纣为虐、或铤而走险，从事贩毒或与毒贩沆瀣一气，不仅玷污了神圣的法律，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公信力。

1、一个自愿戒毒所所长眼里的戒毒所黑幕

在目前我国实行的强制隔离戒毒、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康复的三种戒毒模式中，由于各具优势，深受吸毒人员欢迎，但个别戒毒场所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合法外衣大肆进行罪恶的毒品交易，或直接把戒毒场所变成牟利的工具，或间接在戒毒所里进行毒品的交易。

左小章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那是在笔者所在的报社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戒毒康复有奖征文颁奖仪式上，我们相识的，他当时的职务是湖北省



中西医结合戒毒所所长，也许他知道笔者的身份，也许是他的良知，他说了这样几句特别朴实的话：作为一名戒毒所所长，赚钱的方式很多，比如可以卖戒毒药，比如可以卖美沙酮，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给予的很多优惠政策、免费药品来赚钱，可是一定不能去赚那些昧良心的钱，如果赚了，人会一辈子不得安宁的。

左小章看到笔者一脸专注的神情，他接着披露了发生在戒毒所内小卖部里的一系列黑幕。为此，笔者专赴武汉对他所在的自愿戒毒所及相关戒毒所进行调查。

他告诉笔者，入所后，按照所里的规定，每一位戒毒学员都要把身上的钱交到戒毒所，学员身上是严禁带现金的，可是有些戒毒学员为了搞到现钱，就想方设法地在那些同样来戒毒的学员身上打主意，而那些设在所内的的小卖部自然就成了这些学员的帮凶，昧着良心赚钱，最后买单的都是学员的家人。见笔者一脸的迷惑，左所长向笔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些自愿戒毒所放任学员在所里开的小卖部里拿烟酒，因为是采用记账式结算方法，好多学员为了从小买部套取现金，就先买来烟酒，然后又以低价回卖给小卖部，这样就能从小卖部套取现金，他们拿着钱到外面购买毒品，而他们的家人到时却要来戒毒所结算那些被小卖部赚取的黑心钱。有一位戒毒学员的家长送吸毒成瘾的儿子来戒毒所戒毒，最后在结账时发现儿子 3 个月竟抽了 450 盒烟，平均每天抽掉 5 包烟，这还只是烟钱，不包括吃掉的其他零食，并且他们家长发现，儿子戒毒出所后，他的毒瘾却越来越大。

左小章同时强烈地呼吁，戒毒所里的食堂必须限利润经营，不能承包给外面的人经营，否则只能加重戒毒学员家长的经济负担，让那些吸毒者的家庭雪上加霜，他说，那些赚的都是昧心钱，天理难容。

伴随着笔者随后的实地调查，左小章所说的只是自愿戒毒所敛财的冰山一角，自愿戒毒所内非法进行毒品交易在巨大的暴利驱使下一时难遏。

据左小章介绍，一些有职业道德的戒毒所在管理上都会有一些严格的规定，凡有新入所的戒毒者，戒毒所的负责人都会告诫医护人员要“盯死”，对于像那些屡次进出戒毒所的“老烟枪”，特别要留意他们在住院期间与那些病友的接触，特别是严厉禁止他们相互之间留电话号码，因为好多多次来所戒

毒者是以戒毒为名进戒毒所拉客户，从而贩毒赚钱戒毒，行话叫“以戒养戒”。

左小章告诉笔者，在他们所内部，不仅有入所检查，而且还会有平常的突击检查，有一次一名保安从一名多次来所戒毒的刘姓学员的个人物品中搜出毒品后，对方死活不承认。而在保安提出报警后，对方却突然要求出院，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作为自愿戒毒机构，如果把正在戒毒的学员送到公安部门那里，影响自然不好，再加上自愿戒毒所没有强制力及执法权，这也让他们非常无奈。

与强制隔离戒毒所不同，到自愿戒毒所戒毒的基本都是主动、自愿的，希望能够摆脱毒瘾无休止的折磨，但另一个方面他们内心依然对毒品存在着依赖，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绝大多数戒毒人员是在家人逼迫或劝诫下来所里戒毒，内心渴望缓解身心的痛苦，但同时生理上又无法彻底摆脱对毒品的渴望，便携带毒品来所治疗，因此有的戒毒者进所后，一边戒毒一边在所内贩毒。

在很多自愿戒毒所里，各种规章制度是很健全的，很多是为了应付各级的检查，挂在墙壁上作样子，要么仅仅落实在口头上。按照规定，申报开办自愿戒毒所除了有相应的行医资质外，重要的是要到当地公安禁毒部门、卫生部门进行备案，属公安卫生部门双重管理。

在自愿戒毒所检查室工作的小任告诉笔者，他到湖北中西医结合戒毒所工作两年多以来，已经多次从来所戒毒的戒毒人员身上查获毒品。有的戒毒人员非常狡猾，在入所之前，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体内藏毒，私密处都是藏毒的地方，随着所里加大这方面的检查力度，现在又出现一些新的向所里传递毒品的新方法，这也是所里的清洁工发现的，即在所内的休闲公园里发现了装在烟盒内或废纸包裹着的毒品，这些毒品是从公园院墙外丢进来的，后来据调查是所内的戒毒人员通过电话让所外的人丢进来的，然后戒毒人员假借到公园去游玩的机会获得毒品。后来，所里根据此种情况，及时将院墙进行了加高，同时在院墙上安装了摄像头等监控设备。

而有些吸毒人员在进检查室之前直接将毒品用口香糖粘在外面的墙壁上，从检查室出来后再将口香糖取走。为了盯紧吸毒人员，不给他们一点可乘之



机，检查室一般配备两名检查人员，从吸毒人员进入检查室之前就开始注意其一切举动。

另外，越来越多的毒贩开始利用身体藏匿、运输毒品，但恰恰是这关键而重要的身体检查一关，却在自愿戒毒所内遭遇了尴尬。对于体内藏毒，身体检查这一关，毫不客气地说90%的戒毒所流于形式，加之“很多自愿戒毒人员反对、抵触和排斥身体检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信任，甚至是对自尊的一种伤害。”湖北中西医结合戒毒所一名医生说，这就考验一家戒毒所、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而在他们所，责任与良心让他们必须把这种让人反感的检查进行下去——让戒毒人员干干净净进来，最后干干净净出去。

在自愿戒毒所内，目前所谓的身体检查，男性是肛门检查，女性是阴道检查，工具不过是一根小小的棉签，就是这样简单的检查都无法正常进行，更谈不上配备公安、海关部门使用的高精度仪器。这就带来了直接问题：如果肛门或阴道携带毒品量极小，棉签很难试探出来；如果是直接吞服进体内，更无法查出。而在戒毒所单独的房间内，藏毒人员有充足的时间把毒品从体内排出。

而据笔者近年来的调查，实际情况是，现在绝大多数自愿戒毒所连这些入所检查都无法进行，那些戒毒人员根本不配合，或者直接不让进行这方面的检查，而戒毒所为了经济利益，害怕损失掉这类“客户”，干脆省掉了这方面的检查。

当入所安检流入形式或干脆省掉后，加之戒毒人员戒毒期间相对松散的管理，毒品流入自愿戒毒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毒品交易，自愿戒毒所内禁止戒毒人员随身携带现金。但左小章说，这依然无法阻止贩毒事件的发生。新型交易方式出现了：通过电话联系、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隐蔽交易。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毒贩打着自愿戒毒的幌子混进戒毒所，以谈生意或闲聊为名频繁与病友接触，交流吸毒经验，推销毒品。一旦达成购买意向即互留手机号码，出院后联系交易，或通过转账方式，当场达成交易，有的甚至通过“马仔”接收毒品，再伺机偷运进戒毒所。

为了杜绝隐蔽交易，戒毒所与戒毒人员都会签定一份保证书，要求“不

串病房”。左小章说，每一个新病人入院后，他都会反复叮嘱这一点，就是为了避免给毒贩可乘之机。医护、管理人员也不例外，除了正常工作，不能与病人有非工作关系接触。在他任职期间，曾有3名保安和一名心理医生因为与病人有非工作上的接触而被开除。

医护人员和保安对如何发现戒毒人员可疑情况专门进行了总结归纳，在他们看来，有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有贩毒迹象：病人之间交头接耳、偷打电话、在厕所呆的时间过长、不吃戒毒药物等异常行为都应该引起警惕。

在左小章看来，营利性的自愿戒毒所更应严格管理，不但要坚决杜绝一切毒品，就连麻醉、精神药品都要严格看管、使用，因为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错都可能酿成大祸。管理松懈的可怕后果是让病人家属对自愿戒毒所、医务人员失去信任，让戒毒所自毁名声。

近年来，一些本身是瘾君子的贩毒人员，深谙吸毒人员对毒品的强烈依赖心理，不惜孤身涉险，混入自愿戒毒所贩卖毒品。有的甚至将戒毒人员的毒瘾勾起使其无法忍受，然后直接带其办理出院手续外出吸毒。

在毒贩的眼里，他们看中的是钱。据了解，到自愿戒毒所戒毒的很多都是有钱人，或为私营企业主，或为个体商户。为了不让身体被毒品毁掉，他们在吸食一段毒品后，就会到戒毒所戒一阵子，他们吃冬虫夏草，喝高级补品，保养得极好。戒毒所里的饭菜很难满足他们的胃口，因此经常向外面的酒楼直接叫餐，或者让戒毒所的大厨们加餐。在毒贩的眼里，这些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大客户”，远比社会上每天花几十、上百元吸毒的烂仔出手阔绰得多。因此，一旦所里来了这样的“大佬”，那些所内的贩毒者千方百计地与他们接触。

此外，戒毒人员，尤其是不熟悉本地“行情”的外地戒毒人员，他们在戒毒所里憋得太久了，会“饥不择食”地出高价购买任何可能到手的毒品，这也给混入戒毒所的毒贩提供了机会。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愿戒毒所门槛比较低，导致自愿戒毒所管理难度加大，可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进来。管理人员不可能像警察一样调查、核实每名自愿戒毒人员的身份。戒毒人员也不答应这么做，他们打心眼里反感，甚至入所时不愿提供身份信息。左小章说，虽然戒毒所规定自愿戒毒人



员入院前要登记身份证，但这一规定遭到很大的抵制，他们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填写的往往是假名，就更不用说家庭住址或联系方式。

在一些毒贩看来，他们宁愿花费一笔不菲的住院费到戒毒所“赌”一把，只要能拉到一个“大客户”，投入的“成本”就微不足道了。重要的是，在这里贩毒远比在外面简单、安全、隐蔽得多，只要串串门留个电话就行了。即使被抓住，也伤不到皮毛。

互留电话号码以待出院后进行毒品交易的隐蔽操作，在湖北中西医结合戒毒所每年都会发生十几起，大多由病人本人、其他病友或家属向院方举报。但戒毒所对此往往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毒品。处罚很简单，一般也就是警告，写保证书，告诫他们再留电话、串门就赶出医院！对于有贩毒嫌疑的病人，戒毒所会将其列入“黑名单”，下次再来，拒绝接纳。左小章让笔者看了一下他们所里的统计情况，在戒毒所里的电脑里，笔者看到，截至2006年年底，有22名来所戒毒的吸毒人员被列入“黑名单”，其中3人有“重大贩毒嫌疑”。

戒毒所也曾因此遭到过报复。疑似贩毒人员轻则恐吓，重则叫人来闹事。两年前的一天，当一名戒毒人员被湖北中西医结合戒毒所怀疑贩毒而赶出医院后，曾有社会闲散人员来叫嚣闹事，医院报警后才解除困境。

以贩养吸是目前贩毒的最大特征。让自愿戒毒所深感为难的是，对于那些有重大贩毒嫌疑人员的调查取证工作。“我们不是公安机关，法律没有赋予我们调查、审问的权利。”某戒毒所心理科主任李凌无奈地说，对在自愿戒毒所内抓获的藏毒者，处罚上远不如在外面被警方抓获的毒贩那样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当其携带的毒品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量刑数量时，“送交到派出所，如果对方一口咬定毒品只是供自己吸食，并且验尿属阳性，就只能送去强制隔离戒毒所或让其参加社区戒毒，有的可能以极轻的方式处理，警告教育一下当场放掉。”

左小章说，从事10多年的自愿戒毒工作，不法戒毒人员从事的贩毒勾当，查处越来越难，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狡猾的贩毒分子目前普遍采用“零包散运”的方式，将毒品分包拆装携带、运送，只要重量不“达标”，就算将他们移交到公安部门，治罪也比较困难。

通过院外人员试图将毒品送进戒毒所的情况每年大约发生三四起，而这只是被保安连人带货抓获的情况。

取证问题也是律师和法学专家所担忧的。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律师许兰亭介绍，《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贩毒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吸毒则不是。尤其是当携带毒品人员本身又是一名吸毒者时，证据的采集决定处罚的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也有同感，他说，按照法律规定，只要是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但相同的数量如果是吸毒，处罚则要轻得多，一般就是强制隔离戒毒或劳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非法持有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显然，在暴利面前，这样的处罚是不足以对贩毒分子形成威慑力的。

然而，一包不足以定罪的毒品在戒毒所内引起的结果却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左小章说，他们所曾在一名在戒人员杨某的房间里搜出一包仅0.5克、纯度较低的海洛因，在外面以极低的价格就能买到，但在“物以稀为贵”的戒毒所内，价格就能翻几番。更可怕的是会让复吸现象死灰复燃，使戒毒人员前面接受的有效治疗全部付诸东流。

《戒毒条例》于2011年6月26日正式颁布实施，这让像左小章一样从事戒毒工作的人看到了希望。“一部好的法律法规，要靠过硬的措施监督它的实施。”已经退休了的左小章对此给出了忠告。

2、戒毒者所内被打，牵出所内毒品泛滥内幕

浙江省温州市居民陈先生在湖北省武汉市一家自愿戒毒所戒毒，遭到保安人员殴打。这本是一起普通的行政案件，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却展现



出它耐人寻味的另一面。

来处理此事的是陈先生的妹妹，她闻讯从温州赶到武汉时，已经是6月17日，这离她哥哥被打已经有一个多星期。

汉阳十里铺戒毒所，位于武汉市五医院某分院的四楼内。负责人龚所长承认所内负责安保工作的涂某、胡某打了陈先生。龚所长在派出所民警来调查时称：是涂某等发现陈某在偷偷吸毒，双方因撕扯而扭打，导致陈某受伤。事发后，两名肇事保安被清退。

被打的陈先生的说法是，保安在所内作威作福惯了，瞧谁不顺眼，就会动手打人，他们把戒毒者当犯人看。当天的情况是，保安在陈先生的床头柜发现了一只刀片，询问来历。陈某回答不知道。保安认为陈不老实。6月11日晚间，以谈话名义，把陈叫出病房，将其打伤。

陈先生认为自己自愿自费来此戒毒，而自愿戒毒所本身是医疗机构，因此自己是一名消费者。自愿戒毒所没有任何强制权力，即便自己没有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也不应该受到保安的处罚，更不用说殴打，戒毒所这样做对他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陈先生说他的解释是有依据的，1996年和1999年，卫生部先后颁布了两个文件，规范医疗机构开设戒毒业务，这确定了自愿戒毒所自身的属性是医疗机构。

2008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明确规定，除了强制隔离戒毒，还包括自愿戒毒和社区戒毒。这也为自愿戒毒治疗的开展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有法律专家质疑，自愿戒毒所还有不作为的一面。有数据表明，局部地区自愿戒毒后复吸率高达90%以上。据笔者调查上百家自愿戒毒所得知，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视经济利益至上的自愿戒毒医疗机构从来都不会拒绝复吸者再次自愿戒毒，从理论上说，自愿戒毒所就成了吸毒者的避难所。

陈先生被打一案，揭开了自愿戒毒所管理不规范的冰山一角。

戒毒所负责人的解释确实让人心惊：陈先生在戒毒所内偷偷吸毒。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自愿戒毒所已然不是一块净土，依然有毒品在流通。

根据卫生部条例，戒毒所内保安必须有相当比例的人员是经过公安部门

培训，并持证上岗，而该负责人称，殴打陈先生的保安队长涂某，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培训，只是戒毒所临时从社会招聘的无业人员。

有业内人士告诉笔者，开办自愿戒毒业务的医疗机构现在已经不少，但是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严格按照有关法规条例办事，存在违规的行为包括：医疗机构将戒毒科室承包给他人经营，没有配备相关医护力量和相关设施，隔离措施不严，管理粗放等。他说，自愿戒毒所也有自己的难处，吸毒者是高危人群，管理难度本身就很大，医疗机构本身不具备执法权，必须依靠公安机关来处理。而公安机关的处理方法就是对违规吸毒者进行强制隔离戒毒，这又与医疗机构本身利益发生冲突。

专家指出，自愿戒毒是一个自觉改恶从善的过程，应该予以鼓励，特别是《戒毒条例》颁布实施后，应充分利用社会医疗资源开展自愿戒毒。当前，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支持戒毒医疗机构的发展，通过科学的医疗手段，帮助吸毒者脱离苦海。但是，戒毒治疗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自愿戒毒机构的审批把关应该从严从慎，鼓励兴办大型专业的戒毒医院，由公安机关派员入驻，从而改变目前自愿戒毒机构小、多、乱的情况。

自愿戒毒所，想说爱你不容易。

3、医院院长“合法”贩毒

当远在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的协查通报传到济南时，着实让济南警方吃惊不小。

山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一直认为山东民风纯朴，而发生如此大规模院方利用合法外衣进行贩卖管制药品时，着实让他们深感意外。

最终在山东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此案得以迅速侦结。此案警方先后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医用杜冷丁针剂1000支、杜冷丁片剂400粒，查实涉案杜冷丁针剂4100支、片剂20800粒和氯胺酮20支……

而众多非法流出医院的杜冷丁已经被那些“瘾君子”们作为毒品挥霍



掉了。

“此案的牵出可以说源头是一个小案。”经办此案的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原副支队长于文涛话语中透着平静。

而在其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真实案情是，在案侦过程中，是一个叫“斌子”的毒贩成功牵出了2006年沈阳最大的贩卖杜冷丁案——“6·10”特大跨省贩卖、运输毒品案。

在沈阳警方打击零包贩毒案件中，时常有吸毒人员会提及一个叫“斌子”的毒贩，而他向吸毒者提供的毒品并非传统毒品海洛因，而是医院常用的麻醉药品杜冷丁。据从其手中购买过杜冷丁的吸毒人员供认，“斌子”的货源非常充足，一个电话就能约定交货地点，而且货的质量非常好。

随后，办案民警在抓获的5名吸毒人员中再次获知，5人的毒品杜冷丁来源又是“斌子”。“斌子”频频出现在被抓获的吸毒人员供述中，其一定有重大做案贩毒嫌疑！警方的调查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经过侦查，“斌子”的真实面目终于被揭开——“斌子”真名张德斌，42岁，沈阳人，常年从山东购买毒品回沈阳贩卖。2004年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出狱不久即开始贩毒。同时，“斌子”的同伙郑树林也进入警方视线。

而更让于文涛和他的战友想不到的是，通过进一步侦查和化验，此次被查缴的医用管制药品杜冷丁纯度之高，购毒流程之正规，为近几年来所罕见，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山东省四家医院院长竟利用合法身份贩卖杜冷丁。

6月10日，沈阳警方正式对此案立案侦查，并定名为“6·10”特大跨省贩卖、运输毒品案。

沈阳警方的协查通报发往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济南。在山东警方的协助下，沈阳 警方侦查后得知，在山东进货的张德斌将于2006年6月23日凌晨返回沈阳。当日凌晨，侦查员预先埋伏在沈阳市大东区小什字街张德斌租住房住地附近。

警方的一张大网悄然张开着，只等嫌疑落网。为迎接张德斌，狡猾的郑树林先到室外望风，结果被守候在此的警方抓了个正着。没见到郑树林的张德斌警觉地拎着货欲进入租住房藏匿，却被守候的警方控制在楼道内，从其随身物品中当场缴获杜冷丁针剂450支。

送检后发现，警方从张德斌手中缴获的杜冷丁，全是国家正规厂家生产的医用产品，纯度极高。国家对这类药品的管理极为严格，它们究竟是怎样流到毒贩手中的呢?

经突审，张德斌很快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一个跨省贩毒网络逐渐清晰起来。

据张德斌交代，他的毒品都是来自一名叫“倩姐”的山东女子之手。

事不迟疑，尽快抓捕“倩姐”，但前提是必须有“倩姐”熟悉的人做内应，她才会上当。6月24日凌晨，做通张德斌的工作后，他表示愿意戴罪立功，给“倩姐”打电话，称还需要550支杜冷丁。在警方的安排下，张德斌的电话很快打给了“倩姐”，电话一端的“倩姐”没有丝毫的怀疑，满口应承下来，电话中，彼此约定次日上午10时30分到山东省乐陵市乐陵人民医院门前交易。

临战前的紧张让每一位参战民警没有一丝困意，那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6月25日，专案组10余名侦查员押着张德斌连夜赶到乐陵人民医院。

为了确保抓捕工作万无一失，侦查员雇用了一台当地的出租车，由一名侦查员乔装出租车司机与张德斌一起留在车内等待，而这辆车就停靠在医院门口不远处，假装成接病人出院的样子，其余人有的在医院附近支起了水果摊、有的假装到医院看病、有的在医院门前闲逛，但出租车一直处于侦查员视线之中。大家约定，一旦“倩姐”与张德斌交易成功后，“司机”便用车灯作行动信号。

时间伴着参战民警紧张的心情一分一秒地流走，看似平静的乐陵人民医院门前被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所笼罩。

“注意目标出现了!”10时30分左右，随着对讲机里指挥员一声音传来，在医院门口设伏的民警们的目光在瞬间都投向了一号目标区：此时，只见一名身着粉色纱料上衣、白裙子的女子出现在侦查员的视线中，她手上拎着一个大纸袋，左右看看后便迅速钻进停靠在医院附近的出租车里。

假装成出租车司机的侦查员发现，身着粉红纱料上衣的年青女子上车后对张德斌非常信任，没有交谈，进入出租车后马上收下2万多元钱，直接将手中的纸袋交给张德斌，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按照事先的约定，车灯亮了，假扮成出租车司机的侦查员及在医院门口附近设伏的侦查员们迅速将毫无防备的“倩姐”抓获。看到突如其来的侦查员们，“倩姐”是一脸的惊愕，没有反抗，直到被侦查员带走时，她依然惊魂未定，只是低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做的事，早晚有报应。”警方当场从她交给张德斌的纸袋中缴获杜冷丁550支。

经审讯，“倩姐”化名李倩，真名李素云，32岁，无业，现住乐陵市杨安镇。她的交代让警方坠入一片迷雾之中，大量的医用管制药品竟然出自一名无业女子之手，她手中的医用杜冷丁又来自何方呢，她的背后是不是有神秘的“上线”？

随着李素云进一步供述，她的“货”来自一名叫做赵承月的医生，他承包了乐陵中医保健院肿瘤科。

赵承月有重在作案嫌疑，抓获了赵承月案情将大白于天下。6月25日晚，侦查员租车前往赵承月承包的科室外守候，结果赵一夜未归。难道抓捕行动走露了风声？正当侦查员们准备撤走时，目标出现了：赵承月和一名男子于第二天凌晨一起出现在科室外，守候了一夜的侦查员马上将两人控制在科室内。

在警方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做贼心虚的赵承月很快交代了所有作案经过：46岁的赵承月是乐陵市本段乡人，执有行医执照，2004年曾因贩卖杜冷丁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后，取保候审。

谈到25日晚一夜未归，赵承月交代，前晚他因嫖娼与他同行的男子彻夜在一起。在警方面前，赵除了对自己贩卖杜冷丁的事实供认不讳，还交代了自己的两名“下线”——李素云和一焦姓男子。据其供述，他所在医院医用杜冷丁针剂从医院购出后，主要卖给李素云，另外还有大量杜冷丁片剂和氯胺酮则卖给焦姓男子运往河南。同时赵承月指认同他一起被抓的是他的货源之一，孔镇医院院长张志刚。他还交代出另外3家涉毒医院院长——花楼医院院长张泽友、张桥医院院长郭本胜、翟头堡医院院长崔喜成，而且这三家医院都在乐陵市，都存在非法出售医用杜冷丁的问题。

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赵承月和张志刚的落网，山东省一个“合法”的购毒随后转卖给沈阳的贩毒流程大白于天下。

在警方的介绍下，一个骗购、贩卖医用杜冷丁案的流程清晰地呈现出来。首先，由赵承月向医院提供大量伪造病历，也有的是由这4家医院院长授意本院相关科室的医生开具假病历，再由医院经德州市药品监督局建立麻醉药品专用卡（麻卡），然后医院使用“麻卡”到正规销售部门大量骗购杜冷丁，赵承月再以高价买进杜冷丁，通过赵承月、李素云等毒贩，最后杜冷丁流通到吸毒者手中。

而杜冷丁的价格也从最初的3.6元/支，几经转手，以70元/支的价格被卖到了吸毒者手中。

鉴于此案的复杂性，警方向有关领导汇报后，将张志刚及初审获得的多家医院涉嫌贩毒的情况向当地公安机关作了移交。在警方的押解下，涉案犯罪嫌疑人赵承月、李素云、张德斌和当场缴获的毒品及其他涉案物证被连夜带回到沈阳。

至此，“6·10”特大跨省贩卖、运输毒品案正式告破。

据警方介绍，近几年来，像这样贩卖医用杜冷丁的案件极为罕见。在案情结束时，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在这个案件里，医用麻醉药品自正规渠道流通出来变为毒品再次告诉我们，禁毒决不只是公安系统一家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4、看守所狱医的大蜕变

当田三旺与其他被告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时，他没有一丝昔日狱医的神采。

这样一起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宣判的重大涉毒案由于众多媒体的关注，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极大兴趣。

2005年6月13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跨国集团贩毒案主犯田水清、田三旺、黄小顺死刑，左亚乐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田云青、龚六仙、黄顺安等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15年、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和罚金5万元。据悉，



这是湘西州建国以来涉毒数量最大的一起贩毒案。

卷宗是枯燥的，但却真实地记录着以狱医田三旺为首的贩毒团伙的罪恶勾当：田三旺，系云南省潞西市看守所原狱医。2004 年 2 月，湖南凤凰县农民田水清在云南省潞西市购买毒品海洛因时被当场抓获，关押在潞西市看守所。田三旺因工作关系认识了田水清和同所关押的宁夏吴忠人王金云。同年 10 月 9 日，田水清被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释放后，从事看守所狱医的田三旺深知贩毒的暴利，就劝田水清继续从事毒品贩卖活动，并表示可以给田水清提供货源——毒品海洛因。在金钱的诱惑下，双方一拍即合，罪恶的交易一发而不可收。10 月 11 日，田水清之弟田云青赶到潞西市接田水清，田三旺便安排田水清兄弟二人在潞西市德安酒店住宿。次日田水清在离开德安酒店时付给田三旺人民币 15000 元，要求其帮忙购买毒品海洛因，田三旺要田水清去昆明等电话。当晚，田三旺从家中取出 175 克毒品海洛因，用黑色食品袋包装好后带到朋友左亚乐家中，交给左亚乐，要左帮忙把海洛因送到昆明交给田水清，并留下了田水清的联系电话，左亚乐表示同意。尔后左亚乐开自己的面包车携带 175 克海洛因赶到昆明，在昆明市澜沧江宾馆门口，左亚乐把装有 175 克海洛因的塑料袋交给了田水清，随后驾车离开。田水清携带海洛因返回凤凰县吉信镇都吾村家中，海洛因以每克 400—450 元的价格全部贩卖给了其他吸贩毒人员。

罪恶会在贪婪下变得越发疯狂。

2004 年 10 月的一天，田三旺从潞西市遮放镇跌下村刀岩朵手上购得毒品海洛因 1400 克放在左亚乐家中。2004 年 10 月底的一天，王金云、马秀琴电话联系田三旺求购毒品。田三旺要王、马二人到八达公寓宾馆，王、马二人到八达公寓后，发现田三旺早已在此开好房间，在田三旺的房间内，王金云把 30000 元人民币交给了田三旺，要求买 350 克海洛因，田三旺收了钱后让王、马二人在昆明等货。同年 11 月的一天，田水清电话联系田三旺求购海洛因，田三旺要田水清汇款到户名为王森的账户上。11 月 4 日，田水清向户名为王森的账户上汇款 54000 元人民币，当天田水清乘火车由吉首赶往昆明。田三旺接到田水清的电话后，又从刀岩朵手中购得颗粒状毒品海洛因 500 余克放在左亚乐家中。田三旺要左亚乐查清田水清的汇款到账后，便从左亚乐

家中取出500余克颗粒状海洛因以及350克海洛因，两人一起用经常装药的黑布包装好，乘车前往昆明，到昆明后经电话联系，在澜沧江宾馆一客房找到王金云、马秀琴，将350克毒品海洛因交给了王金云，并将500余克颗粒状毒品海洛因用夏桑菊颗粒胶囊盒装好，交给王金云，要王帮忙送给田水清。田水清到达昆明后经与田三旺联系，在澜沧江宾馆一客房内从王金云手中取得了海洛因，并将毒品海洛因带回家中销售一空。

……

当再一次贩卖毒品时，田三旺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他被警方当场抓获。

法院认定，被告人田三旺以贩卖为目的，先后6次从境内外贩毒人员手中非法收买、居间介绍买卖毒品海洛因5150克，然后贩卖给贩毒人员王金云、马秀琴及被告人田水清。田水清以贩卖为目的，先后7次从田三旺手中收买毒品海洛因4625克，然后在宁波鄞江镇、吉首市等地直接贩卖，同时还指使被告人左亚乐（贩1925克）、田云青、龚六仙夫妇（贩95克）在吉首市将毒品海洛因多次贩卖给当地的吸毒人员。黄小顺以贩卖为目的，先后两次在云南省瑞丽市从境外贩毒人员手中收买毒品海洛因1500克，然后贩卖给被告人田三旺。被告人黄顺安先后从被告人田水清、田云青、龚六仙处购买毒品海洛因98克，然后以贩养吸，在吉首市将购买的部分毒品海洛因多次贩卖给当地的吸毒人员，共贩卖毒品海洛因10余克。

在庭审中，法院认为，上述7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其中，田三旺、黄小顺在共同贩卖毒品海洛因的犯罪中，属非法买卖毒品的买方和卖方，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田三旺、田水清、左亚乐在共同贩卖毒品海洛因的犯罪中，被告人田三旺、田水清起意贩毒，为主出资，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左亚乐、田云青、龚六仙受被告人田三旺的指使、安排，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被告人田三旺、田水清、黄小顺、左亚乐贩卖毒品的数量巨大，依法应从严惩处。依照我国刑法相关条款之规定，分别判处田三旺、田水清、黄小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左亚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田云青、龚六仙、黄顺安有期徒刑15年、15年、7年，并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田三旺等贩毒团伙成员在贪婪面前，终用自己的生命为之埋单。

5、戒毒所贩卖戒毒女卖淫，原所长出狱告媒体

已刑满释放的原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出所后将广东一家晚报（下称某晚报）告上法庭，称其所做的一些报道失实，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从而让几年前的一桩戒毒所所长贩卖戒毒女卖淫案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

广州市长洲戒毒所（以下简称长洲戒毒所）隶属广东省第二工人疗养院，1991年底被列为全市定点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场所之一，开始收治戒毒人员。罗贤文于2000年5月至2002年3月担任该所所长。2002年3月6日，正在广州市长洲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李文来到广州市公安局报案，声称自己是在被戒毒所的管教卖给"鸡头"（组织卖淫者）"接客"时逃脱出来的。此后，一桩桩发生在长洲戒毒所里的肮脏交易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私放戒毒所戒毒女出所卖淫牟利，闻所未闻的丑闻。该丑闻经过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2年3月14日，广州某晚报记者赵世龙获知长洲戒毒所存在女戒毒人员被人领出强迫卖淫的情况后，乔装到该所以出资"赎人"的名义欲带女戒毒人员出所。罗贤文又违反上述规定，批准女戒毒人员董某玲、樊某雯被领出所。

2003年9月20日，该晚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赵世龙据此内容撰写的报道，引题是"滥用职权勾结'鸡头'贩卖戒毒女胁迫卖淫"。主标题是"'长洲戒毒所案'两头头跑不掉了"，副题是"原所长罗贤文被刑拘，省原第二工疗院张一平潜逃正在追捕"。

媒体的报道，一时洛阳纸贵。该报道更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报道属实。随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2003年10月，戒毒所几名管教分别被判处5年徒刑、无期徒刑。同年8月，检察机关开始追究相关领导责任。9月16日，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以"滥用

职权”罪，对长洲戒毒所原所长罗贤文实施刑拘。

2003年6月8日，广州市黄埔区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罗贤文有期徒刑两年后，罗贤文不服，上诉到广州中院。2004年10月11日，广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罗贤文有期徒刑1年2个月。

2004年10月28日，罗贤文向天河区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状。在诉状中，罗称，在2002年3月19日，他因涉嫌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被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5天后转为取保候审。同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对其作出了“因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2004年9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又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将罗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逮捕。

宣判后，罗贤文不服，上诉到广州中院；诉状称，记者取证不合法，同时他不具备滥用职权的主体身份，而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诉状告赵世龙侵犯其名誉权。

对于罗贤文的上诉意见，广州中院审理认为，原审认定罗贤文滥用职权的行为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没有以新闻媒体报道和影响为依据，而是依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以及罗贤文违规批准女戒毒人员出所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严重后果，作为定罪和量刑的依据。但考虑到本案造成的实际后果及罗贤文违规批准女戒毒人员出所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造成的，对罗贤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于是改判罗贤文有期徒刑1年2个月，宣判后不久，罗贤文即服刑期满。

经调查，从2001年9月到2002年3月，长洲戒毒所管教陈太中等人与“鸡头”内外勾结，将9名戒毒女子卖出戒毒所。而戒毒女刚踏出戒毒所，就被“鸡头”们强迫卖淫。2001年10月15日，罗贤文违反关于解除出所须经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领回的规定，明知来接女戒毒人员董某晓（当时使用姓名为陆某兰）出所不符合条件仍批准其出所，造成董某晓被他人出资接走后强迫卖淫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

对于罗贤文状告记者赵世龙一案，法院审理认为，记者报道事实清楚，内容属实，遂驳回其恢复名誉、赔理道歉的请求。

案件早已结束，而此案引起的思索仍将继续。

6、公安局长驾警车贩毒

5 月 21 日深夜，云南边陲城市思茅市像往常一样宁静，然而，表面的平静背后其实将在更大的风暴来袭。在沉沉的夜色掩映下，几辆警车开进了市公安局的某生活区楼下，车刚停稳，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迅速跳下车，冲上楼梯，冲进时任普洱县公安局局长的王喆住处，以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名将正在住处的王喆抓获。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现场搜查的结果还是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在王喆住处的床上、床下，其在思茅市的家中及车库里，到处都是厚厚一扎一扎的人民币和港币，经清理，共查获现金 667.62 万元、港币 159.676 万元，勃郎宁手枪 1 支、各种警用、军用子弹 900 余发。在王喆被抓捕归案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关的犯罪嫌疑人李国山、张坚、刘鑫硕、毛海军、茶星梅等 9 人分别在昆明、深圳、玉溪等地被抓获，至此，这些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人员被一网打尽，接受法律的审判。

那一年，是 2005 年。

一名刚过不惑之年的公安局长，正值年富力强、谱写人生精彩篇章的时候，为何走上走私、贩卖毒品的不归路，先后走私、贩卖毒品数十公斤？获知王喆贩卖毒品的知情人士在为王喆惋惜的同时，更是对其如何走上贩毒道路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思茅市和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国接壤，距离瓦邦 210 公里，是全国 7 大毒品通道之一。“金三角”毒品主产区缅甸佤邦辖区与云南省思茅市山水相连，一些不法毒贩往往携带大量的毒品翻过茂密的山林、趟过低浅的河水企图偷偷进入我国境内。毗邻“金三角”的思茅市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禁毒形势比较严峻。在我国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境外的贩毒分子也想方设法想要通过思茅这个通道将毒品输送到内地。

毒贩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每天都在思茅人身边上演。

对于身为普洱县公安局局长的王喆为什么会参与到走私、贩卖毒品的原

因，当地人在震惊之余，众说纷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担任普洱县公安局局长之前，王喆曾经是一名缉毒警察。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工作原因，王喆认识了一些走私、贩卖毒品的人，再加上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思想的防线没有筑牢，这些都为其以后进行毒品犯罪埋下了祸根。

据法院后来查明的事实，2005 年 3 月，时任普洱县公安局局长的王喆经不住贩卖毒品暴利的诱惑，找到缅甸果敢县老街执法处副处长李国山（云南孟连县人）和在云南经商的广东人张坚，邀约其一起做毒品生意。经过协商，决定进行分工合作，商定由李国山从境外组织毒品运入境内，由王喆负责运输到深圳，张坚负责在深圳当地进行贩卖。计划拟定后，张坚很快返回深圳，又拉上自己的朋友刘鑫硕入伙。

人一旦有了罪恶的念头，付诸行动只是迟早的事

2005 年 4 月 1 日，王、张、刘共同筹集了购买毒品的资金 50 万元人民币，交给了李国山。携带着 50 万毒资，李国山赶往缅甸贺岛，找到了毒贩李国友，李国友以 3.2 万元一件卖给了李国山 20 件毒品。4 月 3 日晚，李国山雇人将这 20 件毒品（约 700 克/每件）运回境内，交给了毛海军。随后，王喆驾驶着一辆三菱吉普车赶到，将毒品转移进了警车内，连夜运往孟连县城。4 月 6 日，为了能顺利将货发到深圳，经王喆安排，毛海军等人先期赶往昆明，刘鑫硕则直接赶回深圳，准备接货事宜。

在此后的几天内，王喆亲自驾驶警车，经昆明将这批毒品运到了广东湛江。由于是警察身份，加之警车的掩护，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4 月 8 日，在湛江郊区的一个加油站附近，王喆将毒品转移至由刘鑫硕开来等候的三菱车上。不久后，该批毒品由张坚等人负责贩卖，共得毒资人民币 290 万元。

见到轻易到手的钞票，尝到贩卖毒品甜头后的王喆更加欲壑难填。2005 年 4 月下旬，王喆、张坚再次聚到一起，密谋更大的“生意”，谈到以后的发财之路，两人商量再次用上次贩卖毒品所获得的 290 万元毒资再做一次毒品生意。于是，王喆又找到李国山，拿出 144 万，委托其再组织 70 件的毒品货源。5 月初，李国山在缅甸共收购了共 75 件毒品海洛因，并组织人员运送至我国境内。王喆得知后，亲自驾驶着警车前来接应，接下了全部的毒品。几



天后，王喆又和张坚、毛海军一起，再次驾驶警车运送这批毒品来到深圳。张坚将其中的65件毒品在深圳贩卖后得毒资920万元。而另外的10件毒品，则由李国山安排运到深圳，由毛海军交给毒贩庄林海。庄林海将该批毒品贩卖后，得到毒资106万元。

毒品出手后，5月8日，满心欢喜的王喆和毛海军一起，携带着355万元人民币返回思茅。5月17日，刘鑫硕携带150万元人民币，从深圳赶到思茅。5月20日，张坚携带150万港币和81万人民币从深圳乘坐飞机来到昆明。来到云南后，刘鑫硕和张坚都将毒资交给了王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喆等人的走私、贩卖毒品活动，早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针对这一情况，警方布置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一场撒开的大网迅速收拢。2005年5月18日，毛海军、茶星梅、庄林海3人在昆明某招待所被设伏多日的警方当场抓获。次日，李国山在昆明被抓获。5月21日，王喆在其公安局生活区自己的家中被抓获。

公安局长王喆走私、贩卖毒品案告破后，由于该案的特殊性，实行了异地管辖。临沧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王喆犯走私、贩卖毒品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并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对李国山、张坚等8人提起公诉。

公安局长开着警车大肆进行毒品犯罪，自然引起了众多省内外媒体和当地百姓极大的关注，在开庭审理的当天，法庭内外聚集了众多媒体的记者和群众，旁听案件审理的还有王喆的家属。据一位旁听了案件审理的媒体记者称：在法庭上，王喆目无表情，对所指控的事实一概否认，认为自己无罪，对自己家中的数百万巨款，他的解释是："几个做矿产生意的朋友准备开矿的钱，为了安全起见放在我家代他们保管的。"但是在公诉机关大量、充足的证据面前，王喆的辩护意见并没有被法庭采纳。

知情人士这样形容王喆："他干过公安，而且还是公安局长，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在庭审中对重要问题含糊其词。"最后，这位人士很是感叹："他一米八几的个头，不仅高大魁梧、仪表堂堂，而且年轻有为，只是居然鬼迷心窍走上了贩卖毒品这样一条不归路，真是可惜！"

在庭审中，其他8名被告及其辩护人多数都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

足、事实不清，应该宣告被告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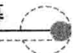
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于2006年3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王喆构成走私毒品、贩卖毒品罪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决定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国山、张坚构成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5名被告，也都构成走私和贩卖毒品罪，分别处以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被告人曾凡柯，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查获的手枪、子弹被依法没收。该判决作出后，除李国山外，其余王喆等8名被告全部提出上诉。2006年5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喆核准死刑。

在临刑前，王喆表示要检举揭发、自首立功。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依据法律规定，死刑被暂缓执行。有关部门对王喆检举揭发的事实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经过核实，王喆的检举并非事实，一切都源自他对生命的渴望，只想尽可能多地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最终，王喆被依法执行死刑。

7、监狱官员帮毒枭保外就医贩毒

周彦吉的死，标志着吴忠市贩毒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

6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国际禁毒日暨焚烧毒品大会上，对宁夏最大的贩毒大案主犯——同心县大毒枭周彦吉作出一审宣判，周彦吉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周彦吉表示不服，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当备受社会关注的大毒枭周彦吉被再次押上被告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公开审理。

多次贩毒数次漏网

资料显示：周彦吉绰号“周大”，1962年11月18日出生，同心县韦州镇石峡村农民。在同心县乃至云南、广东一带的贩毒黑道上，人们对周彦吉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周大”，几乎人人皆知。他17岁便开始在外闯荡，先后跑过甘肃、新疆，并南下四川、云南、广东。

周彦吉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最早有案可查的贩毒活动是在1989年3月初，他与新疆的马存福（1990年11月因贩毒在昆明被处决）、马清贵（1989年1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等人合谋，携带10多万元人民币南下云南，在大理市下关购买了毒品海洛因3440克，交给弟弟周彦义和马存福等5人分别携带。3月20日，在昆明开往广州的166次列车上，铁路公安民警将其一伙查获并当场拘留，缴获全部毒品。就在列车停靠一个小站刚刚启动不久，周彦吉趁机打开车窗跳车逃跑，其弟周彦义后来被判处死刑。

在贩毒的暴利面前，魔鬼从来不会停下贪婪的双手。1990年6月，周彦吉集资436万元再赴云南，很快与毒贩在一竹楼上接上头。6月7日，就在双方交易毒品过程中，循踪而来的云南省耿马县缉毒民警包围了交易地点所在的竹楼。狡猾的周彦吉跳下竹楼，又一次逃之夭夭。周彦吉两次漏网，从此在云南一带贩毒黑道上“名声大振”。同年12月，周彦吉伙同马世兴、海宗儒、马永和等人，筹集资金140多万元，从云南购得毒品海洛因37797克（37.797千克），企图雇人带入四川，从成都转道广州贩卖。1991年1月8日，当4名受雇的毒贩赶到云南省大姚县时，被公安机关截获，一名毒贩被当场击毙，两人被擒。1991年5月，周彦吉又一次伙同马世兴、海宗儒、马永和等人筹集资金47万元，从云南购得毒品海洛因11.7千克，由周彦吉亲自负责，分两箱运送到广州，其中一箱4407克在广州市被公安机关截获，其余被他和马世兴卖掉。

同心县警方1991年6月就已掌握了周彦吉贩毒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追捕，并发出通缉令。1991年12月14日，周彦吉潜回同心县。当时银南地区

公安处派出民警、武警近百人进行围捕，终将这个大毒枭抓获归案。1993 年，周彦吉被原银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服刑期间减刑为 18 年零 6 个月。

“保外就医”继续贩毒

2004 年 10 月下旬，同心县警方获取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将从云南运输大宗毒品途经四川成都到同心县贩卖。获此线索后，缉毒大队民警及时向上级公安机关汇报，自治区公安厅、吴忠市公安局立即派人赶到同心县，与同心县缉毒民警共同研究案情，并制订了详细的侦破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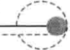
当年 11 月 4 日，同心县、吴忠市缉毒民警联合行动，前往陕西省进行侦查，12 月 13 日，缉毒民警经过缜密侦查发现，组织策划此次运输毒品贩卖的重点嫌疑人竟然是“保外就医”的大毒枭周彦吉！

12 月 16 日下午，按照事先制订的侦破方案，同心县缉毒民警赶到成都。18 日上午 8 时，公安厅禁毒总队派出的民警也赶到成都。当天上午 9 时许，在成都双流机场，准备接货的人一下飞机就被民警盯上。

18 日上午 11 时，在成都石羊车站，守候民警发现“接货人”提着两个大塑料袋，立即向专案组报告。专案组果断命令守候民警实施抓捕。然而，这一次扑了空，犯罪嫌疑人手里提的并不是毒品，而是用来伪装的袜子和气球。眼看就要失去战机，这时，“接货人”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专案组当机立断，指示侦查员小周接电话。小周很快与前来交货的毒贩接上了头。几分钟后，在成都石羊车站门前的街边，交货的毒贩被制服，当场搜出毒品海洛因 7.03 千克。

经公安机关查明，送货人名叫李鸿，云南省大理市人。据他交代，2004 年 10 月 26 日深夜，他接到周彦吉的电话，双方谈妥从云南运送一批货到成都的运输价格。

10 月 29 日中午 11 时，李鸿按照周告知的接货地点，从一个自称姓马的小伙子手中接到“货”——15 块毒品海洛因，并于 12 月 15 日晚按照周要求的时间送到成都，住进了成都石羊客运中心附近一招待所。他连夜将托运到站的 3 大袋“牛油”取出，挖出了油块中的毒品海洛因。第二天下午 2 时许，



李鸿在交货时撞上了警察。

据接货人杨俊交代，12 月 16 日深夜，周彦吉赶到他家，告诉他："你父亲和我在一个监狱服刑，最近我办了保外就医手续，临走前你父亲再三叮嘱我要照顾你家，这次有个好机会给你。"这个机会，就是去成都接货，周当即给了杨 9000 元，而这个照顾，差点把杨俊送上断头台。

监狱官员"帮忙"　毒枭"保外就医"

在贪婪者的眼里，只有金钱它可以让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成为儿戏。

让侦办此案的民警一直不解的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行的毒品犯罪分子，是如何取得保外就医资格的呢？据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周彦吉因贩毒被判刑，在银川监狱服刑。2004 年初，周彦吉找到银川监狱原助理调研员彭建欣，请彭帮忙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并许诺出狱后重谢彭建欣。2004 年 2 月的一天，彭建欣找到时任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的熊斌，以周彦吉在服刑期间表现较好，曾多次揭发他人犯罪问题，在银川监狱继续服刑不安全为由，请求熊斌将周调往其他监狱服刑。

2004 年三四月间的一个夜晚，在夜幕的掩映下，罪恶的交易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彭建欣将熊斌约到银川某洗浴中心，将 20000 元钱塞给熊斌。同年 5 月 21 日，经熊斌签批，周彦吉从银川监狱调到平罗监狱服刑。

2004 年 6 月初，彭建欣找到熊斌，称周彦吉有病，请熊斌给平罗监狱打招呼带周彦吉出狱检查身体。6 月 23 日，平罗监狱狱政科原科长黄靖华派监狱民警押解周彦吉到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熊斌打电话给黄靖华："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条件好，你们带周彦吉到那里检查身体。"经医院检查，周彦吉心电图正常，当时未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但在等待检查过程中，周彦吉给一名不认识的就医患者 1000 元现金，并告诉该患者自己的情况，让那人以周的名义去就诊。该患者经检查后，将诊断有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的诊断证明书交给周彦吉。

6 月 24 日，平罗监狱民警刘某将周彦吉的检查情况向平罗监狱医院原院长朱万国汇报，并将检查结果为正常的心电图及病历交给了朱万国。

当天，周彦吉将以 1000 元钱买来的假疾病诊断证明书交给朱万国。朱万

国明知周彦吉给他的这份证明是假的，却将这份诊断证明收下。

黄靖华在明知周彦吉身体正常的情况下，给周办理请假外出治病手续，并起草了《关于周彦吉外出就医的请示报告》，上报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审批。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审查后，同意周彦吉外出治疗两个月，熊斌签字同意。

2004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彭建欣到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再次送给熊斌现金 20000 元，代表周彦吉向熊斌表示感谢。

9 月 9 日，周彦吉请假期限将满。为了办理续假手续，他通过吴忠市利通区开私人诊所的马某，从吴忠市医院开具了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疾病的虚假诊断证明书，并将这份假疾病诊断证明托人转交给彭建欣，彭建欣又将假诊断证明书交给熊斌。9 月 13 日，熊斌将该疾病诊断证明书交黄靖华。黄依据这个假诊断书，起草让周彦吉续假的请示报告。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审查后报熊斌签字，同意周彦吉外出治疗 3 个月，日期截至 2004 年 12 月 24 日。

而在周彦吉保外就医的日子里，他贩毒的脚步更加疯狂，直至案发。

2006 年 5 月 17 日，青铜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熊斌、黄靖华、朱万国、彭建欣犯私放在押人员罪，分别判处 7 年、5 年、3 年，缓刑 3 年、6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大毒枭新疆落网

“12·18”案件发生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尽快将毒犯周彦吉抓捕归案。

2004 年 12 月 23 日，根据获得的线索，抓捕周彦吉的行动悄然展开。来自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吴忠市、红寺堡、同心县、盐池县等地公安机关的 200 多民警联合行动。按照周的关系人、亲属，民警在当地党委、政府工作组人员的带领下，直扑同心县韦州镇石峡村，但抓捕未果。随后，指挥部决定在同心韦州镇张贴通告，公开悬赏 30000 元缉拿周彦吉。

专案组对周彦吉亲属、朋友等关系人进行了认真梳理，确定了 147 名主要关系人进行全面模排调查；同时积极协调云南警方在办案中重点关注周彦吉一案的线索。云南警方还选派人员在周彦吉可能活动的大理、临沧及缅甸



境内进行布控，并向公安部申请，向边防部门发出通缉令，对周彦吉实施边控。与此同时，自治区公安厅派出 6 个工作组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甘肃、陕西、新疆等地，对周可能藏匿的地方进行了摸排布控。随后，公安部将周彦吉列为 B 级通缉犯，向全国发布通缉令。

2005 年 1 月 28 日，新疆工作组在调查周彦吉的一关系人时，证实周彦吉在案发后到过新疆昌吉。综合分析摸排调查获取的情况，专案组决定将抓捕重点放在新疆。针对周彦吉 2004 年 12 月 18 日贩毒未果，急于翻本的心理，专案组分析周彦吉极有可能再次到云南从事贩毒活动。

2005 年 12 月 6 日，专案组获取信息，周彦吉正在密谋再次贩毒。

2005 年 12 月 13 日，根据在云南发现的情况，抓捕组赶赴新疆，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确定了周彦吉的行踪。12 月 16 日，追捕小组在调查守候中发现，周彦吉与乌鲁木齐市的两名男子一起活动，便对两名男子实施布控。12 月 18 日晚，追捕组获悉周彦吉将到乌鲁木齐市一温泉洗浴中心的情报后，迅速对该洗浴中心进行了布控。19 日凌晨零时 36 分，民警将周彦吉抓获。12 月 27 日，周被押解回宁夏。

至此，大毒枭周彦吉终于伏法。

8、谁在为毒枭提供“保护伞”

愚昧与贪婪是一对双胞胎。

广西警方在柳州市捣毁了一个特大制毒窝点，缴获自制毒品 104 千克。一案缴获一百多千克毒品，这是柳州市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宗制毒案。为了详细地了解这宗特大制毒案，笔者在看守所内对此案的“导演者”、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农民肖春风进行了采访。

肖春风说，如果不对一些生化企业进行很好的监管，对毒品管理的一些规定不进行及时完善，有关管理部门互相推诿，还会出现更多的“制毒工厂”。

现实不可能有那么多“如果”。据办理此案的侦查员介绍，破获此案的线索缘起一宗命案。当年，柳州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贩毒案，缴获毒品海洛因1.5千克。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警方得到情报，在柳州的毒品黑市上，有一个人称“老大”的神秘人物，正四处找人帮他带毒、卖毒。这个“老大”不仅有钱，而且在柳州人头熟，关系广，路子多。此重量级人物立即引起了警方高度关注。随后，又发生了几起与“老大”有关的毒品案。

经过半年左右的调查，警方查实了这个神秘“老大”的真实身份：肖春风，49岁，来宾市大湾乡人。1980年，肖曾因打架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与肖一起加工毒品的，还有一个叫王霭权的广西宜州人。警方获悉，肖、王两人正在秘密加工一种叫麻古的合成毒品。

2006年春节前后，警方查明，肖、王试制麻古成功，但并未在柳州销售，而是销往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份。同时，肖在柳州市蝴蝶山路某生活小区的租住地址也被警方掌握。缉毒人员对肖的租住房进行严密布控。3月10日下午6时，缉毒人员将肖春风雇用的制毒工人张敏抓获，缴获毒品麻古以及碾粉、颗粒冲压、烘干等制造设备。根据张敏的供述，警方在小区内的另外几处房子内，将肖春风、王霭权抓获。令办案人员震惊的是，一间房子里，地上、茶几上、木板上，全是制毒原料及毒品。警方统计，该制毒团伙共生产自制毒品104千克。据张敏交代，他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冰毒片3000多粒。

警方了解到，麻古系泰语的音译，其主要成份是冰毒即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属苯丙胺类兴奋剂，服用后会使人体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极度兴奋，疲劳感饥饿感明显降低，会大量消耗人的体力和免疫功能。长期服用会导致情绪低落、疲倦、精神失常，心脏、肾和肝受损，甚至导致死亡。

一个电话就能拿到的制毒原料

因故意伤人入狱一年的肖春风出狱后到了香港，在一位香港朋友的介绍下，他在公海“民惠公主号”赌船上帮人看场子，还不时地到缅甸去赌博，几年下来赚了几百万元。有了钱他染上了毒瘾。为了有更多的钱来吸毒和赌博，他凭借自己从小对化学知识的喜爱，回到广西开起化工厂，尽管时间不



长，但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实践经验。

肖春风说，几年前，他在上网时，发现一家制药企业的醒目广告。他按着广告上联系人王某的电话打过去，问有何生意可做。王某说，可以提供茶多酚，并称茶多酚与其他化学原料结合、加工，就可以制作咖啡因。王某进一步“游说”，有了咖啡因，就可以办饮料厂、生产咖啡糖等。而且提出，如果提炼出的咖啡因没人要或者办厂不成功，将以双倍的价钱回收咖啡因。

只要稍微对毒品知识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高纯度的咖啡因本身就是毒品。如果在咖啡因中加入其他原料再提炼，就可以制成冰毒。肖春风说，通过几个电话，技术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主要原料又有人直接供货，加之王某的承诺，给他吃了定心丸。无论是在监狱还是香港，肖春风从狱友或工友那里知道毒品生意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肖春风说干就干，付了王某 9 万元，得到了约 100 千克的茶多酚。他还派人到广州购买了冲压式颗粒机、冲压机、反应罐等。当年 9 月，肖春风与曾在吉林省开设过地下赌场、对制毒技术也颇有研究的广西宜州市人王霭权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制毒史。

法律法规漏洞让他游离在“紧箍咒”之外

笔者在采访肖春风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他始终在钻政策空子，力图逃避风险。咖啡因是在茶叶、咖啡果中提炼出的一种生物碱，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极度兴奋，大剂量或长期服用会产生一定的精神依赖，同时对身体有很大影响。因此，被国家列入受管制的精神药品范围。

为了有效地管理易制毒化学品，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并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对 23 种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但肖春风说，根据条例规定，他们购回的茶多酚属于制作咖啡因的原料，不在管制之列。

同时，尽管咖啡因属于受管制的精神药品，但长期以来像咖啡因这样的精神药品算不算毒品，一直存在争议。加之，市场上多数毒品都大量掺假，贩毒者和吸毒者都心知肚明。因此，肖春风又有了新的空子可钻，那就是他提炼的咖啡因纯度不是很高。肖春风认为，这样一方面毒品照样可以卖出去，同时，低纯度的咖啡因“原则上不算毒品”。

有了这些空子可钻，肖春风等人就放心大胆地生产了。他们用6万元的原料就可以生产出1万粒冰毒片剂。负责销售的王霭权在吉林省的“批发”价为每粒28元，也就是说6万元可以很快变成28万元。肖春风说，这还不算掺假，如果掺杂其他物质，利润更难以估算。

政策的空子和暴利的驱使，让肖春风几近疯狂。他请了两个打工仔帮忙。一人负责提炼咖啡因，一人负责合成冰毒片剂，就这样粗制滥造——据打工者张敏交代，他每小时就能生产冰毒片剂3000多粒。

“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成了制毒者的“保护伞”

针对社会上屡屡发生的制毒案件，有关人士建议，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加强监管：

一是必须对生化企业生产产品，废料的流入、输出严格监管。肖春风特大制毒案发生后，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查出为肖春风提供茶多酚的厂家为江苏省无锡市一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据侦办此案的柳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谢警官介绍，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植物提取及其天然产物分离纯化的企业。由于茶多酚不属于管制产品，加之该企业证照齐全，合理合法，更何况公司称提供给肖春风的原料，对公司而言属于“废料”。开始真的“拿他没办法”，后来经公安人员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该企业下属员工打着茶多酚的名义，给肖春风提供了纯度为50%的咖啡因原料。抓住这一点，案件才有所突破。谢警官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可以想象，除肖春风外，不知还有多少不法分子从这里买原料，而且能轻而易举地运出来?”

对于合法企业正常生产来说，层层审批十分麻烦，因为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需要省级公安机关审批、发证，而对于作为“废料”处理的化学品又缺乏监管措施。因此，一方面需要对合法企业生产进行服务，减少审批层次，分级管理，另一方面对作为“废料”等化学品的处理要加强管理，堵住流向市场的源头。

二是监管部门互相扯皮，造成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态。按规定对易制毒化学品在生产、经营、购买、运输等各个环节都有明确规定，公安、安监、药检、工商等部门共同管理。但安监部门认为此案由药检部门管理，但药检



部门认为在他们权限内，该公司没有错，且“证照齐全”。广西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邱玉城说，这种多头管理难形成合力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犯罪的纵容，成了不法分子的“保护伞”。比如，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但由于不具体，太笼统，难以做到各司其职。

另外，各部门在行使职责时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通气，在协调工作上更是疲软无力。专家建议今后要在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方面加强力度，建立一个由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机制，做到统一调度，形成合力。

三是应建立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据有多年禁毒工作经验的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禁毒大队民警李警官介绍，目前我国专门针对精神麻醉药品和能制毒品的化学原料的管理只有一个“办法”和一个“条例”，即《精神麻醉类药品管理办法》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制毒犯罪的形式也不断翻新花样，合成毒品更是层出不穷，相关法律法规跟不上犯罪手段的发展，不少地方遭遇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而难以定罪的尴尬，使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近期南京就遇到一起买卖制毒品前体的案例，因为按规定，买卖前体不属于犯罪，最终没办法定罪。

此外，对于出现的涉入合成毒品案件的处理，只能通过公安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来执行。然而，这些都跟不上合成毒品的发展速度，如K粉出来后，盐酸羟亚胺才被列入管制范围，因此，随着合成毒品的不断出现，相应的管制规定要及时出台，防止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导致无法定罪的尴尬局面。

四是对精神麻醉类药品以及易制毒化学原料的管制范围应该有所延伸。河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彤颜介绍，比如茶多酚，属于管制化学品的上游产品，既不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管制中，也不在《精神麻醉类药品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建议把茶多酚这样常见的上游产品也列入管制范围。

9、副局长创立黑帮组织贩毒卖淫

何奇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成为阶下囚。

以一起普通的抢劫案为导火索，48 岁的何奇，从陕西省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栽”了下来。他被抓后，有民警感叹：“感觉山阳的天都蓝了!”

随着警方调查的不断深入，连办案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一个经济欠发达的普通县级公安局副局长何奇，竟然在几年间，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由打手、亲信组成的“黑网”，包括发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等。一名受害人借了 5 万元高利贷，最终被逼着偿还了 60 多万元，几乎家破人亡。

从一个普通的民警，一路升到公安局副局长，再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老板”，何奇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县人大代表升迁轨迹

2005 年夏天，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候，时任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奇即将度过他 48 岁的生日。

细究何奇的升迁之路，令人深思：在小小的山阳，他的身份“显赫”——山阳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城关派出所所长。从他的履历表上能看到他一路升迁的轨迹——1975 年 4 月应征入伍；3 年后退伍，在山阳县漫川电站待业；1985 年调入山阳县公安局漫川派出所；1990 年 9 月调入山阳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工作。自从 1992 年 7 月被任命为城郊派出所副所长后，他的路走得越来越顺当。先被任命为所长，1995 年，又被任命为城郊区委副书记兼派出所所长。1997 年 8 月，他当上了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兼城关派出所所长。到 2000 年 6 月，他被任命为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城关派出所所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 5 年，直至东窗事发。

在山阳，何奇的口碑一贯极差，多年前就有他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的传



闻。2004 年，山阳县公安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年底山阳县有关部门做行风调查时，山阳县公安局居然名列倒数第一。有不少老干部向公安局主要领导反映，这是因为山阳公安队伍中有少数的害群之马，胡作非为，败坏了人民警察的声誉。

但直接导致何奇落马的却是一起抢劫案。

部督办案件牵出幕后“老大”

从那一天开始，何奇就注定着灭亡的命运。

2005 年 1 月 26 日，山阳县发生一起抢劫案。经警方侦破，犯罪嫌疑人中有一个叫何锋的人，此人正是何奇的胞弟，至今负案在逃。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姚鹏于 3 月 28 日被抓获。审讯过程中，姚鹏进一步交代了多年来充当何奇打手、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的事实，何奇一案浮出水面。

此案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1997 年冬到 2000 年，何奇还是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兼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他曾连续参与两家歌舞厅的经营。一家是县政府招待所的歌舞厅，另一家是世纪花园歌舞厅。

1998 年 7 月，何奇和徐新银、冯彧斌等人，谋划开办歌舞厅。何奇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原山阳县自来水公司经理王某私下交易，从县自来水公司手中买下了县政府招待所歌舞厅的经营权。何奇在幕后操纵，指使冯彧斌与县自来水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的结果是何奇、冯彧斌、徐新银三人，每人出资 5 万元收买经营权，又共同出资对歌舞厅进行装修改造。包括更新设备，增设卖淫女宿舍等。为了掩人耳目，何奇让冯彧斌、徐新银二人具体从事歌舞厅的经营活动，自己不公开参与管理，主要负责协调外部关系，以及私下招揽生意等事务。

除了为歌舞厅的非法经营活动充当保护伞，何奇有时也亲自参与歌舞厅的“业务”，包括招募青年女子在歌舞厅卖淫。

1999 年春，何奇派人到湖北招募歌舞厅“服务员”，并“选中”两名女青年，送到山阳县政府招待所歌舞厅从事卖淫活动，何奇亲自驾驶警车前往迎接。

在经营歌舞厅期间，何奇认识了常来消费的山阳人党军宏，何奇有意将其发展为自己的帮手，并指使其为自己发放小额高利贷。

2000 年前后，山阳县个体工商户李建峰，因长期将自己的运货工具车停放在城关派出所院内，与何奇接触增多，李建峰看中何奇手中的权势，便与何奇拉关系，频繁出入城关派出所，成为派出所不是民警而胜似民警的特殊人物，被称为“二所长”。李建峰多次与何奇参与放高利贷等非法敛财活动，逐步成为何奇手下的骨干。

当时为李建峰打工的姚鹏，起初是替何奇、李建峰收高利贷，随着与何奇交往增多，变成直接为何奇使用的骨干成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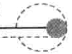
何奇之弟何锋长期吸毒，仗着何奇的权势，长期横行于山阳县，无人敢惹。

黑社会组织疯狂敛财

在相互勾结、大肆敛财中，一个“黑网”也渐渐织成。以何奇为首，党军宏、李建峰、姚鹏、何锋为骨干，有 20 多人参加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形成了，并且有了自己的组织规则。他们的“业务”就是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由何奇出本金，以党军宏、李建峰、姚鹏的名义向他人放高利贷。

根据“组织规则”，他们不能暴露资金来源是何奇的，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要把本息收回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先选择发放高利贷的对象，即那些从事企业生产、建筑包工，有经济实力、但无社会背景靠山，急需周转资金、使用非法暴力手段易于控制的人。选定目标报何奇同意后，他们开始放高利贷。规定贷款时间一般以一个月或是半个月为限，迫使贷款人很难在期限内还本。而且当月、当次 20% 的利息先行扣除，多次收息最后收本。当贷款人无力偿还时，就采用“超小时罚款”、“利滚利”等方式，层层加码盘剥，使贷款人陷于高利贷圈套。甚至在组织成员的暗中串通操纵下，逼迫借款人借何奇的高利贷，又还何奇等人的高利贷，一步一步把贷款人逼进“利滚利”还不清的高利贷陷阱里。

据调查，从 1998 年至 2003 年，何奇和手下先后敲诈勒索 17 起，受害人被侵害达上百人次，涉案金额达 460 余万元，非法敛财 340 余万元。



追“债”的手段丧心病狂

2002年4月28日，因资金周转困难，山阳县高家村“启明多孔砖厂”厂长姜启月找到李建峰借款。结果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几乎家破人亡。

在姜启月找来后，李建峰与何奇密谋，用何奇的资金，以李建峰的名义放给姜启月高利贷5万元，月息20%，贷期一个月。李让姜给打借条后，当场扣除月息1万元，姜实得款4万元，此款姜第一、二个月按时付清了月息。至第3个月，姜已没有能力清息，岂料刚过3天，李建峰便以姜启月“超时”为由“罚款”，按每超1小时罚1000元计算，“罚款”7.2万元。加上第3个月的利息1万元，共8.2万元，让姜打下欠条。第四个月姜仍无力还钱，李建峰将8.2万元累加为10万元。至第5个月，姜启月还给李5万元本金，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不料李建峰把累加而成的10万元“欠款”又变做本金，月息20%。这10万元姜启月用了24个月才还清，光利息就付了48万元。这笔实际金额仅为5万元的高利贷，让何奇、李建峰从姜启月身上盘剥了64万元！

2002年5月31日，因砖厂被罚款，姜启月无奈又向李建峰借高利贷。李建峰用何奇的本金贷给姜10万元，扣除半月息20%的2万元，实付现金8万元，约好这笔高利贷贷期15天，并要在第5天还5万元。到第8天，姜托人贷款5万元，交给了李建峰。李以超时为由作为了罚款。至半月期满，姜又给李还款5万元，李将姜10万元借条抽出，剩余5万元本金，经姜求情变为月息20%，姜用时14个月，付息14万元。这笔高利贷本金10万元，结果姜启月光利息就付了16万元，还交了“罚款”5万，共还了31万元！

2002年10月，李建峰逼姜启月还第一次借款4万元的高息。姚鹏与何奇串通，何奇出本金，以姚鹏的名义再次放给姜启月5万元高利贷，定为日息1%，当场扣除10天的利息5000元和5000元风险金，实给姜4万元。10日后，姜未按时还款，5000元风险金被当作了罚款，5万元的高利贷也转为月息20%……因姜启月无力偿还，2003年7月23日中午，何奇指使姚鹏把姜劫持到家里，何奇用一副拉力器朝姜启月身上乱打，并用手枪指着姜的头，威胁姜如果不还钱就毙了他！

何奇一伙的敲诈手段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一次，姜启月被李建峰、何奇劫持到城关镇权垣路段。李、何拿出一次性注射器，吸入药剂要给姜启月注射，说这种药给牛打了牛就会乱蹦，给人打了人就会发疯，威胁姜还款。

敲诈受害人武某时，李建峰、姚鹏多次将武某劫持到山阳县烈士陵园及苍龙山上，强行脱掉武的裤子，用细树枝、草棍往武的下身捅，进行摧残。

2002年10月底，何奇以李建峰的名义发放给退休教师毛某高利贷2万元，用时4个月，利息8000元。到期后，毛无力按时归还。2003年秋，何奇亲自带领李建峰、姚鹏驱车赶到毛的老家，将毛家电话线接头拔掉，使其与外界失去联系，向毛逼要高利贷，并把毛带往县城借款，途中停下车，把毛拉到路边玉米地里，李建峰强迫毛脱掉裤子，让姚挤青辣椒水往其下身抹。逼毛重新给打2.8万元借条后，又拉到城关派出所看管，并将毛起诉到法院。

在何奇一伙的迫害下，姜启月被敲诈勒索140余万元，砖厂一度倒闭停业。他藏进砖厂工棚躲避暴力侵害，由70岁老母偷着送饭，被何奇一伙发现后又跑到西安、陕北、甘肃等地流浪避难。

高利贷受害者张某，为使家人免遭何奇一伙的侵害，与其妻假离婚。另一名受害人袁某不堪忍受何奇的折磨，曾想与何奇同归于尽，但惧怕对方势力大、爪牙多，担心死后其妻儿难逃黑恶势力侵袭，一度背井离乡，有家难归。

爪牙倚势作恶逍遥法外

作为何奇的得力干将，李建峰、何锋等人多次殴打他人，寻衅滋事，但这些因为何奇的包庇，没有得到依法追究。

1998年11月21日下午，山阳县漫川镇村民李国顺与何锋在漫川街道发生争执。何觉得李不给他面子，回家取来双管猎枪追打李国顺。李闻讯后躲避，何锋追至李开办的木器厂住房寻找未见，在屋里连开4枪，将木器厂里的卧室顶棚震塌，李妻因惊吓昏迷。由于何奇从中干预，警方对此案未作任何处理。

2002年5月，湖北郧西县法院干部李大彬一行前往西安执行公务，途经



山阳县漫川镇街道吃饭时，与何锋发生争执，李准备报案，何威胁说：“我是公安局的，要报案就把你的车砸了！”李一行5人赶紧往山阳县城行驶，何锋打电话把李大彬的车号告诉堂弟何罡。李行至山阳县城东边的鹃岭，被何罡带人拦住，砸坏车玻璃，打伤李大彬。李大彬在山阳治疗期间，何锋仍然扬言要把李打残。李仅治疗一天，就赶紧离开山阳前往西安，何锋竟带领同伙开车追逐。李大彬在办案民警的护送下才离开山阳。事后，李大彬控告何锋倚仗其兄权势，寻衅滋事，属于黑社会犯罪，要求追究何锋等人的刑事责任。但在何奇的干预下，仅对何罡等人治安处罚了事。

何奇一伙自1998年以来，疯狂作案，有时甚至驾警车作案。受害群众百余人次，殃及党政干部、政协委员、警察、企业职工。为激励团伙内的骨干成员，何奇曾带党军宏、李建峰、姚鹏到外地旅游、到大城市嫖娼玩乐，并用绑架、敲诈得来的赃款奖赏骨干成员。

何奇团伙中有多名吸毒人员。党军宏不仅吸毒，而且还贩卖毒品，2003年8月份，经何锋联络，党军宏从潼关毒贩亢战战手中购买毒品海洛因15克吸食。2004年2月，党又从亢战战手中购买10克海洛因，不想给亢付钱，便与何锋商议，由何锋叫城关派出所司机把党军宏接上警车，故意让亢战战看。亢见警车把党带走，仓皇逃离山阳返回潼关。党把一半毒品分给何锋，作为“报答”。

何奇落马案令人深思

多行不义必自毙，何奇的恶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

对何奇的调查并不顺利。身为公安局副局长同时又有多年从警经历的何奇有着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当然不会乖乖就范。被“双规”之前，何奇利用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多次妨害作证，多位高利贷受害者受到了何奇的威胁利诱，要求他们给其作伪证。

得知公安机关询问姜启月后，何奇托人约姜见面，企图和解，被姜拒绝。李建峰按照何奇授意，找到姜启月夫妻，威胁恐吓。何奇还和李建峰订立攻守同盟，教唆李更换手机号码，教给他对付公安机关审讯的办法，并要李转移罪证。

2005年6月29日，山阳县纪委决定对何奇实施“双规”。7月23日，山阳县人大常委会对何奇作出“暂停执行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7月25日，何奇被山阳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8月4日经山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此案历时一年多，目前已侦查终结。异地司法机关——商州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妨害作证罪、绑架罪、组织卖淫罪等9项罪名起诉何奇及其团伙的另外9名成员。他们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如今，何奇的犯罪事实依然在山阳百姓心头萦绕，人们再回头看看，也禁不住要问：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为什么能横行多年？

10、禁毒办副主任为毒贩改年龄之谜

黑幕是最经不起阳光照晒的。

8年前，本该被判重刑的毒贩，却因在派出所将年龄改小8岁，变身“未成年人”，而仅获罪7年，其同案犯两人死刑、3人死缓；8年后，秘密败露，当年为其改年龄的派出所所长被逮捕，而已刑满释放的毒贩仍逍遥法外。

那么，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派出所所长为何帮助犯罪嫌疑人修改年龄？

毒贩被改小八岁

时光回溯到8年前。

1998年5月份，甘肃省广河县的6名毒贩在上海贩毒时，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沪甘两地警方共查获涉案毒品6000余克。随后，经上海的法院审理，6名毒贩中，两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判处死缓，唯独一名叫“张志龙”的案犯，却因实施犯罪时“不满16周岁”，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司法人员并不知道，这个“张志龙”，其实是这个贩毒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真名叫马格麦，“张志龙”这个名字是伪造的，



而且年龄也是假的，被整整改小了8岁。这个1974年3月1日出生，到案发时已24岁的青年，在被改掉年龄后，摇身一变成了不到16岁的未成年人。

2006年，马格麦刑满释放，从上海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现让同案犯的家属十分震惊，当年的贩毒集团头头，为何重获自由？同案犯家属将这些疑问举报到了纪检部门。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黑幕逐渐浮出水面——8年前，时任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所长的赵树德，帮助马格麦将其户口从祖籍广河县迁到站滩派出所，并为他改名、改小年龄，这才使马格麦“成功”逃罪。

2006年9月19日，赵树德被检察机关带走。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捕时他的职务是临洮县公安局禁毒办副主任——一个专事禁毒工作的县级禁毒专业机构的负责人。

“公安民警将嫌疑犯的年龄改小整整8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胆子太大！”一位在临洮政法系统工作20余年的干部这样评价赵树德。

令人惊讶的是，赵树德帮马格麦办假身份证、改小年龄，并不是在其贩毒被捕后的“补救措施”，而是在其去上海前就已办好。“这么做，很可能就是为一旦被抓好找退路。”甘肃定西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分析。

经调查核实，当年，马格麦的家人找赵树德帮忙，也是转了几层关系。8年前，甘肃省广河县居民马格麦在其女友的帮助下，由其女友的母亲胡某找到临洮县公安局民警冯某，冯某又找到时任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所长的赵树德，为其办理了姓名“张志龙”，出生于“1980年5月10日”，住址“临洮县站滩村上街社”的假身份证。

从地图上看，位于定西市的临洮县和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县东西相邻，中间只隔了一条洮河，“所以他把户口从广河迁到临洮辖区的站滩乡也是很自然的。”那位检察官说。

面对协查函一错再错

据了解，马格麦在上海贩毒被抓后，由于本人交代的出生日期是1982年5月20日，与那个名为“张志龙”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符，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为了核实该罪犯的真实年龄，曾专门向临洮县公安局站

滩派出所发出协查函，要求协助核查该罪犯的真实年龄。

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接函后，所长赵树德感到事态严重，但他不想着及时纠正，而是决定一错再错。

“另一涉案民警好像在110指挥中心工作，而且是案发后公安机关主动带到检察院的。”

赵树德与胡某、冯某商量后，又找到站滩乡站滩村的文书编造了以胡某为“户主”的虚假常住人口登记簿，将“张志龙”编造为胡某的外甥，和胡某的女儿张某一起编造在以胡某为“户主”的站滩乡站滩村常住人口登记簿上。

一切安排妥当后，站滩派出所向上海检察机关出具了“张志龙”的出生日期为1982年12月28日的户籍证明。这样，上海检察机关依据站滩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以“张志龙”犯罪时不满16周岁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也按犯罪时未成年判处“张志龙”有期徒刑7年。

同案犯家属的举报，让这一切在8年后真相大白。

赵树德改龄一案，涉案民警有两人，除了赵树德外，还有当年在站滩派出所一名负责户籍管理的内勤。据了解，这名涉案的民警姓姚，被检察机关带走时，也在临洮县公安局工作。“不清楚，我们才来，和他（赵树德）不熟。”

坊间对赵树德一案知之甚少，当笔者提起这个名字时，临洮多数市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个人，没听说这回事。”即使少数人隐约记得赵树德，也是从甘肃当地媒体的报道中略知一二。

八年前的往事后者难评说

但赵的落网在临洮警界却引发了一片震惊。在临洮县公安局，正对二楼楼梯口，就是赵树德曾经工作的地方，金黄的门牌上刻着3个红字——禁毒办。这是一个不足9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两张桌子，还有一台嗡嗡作响的电脑，把这里填得满满当当，靠右手的桌子曾经属于赵树德。

如今，办公设备还在，主人却已换了。

与苏某一样，临洮县公安局的其他民警一听提起赵树德，纷纷表示：“不



清楚，我们才来，和他不熟。”而现任局长以在开会没时间为由，婉拒了采访。其余领导则表示案子早就移送检察院了，那些都是很久远的事。

据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赵树德调到禁毒办时间不长，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事，原来在办公室当主任，新局长来后才调的。

而赵树德8年前为毒贩改龄时工作的临洮县公安局站滩派出所更是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个只有3个正式民警的派出所经常换人，“8年前的事，已没人能说清了。”站滩派出所一民警无奈地说。

“8年后很多证人找起来很难，赵树德自己也不承认受贿4.5万元一说。”

日前，有媒体披露赵树德在为毒贩改年龄时，曾受贿4.5万元，但就这一点，马检察长并未确认。“他肯定收好处了，但到底收了多少钱，是不是媒体披露的4.5万元，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但他表示，以站滩乡1998年的经济水平，如果真是4.5万元，就不是个小数目了。

同样的说法，也在定西市检察院被印证。一位检察官告诉笔者：“起诉的罪名很可能不是受贿，而是徇私舞弊，而且检察院在抓人办案之初，也是以涉嫌徇私舞弊的思路展开工作的。”

之所以暂未涉及受贿，因为取证非常困难。“相隔时间太长，8年后很多证人找起来很难，赵树德自己也不承认受贿4.5万元一说，更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位检察官透露，在广河县贩毒的人不少，调查人员只要一说是贩毒的事情，不少家庭都人人自危，“都害怕扯上自己家人，假话说起来一串串，让人很头疼。”

直到目前，只查明赵树德收受了马格麦亲属送的宰杀的全羊、烟酒，还有二三百元现金。

疑问待解皆成往事

“上海警方当年为什么只向站滩派出所发函询问，而不亲自为马格麦测骨龄。”

八年前的这个案子，是由上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并由上海当地法院宣判的。判死缓的三个罪犯，至今依然在上海服刑。

可是，当时为何没人质疑？定西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解释：“当年虽有案

犯家属到上海旁听，可一旦确定是未成年人，马格麦就不会被公开审理，所以无论是同案犯还是其家属，不知情也就很自然了。”

同样，恰恰是在上海审判，也为赵树德给马格麦改身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正是远在上海，他们才敢大胆假造身份，”这位检察官说，“如果是在当地审，地方就这么大，就这些人，谁不清楚谁?”

但这位检察官也认为，上海警方太马虎，“当年为什么只向站滩派出所发函询问，而不亲自为马格麦测骨龄?”

虽然马格麦仍未归案，但他一旦落网，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么，对马格麦如何重新定罪量刑呢?

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占平介绍，像这样的判决，在近年来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并不多见，这是个典型的漏罪。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如果要改正，人还是应移送到上海，由 8 年前审判他的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朱占平说，“上级人民法院也可按照这个程序指定原审法院再审，上级检察院也可以用抗诉进入再审程序。”

“只要人被移送过去，再审不会太麻烦。”朱占平分析。

同时朱占平介绍，由于时隔 8 年，《刑法》对贩毒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已有了变化，“重判应本着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果 8 年前的标准轻，就按 8 年前的，反之就按现在的。”

可一旦重判，法院如何处理马格麦已服刑 7 年的事实?“如果是判有期徒刑，就减掉 7 年，但如果是无期、死缓或死刑，那就没办法了。”朱占平说。

11、人大代表导演现实版《黑冰》

没有人能够理解周小明被捕时的心情。

正应了那句老话：出来混，欠下的债迟早是要还的。在结束 3 年的逃亡后，41 岁的武汉同济药业董事长周小明显然对被捕早有准备。办案干警郑国



义说，周小明被捕后并不慌张，第一句话是“应该我去找你们，而不是你们来找我”。在从武汉押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周小明主动与干警说话，声音洪亮等种种表现，充满解脱的意味。

30 岁即成创业奇才

有熟悉周小明的人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如果将其用到正道上，他的命运注定被改写。

周小明的年龄与谭晓林、刘招华等大毒枭相仿，但经历完全不同。比较起来，文质彬彬的周出身更好。他曾是“创业奇才”、武汉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他利用制药企业董事长的身份贩卖咖啡因 38 吨，使自己成为“药变毒”的典型代表。针对这种类型毒贩的特点，公安部禁毒局有关人士介绍，“他们有合法身份，不易被发觉；他们倒卖毒品，又打破了其他贩毒者从境外偷运、私种、制作加工毒品的惯例”。

在发展成为一个靠倒卖易毒化学品进行牟利的毒贩之前，周小明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1995 年左右，刚过 30 岁的周小明成为七家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但他的公司就像一个吃多了的胖汉一样，消化不良，步履蹒跚。

“实际上，1997 年后周小明的生意就在走下坡路。”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缉毒大队负责人甘警官说，“他的事业成于‘规模’，也败于‘规模’。”全面出击“摊大饼”的经营方式，在企业经营规模向纵深发展时，资金危机马上就显露无遗。到 1998 年，周的公司已经负债累累。知情者说，那时候来公司讨债的人不少，每次都由门卫通知，周“躲到其他同事的办公室、厨房甚至厕所里”。

为了寻找资金，周小明决心进军利润丰厚的制药行业，与同济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武汉同济药业公司。公司成立那天，同济医学院唐帮春回忆，“很热闹，有市里的重要领导出席”，同济方面也将该公司视为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最初同济和周小明分别以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但周小明的资金链出问题后，双方若即若离。”唐帮春说。

借壳突围陷于资金链

到1998年初，周小明不得不寻找其他生产基地，这一次由黄陂区政府牵线，同济药业与举步维艰的国有制药企业武汉市第六制药厂（以下简称“六药厂”）实现合作。黄陂区看中的是“同济”的牌子，对周小明十分热情。湖北省报一位记者表示，当时黄陂区政府不仅先后7次帮助解决兼并过程中的问题，而且由政府出资26万元办理资产划转等有关手续，然而积极促成之下，双方合作酿出的却是一杯苦酒。

六药厂在很多人眼里，显然是一个受害者。甘警官说，“黄陂区政府，还有六药厂，都被骗了”。据他介绍，双方合作之前，六药厂尚可养活退休工人，还能开工生产几种药品，其中生产的“感冒通”系列产品闻名全国。但被兼并后，周小明并未兑现当初的投资承诺，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最终生产陷入瘫痪，“93%的工人没事做”，在岗工人的工资也难以保证。六药厂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到2002年，“累计有20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尽管武汉市区离六药厂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周小明几乎从不去厂里”，这导致六药厂的数百名无工资可领的职工多次到市、区两级上访。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最终六药厂一纸诉状将同济药业告到了法院，在公司主要领导外逃或被捕的情况下，同济药业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对该案进行协调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冬莉回忆说：“当时双方的合作已经完全搁浅，同济药业没有主事的人，对双方的调解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六药厂与同济药业便不再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

大肆骗购制毒原料牟利

周小明被抓后，透露了他与六药厂合作的真实想法：只为骗购。

自从与六药厂合作后，他就开始一步步进行着自己的罪恶勾当。据笔者调查了解，从2000年起，六药厂已经成了周小明手里的一个“幌子”。周开始利用药企董事长身份来编织自己的毒品网络，经营毒品生意。这一年春天，周小明听公司保安说，河南漯河的王振平想买咖啡因，价格很高。陷入资金烦恼的周小明授意公司销售经理李禄荷“可以试试”，李便从厂里提出了50



千克咖啡因，卖给王得5000元（合10万元一吨），过了几天又卖给王100千克。周发现这生意“来钱快”，于是专门做起了倒卖咖啡因的生意，至案发时，售卖量已超过38吨。

周小明购买咖啡因的来源，郑国义说，比较固定的是四川乐山中西药业公司，这是一家定点的国有制药企业。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我们了解，这个企业生产、加工大量的咖啡因，都是国家批准的，是合法的，问题全出在销售环节上。就是有的买家用虚假证明非法购买，钻了空子。”李禄荷落网后供述，因为河南方面的需求量很大，2001年3月，他与副手曾庆江持同济药业无效的咖啡因购用证明复印件，找到乐山中西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任光华，联系购买咖啡因。任光华请示当时的代总经理和主管销售的副总并获同意后，开始大量卖给同济药业咖啡因。

被“钻空子”的不止乐山中西药业公司。笔者了解到，咖啡因是国家管制类药品，但有关部门管制中的漏洞为毒贩们提供了巨大的犯罪空间。同济药业一名供销人员交代，到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批的时候，只需提交上次产品已用完的单据以及重新购进的申请书，这些内容都由周小明、李禄荷口授，填多少，怎么填，十分随意。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陈金和说，按规定，咖啡因只能持购买证明原件正本购买，“但是，有的销售单位仅凭购买证明的复印件或传真来的购买证明就大批地销售。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要购买单位一张咖啡因购买证明，买多少都行。”

显然，医用精神药品原料市场的混乱无序，是滋生这起毒案的温床。令甘警官一直想不通的是，“近于停产的六药厂每年生产所需咖啡因仅几百千克，但该厂却办出了每季度购买15吨咖啡因的购买证明，如此大量的进货量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丝毫怀疑。”结果，同济药业分17次从乐山等地进货38.5吨。李禄荷等人将这批货存放在汉口一个租来的货仓内，然后与河南的史炳忠、王振平等人联系，让这些二级经销商将咖啡因运回河南加工、销售。

“咖啡因被列入受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范围，目前我国咖啡因的合法生产大于合法需求，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较为严重。”公安部禁毒局的邓警官介绍说，“公安禁毒部门已破获多起境内外贩毒分子互相勾结，把咖啡因走私出境

到金三角地区的案件。”

邓警官说，咖啡因是对人类起作用最快的毒品，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包括大脑，都会在几分钟之内吸收它。“在市场上，咖啡因是一种低端毒品，吸食多为民工及城市低收入者。”而哈铁警方在侦破周小明案时，发现在内蒙古的巴盟、山西的高平、河南的漯河等一些毒品的重灾区，吸食的毒品都以咖啡因为主，购买者只需花 1 元到 5 元钱就能在食杂店、菜市场买到。咖啡因还有另外的用途。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在扫毒时，发现很多人将咖啡因掺杂在冰毒和海洛因等毒品里吸食。”

武汉同济药业最先被公安机关拘捕的，是公司销售部经理李禄荷。事情过去多年，甘警官仍可清晰记起当时的场景。他说：“李禄荷中等个头，显得稍胖，40 多岁就已经秃顶，他是周小明忠诚的执行者。”落网后，李禄荷立即供出了周小明。机敏的周得到消息后马上就消失在警方视野之外。

案发后神秘消失

周案被称为现实版《黑冰》。一直跟踪这起案件的甘警官评论说：“整个事件的发展比电视剧更曲折、更有戏剧性。”3 年中，专案组早已解散，数十名涉案人员被判重刑，如果不是 2006 年初的一个来自武汉的举报电话，周小明的逃亡还将继续。

2002 年，在一段时间的查找未果后，哈铁警方的干警离开了武汉。随后的 3 年中，周小明的下落几乎成了一个谜。武汉警方的办案人员说，2002 年，警方曾安排一些消息灵通的“线人”帮忙找周小明，刚开始还有点线索，但几个月后周小明的消息就完全没有了。警方估计周已逃往外省。

事实上，周小明一直隐藏在武汉，先后住在几个宾馆和两所大学，而且先后整了 4 次容。郑国义说，戴眼镜是周小明的最大特征，案发半年后，周在陆军总医院做近视眼矫正术。后来还做了一个切眉手术，将粗眉变细。相应地，鼻子、口型也有了改变。因怕警方发现，周小明还办了 3 个假身份证。

周在逃亡期间做的最多的事，除了锻炼身体，就是翻看有关法律书籍，了解案件审理过程。用周的话说，“调整心态、勇敢面对，最终解决问题”。后来，周小明了解到湖北惠辉药业药厂搞工程，公开招聘总设计和采购，待



建厂房在监狱内。这个工程似乎可以同时给周带来生活费和安全感，毕竟房地产、制药，这些对于周来说都是轻车熟路。但周小明应征成功后不久，就被一位神秘的匿名人士举报。

据警方介绍，落网前后的周小明其实十分矛盾。一方面，周显得悲观，知道不可能永远这么逃下去，“总有一天要到案的”，就坚持通过慢跑来锻炼身体，因为周“有严重的胃病，怕不能撑过漫长的审判”。而另一方面，周又很自负。被捕后，他还不忘展示自己“杰出青年”的本色，甚至请管教人员替他约记者，为他写自传，声称“保证畅销，不会比海岩的差”。按他的想象，“说不定有制片人买剧本，改编电影”。

可悲的是，周小明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

……

“利”字头上一把刀。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矛盾交织，各种思潮并存，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对一些人思想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甚至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滑坡、法律意识淡薄，对自身实施毒品犯罪的严重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受极度膨胀的贪欲左右和丰厚利润刺激，心存侥幸，不计后果。置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进而深陷毒品犯罪泥潭不能自拔。

当贩毒的暴利被一些人用来经营自身的黑恶势力以及买官、拉拢腐蚀政府官员时，我们党委、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将丧失殆尽。因此，在禁毒战争中，只有坚决把吸贩毒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挖出来，让其付出沉重代价，打得其不敢为、不能为，才能有效遏制吸贩毒活动蔓延的态势。

禁毒战争只有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分工配合、打防并举，形成强有力的长效机制，对吸贩毒活动形成高压态势，才能从源头上根除这些毒瘤，还社会一片净土和安宁。

第五章　明星需要毒药?

引子——断帆的孤船

当所有的希望与梦想都变成现实时，当所有的鲜花与掌声都如期而至时，当所有的名利与物欲一一得到满足时，他们开始变得空虚与手足无措，变得茫然与无所适从，变得失落与失去追求。他们在寻找，在尝试，在坠落，并最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在寄希望能带给他们艺术灵感的毒雾中迷失。而梦醒时刻，曾经的一切都渐行渐远，此时只有痛悔与憔悴的灵与肉……

1、满文军：吸毒的天空并不美

在距离第22个国际禁毒日还差38天时，满文军的人生之帆轰然触礁了。

2009年5月16日，满文军的妻子李俐为了庆祝自己40岁生日，提早订下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路的cocobanana歌厅1号包房，并发短信邀请了几十个圈内朋友于5月18日晚来此参加聚会，朋友们也都纷纷回短信表示



愿意来参加。

用毒品助兴庆生被抓

5月18日晚9点30分，李俐和丈夫满文军一起来到歌厅。为了让不胜酒力的自己能够“多喝点”，也让朋友们都玩得尽兴些，李俐准备了十几粒摇头丸供众人在聚会中吸食，而她自己也吸食了摇头丸等毒品，还喝了朋友敬她的“掺了东西的可乐”（实为合成毒品Happy水，主要成分为冰毒，可掺入饮料中）。后经举报，李俐等人被警方当场抓获。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满文军的妻子自述涉毒始末，称吸毒只是为了能与朋友们多喝点，增加酒量。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随后向外界披露，满文军与妻子李俐因吸毒被批捕。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侯爱文介绍，李俐为他人吸毒提供场所并在聚会中提供毒品，已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在办案民警对李俐的审讯过程中，她表现得十分配合，认罪态度良好。她说自己是2009年4月份开始接触毒品的，长期以来相夫教子的日子让她觉得生活很平淡，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摇头丸，“当时吃完回家睡一觉感觉就消失了，就以为不会成瘾……”李俐说，没想到自己找的这个“乐子”，会把她推向犯罪的深渊。毒品不仅毁了李俐她自己，而且也把丈夫满文军推向了深渊：满文军因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14天，他的声誉与事业，一下子跌入谷底……

入狱始觉亲情自由可贵

被判入狱后，李俐在看守所里几个人住一屋，并无特殊待遇。李俐说，没有什么让她感到还有比自由更宝贵的东西，看守所里的日子和自己过去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进来最初的那段日子像做梦一样，出去放风时都能闻到外面青草和新鲜空气的味道，抬头看到飞机从头顶上掠过时，都会有很多的感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俐谈到了自己的家人，她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泪流满面地说自己对不起丈夫，“是我连累了他，不敢想象这件事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影响”，而提到自己九岁半的儿子和患有心脏病的老父亲时更是

几度哽咽。

李俐说，“生日当晚收到了老公 12 年来第一次送的这么多鲜花，可自己无福消受了”，矛盾和痛苦之情溢于言表。她更是感慨道：“现在回头想想，即使（吸毒时）再快乐，和自己失去自由、无法和家人在一起相比，都太不值得了。”她同时告诫青少年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别像我一样，等到四十岁时才补上人生这一课。”

对于满文军、李俐夫妇的被抓，有知情人透露是因为圈中人的举报，对于这样的说法，笔者无从证实；也有人说，这得益于北京歌舞娱乐场所的管理比较到位，场所的从业人员的觉悟意识较强。

被举报吸毒被查

让我们从警方的介绍中还原整个查处的经过。

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当晚警方获得线索，工体西路 cocobanana 酒吧有人聚众吸食毒品。随后，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治安管理总队、朝阳警方等多警种联合展开行动。

现场一名目击者孙先生称，19 日凌晨两点左右，警方采取行动，他看到四辆警车沿南侧道路，直接驶到了 cocobanana 酒吧门口，其中还有一辆依维柯警车，但这辆车未停到酒吧门口。警车在酒吧前尚未停稳，10 多名民警就从车上冲下来，直接冲入酒吧中。而就在此前的几分钟，便衣民警就已将酒吧内的一间包间控制住了。

孙先生说，10 多分钟后，民警们押解着 10 多人，从酒吧内走出，这些人中有男有女，他看到其中一人与满文军很像，而其中的几位女子，用手捂着脸，跟随在民警身后，后面还有 10 多名便衣民警。就在抓捕行动前一个多小时，这些便衣民警就不断在现场出入。随后，这 10 多人被押到依维柯车上带走。随后孙先生上前询问酒吧安保人员得知，这些人与吸毒有关，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明星。

警方称，事发时满文军正在与 10 余个朋友举行生日派对，庆祝其妻子李俐的生日。现场被警方带走的涉嫌人员多达 10 余名，警方同时在现场发现了部分毒品。



北京多家媒体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获悉，19日凌晨，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路的cocobanana歌舞厅一包房内，查获多名尿检呈阳性的吸毒人员，其中包括歌手满文军。事发第二天，满文军夫妇涉毒被抓成为多家媒体娱乐版的头条。

据北京警方介绍，对于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涉毒行为一直保持严厉打击的态度，对于歌舞娱乐场所的涉毒违法犯罪，警方将一律按照法规高限处罚。

吸毒让当红歌星声誉受损

吸毒被拘留不仅严重损害了满文军的形象，更是对他的精神与肉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作为脑瘫康复项目爱心大使，中国社工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简称“儿助会”）在获悉满文军吸毒后，委员会迅速就此事进行商讨，最终决定中止满文军继续担任爱心大使。

儿助会有关负责人吴建英告诉记者，满文军在担任爱心大使期间，为帮助脑瘫患儿做了很多公益事情。“他的贡献不能抹杀。今后满文军如果还愿意继续做公益事业，欢迎他来做志愿者，但是再当爱心大使就不合适了。”

中国红十字总会也中止满文军继续担任“蒲公英爱心行动”爱心传递大使。

受此影响的不仅是公益行象大使，由满文军代言的相关电动车和汽车在合约到期后也没有下文，至于那些潜在的代言客户的流失，更是无法统计。

与满文军签约的太合麦田老总宋柯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坦言：“损失一定有，但是我觉得对公司来讲，最重要的是他出来之后能够接受教训，做一些事来重塑形象。”

在精神方面，因为吸毒被捕，满文军几乎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人也显得相当憔悴。

值得庆幸的是，满文军走出看守所后，第一时间向公众进行了道歉，忏悔了作为公众人物吸毒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活动。2010年6月5日上午，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尔康医院重新将“脑瘫康复项目”爱心公益大使荣誉授予满文军，现场接过证

书时，满文军眼眶都红了，泣不成声。

从1998年推出首张专辑《让你的天空最美》至今，除去吸毒事件外，满文军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一次放纵让他明白，吸毒的天空并不美！

庆幸的是，他明白得并不太晚。

2、谢东：真的为获创作灵感而再次涉毒吗?

一曲《笑脸》唱红了谢东，也让大家了解了一个歌手。

常常地想
现在的你
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可是可是我　却搞不清
你离我是近还是远
但我仍然　仍然相信
你和我前生一定有缘
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
一往情深的双眼
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
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儿牵
听说过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
突然想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

《笑脸》曾经传唱祖国的大江南北，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喉感染着无数听众，但今天，谢东已经笑脸不再，他不得不在长沙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为期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为获创作灵感再次涉毒被抓

人们在为谢东惋惜的同时，更多是的是想探究他从云端坠入地狱的真相。



谢东的再次落网，是在远隔北京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

2011 年 3 月 25 日晚 9 时，长沙市望麓园派出所民警在对辖区进行例行的治安检查时，发现某连锁酒店的三楼一房间内有人吸毒，遂对房内人员进行盘查。同时，另一组民警则在酒店前台意外发现，该房间一嫌疑人还以自已的名字在该房旁边另开了一间房。当民警通过服务员打开这间房时，此时一个人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民警感到眼前的这名男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经查验身份，证实该男子就是此前曾因吸毒被媒体曝光的歌手谢东，从他身上，民警还当场收缴毒品冰毒约 10 克（后经公安刑侦部门技术鉴定认定为不足 10 克）。

据办案民警介绍，谢东此次东窗事发，与前两次因吸毒被抓不无关系。因一首《笑脸》出名的谢东曾是国内的一线歌手，两次被抓后，谢东感觉自已在北京有点混不下去。春节前，他在长沙某知名大歌厅担任营销总监的一位好友劝他到湖南来“散散心”，顺便也可以接点演唱会的单。据其被抓后，在接受警方的讯问供述中称：前不久，他应邀从长沙去衡阳开个人演唱会，来去的路上都有毒品相伴。他说自己十分清楚毒品的危害，但为了重新迸发出创作灵感，“迫不得已”才再次走上这条路。

通过毒品来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演唱的激情，已经成为演艺圈内公开的秘密。

谢东被抓后，考虑到案情需要，警方当时未对外公布这一消息。相关人员也在此期间曾找到警方说情，希望对其“网开一面”。民警告诉记者，谢东的违法行为已符合强制隔离戒毒的要件。案发不久，谢东就被押送进长沙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没有人能够解释，谢东四年多来一直在毒海中沉沦起浮的真实理由。

多次复吸事业每况愈下

据介绍，谢东四年前染上毒瘾后，曾于 2008 年在北京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过为期半年的戒毒生活，而这样的勇气，与圈中好友常宽、李金斗、尹相杰的支持鼓励密不可分。据相关媒体报道，常宽的经纪人李楠在案发后得知谢东再次吸毒被抓的消息后十分惊讶，当即反问：“他不是已经戒毒了

吗?”随后还向记者反复询问他本人目前的现况以及此次长沙之行的目的，言语之中透露出与谢东交情匪浅的味道。而当记者想请常宽谈谈对好友谢东的近况以及对此事有何看法时，李楠却以常宽正在出席一个重要应酬为由婉拒，对方虽在采访中几次直言“不是常宽发言人，所以不方便代为表示看法”。之后李楠还表示“最近常宽没有和谢东有过任何联系，所以对于他的近况也不清楚。”

透过谢东吸毒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其已经吸毒成瘾，并已深陷吸了戒、戒了吸的怪圈。

2007 年 5 月，谢东及其女友在住所内吸毒时，被警方抓获。当时谢东对毒品冰毒和摇头丸呈阳性反应，其女友对冰毒呈阳性反应。谢东被释放后表示要痛改前非。同年 12 月 5 日，谢东被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聘为禁毒志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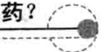
2008 年 2 月 29 日晚，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民警进行例行检查，发现谢东及一名女子神色异常。尿检结果显示，两人的甲基苯丙胺类（冰毒）成分呈阳性。警方还在谢东家中搜出吸食冰毒的工具“冰壶”。3 月 1 日晚，西城警方对谢东及另一名女子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同年 3 月，谢东的禁毒志愿者的资格被中止。谢东及其女友被警方送往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2008 年 9 月底，谢东戒毒成功离开戒毒所，开始到北京一家酒吧驻唱表演。和一年多以前吸毒被捕时憔悴萎靡的状态相比，刚刚戒毒成功的谢东，身体有一些发福，精神状态也明显好了很多。据报道，当时的谢东对于酒吧内客人突然跳上台的合照要求一一满足，甚至还用现场征婚这样自嘲的方式来取悦台下观众。有报道称，当时谢东的日子过得很潦倒，出门基本上都要坐地铁。

吸毒不仅耗尽了谢东的健康，更是耗干了他这些年积聚下来的物质财富。

2009 年 8 月，谢东在沉寂了一年后，正式签约新东家金翼龙唱片公司，并打造新歌。据悉，金翼龙唱片公司负责人还透露为谢东筹备拍摄一部以禁毒为题材的公益宣传片。正当人们都以为谢东的人生真正能够灿烂依旧的时候，远走长沙的他依然摆脱不了毒魔的控制，再一次沉沦。

其实，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生活对于谢东未来的人生之路并不算太长，戒毒所里的生活虽说单调乏味、失去人生自由，但没有了毒品的诱惑和伤害，



多了反思与彻悟的时间与空间，而对于他真正的考验是走出戒毒所的日子，因为到那时，高墙外不仅有阳光和自由，还有美丽诱惑的罂粟花。

3、景岗山：机场安检出的蓝色药丸

侥幸的心理往往能把人逼上绝路。景岗山就是没有那么幸运的那一个。

读者报料歌手带毒被查

歌手景岗山在首都机场贵宾通道准备登机前往西安时，机场安检人员从其身上搜出毒品摇头丸，随后，景岗山的西安之行被延后。

这是北京一家知名娱乐媒体在接到读者报料后刊发的相关报道：

“我刚才在机场贵宾通道里看见，歌手景岗山在安检的时候，机场安检人员从他身上搜出了摇头丸。”下午2时左右，读者赵女士给北京的一家媒体打来电话，“我的一个朋友正好要去西安，和景岗山坐的是一趟飞机。”

据赵女士介绍，下午1时许，身穿白色休闲装、拿着机票的景岗山，打着哈欠，一脸疲态地进入了机场贵宾安检通道。在安检员的要求下，景岗山从身上拿出了手机等随身物品。“我看见安检员在检查烟盒的时候，从里面拿出了几颗蓝色的药丸。”赵女士说，“后来，安检员就开始对他进行询问，但因为距离较远的原因，我没听清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是什么，但从神情上能够看出，景岗山根本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她介绍，对话大约持续了5分钟后，景岗山就被赶来的机场派出所民警带走了。

“因为景岗山穿的是一身白色的衣服，而且也没戴墨镜，所以，他被带走时特别显眼。”赵女士还说，“当时，一下就有几十人围过来看。听说，他烟盒里放的是摇头丸。”

“他那时已经办理好了行李托运，被带走的时候，他手里什么都没拿。”赵女士补充道，“景岗山好像是一个人来的机场，没有见到送他的人。”

记者通过多种途径从有关部门得到证实，安检员从景岗山身上搜出的可

疑物品的确为蓝色摇头丸，其鉴定报告称，这些物品为：毒品摇头丸0.25克、大麻4.75克、海洛因约2克。另据记者从相关报道中了解到，如嫌疑人所携带的毒品量低于10克，还够不上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的司法解释中专门规定了对“非法持有毒品”的处理，如果排除贩运可能，就只能是15日以下拘留或2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根据持有者认错态度的好坏，这两个处罚可单处也可并处。非法持有毒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用于贩卖，但如携毒量太小，而且查获时也没有交易行为，因此就算携带了毒品，也会在缴纳罚款后被当场释放。

涉毒已成娱乐圈潜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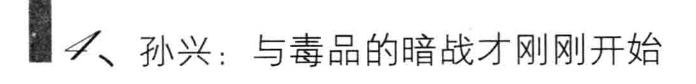
记者随后拨打景岗山所属公司“星工厂”老板姜弘电话时，其话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其公司旗下所有员工以及艺人孙楠、孙国庆、艾雨等人的手机也大多无法接通。此外，记者采访其他唱片公司负责人以及歌手时也都得到了“保持沉默”的回答。

据了解，娱乐圈里一直存在着“HI（嗨）族”，一些知名的歌手、写手都是其中的成员，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共同分享毒品大麻或者吞服摇头丸，现在，他们已经转而吸食一种更容易让人“飘”的毒品冰毒。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许多歌手就是在感觉自己“江郎才尽”的时候转向毒品，希望借助毒品的神奇力量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某些身处娱乐圈的名人在谈到自己吸毒的理由时，总会搬出“有助于提升创作灵感”的说法。

据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歌手说，这是一个圈子。大家常常在一起聚会，地点或在酒吧、迪厅，或在某个朋友的家里。大家互相传递一支雪茄，雪茄里面有大麻，或者是把摇头丸泡在可乐里，每人一口地轮着喝。其他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在酒吧情绪低落时，旁边也会有人过来问你尝试过摇头丸没有，那个人还会告诉你，他手上就有货。

音乐人郭峰在听闻此事后直言不可思议，“太可怕了！大家都是大人了，该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拿自己的一切做赌注，这样做太可惜了！”

景岗山曾演唱了一首多次上榜歌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不知道他的这次偶尔触毒，是不是因为寂寞？



1、孙兴：与毒品的暗战才刚刚开始

2011 年 4 月 15 日孙兴在北京因涉嫌吸毒和藏毒被公安机关拘捕。

“五毒俱全”瘾君子被抓

孙兴吸食毒品的种类可谓“五毒俱全”：尿样检测显示，孙兴被查出吸食 K 粉、大麻以及冰毒。因为吸毒，孙兴在自己的胳膊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孙兴自己在接受警方的讯问中承认，已经吸毒 5 年，很多毒品都试过，随后警方从其家中搜出制毒、吸毒工具。

面对警方的审讯，他对自己常年吸毒的事实供认不讳，坦承透露吸毒原因是两段失败婚姻带来的身心打击。选择如此通路宣泄情感，已经很危险了，但更可悲的是，没有体悟到爱情教训的他，看到没工作的现任女友骆莉娜生活空虚，竟然邀其同食毒品，慰藉心中寂寞。

来到他在北京的住所，警方发现其客厅茶几上有一盘子的白色粉末，孙兴承认这些 K 粉是前不久刚吸食完剩下的，此后，警方又在其行李箱中查出一袋大麻，“这是我在香港工作中留下来的。”孙兴说，他最近接触上一种合成毒品“开心水”，警方随即在其家中找到配制这种毒品的原料。

警方向外界公布了从孙兴的家中搜出了大麻、“开心果”等毒品，以及一些吸毒、制毒的工具。

带女友吸毒打发寂寞

接受盘查的孙兴，言语始终对一起被捕的女友骆莉娜有维护，不过当他亲眼看到女友包中藏有几排“开心果”（摇头丸），47 岁的孙兴悲从中来，他说一开始看到女友整日无所事事，便带着她一起吸毒，事后多次劝阻女友不要再吸，但女友已经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为她没有工作，我又太宠她了，不让她吸她会觉得空虚，我宁愿打自己，扇自己的耳光，都不愿她碰毒

品，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说到此处，他忍不住流下眼泪。

笔者就此事致电孙兴经纪人振楠，但他始终不接电话，负责孙兴经纪工作的李小姐在答复中说：“我回北京后一直在医院挂点滴，没接到公司通知，不方便回应。”

与早前相关媒体的报道一样，孙兴、骆莉娜是在与友人的饭局上，遭到北京警方检查，整个过程他始终表情淡定，极度配合警方的检查，最终尿检结果表明他吸食过毒品 K 粉、大麻以及冰毒，随后，警方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

审讯中的孙兴，对自己常年吸食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

从警方对孙兴的讯问笔录中，让我们还原他吸毒的大致情况：

侦查人员问：“你主要吸食的是 K 粉，还是大麻?”孙兴答：“其实我什么都尝试过，吸了大概五年。我不是拿毒品害别人，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儿能量，一些给养。”孙兴说，两次失败的婚姻让他身心疲惫，希冀通过选择吸食毒品来排解烦恼，但这种宣泄情感的不良嗜好，最终让他吸毒成瘾，并且难以自拔。

道歉会是最后一次?

情感上的随意与滥情已注定孙兴感情生活风雨飘摇，同时也为他日后的生活埋下了苦果。

22 岁时，孙兴娶了第一任妻子、作家潘阳。两人生下了女儿后，孙兴与马来西亚美女林美贞发生了婚外恋。在与林美贞再次建立家庭生下儿子后，孙兴为了小自己 15 岁的四川姑娘骆莉娜，再次背叛了家庭。他曾经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这样形容：“有次和朋友一起唱歌，她从天而降出现在我面前，我发觉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最爱。”

由于涉嫌吸食毒品，孙兴在拘留所度过了 20 天的铁窗生活。

2011 年 5 月 9 日，孙兴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自己的吸毒行为进行了检讨和反省。孙兴身穿黑色西装在众保镖的掩护下进场，在媒体面前连续三次鞠躬道歉，道歉会上，他更是数度哽咽流泪，随后保证自己永远不再碰毒品。



发布会上，孙兴承认自己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表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更应该勇敢地承担自己所犯的错误。同时指责不良媒体撰写自己“将入狱一年或终身监禁”的假新闻，希望公众媒体能有自己的责任心，不要落井下石。

孙兴同时对于相关媒体炒作他“供出众多大牌涉毒艺人”一事进行了否认，孙兴坦言：“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不负责任的话，警方就此事已经声明过，所谓的涉毒名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一直以来都是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在造谣炒作、胡乱编造。”随后表示吸毒属于个人不良行为，与娱乐界任何一个人都毫无关系。

孙兴表示深深地感受到自由的珍贵。他希望此番经历能让更多迷失的人引以为戒，同时感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并向全社会呼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发布会最后孙兴称自己日后将不会再就吸毒一事做任何的说明与回应。

这是他向媒体提供的致歉信的全文：

首先，我要感谢这段时间以来一直用心良苦不断关心我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感谢媒体朋友们今天抽出时间来到这里，听我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做一个交代。

今天，我之所以选择在北京面对大家，是因为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我最宝贵、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我十一岁才离开北京去了香港，这里有看着我成长的父老乡亲，来到这里的各位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选择在我的故乡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旅程，我请大家一起为我见证：我从哪里跌倒就能从哪里站起来，我认为，敢于面对错误并勇于去改正它，这才是一个真男人的所作所为！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我个人的不良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觉得我应该坚强勇敢地承担这一切，我的行为不仅伤害了自己，更伤害了你们！这一刻，我必须要向社会大众说一句：对不起！让你们操心了！请你们接受一个迷途知返的男人最真诚的道歉！

前段时间，某些媒体报道说我向警方供出了同伙及重量级人物，更有好事者拉出了一串天王天后的名单，说这些都是出自我的口中，在这里我要正

式声明：我孙兴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不负责任的话，警方就此事已经声明过，所谓的涉毒名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一直以来都是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在造谣炒作、胡乱编造。我要向大家再重申一遍：这次纯属个人不良行为，与娱乐界任何一个人都毫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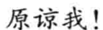
同时，我也要澄清某些媒体对我的事情进行的不实报道：那些说本人要被强制戒毒、被终身监禁或判死刑的说法，纯属谣言。我现在能站在大家面前，是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我国的法律对我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给出了定论：本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条文。如之后再有媒体想做出不属实的报道，请你们在拿起笔前问问自己的良心，不要再落井下石。

在前后大约20天的铁窗生活的背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是可贵的、而自由更加珍贵。我希望，我的此番经历能让那些迷失的人引以为戒，我要忠告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人一定要懂得：什么是应该去珍惜的，什么是一定要拒绝的。如果我的此番经历和忠告能让那些迷失的人重新找回方向，那么本人不枉此行。

现在，应该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很庆幸我的家人和影迷朋友们一直都在支持我：这些天，父母都是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才知道我的消息、看到我的形象，他们非常担心我，让我觉得作为儿子特别的不孝、很对不起他们；还有，我的影迷告诉了我八个字：你若不离、我必不弃。正是这八个字，给了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勇气，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患难见真情，这次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也让我找到我人生中最后一位女人，我一定会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不会让她再受到任何委屈。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表演带给大家很多快乐的回忆，这次不光彩的记忆我不奢望大家能够把它抹掉，但是，我真诚地恳请你们把信任重新交回到我的手上——在这里，我要向全社会呼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远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命才能更阳光。

经过今天的陈述，本人日后将不再就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说明与回应。现在，我再次感谢各位兄弟姐妹来到这里，给我重新面对大家的机会。对于我的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本人再次向全社会道歉、向所有人道歉，请你们



原谅我!

最后，我在这片曾经养育我的土地上向大家保证：今后，我不会再接触毒品，用行动来履行我的承诺，日后一定会让你们看到一个更真诚、更阳光、更与众不同的男子汉!

谁游戏人生谁将受罚

针对发生在孙兴身上的吸毒事件，记者致电某心理专家刘瑶，请她解释一下“孙兴现象”，刘瑶说，孙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宣泄方法，慰藉失婚后的痛苦，造成眼前无法弥补的伤害，是一种内心不强大的表现。“吸毒是在用‘暂时快乐’逃避痛苦，情感破裂后，对儿女私情他是有亲情纠结的，名利场上，外人对他也有质疑声，这些问题都会给当事人造成情感伤害，但他却没有选择积极正面的方式解决，一来说明他内心不够强大，二来说明他心智不够成熟。”

情感分析师郭玉琳从情感学的角度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孙兴个案上讲，男方比女方大很多，男方的身份是明星，在彼此的情感接触中，女方对男方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感，这种感觉建立在信任上，所以夫妻、情侣关系，如果其中一方沾染毒品，另一方容易被影响。但在此案例中，这个女方也没有分辨错对的能力。正确的交往方式是，一旦发现对方沾染毒品，应该开导其戒毒，同时自律和保护自己不能沾染毒品，一起堕落。

涉毒前，孙兴最近的一部作品是《黎明前的暗战》，他在剧中扮演陈明仁，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与毒品的暗战将进一步考验他的意志品质。

5、零点乐队：毒品让他们回到零点

这是一支成立了21年的乐队；这是一支曾给观众带来无数激情的摇滚乐队，他们在中国摇滚乐坛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从“零点”上路，最终还是回归到了零点。

“零点”成员多个涉毒

据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通报，2010年4月15日，北京警方抓获多名涉嫌毒品犯罪的嫌疑人和吸毒人员。随后，警方根据线索，在北京市海淀区将另外两名李姓涉毒人员抓获。其中一个名为李小俊的嫌疑人，今年44岁，另一人名为李瑛，49岁，两人均为“零点乐队”重要成员。李小俊和李瑛，正是该乐队鼓手“二毛”、吉他手“大毛”的真名。

被抓后，“二毛”主动交代了自己在4月9日、11日两次在家中容留多人吸毒的犯罪事实，为了立功，他还将3名吸毒人员供了出来。其中，包括“零点乐队”的吉他手“大毛”。海淀警方了解到，“大毛”真名李瑛，是李小俊的亲哥哥。

将“大毛”等人抓获后，警方又顺藤摸瓜，将平时吸食大麻的“零点乐队”键盘手朝洛蒙抓获。事发后，海淀警方将“二毛”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刑事拘留。

经过审理海淀法院认为，“二毛”利用租住的房屋为他人吸毒提供场所，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鉴于他到案后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人，属于立功表现，且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

据了解，“二毛”因吸食毒品曾于2008年9月9日被警方强制隔离戒毒。据摇滚圈内人士透露，近年来“零点乐队”其实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记者还了解到，“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听说几位兄弟被抓后，感到“震惊”和“难过”。他说，近些年大家都比较忙，也没什么联系，最近的一次聚会是在2007年。

吸毒负面新闻让“零点”很受伤

早在2004年，当年的吸毒事件就让“零点乐队”一度被打入冷宫；2008年，主唱周晓鸥离队单飞，让“零点乐队”很受伤；2010年，乐队再爆吸毒事件。这些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这还是那个曾经带领着歌迷演唱《爱不爱我》时，每当唱到副歌部分，全场合唱的那个“零点”吗？

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对近来队友再次卷入吸



毒事件也感到无奈，“我们一起吃过苦，也辉煌过，现在看到他们这样，真的很惋惜，也希望他们能够好。”他告诉记者，“他们出事，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并不是他们告诉我的，而是有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我才知道大毛、二毛出事了。”他说，虽然大家曾经是一个乐队的，但是彼此的私生活并不属于同一个状态，平时都是演出完了就分开，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要去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平时很少在一起聚的。“他们到底玩什么，怎么玩，我也不知道，可我的圈子很健康，我的主要朋友都是喜欢运动的，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很重要，我的朋友都这么健康，我怎么可能去沾那些东西呢？”周晓鸥说。

说起当初离开“零点乐队”时的原因，周晓鸥表示只有一个原因，是由于自己比较喜欢拍戏，怕耽误乐队时间，另一个原因则是和乐队在一起14年了，感觉大家在音乐上没有一个大的突破，自己需要一点新鲜的血液，来不断突破、超越自己。

此前有关零点重组的传言很多，吸毒丑闻再次曝光后，这个计划是否还有希望呢？周晓鸥表示，“我不知道‘零点乐队’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关心我的人都知道，2008年，我已经在博客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从那个时候起就宣告离开了‘零点’。也就是说，现在的我早已不属于零点了。不知道这次事件之后，他们还能不能够再次站起来。”

“零点”曾带给队员太多追忆

说起“零点乐队”，周晓鸥回忆起了大家曾经一起打拼时的那段时光，这也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日子，“当时大家组成了一支乐队，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然后把梦想集中在一起。”1994年，周晓鸥加入“零点乐队”，那个时候，“零点乐队”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单曲，“我们刚开始先录出6首歌，最早的一首歌是《挥挥手》，当时我们去外地演出都没有自己的歌，所以就用《挥挥手》当乐队的第一首歌。”1996年在北展的一次演出后，有人就建议周晓鸥把专辑录出来给唱片公司听，于是，从那时起“零点乐队”才录制第一张专辑《别误会》。主打歌曲《别误会》成为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

"乐队最苦的时候也就是最早开始唱歌时，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属于乐队自己的声音，也不是练的累，是心累，因为你不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声音。"周晓鸥说。"其实我们乐队不属于完全的摇滚，摇滚的定义也不是特别刻意的，我觉得这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记得我们当时被大家接受，可能是因为觉得众多乐队里面，只有'零点乐队'是跟其他乐队不一样的，有乐队的一个形，唱的歌写爱情的比较多，说教的比较少，我觉得还是一种亲身感受的一种东西，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当时第一觉得这个乐队和别人不同，然后歌好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被大家接受了。"

渴望"零点"再出发

然而，每每说起在"零点乐队"的那段时光，周晓鸥也坦言曾经有很多难忘的故事，"曾经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和愿望，后来那些梦想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离开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自从2007年底和"零点乐队"最后一次参加了一场演出后，就再没有见面了，周晓鸥和"零点乐队"也没有了接触。想当年零点真的是从零开始，乐队所有成员一起吃苦、一起受罪，后来终于一起享受到了"零点"的辉煌，可如今却再次出现吸毒事件，周晓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觉得很惋惜。"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挺难过的，从'零点乐队'出来之后这两年，大家都比较忙，我跟他们也没什么联系，也不知道大毛二毛的近况，所以听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惊讶。"他说，他希望两人能改过自新，维护"零点乐队"的形象，"虽然我已经离开'零点乐队'了，但我还是希望乐队能进行下去，不想看到乐队就此一蹶不振。"

两起涉毒案后，曾经风靡一时的"零点乐队"会不会消失。记者联系到"零点乐队"的贝司手王笑东，他的态度显然更加明确，"零点乐队"早已名存实亡了。

周晓鸥离开后，很多人都以为，"零点乐队"又找了新主唱，重新搭台演出，但王笑东却道出了真实情况。"实际上从晓鸥走了开始，我觉得就已经没有'零点乐队'了，这两年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活动，我印象中上一次演出还是为中超演出。"王笑东说，"零点乐队"现在没有主唱，也不再排练新的作品，没有公司签约他们，全靠自己单干。"谁都不能生活在昔日的辉煌里，



生活永远要继续，我觉得这件事之后还是各忙各的吧。”记者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如何，王笑东说，他目前还在做一些与音乐有关的事情，比如为国内歌手的演唱会伴奏等。

离开“零点乐队”后，单飞的周晓鸥推出了个人首支单曲《如果我是梁山伯》，产生了不错的反响。同时，周晓鸥还涉足电视剧，在电视剧《奋斗》中，周晓鸥在扮演的30多岁、有社会经验的“猪头”一角，周晓鸥说其实自己现在也是一个为了目标而奋斗的青年。

经历了太多是是非非的知名摇滚乐队“零点乐队”，21年里承载着太多的希冀与梦想，在鲜花与掌声中，他们开始变得轻浮与放纵，变得迷失了自我，事业回归到了零点。其实，只要梦想不破灭，所有的一切大不了从头再来。

6、莫少聪：吸毒是不聪明之举

对于自己涉毒事件，莫少聪直言：我没毒瘾，吸大麻是应酬。其实平常我的生活圈子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平常也没有很多去应酬的事情，有时候就是那么巧。

做客新浪澄清吸毒经过

事发不久，莫少聪决定要给公众一个交代。他做客新浪娱乐，讲清吸食毒品大麻事件的前因后果。

以下是莫少聪与网友的一个对话，从对话中能够了解事件的大致经过。

问：我们想知道当天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据说当天你是在家里被拘留的。

莫少聪：趁这个机会我也想向大家说清当天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我没有藏毒，也不是警方来到我家里之后，看见我和朋友一起吸毒的时候被抓的。那天是我在拍戏，警方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家，协助他们调查。

问：所以当时你是从北京的郊区的片场赶回家里的？

莫少聪：是的，然后警方跟我说有人举报我抽大麻。

问：你抽了大麻吗？

莫少聪：在警方过来找我的三天前，有个朋友说他有一些朋友来北京了，让我一起去北京的名胜游览。在途中，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烟斗一样的东西，他说是大麻，叫我试试。

问：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大麻？

莫少聪：是。刚开始我说我是不抽这个东西的，可是他非常热情一直叫我抽，那时候我也不想不给他面子，就应酬一下抽了一口，然后我就走开了——这就是整个事情。通过警方的调查，可以证实我没有说谎。我没有毒瘾，也没有长期吸食毒品的习惯，所以现在整个案子都已经结束了，虽然（警方）没有再继续追究，但是我知道我的行为是错的。我要跟关心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在这段时间让你们担心了。

问：听你讲起来很巧合，有人说你是被人陷害的？

莫少聪：（沉思，笑）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其实粉丝是了解我的，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我就不再去想别的了，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以后只能好好努力来报答那些信任我的人。

问：这几天你经历这些事情，心情是什么样的？应该也很低落吧？

莫少聪：发生之后自己要去面对，去反省。反省之后，我的心态要平静了一些。

问：所以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绝对不会这么做了？

莫少聪：绝对不会，其实平常我的生活圈子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平常也没有很多去应酬的事情，有时候就是那么巧。

问：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件事情跟你的女朋友有关系，是这样吗？

莫少聪：其实有很多流传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跟女朋友没有任何关系。我也看到有些报道说我被陷害，是因为女人怎么样的，我就看见了标题，内容我都不想看，这些完全就不是事实。

发布会为行为道歉

2011年5月8日，因涉毒在北京被捕的莫少聪已经获释，在随后举行的



记者会上，莫少聪一身白色西装，由经理人张国忠陪同下现身，经上次道歉面露笑容被轰没诚意，今次他刻意收起笑容，出场九十度鞠躬，记者会 15 分钟完结。其前女友上山诗纳亦亲到现场支持。

张国忠先发言："整件事在两三星期前，香港所有传媒也关心，当莫少聪离开拘留所，在国内公司发声明及安排太仓促，声明有很多错误问题，故出现很多不必要及无谓的新闻，所以阿聪回来跟大家说清楚情况。"

莫少聪说："首先多谢传媒、关心我朋友、家人及剧组，案发当天情况，我澄清没有藏毒，也不是在家中聚毒及吸食毒品被警察捉。而警察去到我家中也没发现任何毒品，当天我拍片警叫我助查，原因有人举报我三天前吸食大麻，我跟他承认这是事实，当天我跟二十多个朋友去颐和园旅行，我只认识五、六个朋友，当时有人拿烟斗出来里面是大麻，开始我拒绝，他继续叫我吸食，因不想失他面子，我应酬吸食了一口便离开。警方拘留我后，有调查整件事，证实我没有毒瘾，不是长期吸食瘾君子，故便放了我出来。今次事件我有做错，连一口也不该吃，只要坚持便不会发生这件事，藉今次事件给年轻人借鉴，无论什么环境遇到这问题也一定要 SAY NO，不然后果跟我一模一样。经今次后我会深深反醒，以后也不会同样犯错，最后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对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家人、粉丝说对不起，不会犯同样错误，多谢大家。"阿聪称会工作报答大家，用爱心多做有意义的事回馈社会。

问到拘留期间情况，追问他接受专访要收钱的传闻，莫少聪说："整件事收钱是没可能，根本没这件事，拘留期间只是给警方调查，跟其他人一样接受处分，总之没有收钱这回事。"张国忠补充说："阿聪离开拘留所，本身有正为电影开拍两、三天，为了今次事担误了剧组，剧组要做交待，他们仓促安排了一个媒体作独家报道，引起误会是做了个个别专访，变了其他传媒造了这新闻及情况出现。"

问到上次被拘留是否行政拘留，过程可令之不快，他说："跟其他人一样，自己做了属违法的事，所以要时间调查真实一面。过程不辛苦，警察人性化跟我聊天，叫我不要再碰，也不想再见面了。"

问到是否第一次吸毒，可知拘留的照片被公开，他说："出来后没有看有关报道，我至昨晚才知道，整件事我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那两个人不是我

的经济人，亦不是在我家中捉到他们，我家亦没有发现任何毒品。”

有传闻他在北京得罪有势力人士才发生这事，及可有与儿子解释事件，他说：“我不清楚，也相信应该不会吧，至于第二条问题，我没有跟他联络，不知他知不知这个事情，谢谢。（是否第一次吸食?）是。”“孙兴也发生这件事，之前可有类似聚会?”他说：“有报道说我跟孙兴在家中吸毒是错误的，我认识孙兴，但平常没有联络，他的事情跟我的事情是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

离开发布会，莫少聪起身再数度鞠躬。

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曾志伟，他忠告：“艺人时刻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事事都应该多注意，更要懂得洁身自好。”曾志伟力撑莫少聪说：“我们是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不是一个惯性吸毒者。他平时生活很健康，喜欢跑步做善事，我想可能是在外面应酬抹不开面子吸了几口，真的很惨。希望他快些回来，让我们鼓励他，尽快投入工作，不要为这事不开心。”而作为电影《光辉岁月》的监制，曾志伟也明确对记者表态，不会换掉片中莫少聪饰演的角色。

7、含笑：亲情伴他再度飞天

2009 年 8 月，昔日的红歌星含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的他却不是因为唱歌，而是吸毒。2009 年 8 月 13 日下午 4 时许，在北京朝阳区望京附近的一座小区内，公安机关将在家中吸食毒品的含笑抓获。经历了 12 天的行政拘留，8 月 25 日，含笑被释放回到家中。

吸毒事件致爱妻流产

吸毒事件的曝光对含笑影响巨大，怀孕 4 个多月的妻子高珊也因受打击而流产。现在的含笑和妻子高珊生活得怎么样？含笑是否已经走出吸毒深渊?

记者眼前的含笑剪了一头短发，显得神采奕奕，和 2009 年 8 月在电视上

见到的面容憔悴的他模样判若两人。含笑说，他现在生活非常健康，生活得非常有规律。他和高珊每天都早睡早起，两口子一起去游泳、跑步、打羽毛球。前不久，两个人再次走进英达主持的《非常夫妻》（原《夫妻剧场》）节目，节目录制现场相当感人，很多在场的观众都被他们夫妻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

虽然含笑现在“出来”了，但是公安部门对他的处罚并没有结束。现在的他正在接受社区戒毒，时间是两年。每个月都要去派出所做尿检，还要向专门成立的戒毒小组汇报思想。前不久，含笑被北京市禁毒委员会授予北京市禁毒形象大使还参加了北京市公安系统优秀监所双十佳颁奖晚会，并演唱了在拘留所里创作的新歌《妈妈》。

回忆起在东城区拘留所的12天，含笑感觉度日如年。睡的是硬板床，没有枕头。每顿饭一个馒头一个菜，菜以汤为主。每天中午和夜里还要值班两个小时，夜里值班的两个小时也不能睡觉。看电视主要是看《法制进行时》和《新闻联播》。含笑进去的第2天，就当了室长。拘留所里，含笑和也因吸毒被抓进去的谢征宇（电影《寻枪》的摄影）一起创作，完成了三首新歌，分别是《妈妈》、《就在窗外》、《兄弟》。含笑在拘留所里，一句一句地教在押人员唱歌，他们唱得泪流满面。

誓言为亲人永不沾毒

含笑说：“进拘留所后我简直崩溃了，以为这辈子就完了。我是军人家庭出身，太注重名声。”含笑表示，由于母亲从小对他管教甚严，他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老母亲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并在拘留所为母亲写下了《妈妈》这首歌。然而，母亲对他的宽容和关心让他相信，虽说经历了吸毒这么大的事，但对他来说并不是末日。

他说：“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家里人。我母亲30多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她一直带着我跟刚出生的妹妹，用38块钱的工资一直供我上到大学。我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道，结果又给她添了那么大的负担。”

含笑“出来”的第一天，他对妈妈、岳父岳母还有妻子说：“我绝对不碰了。”亲人们的信任，让含笑一下从那种阴影中走了出来。含笑说：“现在，

我想对我的母亲、包括我的岳父岳母以及妻子，说声非常抱歉！我作为晚辈，没有让长辈们安度晚年，没有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却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大的精神伤害。我觉得我非常有愧。我敢发誓，从现在开始我肯定不会再沾毒品了！我一定能做到。我要用我的余生，让我的父母和妻子过得快乐。"

今年40岁的含笑出生于呼和浩特市，15岁时以电影《少年犯》主题歌走红乐坛。此后，又以《飞天》唱响大江南北，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具盛名的流行歌手之一。含笑和经纪人高珊相识相恋之后，事业上更是蒸蒸日上。

心会跟爱一起走

含笑和高珊相识11年，结婚6年。开始时，高珊是含笑的经纪人，两个人在工作中逐渐有了感情，之后相亲相爱。两个人之前各自都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含笑的前妻是中央电视台著名化妆师文艺，高珊的前夫是著名歌手林依轮的亲哥哥林东。含笑和高珊非常珍惜这份感情，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含笑说："在我眼里，她最完美；在我眼里，她最贤惠。总之是非常完美。我们每天都有初恋般的感觉，都说付笛声、任静是歌坛最腻的模范夫妻，其实我们比他们还要两口子还要腻，很多来我家做客的朋友到了我们家都受不了我们这样。如果我们有了女儿，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高爱珊。儿子的名字还没有起好，不过一定要把老婆的名字加进去。"

谈到丈夫含笑，高珊更有话要说。她从开始和含笑恋爱到现在，首先看中了是含笑的人品。她说："我觉得含笑很善良，很有责任。我首先看中的是他的人品，他经历的很多事情，哪怕是一件事，都完全可以把一个男人打倒，但是他没有被打倒，他是一个挺能担当的人，是个爷们。还有含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你和他接触越久，越能发现他身上优点越多的人。"

高珊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在她的眼里，她认为男人是不下厨房的。高珊最喜欢下厨，红烧肉、回锅肉、可乐排骨都是她的拿手菜，含笑说他做的饭太好吃了。每天她照顾得含笑无微不至，把含笑"喂养"得容光焕发。

含笑亲切地称呼高珊为"老婆子"，当着外人也不例外。这个"老婆子"对含笑非常照顾，为了含笑更好的搞创作，很多家务事都不让含笑插手。高珊说她特别欣赏含笑，每天看着他就高兴。很多人都不会相信，现在的含笑



去外地演出回京，高珊每次去机场开车接他时，心还会怦怦跳呢。

因为爱，所以爱。当年含笑的投资文化公司破产，那时，不少人就预言高珊会离含笑而去。可他们并未怀疑彼此的忠诚，相扶一路走来，仅用3年时间，就还清了外债。这次，当含笑吸毒被拘留时，高珊不仅没有弃他而去，反而用自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当含笑被释放后，她又一次次用爱的雨露浇灌着丈夫的心田。高山说，这都是爱情的力量，爱情能使女人变得坚强。

高珊一直坚信，丈夫含笑在歌坛笑傲江湖、再度飞天。现在的含笑已经从一个歌手转向了音乐制作人。他学习作曲编曲，3年的时间干了别人七八年才能干完的事情。含笑说："两年前，我偶然发现了百度上一个'含笑吧'，那时我刚开始学MIDI。说心里话，我学MIDI、学作曲跟这个吧上的网友有直接的关系。那时候是我最糟糕的时候，那个吧里虽然人数不多，好像是200多人，但是对我各方面的消息都做得很规整。我那个时候已经长期没有消息了，没有演出没有上电视，没有新专辑，但是那些人始终在坚持着等待着，就像我在他们身边一样……当时我哭了。我不是经常流泪的人，但那次我流泪了。当晚我就跟老婆说，我必须学作曲，唱歌没新东西很难有新发展。老等着别人给我写太难了，那样很多东西不是我想表达的。"

记者问他："这次出事后，你去含笑吧里看了吗？"含笑说："我一直没敢看，因为我很对不住他们。听朋友说，现在吧里的很多歌迷留言，希望我改过自新。他们没有放弃我，这更让我倍加悔恨。所以，我郑重承诺，不再沾毒品。"

事业不顺岂是吸毒理由？

含笑特别向记者澄清，他是一个人在家吸毒被抓的，并不是人们说的聚众吸毒。

1996年，含笑凭借《飞天》、《情侠》、《笑傲江湖》三首侠客风格的单曲让含笑再度火爆，形成独一无二的侠客风格。2000年后，含笑不满足停留在侠客歌手的成就上，再次转型，力图是自己的创作和演唱风格多样化。2006年开始，含笑一直潜心于音乐创作，正在与国际音乐接轨。除了唱歌，含笑近年来还在《女子公寓》《大漠皇妃》，《大钦差之皇城神鹰》《皇后进宫》等

电视剧中出演男主角。

而近些年来，含笑的歌唱事业每况愈下，基本退出了歌坛一线，甚至鲜有他的消息，有点印象的还是他因车贷“断供”的两次被起诉惹上的官司，据悉2003年，含笑帮朋友签字贷款55.8万元买了辆莲花跑车。因其朋友没能按期还款，2004年，远景盈拓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将含笑告上了法庭。因含笑未出庭，丰台区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判决。含笑被判给付经销商代为偿还的贷款本息563989.5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002年5月27日向建设银行贷款30.08万元用于购买轿车。此后，含笑未能按照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将含笑诉至法院。法庭传唤后，当时含笑拒不出庭。

简直难以想象，沉寂多年后的含笑，这次却因涉嫌吸毒而被曝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含笑相当荒诞的吸毒理由让人再次无语。

8、《同一首歌》策划人胡继国贩毒，瑞丽落网

《同一首歌》的策划人贩毒？是真是假，让人一时难辨。

2006年年底，网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同一首歌》幕后策划人胡继国瑞丽贩毒落网。仅仅过了几天，央视《同一首歌》发表声明：胡继国与《同一首歌》节目组无关，该栏目组从来就没有此人。为弄清事件的真相，笔者采访了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两禁处胡警官。据介绍，昆明市盘龙公安分局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让所有人惊诧万分的是，贩毒嫌疑人竟然是在演艺界堪称“大腕”的经纪人胡继国。据调查，36岁的胡继国来自成都，父亲曾是一位共和国将军，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进入演艺圈从事自由经纪人职业，在圈内享有极高知名度的他与众多大牌明星交往密切，他自称手里有至少上百名两岸三地的明星资料和联系方式，还策划组织了200多台大型演唱会，多次参与《同一首歌》的幕后策划，常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捐助希望工程。而近几年，他还和香港歌星合作在成都



进军商圈。而这些资料，都已被警方查证属实。

阔绰吸毒者现身瑞丽

2006 年 10 月，盘龙公安分局禁毒大队的谢警官突然接到举报称：有四五名疑似涉毒人员的四川人出现在瑞丽市，他们长期入住高档宾馆的总统套房，并在房内吸食毒品冰毒，形迹非常可疑！除吸毒外，这伙人是否参与了贩毒？要不要对其进行跟踪？线索的模糊性让谢警官非常头疼：“毒贩一般并不吸毒，就算是以贩养吸，他们又从哪弄来经费填补长期入住总统套房这样的巨额开销?”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逐渐掌握了更多信息：团伙中的“老大”胡继国来自成都，其殷实的家境一直为自己及手下人吸毒提供着经济支持。这伙人平日里吃住用的全是名牌，加之吸食毒品的量非常大，他们每天消费在 2－3 万元左右，而胡继国等人更是在短短两个月内，或乘飞机，或驾驶一辆最新款的本田雅阁轿车，往返于大理、宁波、深圳、成都等城市，四处筹集供自己吸食的毒品。但由于此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致使当地警方始终没有掌握其贩毒的确凿证据。

接下来的时间里，胡继国又先后乘飞机或自驾车来到瑞丽。在此期间，胡继国认识了一个精明能干的“马仔”，一番试探后胡继国向其表露了想购买大批毒品的想法。可胡继国却没有想到，能干的“马仔”竟然是警方卧底的侦查员。

2006 年 9 月，对侦查员早已深信不疑的胡继国第 5 次来到瑞丽后，很快向我侦查员提出要购买大批毒品，并当场抛出了 3 万元定金。但由于当时种种因素的存在，认为时机不成熟的盘龙警方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并且让侦查员主动将 3 万元定金还给胡继国。而 3 万定金的退还，更加深了胡继国对我侦查员的信任。

2006 年 12 月份，第 6 次来到瑞丽的胡继国依旧向侦查员提出要购买毒品，并且还自己到境外购买了 200 余克毒品冰毒。对于侦查员提出要先支付定金的要求，他也更为大方地甩出了 5 万元。12 月 12 日，胡继国终于在瑞丽市某宾馆内见到了毒品海洛因。当其购买了 3.5 千克毒品，背着毒品走出酒

店时，被守候多时的盘龙警方人赃俱获。到了这个时候，胡继国才意识到自己早在警方掌控之中。在大叫着："我上当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同一首歌'是我策划的，我策划过几百场大型演出。"

在胡继国身上，警方除缴获3700克毒品海洛因、200余克冰毒以及27万毒资外，还缴获了其用于反侦查的密拍机、探头、夜视仪、监听器等高科技装备。审讯中，36岁、籍贯四川的胡继国对贩毒一事供认不讳，并交代在贩毒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上网熟读国内外精典毒案，并专门了解机场、边检站所使用的安检设备资料。

高科技反侦设备胜过警方

在警方缴获的嫌疑物品里，一个暗红色的木箱尤为显眼，里面装着一只造型奇特而精致的玻璃瓶，玻璃瓶被做成一匹奔马的形状，首尾两端分别连接着两根细管。警方介绍，"这是胡继国专门订做的'马壶'，全国仅有一只，用于吸食合成毒品'小马'（麻黄素类合成毒品），造价在3000－4000元左右。"不难看出，财大气粗的胡继国在吸毒方面还非常讲究。

而更让笔者大开眼界的还是那些"反侦查的科技设备"，藏在钱夹里的窃听器、针孔摄像机、用于检查房间内是否安装有电子设备的"小精灵"……胡继国交代，这是一批在演艺圈中用途广泛的科技设备，在偷拍明星隐私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这里，却被他"灵活运用"到了吸贩毒的歪道上。每次交易毒品前，胡继国都会用"小精灵"对交易地点进行仔细的检查，确认没有被监听监控后，他才会放心大胆地进行交易。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胡继国竟还随身带了一个电子天平，据说他在交易毒品时都要当场称量，要求必须精确到"0.01克"。

婚姻破裂是他贩毒的导火索

被刑拘后，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胡继国似乎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他还向前来提审的孙警官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回家过年，因为他在瑞丽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准备等出狱后就娶她。

"第一次见面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会和毒品扯上关系！"办案民警孙警



官回忆说,“胡继国出口成章、博古通今,确实是个人才,只可惜他将聪明才干用错了地方!”

如此显赫的身份背景,却又为何与毒品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调查的深入,胡继国向警方道出了他一步步走上贩毒道路的原因。

除了演艺圈自由经纪人的身份,胡继国还和香港歌星温兆伦在成都城南开了一家名为“温莎公爵”的美容厅。按说在大理等地已经拥有别墅豪宅的胡继国已算是财大气粗之人,但突如其来的婚姻变故却让他从里到外变了一个人。

胡继国交代,从去年起,他开始发现妻子对自己不忠,“她不但每天在夜总会玩到很晚才一身酒气地回家,最让他奇怪的是,妻子每次回到家后都显得兴奋异常!”满腹疑惑的胡继国在跟踪妻子后发现,原来妻子经常和一帮演艺圈的朋友在夜总会里吸食毒品冰毒。当时的胡继国对其不甚了解,只是听说那是一种很时尚且不会像海洛因一样上瘾的毒品,不久之后,胡继国与妻子离了婚,财产全部给了妻子,他带着30余万元来到云南,开始了吸毒和贩毒的生活。

在瑞丽待上一段时间后,胡继国准备东山再起,但毒品的暴利诱惑已经远远超过自己在演艺圈辛苦打拼的报酬,胡继国决定改行贩毒。为此,他不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上网搜集资料——从查询法律空子到了解云南各地的禁毒关卡,胆大心细的胡继国很快将需要掌握的资料烂熟于胸,为了小试牛刀,他曾携带20多颗毒品冰毒在某关卡成功躲过安检,这也更为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想法添足了信心。最终,自认为聪明的胡继国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里。

……

为了吸毒,个别艺人们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他们又是绞尽脑汁,为自己吸毒找借口。艺人们如此自甘堕落,让人扼腕,让人叹息。

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明星,其所作所为无时无刻都影响着大众。尤其对那些“粉丝”和“星迷”们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铁杆“粉丝”们,明星们涉毒及其他不检点的行为无疑会对许多未成年的追随者们产生负面和不良的影响。涉世未深的青

少年对明星的言行更易模仿。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因此而容易被明星的不良影响而造成扭曲。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心理发育时期，单纯无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逆反心理，判别是非能力较弱，抵制毒品侵害的心理防线薄弱，对毒品的危害性和吸毒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本来就容易上当受骗。再加上受明星的影响，更容易陷入毒品的万恶深渊。误认吸毒为时髦。毒贩们更会借偶像明星吸毒的事件大肆鼓吹“吸毒可以炫耀财富，现在明星都吸毒”、“吸毒是时髦”等错误观念，而部分青少年关注潮流，追崇时尚，盲目模仿偶像明星的一举一动，往往会被这些错误的观念所左右，走上吸毒的道路，不光吸尽家产钱财，毁掉自己的身体，也毁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对于艺人吸毒，有人称是为了减压，有人称吸毒是为了庆生，还有人称吸毒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为了吸毒，艺人总会有千万个理由，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丑陋的理由。而这些理由也无法减轻吸毒行为对家庭、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近年来，演艺界人士涉毒的案例并不少见。为何演艺人员频频涉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此，2011 年 6 月 19 日，正在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歌手谢东接受采访时说，演艺圈很容易攀比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跟自己的过去比、跟现在周围的人比，跟知名度高的、跟歌唱得红的等等等等，很容易产生比较，无形中就产生了很多的欲望。

应该说，艺人涉足吸毒、涉足黑社会是他们的自甘堕落，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光亮的，应该受到舆论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好的演员，我们会联想到德艺双馨这个词，现在的演员很容易被公众宠坏，导致自我膨胀。明星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披着很多耀眼的光环。但是这种光环是个双刃剑，有可能使真正的艺术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对于那些自我约束能力差或者是自我道德水准经不起考验的人就变成了负担，促使走上迷失的道路。从社会角度来讲，做明星是全民的热潮，对明星厚爱偏多，各种约束偏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于明星吸毒事件，法律、法规一定要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真正做到零容忍。明星并不代表个体，其实会影响这个社会，甚至可能会成为很多的



年轻人奋斗路上的精神榜样；效仿对象。实现零容忍一定要完善我们的监管体系，建立吸毒明星退出、惩戒机制，增加它的惩处力度。

对于此类事件的预防，可以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或者是成为一个行业当中的准则，除了明星本身需要加强自律之外，他们的管理者包括经纪公司，相关的行业机构也应该在管理和教育方面提高认识，一方面是帮助明星，另一方面要对屡教不改的明星敢于说“不”。

严格意义上说，明星吸毒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明星应背负社会责任而存在。

9、李代沫，在毒雾中迷失的“好声音”

短短数十字的消息，让关注“中国好声音”的众多铁粉跌入谷底。

2014 年 3 月 18 日，认证为“中国娱乐报道官微”的微博曝出快讯，称因选秀节目一夜成名的某光头歌手卷入吸毒事件，被警方带走调查。随后，该微博再次更新称，该名歌手为李代沫。全国各大媒体随后的报道也进一步证实了此事。5 月 28 日，歌手李代沫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经过两个小时的审判，李代沫一审获刑 9 个月，罚款 2000 元。

这已经不是李代沫第一次因为负面新闻而占据娱乐新闻版面了，吸食冰毒的消息更将他推向了公众口诛笔伐的风口浪尖。李代沫在无限风光和险峰面前，未能很好地把握自己，选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最终不仅毁了自己，而且为演艺圈又增一笔“不良纪录”。

“星途”无限好

2012 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大批学员经媒体放大后，涌入演艺圈，经历了两年的大浪淘沙后，仍较有市场的，女有吴莫愁，男有李代沫等人。不过在李代沫吸毒被捕后，只剩下吴莫愁一人能继续证明首届《中国好声音》的辉煌。

李代沫在当年比赛尚未结束时，出场费已高达 15 万元。同年 11 月，他签约了当然娱乐，成为当季第一位签约唱片公司的学员。一年多来，他已发行了《我的歌声里》《敏感者》两张专辑，并于去年 7 月在北京万事达中心 M 空间率先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因此，他算是《中国好声音》首期学员中发展较好的一位，“星途”一片光明。

据了解，事发前李代沫的商演价格已飙至 38 万元一场。此外，他还有电脑、电商等要代言。

受吸食毒品的影响，一夜之间，辽宁卫视的节目已经确定不再邀请李代沫参与。中央电视台则直接封杀了其所有代言的电商品牌广告。

从北京市朝阳警方公布的案情看，李代沫吸毒已确凿无疑。就法律层面讲，如果涉事 8 人只是单纯地吸食毒品，没有其他涉毒品行为，那还只是治安事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可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就李代沫涉毒案而言，目前报道所反映的案情还很有限，但李代沫存在吸毒外的涉毒品行为，已被证实。据警方披露，李代沫在内的多人在其暂住地内被抓获，他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而根据最高法司法有关的解释，提供场所容留他人吸毒、注射毒品的，一次容留 3 人以上的，都将被立案追诉。而这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演艺圈更新换代极快，如果李代沫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 3 年以后，娱乐圈还能记住他吗？韩国男星服兵役后的星路大多不如以前，这还是在口碑良好的情况下。勿容质疑，涉毒后的李代沫，前途堪忧。

自毁前程路

实际上，人们对于演艺圈中明星涉毒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既有公众对人们选择生活多样化的宽容，更有太多相关消息所带给公众的免疫力。不过，年仅 26 岁的李代沫，不仅是为大众所知的涉毒人员中年龄较小的，他还是第一个选秀歌手。

实际上，如果没有涉毒这件事，可以预见李代沫会在很长时间内，定会混得风生水起。从卷入了与《我的歌声里》原唱曲婉婷的版权之争到疑似前



男友被抛弃等新闻，李代沫以及他身后的团队，就在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与这些丑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距离，不承认，不否认也不避嫌。事实证明，粉丝们很吃这一套。

按理说，李代沫应当珍惜今天所拥有的鲜花与掌声。他从小开始学单簧管，学唱歌，高一学美声，偶尔到酒吧驻唱，在沈阳上大学，主修的还是美声。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打拼，直到走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他终于如愿以偿。

签约，当歌手，出唱片，开演唱会，唱电影主题歌，上各种各样最火的电视访谈，甚至代言各种有份量的广告，出演电影，真可谓一步登天。可为什么好不容易盼到的好日子，只过了一年半就翻船了呢？

相比之前涉毒的艺人，如满文军、罗琦、谢东、苏永康等，多是圈中元老级人物，成绩斐然，像李代沫这样年纪轻轻就毁在毒品上，真的除了惋惜就是让人痛心。

“忘本”和“膨胀”的代价

选秀出来的歌手，除了少数成功的之外，大多默默无闻，或是负面新闻不断。从高空跌入谷底的，李代沫绝非个案。

走红之后“忘本”和“膨胀”的评价，也时刻威胁着这些草根歌手。《我是大明星》第二季总冠军朱之文就被某影评人评价为“穿军大衣是炒作、是被人包装出来的”，旭日阳刚“住高档房开豪车”的传闻，也将两人塑造成膨胀至极的形象。

2007 年，来自内蒙古的歌手阿穆隆杀入《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 8 强。2010 年 3 月 3 日，阿穆隆酒后驾车撞死一名行人，最终被警方刑拘。2010 年 7 月 21 日，阿穆隆因交通肇事罪获刑 3 年 6 个月。

音乐制作人郝磊也是选秀出身。2004 年 MTV 和海飞丝合办的新生赛，郝磊依靠自己创作的《月半弯》获得了全国的最佳创作奖。“陶喆亲自给我颁的奖，所以我特别知道刚刚选秀出来的歌手的那种膨胀。当年，我跟 EMI（百代唱片）谈合作时，我记得是胡彦斌、EMI 总经理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聊我的唱片约。讲实话，我很膨胀，我觉得如果公司肯大力推我的话，超过胡彦斌根本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成功是把“双刃剑”

马云曾说过：“名声让我忧心，我见过太多飞上天空然后摔下的人了。”他还说：“每次成功都可能导致你的失败。”如果说，这世界上的失败者有一半是根本没有窥见成功之路，那么还有另一半是掌控不了成功。

美国的“小鬼”金·麦考利、林赛·罗韩，还有近几年很红的贾斯丁·比伯，都是年少出名，成年后却丑闻缠身。即使还拥有那嗓音和演技，也不是当初热爱表演的自己了。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而底蕴却未曾有超过经济的发展速度。节奏一快，人心浮躁，选秀节目大把造星，可多是为了收视率，舞台只是附属品。至于选手签约成了艺人，公司不考虑如何抵御物欲横流、保持纯真，只希望他们的才华能在最短时间内释放，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歌手、演员也只是普通人，对演艺过早的投入导致他们只拘泥于声乐形表，看的书、走的路太少，再加上工作繁忙，压力太大，定力差的便脱离了轨道。对于李代沫来说，成功来得太突然，稍有不慎，光芒就让人眩晕了。

对于娱乐圈来讲，歌手吸毒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君不见有多少红极一时的歌星乃至一线影星毁在了吸毒的路上。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吸毒都是一种丑陋现像，一种违法行为。有很多歌手苦于找不到创作灵感，便利用吸毒来兴奋自己的神经，但最终也还是难以取得什么收获，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公众形象，遭到歌迷们的疏远，影响了事业的发展。

说白了，无论是老歌手还是新艺人，一旦混入吸毒的行列，也就暴露出了自己人性的弱点，这意味着堕落的开始，让自己的人品和修养打了折扣。一个人尤其是作为艺人，做到洁身自好显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我们克制欲望与杂念，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和定力，抑制浮躁膨胀的不健康心态，坚守底线，为自己把好是非关。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成名容易毁名也容易，来的容易了也就不懂得珍惜。李代沫可以说也是一夜成名的少数幸运儿，他本该好好珍惜自己的前程，用更好的成绩和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以回报喜爱他的歌迷和粉丝。然而一个人有了名气之后，相应的种种压力可能也就随之而来，无论吸毒是出于缓压、寻找灵感，还是放纵，这都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第六章　缉“毒”生死间



引子——泣血的呼唤

死亡、屈辱、堕落、绝望，当这些字眼一旦和毒品沾染上关系的时候，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毒品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是如此巨大，和毒品的较量其实不亚于一场战争！当无数缉毒英雄为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危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时候，我们只有行动起来，和毒品斗争。

1、给国人和世界一个承诺

13名中国同胞遭枪杀，惨死异国他乡，举国震惊，世界哗然……

是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荣誉，辗转中老缅泰，万里寻凶，力图揭开惨案真相；

是他们，为了13名同胞的亲人不再流血流泪，历时近一年，风餐露宿，缉拿顽凶，只为告慰惨死同胞的亡灵；

是他们，心系同胞与祖国，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了中国缉毒警察护佑人民安宁、惩治罪恶的铮铮誓言与无悔传奇……

11 月 6 日下午，举世瞩目的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曾在湄公河流域“不可一世”的缅甸籍毒枭糯康被判处死刑，糯康犯罪集团其他骨干分子也依法受到惩处。

审判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审判大厅里回荡：“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及正常的边境秩序，严厉打击跨国犯罪、有组织犯罪及严重暴力犯罪，保护中国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不受侵犯，被告人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均应依法予以严惩!”6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至有期徒刑 8 年不等的刑罚，刑事附带民事部分则判决共赔偿 600 万元人民币。

沉冤昭雪，如果上天有知，13 名同胞也该含笑九泉了。

看着被告席上罪犯的绝望表情，旁听席上，遇难中国船员的亲友们的表情悲喜交加。“玉兴 8 号”船主之一何熙伦也是遇害者家属，他的哥哥何熙行、嫂子陈国英都在此案中遇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悼念哥哥、嫂子的文章：“我深知，若要还你们公道，必须是祖国为我们做主。”

快速处置　联合执法——尽展祖国强盛的力量

从来没有一则普通的消息如此牵动着国人的神经，同时吸引着世界关注的目光。

2011 年 10 月 5 日，泰国军方对外发布消息：两艘中国货船今天在湄公河流域武装贩毒，泰国军方在检查时遭遇抵抗，13 名中国船员被全部枪杀并落水。从中国商船上缴获毒品 9 万多粒。

消息一经发出，震惊中国，世界哗然。

我国公民的安危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心。

案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同志立即指示要求妥善处置、查明真相。云南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应急处置领导组，紧急启动重大案件应急处置 I 级响应预案，与外交部、公安部、交通部联合工作组一同赶赴边境，开展走访安抚和



善后处置工作。

同年10月23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10·5”我国货船遇袭事件有关事宜。他强调，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会同有关国家加快案件调查处理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尽快建立中老缅泰四国维护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安全执法合作机制，切实维护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安全。当天，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受命率中国公安高级代表团赴泰国开展工作，督促泰方尽快破案。

在公安部的指挥下，云南警方迅速成立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启动边境会晤机制，通过警务合作渠道，于10月6日派员急赴事发区域，察看现场，了解案情，协助搜寻幸存者，打捞我遇难同胞遗体。

一切都在围绕揭开惨案真相而迅速展开。

经过走访目击者证人了解到：当天，我国“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货船在几艘快艇的押解下从缅甸和老挝交界水域开往泰国水域，靠岸后，货船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之后一伙“黑衣人”从货船跳到快艇上离开；紧接着，岸上一批泰国军人向货船开火，之后登上货船。

“案发后，我国船员的尸体陆续浮出水面，他们都被捆绑手脚，蒙着头，堵着嘴。”办案民警回忆说，这违反常理，与泰国军方所称严重不符。警方判断，两艘货船系被非法武装力量劫持，现场发现的毒品、枪支极有可能为栽赃陷害。

“中国公安绝不让在海外受侵害的我国公民的血白流！”“10·5”案专案组组长、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接受任务时向战友下达了总动员令，同时也表明了不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誓不罢休的决心。

据刘跃进介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民出国旅游、经商，在海外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我国公安机关有决心和能力保护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这是中国警方的庄严承诺。

刘跃进是此次高级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坦言，案件初期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异常艰辛，泰国国内形势复杂，警方难以开展工作。如果仅仅靠泰国警方，

侦破此案的可能性很低。难道13位中国公民真要冤死他乡？必须尽快以我为中心，扭转被动局面。

中国政府强力出手了。

10月31日，在中方主导下，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发表了《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达成“联合办案尽快彻底查清‘10·5’案件案情，依法惩办凶手”、“建立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打击毒品犯罪团伙”和“开展联合巡逻执法”四项共识。

11月3日，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10·5”案件联合专案组，刘跃进任组长。随后，专案组分别向老缅泰三国派驻工作组，相互通报调查情况，增进理解互信，敦促落实协作事项。

战鼓已经擂响，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迷雾即将揭开。

到底是谁杀害了我国船员？目击者口中的“黑衣人”是谁？是否存在非法武装力量与泰国军人勾结？一系列问题让专案组成员夜不能寐。

“10·5”案件发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带，距离我国境200多公里。长期盘踞于此的各路贩毒集团、黑社会组织、非法武装为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不时发生武装冲突，造成这一地区治安混乱，安全形势严峻。

要想在错综复杂的武装贩毒集团中查觅出真凶，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经回溯整理，盘踞在境外湄公河流域的糯康犯罪集团被纳入视线。”专案组副组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先燕明说，2008年以来，云南公安机关接到了28起中国船主报案，称在湄公河流域受到武装分子敲诈勒索，经云南警方与老缅泰三国地方公安机关积极开展警务合作，发现实施不法勾当的主要为糯康武装贩毒集团。

据了解，糯康原为“金三角”大毒枭坤沙的手下。坤沙投降政府后，糯康挑梁单干，组织了一支非法武装，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大肆进行杀人抢劫、武装贩毒、劫持船只、绑架船员、敲诈勒索等犯罪



活动。

近年来，糯康先后被老缅泰三国警方通缉，并上了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越来越多的疑点集中在糯康团伙身上。

为此，专案组开始搜集与糯康集团有关的线索和人员。2011 年 11 月底，专案组获悉糯康犯罪集团一名骨干分子正在中缅边境湄公河流域进行活动的情报后，迅速守候布控并成功将其抓获。

经审讯，该骨干分子交代，其为糯康集团 3 号人物依莱的手下，曾听依莱炫耀称：“10・5”案是糯康集团干的。

“后来我们了解到，糯康集团之所以如此凶残地杀害中国船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刘跃进告诉记者，一方面是遇害船只的船主不愿意向糯康集团缴纳保护费用；另一方面是案发不久前，缅甸军方曾征用中国船只清剿糯康犯罪集团，打死打伤其数名成员，糯康犯罪集团为此怀恨在心，决心报复中国船只。

虽然锁定了目标，但糯康身处何地，长什么样子，专案组几乎一无所知。

“在老缅泰，糯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专案组派驻老挝工作组组长于海斌说，糯康原籍缅甸，40 来岁，手持多国护照，懂老缅泰各国语言，长期在三国间穿梭，从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三国警方对其通缉多年未果，“甚至有人怀疑糯康是否真实存在。”

“一开始，我们仅掌握一张他 20 多年前的照片，还是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专案组成员、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胡祖俊说。

锁定了犯罪集团，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该案是我国公安机关侦办的条件限制最多、案件线索来源渠道最复杂、采取手段最特殊的刑事专案。”刘跃进用 3 个“最”来概括此案侦破过程之艰难。

虽然中老缅泰四国共同发表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但这只是框架性协议，关于“10・5”案的具体工作还需要派往各国的工作组协调。赴老缅泰各工作组组长表示：刚开始工作可谓举步维艰。

“一开始难以密切合作可以理解，毕竟是在国外，对方也会有是否干涉主权、执法权等担忧和疑虑。”赴缅甸工作组组长赵乘锋说。

慢慢地，局面开始好转。刘跃进说，工作组在外工作时，纪律严格，充分尊重所在国主权和民族风俗，赢得了各国政府和国外同行的信任；同时，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合作的强力推进。

去年12月以后，中央领导和公安部领导开始紧锣密鼓地会见或赴老缅泰国会见三国领导人和警方负责人，共商如何加强执法合作，要求对方加大配合力度。

孟建柱率团出访泰老缅等国，与三国领导人就联合打击糯康犯罪集团达成共识，委托专案组向老缅两国军警高层转交亲笔信，协商交涉案侦合作事宜，为案侦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基础。

大小头目纷纷落网——显示科技与智慧的力量

四国联合密织的大网已经张开，毒贩的最终落网已成宿命。

“在此背景下，中方从情报交流、联合清剿、协作抓捕、证据交换、共同审讯、嫌疑人移交等方面大胆创新，积极与老缅泰三国交流协调，开创了中央和地方层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司法协作和警务合作格局，为成功侦破此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刘跃进说。

“中老人民是朋友，中老友谊天长地久。”这是赴老挝工作组组长于海斌在老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当工作组与老挝警方接洽时，老挝警方也设立了与我工作组对接的联络组，甚至成立了一个“10·5”案6人抓捕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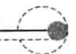
12月中旬，我专案组获悉，3号人物依莱躲在老挝万象。工作组立即与老挝警方联络、协调，将依莱抓获。

经审讯，依莱交代了糯康集团通过黑社会牵线，与泰国部分军人勾结，策划实施了“10·5”案，并用毒品栽赃中国船员的事实，称率队上船开枪杀人的是糯康集团4号人物翁篾。

依莱还交代，糯康目前在“金三角”缅甸一侧的可能最大。

实际上，在抓捕依莱前几天，警方就差一点就将糯康抓获。

12月6日，工作组与老挝警方对糯康集团经常活动的区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在波乔省顿彭县一个沿河的村庄发现了糯康的踪迹。工作组紧急协调老挝军警，并包围了该村庄，仅搜查了五六户，就抓住了好几个糯康集



团的成员，查获一批枪支弹药和毒品。

但此时，搜查却受到当地村民的阻挠，搜查无法进行，糯康趁夜色坐船逃离，“几乎是在我们眼皮底下逃掉的”，于海斌当时气得直跺脚。

对此，刘跃进有他的理解，糯康集团近年来非法所得数亿元，除了组织非法武装、购买毒品和用于个人挥霍外，糯康还时常给当地做一些慈善捐助，修路建桥，以维护与当地人的关系，在其活动区域的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声望，被围剿时经常能得到帮助。

依莱落网后，中老缅泰再次摸排糯康踪迹。“在我们主导下，中老缅泰四国警方决定联合对糯康集团进行清剿行动，打压其生存空间，实施‘斩手断肢’行动，要将糯康集团一网打尽。”刘跃进说。

事实证明，他们采取的策略成为成功侦破此案的关键。

2012 年 2 月 22 日，工作组发现糯康及其集团主要成员都在“金三角”缅甸一侧的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根据情报，该营地有数十人，配备火箭筒、AK47 等武器，弹药充足。

次日凌晨，在缅甸军警配合下，对糯康集团进行突袭。行动中，我方被暗哨发现，引发枪战，击毙糯康集团成员两名，但糯康等人得以逃脱。

“这次突袭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毒品。我们发现，当时糯康在深山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吃的都是新鲜的肉、蔬菜和水果。”胡祖俊告诉记者，类似的围剿、突袭还有多次，糯康均侥幸逃脱，但震慑效果逐渐显现，糯康集团开始分崩离析。

4 月 20 日，专案组发现糯康集团 2 号人物桑康离开缅甸深山老林，便通报相关国家警方将其抓获。

4 月 25 日，已成为“孤家寡人”的糯康走出深山，带着两名喽划着一条小船准备前往老挝一侧。中老警方已经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刚上岸，就被警方发现，警方鸣枪后，糯康束手就擒。

糯康被抓获后，专案组乘胜追击，进一步加强与老缅军警高层协调力度。同时，继续强力推进边境合作，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案件信息，敦促推进调查，联合开展抓捕。在强大的清剿围捕攻势下，先后在中缅边境成功抓获四处躲藏的糯康犯罪集团成员扎西卡、扎波、扎拖波等人。至此，侦查抓捕工

作取得重大胜利。

毒枭引渡回归受审——体现国际合作的力量

5月10日北京首都机场，注定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4月25日，被中老警方联手抓获的湄公河流域“金三角”地区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在老挝万象正式依法移交给中国警方。5月10日15时50分，押解大毒枭糯康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随后，糯康被押到首都机场临时看守所。当日晚间，糯康被押到云南“10·5”专案组的工作基地。

首犯糯康落网当晚，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指示境外工作组立即与老挝当地警方交涉，表明中国警方希望老挝警方移交糯康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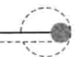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拿着国务委员孟建柱的亲笔信赶赴老挝，就通过两国警务合作渠道移交糯康开展交涉。”刘跃进说，经过反复磋商，老挝政府同意由老挝警方向我国警方移交糯康。此举探索创新了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渠道快捷移交犯罪嫌疑人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将毒贩移交我国”是禁毒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难点。移交的基础要看对方国肯不肯移交。一般是要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移交，而很多外国人在国外对中国人犯罪，我国警方很难取证。各国法律制度不同，移交障碍重重。

我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刘跃进分析称，“10·5”案杀害的13名中国船员都是中国人，犯罪实施地在中国的船舶上，特别是此次抓获糯康是中老警方联合抓获的，虽然也有其他国家要求引渡，但都没有中国的理由充分。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谈判，老挝政府和警方郑重决定将糯康移交给中方处理。

同时，随着糯康、桑康的落网，糯康集团作鸟兽散。得知糯康等人相继落网的消息后，走投无路的4号人物翁篾与其他糯康集团共50多名成员相继向缅甸警方投降。



8 月 28 日，经过艰苦谈判和具体交涉，根据中缅协商结果，翁篾被移交给中国，以协助中方调查。翁篾的落网和移交，标志着“10·5”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该案案情也全面查清，以糯康为首的武装贩毒集团与泰国不法军人相互勾结、共同预谋、组织实施，栽赃陷害中国船只武装贩毒，泰国少数不法军人欲借机立功，劫持并枪杀 13 名中国船员的刑事案件。

让凶犯认罪伏法——彰显法制与正义的力量

让凶犯认罪服法，成为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共识。

要将糯康等人绳之以法，取证工作极为重要。专案组认真细致寻找知情人员，广泛开展走访调查，先后询问证人近百人，全面搜集固定相关证据。

基于各国调查重点和掌握证据材料不尽相同，专案组与泰老缅三国深化国际司法协作和警务合作，积极开展证据移交、交换，依法获取了大量现场勘验、检查鉴定、证明资料等关键证据，进一步充实完善证据链。

“通过全面、客观、细致、认真的调查，专案组最终搜集掌握了大量证人证言、书证、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专案组证据组民警何超峰说，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证据卷宗 37 卷、6000 余页，充分证明了糯康犯罪集团实施“10·5”案的犯罪事实。

专案组还先后 3 次主动向泰方提供了近 600 页证明泰国不法军人勾结糯康犯罪集团实施“10·5”案件的证据材料，有力支持了泰国对涉案不法军人的深入调查。

“老、泰两国应我方的司法和警务协助请求，派员来华出庭作证，直接支持我国对糯康等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开创了国外执法人员到我国出庭作证的先河。”何超峰表示。

与此同时，专案组坚持依法审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他们及时通过翻译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等权利义务，依法通知相关国家使领馆，并坚持全程讯问录音录像。

专案组审讯组组长张润生介绍，针对嫌疑人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使用多种不同语言的情况，专案组为每名犯罪嫌疑人安排 2 至 3 名相对固定的

翻译人员，确保审讯问答准确顺畅。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给予人道对待，充分满足其生活方面的合理要求，充分体现我国法制文明。

"当然，审讯过程还是十分艰难的。糯康等犯罪嫌疑人经历丰富，深知罪孽深重，有很强的反审讯能力。"张润生告诉记者，糯康、桑康、依莱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心存侥幸，或拒不认罪，或避重就轻，态度顽固不化。

在这种情况下，审讯组沉着应对，与嫌疑人斗智斗勇。由于民警全面吃透了案情，在审讯过程中能够对嫌疑人的供述作出准确判断，适时揭露供述矛盾点，这对嫌疑人自恃在境外作案，认为我国民警不掌握其犯罪事实和证据的顽固抵赖心理，形成有效震慑。

针对嫌疑人不懂我国法律，专案组强化法律教育，打消其不实幻想，让其明白坦白交代是唯一出路。

"10·5"案件是发生在境外的中国公民遭受不法侵害的案件，全部侦查工作都在境外进行，全部抓捕工作都在境外实施，所有的证据材料搜集工作都在境外开展，而且犯罪嫌疑人全都是外国人。

"这在中国公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刘跃进说，在10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公安动用了千军万马，踏遍了千山万水，想尽了千方百计，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千回百转，排除了千难万险，用艰苦卓绝的工作，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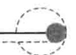
天职与忠诚——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力量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专案组全体参战民警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克服了来自身心的巨大压力，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民警付出了太多太多。"胡祖俊感叹到，他记得非常清楚，案发后，他率抽调的云南各地公安民警飞往北京，接受任务后直接赶赴老缅泰。

飞机上，胡祖俊看到身旁一位青年民警手背上绑着麻绳一类的东西，便询问是什么风俗。一问吓了他一跳，原来这是结婚前的习俗，小伙原本第二天举办婚礼。小伙憨厚一笑道："我是少数民族，懂傣族语，出去了方便开展工作。"一席话，让身边人感动不已。

在专案侦办的过程中，全体参战民警坚守"彻查案情、缉伏凶手、坚决



还逝者公道”的信念，无论常驻境外还是坚守边境一线，始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夜以继日、艰苦奋战。专案组主要领导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所有民警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长时间身处异国他乡，民警们不仅面临着来自语言、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障碍和困难，在开展案件调查走访时，还不免受到人身威胁。

从成立专案组派赴缅甸到今年9月11日回北京，赵乘锋在外持续工作了整整10个月。开始时，因为保密的需要，他很少与家里联系。有一次，母亲要做心脏手术，想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但却不知道如何联系他。后来直到母亲出院后，赵乘锋才知道母亲动了手术。

在专案侦查的10个月时间里，专案组的同志们没有过一个休息日，春节也未能与家人团聚。有的民警亲人辞世也没能赶回送行，有的民警妻子临产或家人重病不能守候照顾，有的民警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带着吊瓶仍继续奋战。但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提出要求，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岗。

全体参战民警始终牢记党和国家的嘱托，人民的期望，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聚焦建国“第一毒品大案”

这是一起涉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侦破时间长达6个多月，涉案团伙多达5个、涉案人员多达80余人的跨省禁毒大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侦破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宗从套购麻黄碱片到提炼麻黄素到制造冰毒的典型案例，涉案的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达22220件，净重104.4吨，可提炼麻黄素约13.6吨，可加工冰毒10.9余吨，涉案金额21.7亿元。其涉案人员之多、涉及区域之广、查获数量之巨为全国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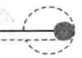
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一味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的止咳平喘药。在百度搜索里查询到，这种复方制剂的主要成份含茶碱、咖啡因、可可碱、盐酸麻黄碱和颠茄浸膏粉。该讯息着重提醒用药者“因含有

麻黄碱，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慎用；因含有嘌呤类药物及麻黄碱均有中枢兴奋作用，晚上服用时可酌情给予安定镇静药，避免引起失眠。运动员慎用”。麻黄碱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百度搜索里明确标注出它兴奋神经、促进新陈代谢等类似兴奋剂的功效，最后更是罗列出“它是合成苯丙胺类毒品也就是制作冰毒最主要的原料”。正因为这一特殊用途，国家药监局对此类药品进行了严格控制，全国各大药店对含麻黄碱成分的复方茶碱麻黄碱片等数十种常用感冒、止咳平喘药进行了限量销售。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国家的严格控管下，围绕麻黄碱复方制剂，近百人亡命奔波，在巨额利润面前，一条巨大的非法利益锁链悄然而生……

套购麻黄碱片　罪恶开始

2009 年 3 月底，宜宾市药监局接到吉林省吉林市药监局协查函，要求查明：宜宾市南溪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是否为合法药品经营企业？是否委托一个叫冯慈军的人与吉林某制药有限公司签订购买 300 件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其中已发出的 217 件药品是否到了南溪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宜宾市药监局经过调查发现，南溪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复方茶碱麻黄碱片的经营资质，并且该公司的确收到了吉林维康制药有限公司 217 件货的增值税发票，但这批药品没有进出台账，库房内也未发现这批药品的影踪。难道这批药品不翼而飞了？

鉴于药品下落不明，宜宾市药监局立即将案件移送至宜宾市公安局。然而，最初对“是否立案，以什么罪名立案”，民警中存在着诸多分歧。从市药监局转过来的材料看，构成立案的证据和条件并不充分，一批药品下落不明，可能性很多，医药公司账面出错，运输途中出了问题……种种可能性都存在。与此同时，如果立案，以何种罪名立案又成了一道难题。因为依据现有的规定和此前全国各地的处罚惯例，麻黄碱复方制剂未列入易制毒化品管制范围，但国家药监局已于 2008 年 10 月将此类药品列为管制范围。一系列问题集中起来摆在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剑明的面前，直觉告诉他这肯定是一个案件，而且不是一起普通案件，然而一切都得有证据。对于宜宾市公安局来说，这或许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此时的他决定硬啃下去，当即调集民警展



开调查。

然而，初期的案侦工作进行的举步维艰。这起案件除南溪县医药公司与吉林维康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一份购销合同外，几乎没有任何线索。这份合同中到底蕴藏着什么玄机？民警决定一探究竟。调查发现，购销合同上留下的联系人是一个叫冯慈军的人，然而留下的联系方式却不是冯慈军本人的联系电话，而是宜宾市江安县的一个小灵通号码。这说明合同上白纸黑字的东西本身就有假。那么小灵通的机主到底是谁，又跟南溪县医药公司有什么关联？这个叫冯慈军的人为什么要留其他人的电话呢？专案组通过小灵通查找线索。然而，经多方调查，小灵通却是有人用假身份证开的户。千头万绪终有一点线索，可线索到这里一度中断。

接下来，案侦民警展开大量走访调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小灵通持有者某医药公司经理杨某某，面对警方的询问他并未承认什么，却在民警走后，悄悄给冯慈军报了信。又是这个冯慈军，合同上留有他的名字、调查人向他通风报信，这一切线索都集中到了广西南宁人冯慈军的身上。民警决定全力彻查冯慈军，兵分三路前往涉及冯慈军的吉林、广西和成都三地开展工作。调查中发现，冯慈军通过许以高额好处费，串通杨某某等宜宾几个医药公司人员，租用到了南溪县医药公司关于麻黄碱复方制剂的批发经营资质，并以南溪县医药公司授权委托采购人员身份与吉林某制药公司签订了 300 件买卖合同，已履行的 217 件药品已直接发往了成都。案情逐渐明晰。4 月 21 日，根据掌握的情况，案侦人员迅速赶往广西，将冯慈军抓获。与此同时，在对冯慈军的审讯中，民警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冯慈军以每瓶 3 元的出厂价购得的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可以转手卖到每瓶 6、7 元的高价，获得 100% 的利润，这在正常的销售市场是决不可能的。况且，整个四川省复方麻黄碱片一年的消耗量不过一、两千件，而一个冯慈军一次性的吞吐量就如此之大，太不合乎常理。宜宾警方决定一查到底。

而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证。冯慈军从事这一行业，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王总”的人，连冯慈军都不能肯定这个“王总”的真名，只记得好像叫“周勇”。双方在网上达成共识，由“王总”出资，冯慈军出面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而这个自称“王总”，亦或叫“周勇”的人到底是谁？

此时，前期到广西的案侦民警反馈了一条重要消息，吉林那边发给冯慈军的217件货发往了成都，那么成都的物流公司应该有记录。根据这一线索，在成都的民警找到了物流公司，并锁定了货品接收人。4月21日，警方果断出击，在成都市成华区将货品接收人丁显中及其妻抓获，从他的家中搜查出多个省、市出品的两件麻黄碱复方制剂样品，并在其电脑上发现原来他就是冯慈军口中的“王总”，又化名“周勇”。案侦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不料，审讯中，丁显中却拒不开口。“案子猛然间断了线”，事后，案侦这样民警说道。“丁显中为何如此不计成本地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他套购大量的复方制剂到底用来干什么？这些复方制剂最后又去了哪里？”那段时间，这几个问题成了民警们天天想在脑中、挂在嘴边的疑问，百思不得其解。此时，王剑明与宜宾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宗权、分管副局长赵飞当即召集案侦民警召开案情分析会，分析案件的每个可疑点，大胆假设每种可能性，分析中逐渐理清一条思路“搬运大批量货物，必然会动用交通运输工具”，顺着这一思路，专案组最后确定了“围绕交通运输工具，寻找丁显中关系人”的案侦方向。于是，在这一案侦方向的指导下，民警们四处开展调查走访，以期打开久未进展的局面。

在对案件的全面梳理中，细心的办案民警在被挡获的丁显中的车上发现了20多张名片，通过对名片一一核查，发现了一、两名货车司机的名字，货车司机就是这一环节的关键突破口，这恰恰与“围绕交通运输工具，寻找丁显中关系人”的侦查方向不谋而合。很快，案侦民警将与丁显中被抓前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叫吴某某的货车司机突出出来。案件出现重大转机。

然而，怎样接近吴某某，专案组煞费苦心。直接抓他怕把后路封死，迟迟不下手又怕丁显中被抓的消息走漏后打草惊蛇。思量再三，案侦组决定按图索骥，用丁显中的电话直接打给吴某某，佯装“王总”的部下，称“‘王总’要运点货走，叫你们把车开过来。”刚见到乔装的民警，吴某某有些怀疑，问“王总怎么没来？”民警不动声色地说道“他有事没来。”在摆谈中逐渐打消了吴某某的顾虑。就这样，吴某某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直接将民警带到了成都市成华区城郊丁显中的药品转运仓库，到仓库一看，民警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仓库里有1043件约4.8吨麻黄碱复方制剂，而这些麻黄碱片分



别由广州、内蒙、福建、江西等全国30家制药公司出品。如此巨量、来路众多的麻黄碱复方制剂，大量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的案件初露端倪。至此，案件出现重大转折。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案侦民警分组南下北上，前往药品出品地一一走访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瞠目结舌。这些麻黄碱复方制剂出厂价仅为每瓶3元，市场价每瓶也不过5元，但几经转手到丁显中手里，摇身一变变成了每瓶12、13元，有的甚至高达16、17元。如此不计成本的大量套购，丁显中并不在意这其中每瓶几元甚至十几元的价差，没有其他解释，只有一个结论，大量的麻黄碱类药品流入了非法渠道用于制毒，专案组果断认定。

案情重大，宜宾市公安局立即将案情逐级上报，引起了四川省公安厅、公安部的高度重视。为加大侦办力度，公安部将此案作为毒品目标案件挂牌督办，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曾省权作出重要批示，决定以“非法买卖毒品案”立案，专案代号“4·08”，并成立以常务副厅长吴健任指挥长，宜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剑明，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赵建川，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吴宗权，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杨晓阳、杨林，市公安局副局长赵飞为副指挥长的指挥部。同时，四川省公安厅将此案指定宜宾管辖。为加快侦破速度，“4·08”专案组由王剑明亲自挂帅，并从各警种、部门抽调80余名精兵强将全力侦破此案。与此同时，5月8日，为加强对专案的指导和协调，公安部禁毒局和国家药监局在宜宾召开由涉案地的13个（后增加至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禁毒总队（处）领导参加的“4·08”专案协调会。会后，专案组组长王剑明再次召集所有案侦民警，痛下誓师令“不管困难多大，坚决拿下此案”。至此，“4·08”专案工作全面铺开。

提炼麻黄素　犯罪升级

在专案指挥部的指挥下，专案组决定将丁显中套购、囤积的麻黄碱复方制剂去向作为案件突破口，全力展开侦破。调查中，根据“围绕交通运输工具，寻找丁显中关系人”这一案侦方向，专案组拓展思路，很快找到了丁显中的另一关系人货车司机李某某，将其抓获并让他带路指认丁显中的仓库。却不料，这一举动让有个人坐立不安起来。此人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何通富。

其实，何通富的仓库离丁显中仓库仅 20、30 米之隔，就在李某某带领民警指认仓库的同时，为何通富看管仓库的亲戚向其偷偷报了信。得此消息，何通富全身汗毛竖立，他没想到警方会找到经常跟自己运货的司机，更没想到会如此快地找到自己的仓库附近，如惊弓之鸟的他决定迅速转移药品。事不宜迟，他迅速指挥儿子何涛、儿媳郭丽华及女儿何玉娟、女婿张頔等人前往仓库转移药品。

成都市郫县安庆镇，多家药厂所在地，集中了各路生意人的货运仓库。5 月 11 日，接到父亲指令后，何涛、张頔等人立即来到这里转移货品，几千件麻黄碱片捆绑成 400 多麻袋，然后装上事先租来的三辆大卡车，何涛、张頔等人整整忙活了一上午，快装完了，何涛接到父亲何通富电话称："将货全部转移到向阳药业"。临挂机前，何通富在电话里叮嘱了一句"一定要小心啊!"何涛心领神会。于是，三辆装着 26.5 吨麻黄碱复方制剂的大卡车鱼贯驶出仓库，朝着成都双流县直奔而去。何涛、张頔分别驾驶一辆小车尾随其后，一路有惊无险，最终大卡车停在了成都双流县向阳药业大门前，张頔、何玉娟、郭丽华 3 人迅速下车张罗着搬运卸货，而在父亲授意下倍加谨慎的何涛却在离仓库十几米远的地方把车停了下来，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猛然间，他看到一辆挂有宜宾车牌号的车子停在仓库一角，他顿时意识到了什么，顾不得通知老婆、妹妹和妹夫，一个人开着车张惶逃离了现场。何涛没看错，就在何涛、张頔等人转移货品的同时，专案组得到消息，迅即赶到了向阳药业，在对现场情形作出正确判断后果断出击，一举将张頔、何玉娟、郭丽华抓获，何涛不知去向。

通过审问，张頔供出了岳父何通富。在他的供述中称自己在全国各地套购的麻黄碱片最终都交给何通富用来提炼麻黄素了。案情逐渐明朗，何通富通过自家人四处套购麻黄碱片，目的就是提炼麻黄素，然后再卖给他人制毒。然而，一直闭口不言的丁显中与何通富是否有直接联系，他在其中又充当了何种角色？通过对何通富的外围关系调查发现，丁显中正是何通富的侄儿。据此，专案民警分析，丁显中套购的麻黄碱片必定也流到了何通富手里。一个以何通富为首，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提炼麻黄素的犯罪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接下来，民警在何通富租住的房间内提取到一些残留物，经鉴定为麻黄



素，进一步证实了何通富购买大量麻黄碱复方制剂就是为了提炼麻黄素这一犯罪事实。

随后，专案组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捣毁了何通富在成都、乐山的两个麻黄素加工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向东林、彭才学、王世强。经审查，在成都双流县向阳药业所在地的麻黄素加工窝点由何通富、向东林、彭才学3人合股建立，各占33.3%的股份。何通富提供原料、彭才学负责技术、向东林组织生产。截至案发，该窝点已经提炼出麻黄素500公斤。在乐山市五通桥区一农户院落的麻黄素加工窝点由王世强负责生产，何通富负责组织原料和销售麻黄素，该窝点已经提炼出麻黄素130公斤。至此，专案组基本查清了以何通富、向东林、彭才学为首，何涛、张頔、王世强、丁显中、罗聂凤等人为骨干的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提炼麻黄素的犯罪集团，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缉拿何通富成了本案的重中之重。然而，消息灵通的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女婿、侄儿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与专案民警玩起了躲猫猫。于是，专案组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将何通富的女儿何玉娟、儿媳郭丽华放出去，引诱这个老奸巨滑的老狐狸上勾。

何通富，早年在成都五块石一带经营药材、虫草生意，2002年生意越做越大的他在别人伙同下开始打假牌，结果却常打常输，这一时期他承包工程又由于不懂工程造成巨额亏损，到了2003年由于资不抵债，他的欠款高达1000余万元，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成都的第二欠款大户，他逃跑了。直至2006年底，他重新现身大儿子何波的婚礼现场。然而，他的这次现身为自己和这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巨额的利润，却同样为他们开启了一条梦魇般的不归路。

逃跑的三年中，何通富走南闯北，了解到药品市场中麻黄碱片的销售市场很大，有一部分人在高价收购这一药品，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的他清楚这类药属于国家限制销售药品，普通的药店一人一次只能购得5盒药片。凭着长期在医药行业的关系，回来后，他开始疯狂收购麻黄碱片，一方面他大肆发动儿子何涛、何波，女儿何玉娟，侄儿丁显中、丁显富及女婿张頔、儿媳郭丽华等亲戚用假名四处套购，另一方面，他通过国家医药网发布“急需大量麻黄碱片”的信息，结识了后来长期为其供货的罗聂凤、冯慈军和马祖军

等医药行业人员，不计成本地大量收购。一瓶麻黄碱片市场价为3元，经过为他供货人的多方交易，到他这一环节一瓶麻黄碱片就已高达12、13元甚至16、17元，中间的巨大差价成了为他供货人员获取的高额利润。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几十个人，大部分是其家族成员，也有他的朋友、生意伙伴，这些人又通过自己的关系发展为他们供货的人员，其中不乏医药公司人员，如此这般，这张网竟辐射到了全国21个省市，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关系网。几年间，何通富集团通过各种渠道总共买卖的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多达90余吨。

然而，干这行久了，何通富逐渐了解到小小的一瓶麻黄碱片就可以提炼一克麻黄素，而当时麻黄素的市价是每公斤4万元，也就是他花几千元套购来的麻黄碱片就可以提炼一公斤麻黄素，提炼一公斤麻黄素就可得到近两万元的纯利，利润率高达400%，远比套购麻黄碱片的利润更为可观。这一算不要紧，他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他手里高价收购麻黄碱片，也就是这一算让他不再满足套购麻黄碱片所获的有限利润。此后，他干起了提炼麻黄素的勾当。与此同时，有着多年医药经验的何通富知道麻黄碱单方制剂属于国家24类易制毒化学品管制范围，而复方制剂并未列入其中，于是，狡猾的他在麻黄碱复方制剂上做起了文章，苦心研究怎样用复方制剂提炼麻黄素，妄想逃避法律的打击。

其实，深谙此道的不只何通富一人，在这行的赵丽凤和她的丈夫王克明及她的姐姐赵丽华、姐夫卢光吉绝对算得上精通者。

赵丽凤，38岁，东北吉林人，这个接近40岁的中年女人有一股子干劲，早年曾南下深圳闯荡，结果一无所获。回来后不久，即与比自己大近三十岁、做药材生意的王克明结为夫妻。2003年，何通富逃跑到了东北，认识了赵丽凤、王克明、赵丽华、卢光吉四人，同为做药材的伙伴，他们就此结下了“友谊”。待何通富回成都开始从事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和提炼麻黄素后，四人依然过着一如平常的生活。2008年10月的一天，四处套购麻黄碱片的何通富打电话找到他们，向他们说了自己一本万利的生意，并要他们在当地想办法套购麻黄碱片。于是，在何通富的带领下，她们开始套购麻黄碱片，并一发不可收拾。入行稍久，和何通富一样，赵丽华、卢光吉看到了提炼麻黄素



的暴利，开始自己提炼麻黄素。初尝甜头后，今年5月，四人干脆结束了在外地的其他买卖，落户成都专心做起麻黄碱片和麻黄素的生意。此间，除卢光吉、赵丽华自己提炼麻黄素外，何通富成了她们购买麻黄素的重要渠道。从何通富处拿麻黄素每公斤3.9万元，赵丽凤转手买给下家每公斤可赚1～2千元。这一买一卖就能赚上普通人一辈子的钱，这生意比做什么都“强”。在这条路上，他们再也不能自拔……

制贩冰毒 犯罪终极

随着案件侦查工作的不断深入，专案民警发现，在何通富周围是一张纠结交错的大网，其间盘根错节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都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李文兵被纳入警方视野，是在同样为何通富大量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的重要嫌疑人李建华被抓后突出出来的，而李建华正是李文兵的哥哥。

今年34岁的李文兵，长期从事医药生意，三年前分别在云南腾冲县和昭通市的医药公司做过销售经理。然而，他虽然办事精明，工作业绩也不错，但跟绩效挂钩时高时低的薪水始终让他觉得饱一顿饿一顿，无法满足自己的花销。所以，他一直伺机而动，盼望着发达的那一天。

2008年7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回到成都的李文兵结识了同样做药材生意的何通富和另一个叫符洪贵的中年男人，当两人知道李文兵的姐姐、姐夫在广州开医药公司，而他自己也长期跑医药销售，在全国的医药市场都有着较广的人脉关系，便开始对他另眼相看，百般拉拢。

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何通富见时机成熟，便让李文兵出面给他购买消咳宁和复方茶碱麻黄碱片。“钱我先给你，你尽管去买，能买多少是多少，买到后翻三、四倍的价钱给你。”何通富说，当场叫人提出500万现金给李文兵。

这可是空手套白狼的美事儿！李文兵随即马不停蹄地调集各方关系联系套购麻黄碱片事宜。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李文兵先后伙同自己的兄弟李建华等人利用多家医药公司资质从湖北城成、北京燕京、北京太阳、安徽阜阳等制药厂为何通富和付洪贵购买消咳灵、复方茶碱麻黄碱片2700多件，涉案金额1700余万元。

短短三个月时间，李文兵不过在其中充当中介联系的角色，打打电话跑

跑腿，就轻而易举的赚了近400多万元人民币。而李建华也获得130万左右人民币。

一夜暴富的李文兵迫不及待地享受生活，他为自己购买了一辆价值120万的辉腾轿车，长期带着自己的马仔出入成都的各大酒店和夜场把酒寻欢，一掷千金。他喜欢这样的豪气与派头，也迷恋这种奢华的生活，纸醉金迷中，他忘掉了打造这种生活的金钱的来由，也麻醉了自己的担忧和害怕！

饱暖思淫欲！和许多有了钱的男人一样，李文兵面对异性有了更多的憧憬和底气。2009年初，他遇到了一个叫小凡的长发大眼女孩，尽管是在夜场里邂逅，这个女孩却有着欢场女子所没有的清纯和文静，让他一见倾心，他便马上展开热烈的追求。他的长相颇为帅气，加上能说会道，出手又大方，几千元的花篮一个接一个的送，很快将小凡俘虏。小凡其实是成都某大学的大四学生，李文兵知道她的身份后更加疼爱她了，他将自己容貌同样姣美的妻子和乖巧可爱的儿子抛诸脑后，用LV包和名牌衣服把小凡包装得高贵不凡，还出大手笔花费百万为她在成都市中心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马六”轿车，二人过起了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时的李文兵已无法回到过去正常收支的生活状态，他需要更多的金钱来维持现在的生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钱为了心爱的女人，他豁出去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医药行业里混迹多年的李文兵并非不知道他所出面套购的消咳灵和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实际上并没有被正常使用，略懂医药知识的他明白这两种药物里都含有一种特殊成分——麻黄碱，而麻黄碱与冰毒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从化学结构上看，两者甚至是“同门兄弟”，将含有麻黄碱的消咳灵和复方茶碱麻黄碱片分解制成冰毒的工序也并不复杂。毫无疑问，何通富等人就在从事此种勾当。尽管李文兵知道自己已沦为他们的帮凶，已是处在悬崖边上的人，但是巨额利润的驱动还是让他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他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我只是在贩卖药品，并没有违法，不算制贩毒”。就这样，始终心存侥幸的李文兵一步步走入了深渊。

2009年3月份，来自四川遂宁的符洪贵与李文兵有了一番赤裸裸的对白。“由你提供原料，我在成都有工厂，提出麻黄素卖了以后，我们三七分成。”



符洪贵如是说。"没问题。"早已尝到甜头的李文兵当即应承下来，为提防付洪贵在数量上做手脚，他提出把自己最信任的马仔黄勇安排到加工厂参与提炼工作。

2009年3月底，黄勇在李文兵的安排下前往符洪贵在成都市新都的毒品加工厂里工作，监督其提炼，短短五天时间，黄勇亲历该厂提炼出的麻黄素约50公斤，就这五天他收到了李文兵给他的10万元报酬。随后几天，黄勇发现工厂里提出了一种白色晶体状的东西，他慌里慌张地逃离了工厂，此后，给李文兵打电话说："他们是不是在提冰哟？这个东西千万碰不得，要杀头的，以后我们都跑不脱！"

此时的李文兵早已在这条路上迷失了自己，他轻描淡写地对黄勇说："不关事，只要你看一下，又没得啥子！"无奈之下，黄勇又回去守了几天。

然而，李文兵的好日子已经到头！

5月初，专案组民警将为丁显中大量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的重要嫌疑人李建华、罗聂凤抓获。审讯中，李建华供述了自己和弟弟李文兵通过租用成都、重庆、贵州等地多家医药公司资质，在湖北成城药业公司、新疆生化制药有限公司非法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数量达1315件的犯罪事实。6月7日，重庆彭水县，李文兵及其马仔黄勇等人被悉数抓获，和他一同被抓获的还有那个对他死心踏地、执迷不悟的女大学生。此后不久，涉嫌提取冰毒的符洪贵团伙在重庆落网，当场从其车上搜出冰毒8.5公斤，麻黄素14.5公斤，毒资220万元。

正如李文兵一样，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还有张正吉、张春艳两父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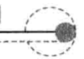
60岁出头的张正吉早年曾因抢劫被判刑4年，以前做过药材生意，目前无正当职业，在城郊有1幢3楼1底的楼房底楼开了间茶坊，平时没事就吆三喝六地在茶馆里喝茶打牌。赵丽凤、赵丽华、卢光吉等人经常出入茶楼，俨然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据点。茶楼后院一直紧锁，养了两条狼狗，有两三个人偶尔出入，行踪诡秘。屋内不时地还有刺鼻的味道飘出。专案人员经过暗中侦查，综合分析认为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制毒窝点。对张正吉女儿张春艳的调查，倒让专案人员有些吃惊：张春艳既是成都市金牛区某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董事长，又是"金凤凰"物流公司的总经理；她曾担任过四川省中江县12

届政协委员，也曾获得过全省“十大青年贡献奖”，绝对算得上是位“成功人士”。然而，张春艳和赵丽凤关系密切，赵丽凤从东北来蓉时，曾一度住在张家中。近期二人来往频繁。难道她也参与了制毒活动吗？她在这个制毒团伙里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专案组遂对其进行24小时的跟踪侦查。

作为从小县城出来的贫家女在大城市立足，张春艳付出了比别人多的心血和汗水，两次不幸婚姻留给她的一双儿女，坐牢后出狱的父亲张正吉都带给了她沉重的负担。她做过医药生意，跑过销售，做过物流，人情冷暖她体会很深。赵丽凤和她因做医药生意相识，因为性格相投，一来二往发展成亲密好友。今年5月，赵丽凤突然从东北来四川发展，前几个月就住在她家。此间，张正吉一直无所事事开始和朋友溜起“冰”来，还整日做着发财梦。一次，听茶友说现在套购麻黄碱药品卖很赚钱便想做此行当，并要她这个人脉资源丰富的女儿为他牵线搭桥。张春艳思量再三，考虑到这行利润大，也能让父亲做点事就答应了，并帮他联系买了三次150件复方麻黄碱片。偶然听得赵丽凤说她有这方面的路子，便决定直接跟她购买，在赵丽凤处她们购买了两次共200件复方麻黄碱片。

然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天，和张正吉一起溜“冰”的朋友王先验和张光辉提议：“现在‘冰’紧缺，价格贵，不如我们一起做‘冰’吧。”不久，王先验还把自己试制成功的冰毒拿给他看。张正吉再也按捺不住，把制“冰”的想法告诉了张春艳，立马遭到了张春艳的反对。制“冰”和非法买卖复方麻黄碱不一样，那是重罪，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张春艳对此非常清楚。但是这次张正吉非常坚决，居然甩下重话：“反正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做，你不帮我以后别认我这个爸”。过不了多久，张春艳发现父亲和张光辉、曾建忠等人买来几个不锈钢桶、循环冷凝管、蜂窝煤炉等东西放在茶坊后院，并四处打听具体的操作方法。事已至此，无奈之下，张春艳只得找来提炼麻黄素的流程图，并跟赵丽凤联系想直接购买麻黄素，帮父亲一把。张春艳不能肯定自己帮助父亲是否完全出自无奈，在制“冰”这件事上是否一点都没动心。毕竟巨额利润摆在那里，追求利润是商人的本性，更何况她的确穷怕了。

前几天，赵丽凤打电话来说已经帮她联系到了一批麻黄素，准备近日



交易。

经过几天的外围调查和内围监控，专案组已基本掌握了张正吉茶坊后院制毒窝点的情况以及赵丽凤、卢光吉、张春艳等人的行踪，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极有可能近日交易。关键时刻，王剑明带领专案组领导连夜赶赴成都并召开专案组会议，决定兵分四路，分别对卢光吉、赵丽凤、张正吉、张春艳等人进行布控，静待最佳时机，一举将这几个涉毒犯罪团伙全部歼灭。

7 月 7 日，一场透雨洗礼后的蓉城，天空清澈，微风习习。在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个居民密集的住宅小区里，晨练回家的人们三三两两穿梭在小区主干道上，一切都是那么安祥。一幢楼房门外，停着一辆小车，侦查员蜷缩在车内，静静地守候了一夜。连日来的全天候跟踪，已使他们的眼中布满血丝，但仍目光灼灼的注视着赵丽凤家的窗户。

下午 3 时左右，追踪的专案民警发现赵丽凤的姐姐赵丽华从海凌阁酒店提了两包用白色编织袋包装的东西出来，放在了赵丽凤的奔驰车尾箱后面。赵丽凤拿了一扎钱给赵丽华后开车离开了停车场。“狐狸终于行动了”两位专案民警彼此会意一笑，连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马上给专案指挥部汇报。指挥部指示：沉着应变，守住鱼饵。不久，专案民警发现赵丽凤开车接到张春艳，并把车停靠在了张正吉的茶坊门口。张光辉、曾建忠出来各提起一袋白色编织袋走进后院。指挥部果断下令：立即收网，人赃并获。早已部署妥当的专案民警立刻以迅雷之势破门而入，当场将赵丽凤、张光辉、曾建忠、张春艳抓获，缴获两袋净重为 23 公斤的麻黄素。抓捕现场，很多打牌的人都围观过来，却有一人想钻出人圈往外跑，眼尖的案侦人员立即将此人挡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此人正是追查已久的张正吉。

与此同时，专案组在另外两处展开突击行动。一队人马一举将长富新城小区内的卢光吉、赵丽华夫妇抓获，缴获毒资 171 万元，在其地下车库内查获麻黄素 800 克。另一队在青神县白果乡收网，一举捣获卢光吉设在茶厂内的麻黄素加工窝点，抓获了涉案人员卢中应、卢中斌，经查，该窝点一共生产了麻黄素 68.8 公斤。

专案组民警在对张正吉的农家院开展搜查时发现，底楼一个 100 平方米的房间内，地上摆满了装满化学原料的褐色瓶子和放原料的铁桶，一张桌子

上摆着大大小小的化学量杯、天平以及大量毒品分装袋和制造冰毒需要用到的浓酸、循环冷凝管，俨然就是一个生产化学品的车间。同时，在张正吉卧室、杂物间和麻黄素加工窝点分别发现了冰毒435克、麻黄素16公斤以及复方甘草麻黄碱药品100件，并发现1支手枪、2发子弹。与此同时，在与其相关的另一涉案人员处收缴到2支手枪、8发子弹。综合各方面的证据，张正吉的加工窝点就是制造冰毒的地下加工厂。这充分证实了这个犯罪团伙套购麻黄碱复方制剂、提炼麻黄素就是用于制造冰毒的终极目的，犯罪形态再次升级。这一重大发现震惊全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和省公安厅厅长曾省权、宜宾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杜紫平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宜宾警方的工作，并要求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最好的效果。

与何通富相关的各色人员相继落网，包括此前侥幸逃脱的何通富的儿子何涛。然而，何通富却仍然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此时，离展开案侦工作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专案组经受着巨大的考验。9月1日，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吴健亲自带队专程赶到宜宾指导，要求专案组“打好最后攻坚战，全力缉捕何通富”。专案组吹响最后的冲锋号。

10月1日，国庆大假刚开始，当国人沉浸在国庆的欢乐气氛之中时，专案组民警又踏上了前往成都、资阳的征途。国庆、中秋在即，何通富很有可能秘密和家人团聚，专案组不愿意放掉这个机会。然而，何通富并未现身。被取保候审出来的何玉娟、郭丽华生活一如平常，逛街、回家，和母亲即何通富的老婆丁某某、何通富的三儿媳等人一起聊天，一切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难道何通富真没跟她们有任何联系？这个老狐狸到底去了哪里？为了探得虚实，专案组对丁某某、何玉娟、郭丽华等人出示了刑拘令，并将何涛、何波写的信带给几个女人看，以便摧垮她们的心理防线。这一招果然奏效。她们开始漏出破绽，几个女人间有了口角之争。民警发现，郭丽华和何通富的三儿媳思想开始动摇，让母亲、妹妹劝父亲自首，而丁某某、何玉娟则坚决不同意。民警就此判定，丁某某、何玉娟与何通富肯定有直接联系，专案组锁定丁某某和何玉娟两人实施24小时跟踪。

两个组轮换休息，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那段时间，专案组民警



几乎是跟到哪里歇在哪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段时间，专案组发现，何玉娟买了两部新车，前期调查中何玉娟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一定是有人给她汇了钱，也就是说她的银行账户近期会有大笔现金往来，专案组分析。一查，果然，何玉娟的账户上同时有两笔大额现金汇入，打款人用的是同一张银行卡，且打款地就在成都，不用说此人就是何通富，何通富还在成都。这一发现无疑给疲惫不堪的专案民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不久，专案组顺藤摸瓜发现了何通富的踪迹，并获悉他将与一王姓男子见面，民警决定兵分几路全力追踪王某某，一举擒获何通富。

10 月 13 日，天空一扫连日来的阴霾，突然放晴。上午 9 时刚过，王某某出门，一脸平静地来到成都市九眼桥附近某条巷子喝起茶来。为防打草惊蛇，尾随而至的民警分别守在了巷子两头。冷不防，9 时 40 分，王某某突然骑一辆电瓶车冲出小巷，眼看就要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开车是来不及了，何况他如果穿小道，汽车是绝对过不去的。就在一瞬间，守在巷口的一名专案民警灵机一动，看见巷口有三辆摩的，且有一辆残疾人摩的，“残疾人摩的可以进城”，一念之下，机智的民警亮明身份，只身坐上残疾人摩的跟踪追击。一路上，电瓶车风驰电掣，一反常理地遇红灯就冲，遇绿灯就停下来观望，并多次穿过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紧跟其后的民警不敢有一丝麻痹，为死咬住他，有两次差点出车祸。终于，到九眼桥，电瓶车停了下来。王某某左顾右盼后抽起烟来。看来，他在等人。民警在不远处密切地注视着他，此时，其余专案民警也及时赶到，将九眼桥上上下下全部包围。时针滴答滴答走着，每一个办案民警的心都提到了心口上，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0 分钟后，一个看上去约 30 多岁的“眼镜”来到电瓶车前，和王某某嘀咕了几句，顺势坐上了电瓶车，两人绝尘而去。事不宜迟，分散在桥四周的民警，从不同方向汇集过来，跟踪而去。九眼桥下，只见电瓶车在一条路上来回骑了 3、4 次，突然，钻进了一条小胡同。紧跟其后的民警发现两人进了一个茶馆。不一会，“眼镜”离开。

茶馆内，王某某与一中年男人喝起茶来，两人似在密谋着什么。尽管中年男人刮过胡子，剪了头发，但不知在照片里看过多少遍、在心里默认了多少次的专案民警认定，此人就是何通富。没有挣扎，没有反抗，何通富束手

就擒，只是他没想到自己如此谨慎小心，终究没能逃过警方的法眼。审讯中，何通富对套购麻黄碱片、用麻黄碱单、复方制剂提炼麻黄素等行为分别构成何种罪说的头头是道，企图用了解的法律知识为自己减轻罪行。然而，他哪里知道自己的犯罪行为已为打击此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

至此，历经半年多的艰辛，足迹遍踏全国21个省、市，宜宾警方成功摧毁了以何通富、李文兵、符洪贵、张正吉、卢光吉为首的5个犯罪集团，捣毁了8个提炼麻黄素和制造冰毒的窝点，将一条集非法购销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提炼销售麻黄素、制造贩卖冰毒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彻底截断，成功地阻止了大量麻黄碱复方制剂、麻黄素流入制毒渠道。“4·08”专案全案告破。截止目前，全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85名，目前已逮捕45人，起诉45人，捣毁麻黄素加工窝点和冰毒加工厂8个，缴获麻黄碱类复方制剂44吨、麻黄素415公斤、冰毒955克，手枪3支、子弹10发、毒资1820.9万元、房产10套、车辆21台，合计收缴赃款赃物价值约8780余万元。“这些药片要是流入了非法渠道，将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和危害”，事后，一位专案民警这样说道。是啊，在这个案件中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全部将非法所得大肆挥霍，买房、购车、吃喝嫖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已经无法估量，而一当这些药片再制造成冰毒流入社会，势必是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灾难。

其实，本案的影响还远非如此，对于麻黄碱类药品的管理，至今国际上有一些管制呼吁，但都没有纳入国际管制，此案的成功侦破，无疑使我国在此类药品的管理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解决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性的难题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宜宾警方打了一个漂亮的禁毒仗。正如四川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吴健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这起案件的侦破是对全省、全国打击合成毒品案件前所未有的突破，是四川禁毒史乃至全国禁毒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公安部也发来贺电称：“4·08”专案是迄今全国破获单案抓获人数最多、涉及区域最广、缴获量最大的一起非法买卖麻黄碱复方制剂制造冰毒案，此案的成功破获彻底摧毁了一个特大制毒团伙，沉重打击了非法买卖麻黄碱复方制剂制造冰毒犯罪活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战果。“4·0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专案组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从1公斤几千元左右的麻黄碱片提炼出1公斤价值4万元的麻黄素，然后通过简单的脱氧反应制造出1公斤价值20万元左右的冰毒，其间的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无怪乎何通富全家30余人参与作案，又有那么多人近乎于疯狂地加入，更有张正吉、李文兵之辈冒天下之大不韪制贩冰毒，正如该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剑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毒品是万恶之源，让无数人丧失理智，也拆散了无数个家庭。打击制贩毒品是个世界性难题，尽管我国在涉毒案件方面量刑非常重，但仍然屡禁不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因为它的高额利润，使一个个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亡命天涯，我们的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案件的成功侦破，为规范全国麻黄碱类药品的市场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此，国家药监局专门出台《关于切实加强含麻黄碱复方制剂销售管理的通知》、《关于对生产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所需麻黄碱类原料药购用审批的指导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此类药品市场。

这一案件的全案告破，促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必将推动全国刑法修正案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其深远的影响和意义绝对大于案件本身。

3、直击重案：抓捕“金三角”大毒枭

这一天，注定值得云南警方庆贺；这一天，虽然来得有些晚，但必将永载中国禁毒史册。

2005年10月，混迹东南亚“金三角”十几年，长期向我国大肆输入毒

品的大毒枭韩永万被我国警方从境外押解回国。曾经不可一世的韩永万这一次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为了抓捕韩永万并押解他回国受审，我国警方已经等待了多年，并与多个国家的警方展开合作。

2006年6月，云南省昆明市人检察院以涉嫌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为由正式对韩永万审查起诉。

柚木惊现大秘密

早在2004年年底，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就接到重要情报，将有大批毒品从云南瑞丽边境进入，侦查员根据情报，截获了两辆从瑞丽开往昆明的厢式货车，并对车上装载的200多根进口柚木进行了彻底检查。

最终，在29根精心伪装有红色标记的柚木内，侦查员共查获220千克高纯度毒品海洛因。柚木质地非常坚硬，每一根都有100多千克重，很少有人会想到用柚木进行藏毒，从藏毒手法来看，这些柚木里面的空洞是用高精度的机床开凿而成的，藏在里面的毒品被压制成的形状和大小与木头中的圆洞贴合得天衣无缝，这样从外面进行敲击不会发出空响声；毒品藏好后，木头的两端又涂上了层层石蜡，这是木材商防止木头被虫蛀的常用方法，根本不易察觉，手法之隐蔽足见贩毒分子是何等的老练和处心积虑。

一次性发现这么多毒品，对于长期战斗在云南禁毒第一线的侦查员来说，他们马上意识到220千克之外的份量：200多千克毒品海洛因如果贩运到东南沿海和内地，市值最少在4000万元以上，普通毒贩是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大宗的毒品交易的。

不久，两名运送这批木材的货车司机接到货主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将两车木材交给另外的接货人用火车运往广州。指挥部决定将战场从云南延伸到广州，两名货车司机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行动。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的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公安部的批准。侦查员将查获的毒品放入打开的柚木中，重新伪装还原，让两名货车司机按照货主要求，将毒品交给昆明的接头人用火车运往广州。

两天后，货物安全地到达了广州市郊的石围塘车站，200多根柚木经过不同的接货人转了几手之后最终被转移到了两名操西北口音的男子手中，他们



对这批木材进行了检查并办理了提货手续，半天后，他们将这批木材运到了广州市郊区江下村一处偏僻的仓库里。

晚上8点多钟，当两名男子携带电锯、斧头准备打开木头取出毒品时，来自广东、云南的办案民警马上对仓库进行了突击行动，当场查获了隐藏在木料中的毒品海洛因220千克。为了寻找这宗毒品的接货人，挖出幕后的“买家”，侦查员从云南边境地区辗转数千公里一路追踪来到了广州。然而，对于整个案件来说这批木料中的毒品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幕后买家、卖家浮出水面

在广州的这次联合行动中，警方当场抓获了两名接货人，一名叫马有文，青海省民和县人；另一名叫马清元，宁夏同心县人。那么这么大一批毒品究竟要卖给谁呢，到底是谁有能力贩卖数量如此巨大的毒品呢。警方只有揭开这个庞大的贩毒网络和通道，才能抓到隐藏在幕后的“买家”和“卖家”。

此时案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幕后的老板。然而两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的幕后老板始终闭口不谈。不久，专案组接到从云南传来消息，瑞丽边检站在边境地区抓获了马清元和马有文的两名同伙，两人交代他们的幕后老板也就是购买这批220千克毒品海洛因的买家就潜藏在甘肃。

在公安部的协调下，云南省和甘肃省的公安边防总队的办案人员在兰州会合后，迅速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全力追踪隐藏在背后的“买家”。

通过调查两名接货人的社会关系，警方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50多岁的甘肃人身上，这个人叫田玉来。

事不迟疑，专案组马上展开抓捕行动，在宁夏银川将闻讯逃跑的田玉来抓获。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起来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男子竟然是西北地区一个特大贩毒团伙的头目，在他的手中控制着一个连接云南、广东、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庞大贩毒网络，这也说明我国西南边境的毒品正悄悄地向西北地区渗透。

根据田玉来的交代，云南、广东、甘肃三地警方的办案人员在广州一举将田玉来在广东的“下家”——“肥佬”抓获。“肥佬”，原名郑泽川，广东汕头人，他所控制的贩毒网络遍及广东，部分毒品经郑泽川的网络通过香港

再流入海外。

在这样一个走私链条中，巨额的暴利是驱使贩毒分子铤而走险的巨大动力，犯罪嫌疑人田玉来以每千克 4 万到 8 万元不等的价格从缅甸毒枭手中购买了这批毒品海洛因，经过汽车、火车层层转手后运到广州，价格已经翻了三到五倍，田玉来再以每千克 20 万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广东的“下家”郑泽川和西北几省区的“下家”，广东的“下家”和西北的“下家”再通过他们建立起来的贩毒网络层层分销，向下每延伸一层，毒品价格都会成倍地增长。

这么多的毒品到底来自哪里呢？幕后的毒枭成为了这起案件未解的悬念。种种证据表明，这一特大贩毒网络的所有毒品都来自缅甸“金三角”地区的一个大毒枭之手，他叫韩永万，被称为“毒枭之王”，混迹于金三角地区近 20 年，2005 年被我国警方列为头号毒枭，悬赏 10 万元通缉，中老缅泰四国警方的合力追捕，却始终未能发现韩永万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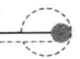
“毒枭之王”屡屡作案

本着“擒贼擒王、抓团伙、打毒枭”的缉毒思想，警方认为只有抓获贩毒集团的核心人物，摧毁他们建立起来的贩毒组织才能有效地遏制毒品走私的势头。2001 年，中缅警方联手抓获了震惊中外的大毒枭谭晓林；2004 年至 2005 年，我国警方又相继抓获了公安部公开悬赏通缉的 5 名大毒枭中的刘招华、马顺苏二人，这些大毒枭的落网，沉重地打击了境内外贩毒组织对我国的毒品输入，收效显著。

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的调查资料显示，“金三角”地区特别是缅北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这起案件的终极目标韩永万正是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大毒枭。

一份罪恶档案上记录着他的“毒迹”：韩永万，云南省陇川县人，17 岁时只身一人来到缅甸，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行贩卖毒品生意。生性自负的韩永万在缅甸做的第一笔毒品生意竟然是多达一吨的鸦片，从此后他开始名声大振，韩永万还豢养了大批的私人武装，狠毒与狡诈使他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了缅北“金三角”地区贩毒网络的核心和枭首。

长期以来韩永万就隐藏在缅甸和老挝的边境地区，大肆向我国境内贩运



毒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韩永万已经成为缅北地区危害我国最严重的大毒枭之一，抓捕韩永万已经成为专案组的首要目标。

在警方出示的毒枭档案中，韩永万早已是罪行累累：2000 年 3 月，韩永万等人从缅甸组织海洛因 269.5 千克，运入我国，被我禁毒部门查获；2000 年 12 月，韩永万等人再次从缅甸组织海洛因 85.5 千克，运入中国贩卖，被云南德宏警方查获；2001 年韩永万在缅甸组织海洛因 186 千克进入我国，被我禁毒部门查获。然而这些只是韩永万众多贩毒事实中的一部分。

据介绍，韩永万一直在境外从事贩毒活动，公安机关也一直把他作为首要目标，但每一次都让其逃脱，因为他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反侦察能力也很强，为人比较低调，心计比较多，非常狡猾，所以一直都没有抓捕归案。

常年在境外活动的韩永万，从不轻易入境我国，这成为了抓捕这名毒枭的最大难处。

发生在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毒品大案，绝大部分都是跨国贩毒，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禁毒部门打击跨国贩毒的重要手段。

多国警方联手擒顽凶

近年来我国禁毒部门积极与联合国禁毒部门、东盟、以及欧美国家的禁毒部门展开了广泛合作。早在 2005 年，我国与东盟各国确定了在本地区开展禁毒合作的战略和措施；加强了同缅甸、老挝、泰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禁毒合作，特别是在办案协作、缉毒培训、打击境外毒枭和贩毒集团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协助泰国等国警方抓获了他国警方通缉的毒犯，这些都为抓捕大毒枭韩永万和进一步加强禁毒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很快，寻求多国合作，联手抓捕韩永万的方案初步形成并上报公安部，抓捕随时都将进行，警方只等最佳抓捕时机的到来。

2005 年 8 月，云南警方截获一条重要情报，大毒枭韩永万雇用了缅北地区一个叫“老黑”的贩毒头目，准备将一大批毒品从缅甸的邦康武装押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其力进行贩卖，警方认为，这次转运毒品的行动是抓捕大毒枭韩永万的最佳时机。

我国警方立即与缅甸警方联络，向缅方通报了案情，提出了通过国际禁

毒执法合作打击这批毒品的意见。

8 月下旬，由我国多个部门组成的 7 人工作组秘密进入缅甸的景栋市。中缅警方在景栋汇合之后组成了中缅联合工作组，秘密对从邦康到大其力沿线地段的主要公路都进行了实地勘察，初步选定了堵截伏击的地点。

由于“老黑”手下的贩毒人员持有重武器，火力强大，为确保万无一失，缅甸政府军派出了 3 倍于对方的兵力协助中缅联合工作组堵截这批毒品。

9 月 10 日下午，在缅甸政府军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老黑”贩毒团伙被迫缴械投降，缅甸禁毒部门的执法人员当即从四辆车上查获毒品海洛因 496 千克。缅方还当场缴获了贩毒团伙的枪支 36 支，火箭筒 6 具，手榴弹 33 枚，各种子弹数千发，一个庞大的武装贩毒团伙被彻底摧毁。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冲昏中缅联合专案组的成员们，他们把目光盯上了首恶分子韩永万。当联合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昼夜兼程赶往韩永万的藏身地大其力的时候，韩永万刚刚离开一个小时。原来韩永万得知自己组织贩运的毒品被堵截，“老黑”被抓的消息让他顿时感到大事不妙，驾驶摩托车慌忙逃窜。狡猾的韩永万并没有选择离他最近的泰国，而是翻越了连绵的群山潜入到老挝境内。

公安部传来指示，要求专案组马上追击韩永万，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联合专案组翻山越岭抄近路赶到了老挝，然后沿湄公河快速追击，当专案组赶到琅勃拉邦时，他们再次与韩永万擦肩而过，韩永万刚刚从这里离开。

此时已是惊弓之鸟的韩永万，马不停蹄，逃往了老挝东部的川圹省尚乃村藏匿，这里距离越南西部仅一步之遥，种种迹象显示，韩永万准备逃往越南，追捕组立即将情报通报给老挝警方。

就在韩永万包租的小型飞机刚一起飞时，就被老挝警方控制并实施空中管制，迫降在老挝琅勃拉邦机场，亡命天涯的大毒枭韩永万最终也没能逃脱中、缅、老、泰四国警方联手织就的天罗地网。

2005 年 10 月 2 日经中国、老挝和缅甸警方协调，大毒枭韩永万被移交给我国警方，韩永万在缅甸组织贩买的 496 千克海洛因也交由我国警方处理。

毒枭不绝，毒品不止，韩永万不会是最后一个落网的毒枭，因为“跨境



犯罪”并不代表“逍遥法外”，金三角曾经是他们罪恶的起点，更是他们生命的终点。

1、北京警方重拳砸向涉毒迪厅

那是2006年国际禁毒日当日的凌晨，北京警方根据可靠线索，全副武装的特警携带缉毒犬，突袭了位于北京市朝外大街上著名的“高速迪厅”，警方的到来让现场一片混乱：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客人，都吓得四散而逃，最终警方当场查出32名吸毒人员，其中除了客人，还包括该迪厅的部分领班、保安和服务人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4天前，迪厅的法人代表刚刚与警方签订了《娱乐场所禁毒责任书》。

当天零时，北京市公安局禁毒部门获得线索，位于朝阳区朝外大街12号的高速迪厅内有人聚众吸食毒品。禁毒部门会同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立即展开调查，同时迅速调集了武装特警、朝阳公安分局的民警随时待命。刑侦总队警犬侦查训练大队缉毒犬也被紧急调遣至现场。通过秘密观察，警方确定迪厅内确有聚众吸食毒品的迹象。

2时30分许，行动正式开始。武装特警率先冲入迪厅，立即封锁了迪厅所有出入口。

此时，迪厅内正播放着震耳欲聋的“迪曲”，数十人随着音乐扭动身体，其中有些人动作夸张，明显呈现出吸食毒品后的兴奋状态。见到大批警察后，这些人仍无动于衷，继续跳舞。警方随即中断音乐，此时他们才发现不妙，一些心虚的人企图逃跑，警方将所有人控制，立即进行尿检。经初检，有32人尿样呈冰毒、氯胺酮等毒品阳性。警方调用缉毒犬搜索现场可能藏匿的毒品，但对这些人所在的包间、随身物品进行细致搜查后，并没有找到毒品。警方随后扩大搜索范围，在迪厅办公区的一个衣柜附近，缉毒犬突然趴在地上示警。民警打开衣柜搜查，发现了一包白色可疑物。据了解，该衣柜是该迪厅一名保安使用的。

在对“高速迪厅”的处理结果上，北京市禁毒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自6月22日全市1100余家娱乐场所法人代表与警方签订《禁毒责任书》后，高速迪厅的法人代表白瑞明“仍疏于场所从业人员的禁毒教育，不充分履行禁毒责任，将受到相应处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普查和抽查力度，一旦发现场所内涉毒，将依法予以严厉处罚。

另外，警方希望市民在发现娱乐场所涉毒的线索时，能主动与警方联系。举报线索经查属实，警方将给予举报者最高1万元的奖励。

据北京警方介绍，突查娱乐场所将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北京将打防结合，真正将北京娱乐业打造成阳光娱乐场所。

5、山村民房惊现湖南制贩K粉第一案

湖南一特大制造贩卖毒品K粉的犯罪团伙被株洲警方彻底摧毁，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收缴毒资40余万元，K粉成品4000余克，以及大量半成品和制毒原料。

初中生在山林制造K粉

湖南省株洲市警方在市区娱乐场所暗访调查时获悉，近期本地可以买到每克100元左右价格便宜的K粉。从以往破获的涉毒案件中得知，株洲的K粉大多是从广州等地贩卖过来的，几经转手卖到吸食者手中价格高达每克200元至300元左右，为何会出现如此价格低的K粉呢？其中有何蹊跷？

同时，长沙、湘潭警方也向株洲警方发来协查通报，近段时间两市侦办的贩卖K粉案件中反映，部分K粉来自株洲，且地下交易价格相对便宜。

反常现象引起了市公安局有关领导的高度警觉，民警们在日常工作中秘密展开侦查。随后，在办理一起贩毒案件中，民警追问毒品来源时获悉，毒品K粉来自于本市一刘姓男子手中，而刘某又是从一个叫“凯宝”的男子手上买的，并且“凯宝”曾自称“货”是他自己做的，并拍胸脯保证“质量不



比广州货差”。

株洲出现如此批量制造毒品现象前所未闻，这一线索到底是真还是假？

“有情况就绝不能放过，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接到报告后的市公安局局领导当即要求禁毒民警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秘密进行深入调查。

民警们随即围绕“凯宝”展开调查，调查得知“凯宝”真名鲁艺，现年32岁，家住荷塘区红旗村。根据其活动规律及其行踪，警方发现鲁艺除了与其母在红旗村有一套房子外，还在荷塘区大坪路和芦淞区体育路各有一套租房，而且他还经常前往位于株洲县仙井乡一个小山村里的一栋民房。

通过实地秘密查看，警方准确获悉，株洲县小山村里的那栋民房原来正是鲁艺制造毒品K粉的窝点。他在民房内用原料配制成K粉半成品后，转移至市区体育路租房内进行简单加工，再将成品K粉转至自己家中藏好，然后分批分量贩卖牟利。

鲁艺只是一个仅具有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他是从哪里学会制造毒品K粉的方法呢？他制造K粉的原材料又是从哪里购买的？他制造的K粉又通过什么渠道外销？围绕这一系列的疑问，民警们展开大范围的摸排。根据鲁艺账户银行汇款情况，民警们掌握到四川一名自称“老王”的男子向鲁艺提供了制造K粉的技术，而原材料则是从浙江的某贸易有限公司所购。同时警方查出，其制毒所需的工具是由本市一家专营化工器皿的经销店提供。

贩销网络则更加庞大，与鲁艺直接联系的“下线”就有6人之多，再经过数十人的层层转卖，销往本市、以及长沙和湘潭等地的娱乐场所，甚至远销至广州等地。

通过一个月左右的艰苦、秘密侦查，6月12日，以鲁艺为首的特大制造贩卖毒品K粉的犯罪团伙逐渐明朗，警方较全面地掌握了该团伙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及其制造、贩卖毒品的网络构成情况。

这是株洲市发现的首例制贩毒品的团伙犯罪，且制贩K粉数量巨大，参与人员众多，还涉及株洲市的四区以及株洲县。案情重大！在听取案件专题汇报后，市公安局领导要求：一定要全力侦破此案，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彻底摧毁整个制贩毒网络，坚决扫除这个“毒瘤”！

主犯鲁艺成功归案

“6·12”专案组很快成立了，从相关单位抽调70余名民警组成了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一张无形的缉捕大网悄悄铺开……

2006年7月21日，专案组获得线索，该团伙正准备交易一批毒品。就在专案组准备采取行动之际，狡猾的犯罪分子似乎有所警觉，取消了交易活动。专案组也当即将计就计，按兵不动，继续集中备勤严阵以待。

7月24日晚，专案组再次获悉：主犯鲁艺携带刚刚制好的K粉半成品已从株洲县窝点返回市区，并与“下线”约定交易K粉。这是人赃并获的绝佳时机！当晚，有关负责人带领70余名民警分成6个抓捕小组，先期赶至各自指定地点待命。

“行动!”7月25日凌晨5时50分，随着专案指挥部一声令下，专案民警迅速展开抓捕行动。早已掌握主犯鲁艺行踪、在芦淞区天华宾馆前守候多时的专案民警一行数人当即进入宾馆，直奔206房间。“砰!”民警们破门而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在睡梦中被惊醒的鲁艺仅仅只“啊”了一声，就被民警们死死按在床上。

经突审获悉，其体育路租房内正住着与他一起制造毒品K粉的袁崭鸿。民警们随即拿起鲁艺身上的钥匙，赶至体育路某小区内，用钥匙悄悄打开租房门，将睡在卧室里的袁崭鸿抓获，并收缴K粉70余克，以及小型搅拌机、干燥箱等制毒工具。

民警向涛等人则在鲁艺的荷塘区红旗村家中，从卧室内缴获K粉成品3400克；民警们还在鲁家厨房内的灶台下搜出鲁艺在外地打工时偷回家中私藏的12千克炸药和雷管50枚。同时还在荷塘区大坪路的租房内，缴获了大量用于制毒的工具和器皿，以及部分原材料。

团伙成员悉数落网

为鲁艺制毒提供工具的廖海涛刚刚从保利花园一朋友家打完麻将，下楼准备开车回家时，被蹲守多时的民警逮个正着。



在株洲县方面，十余禁毒民警名民警将参与制毒的该团伙主要成员张加仁的家团团围住。张的父母见状一边阻挡民警，一边大声叫喊“我儿子不在家”，示意张加仁快逃。民警们最终将绻缩着躲藏在猪圈边的张加仁抓获，可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张家仁，并直呼“冤枉”。“张加仁！老实点！”认识张加仁的当地派出所管区民警一声断喝，让张加仁现了形。随后，民警们来到离张家200多米远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找到了那栋租来制毒的平房土屋，只见窗户被麻袋紧紧封闭着。在屋子里，民警们查获大量的制毒原料，制毒用的玻璃烧杯、漏斗等器皿。

刘湛是该团伙中贩卖外销K粉的“得力干将”，下线众多，对摧毁该团伙贩卖网络有着关键性作用。抓捕刘湛，专案组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刘湛有一台私车，专案民警决定以车找人，可是从7月24日至7月25日，专案民警在刘湛经常出现的天鹅花园租房、公园路的家门口守候，却一直没有发现刘湛的影子。最后民警决定还是从鲁艺身上打开缺口，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鲁艺答应协助抓捕刘湛，将功赎罪。

7月25日下午，民警们认为刘湛一定会主动来找鲁艺，当即要鲁艺打开了自己的手机。下午4时左右，鲁艺的手机响起，正是刘湛打来的，“你这个死鬼在哪里？手机又不开机，害得我找得好苦。”“哦，昨晚好累的，我在睡觉，刚起来的。”“好多人找我要货，我现在比较着急。”民警们当即示意鲁艺将刘湛约至天华宾馆拿货。

不一会儿，刘湛就驾车赶至天华宾馆。躲在房间里守株待兔的民警从房间猫眼里确认按门铃的男子正是刘湛后，当即打开房门，一拥而上将还没回过神来的刘湛扑倒在地。

当天，贩卖头目之一胡某在荷塘区某单位宿舍内被民警抓获，另一头目李某在河西保利花园家中落网。专案民警还在石峰区响石广场附近一宾馆里将贩卖头目刘某逮住，在荷塘区某单位内将程某抓获……

目前，警方共抓获参与贩卖、吸食K粉团伙成员20余名。

技术方、供货方相继伏法

打贩毒团伙，摧贩毒网络，必须追查其“上线”。根据鲁艺的交待，民警

们得知其制毒技术是其一个网友所传授的，而鲁艺也只知道对方自称“老王”，俩人从未谋面。民警们通过查询发现，“老王”真名王进章，实际只有26岁，系四川省彭州市人。

8月1日，专案组民警赶赴四川。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们进一步确定与鲁艺联系的“老王”是王进章，可王一直未回家。根据王喜爱上网的特点，民警们于是在网吧寻找王。8月8日下午6时许，在彭州警方的配合下，民警们获悉王进章在该市城郊接合部的一网吧里出现，迅速赶至将其抓获。王进章一听是湖南来的警察抓他时，叹息道：“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找我的。”

专案组另另一路人马则前往浙江宁波，抓捕为鲁艺制毒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根据鲁艺交待，其所购的原料均是从一家名为某贸易有限公司所购，公司负责人为孙明。在浙江省兹溪市警方的配合下，民警们查明某贸易有限公司早已在2004年注销，实质上是一个空壳公司，所谓的负责人孙明系河南人，他早在几年前就来到宁波打工，后来专门从事化工原料生意。获悉孙明刚买的一台马自达轿车正在该市周巷镇一修理厂维修，民警们当即在修理厂附近设伏，可等了四天四晚也未见孙明出现。很快，当地警方获悉孙明正在该镇一宾馆里，警方迅速赶至宾馆将其擒获。

经突审，孙明交待，为鲁艺提供制毒原料的另一名男子叫何辉，是其好友，安徽省蒙城县人，外号“黑皮”，现也在镇上。当晚7时许，何辉与其女朋友从某宾馆出来时，被民警们抓了个正着。

至此，这一特大制造贩卖毒品K粉的犯罪团伙被株洲警方彻底摧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收缴毒资40余万元，成品K粉4000余克，以及大量半成品和制毒原料、工具。

财迷心窍终走绝路

据调查，犯罪嫌疑人鲁艺自幼丧父，案发前几年曾贷款20万元开了一家饭店，后因经营管理不善，亏本关门，为了躲债，他在外流窜了四年，后见风声已过，又窜回了株洲。整日无所事事的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赚大钱，一次在与朋友的闲聊中，得知现在吸食毒品K粉成了一些青年人的时尚，而且K粉很紧俏，价格又贵，他就萌生了制造K粉牟取暴利的念头。



正是在这种贪念的支撑下，他很快结识了网友王进章，并在王进章的授意下学会了制造毒品K粉的方法。他于是找到宁波的孙明，从其手中购买制造毒品K粉的化工原料，并在荷塘区大坪路专门租下一套房子，开始制造K粉。成功试制几次后，因为制造K粉的过程中会散发出一股类似油漆的刺鼻气味，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一个月后，他又将阵地转移到芦淞区体育路的一栋居民房的顶楼，进行批量生产，并叫来好友袁崭鸿，要他帮忙一起制作K粉，并承诺每加工一次给1000元的工资。

为了及时将生产出来的K粉外销出去变为钞票，鲁艺于是找到“门路很广”的刘湛，承诺比“广州货”低一半的价格将K粉卖给刘湛，见有如此好事，刘湛当即一口应允，随后，胡某、李某、程某等人也闻讯而来，相对固定的贩卖网络逐渐形成。

因为每次K粉的交易都是在体育路租房附近，鲁艺既害怕“下线”被抓，自己的“窝”被端，也害怕制毒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异味会引起居民的怀疑，他再次决定转移生产地点。可搬到哪里去最安全呢？何不到乡下找一个人口稀少、难以被人察觉的地方？他第一个想起了株洲县乡下的表哥张加仁，于是他要表哥张加仁在村里租了一栋位置比较偏远、座落在半山腰的平房作为“生产基地”，每到深夜12点，就紧闭门窗制造毒品，制成半成品后再拿到市区加工成成品，然后分装卖出。经不住诱惑的张加仁随后也加入到了制毒行列。因为相当隐蔽，加之当地很少有人到山上去，就是偶尔有株洲当地的村民全然不知散发出来的异味是制毒所产生，还以为是山上土地庙中燃烧的香烛变了质的原故。

就这样，鲁艺从宁波孙明及其朋友何辉手上购得的数十千克原材料后，先后加工制造出10余千克K粉，其中近7000克是通过刘湛等人贩卖，流入本地及长沙、湘潭等地，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的鲁艺告诉笔者：“我知道，我制造K粉迟早会被抓的，可我就是抵制不住诱惹，我太想钱了，想得都要疯了，也不想一心一意干实事赚钱。而且还把自己的好友、表哥带上了犯罪道路，还牵连了可怜的母亲，真的很后悔呀！可现在后悔已经迟了……”这真是印证那句古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8 月 28 日，该团伙的 12 名成员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女边防战士虎穴卧底

在查处贩毒案件中，由于贩毒团伙往往具有黑社会性质，穷凶极恶，与这些犯罪分子周旋，不仅要机智勇敢，更要有极强的耐力和超人的胆魄。打击贩毒，跟战场上的殊死搏斗不分两样。由于危险无时不在，很多女同志都望而却步，女侦查员更是奇缺，但在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侦查大队，却有这样一名经常卧底毒穴、敢于孤身犯险、驰骋于缉毒战场上的女中豪杰。她就是海南公安边防总队刑侦大队的女侦查员王婷。

早在 2006 年 8 月 8 日，王婷就被全国公安边防部队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边防卫士”。

蹲守 12 小时不动弹

2003 年 8 月，边防总队刑事侦查队因案情需要，要借调 3 名坚韧而又精干的女兵参加案件侦破工作。经领导多次讨论，大家一致推荐王婷。

2004 年 7 月，王婷再次被抽调到侦查队，这一调就是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参与侦破了一宗又一宗轰动海南的毒品大案。

刚到侦查队，王婷还不懂任何侦查知识，更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性格活泼开朗的她勤学好问，侦查队里的人都很喜欢她，每个人都把她当作是小妹妹一样关心教导。在大家的呵护指导下，王婷渐渐在实践中学会了跟踪侦查和犯罪分子周旋的技巧，并成为队里一名侦查能手。

2004 年 8 月，王婷受命参与“8・09”贩毒案的侦破工作。经过艰难的侦查，收网抓捕的时机终于成熟。为了不暴露目标而又得到准确情报，抓捕组决定派一人到嫌疑人居住的小区内监视。派谁合适呢？王婷毛遂自荐站了出来。队长经过认真考虑，最后把任务交给了她。

王婷从下午 6 点一直守到午夜 12 点都不见嫌疑人的踪影。为了不惊动小



区保安和引起居民的注意，她毅然钻入花园并潜伏在花丛下。海南的夏季蚊子猖狂，躲在花丛下的王婷很快就成了蚊子的攻击对象，全身被蚊子叮满了疙瘩。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目标终于出现，已经守候了12个小时的王婷立刻向队友发出了抓捕信号，任务顺利完成。当大家把双腿麻木、动弹不得的王婷从花丛下面扶起来时，发现她浑身上下血迹斑斑，胳臂、腿上、脖子上，甚至连手上脸上已没有一块不肿的地方。从此，刑侦队的同志更是对她刮目相看。

勇闯进毒贩房间摸底细

与王婷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无不被她的机智所折服。她擅长化装，又善于随机应变。

2005年初，侦查队获得重大情报：有一个从广西来的贩毒团伙在海南进行大肆贩毒。据侦查，其毒品都是从越南贩卖过来的，涉案毒品数量大，团伙人员多，内部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是一个跨国性质的贩毒团伙，交货手段非常隐蔽。几名狡猾的首要分子整天躲在房间里，除了出去跟其他毒贩进行毒品交易外，从不外出活动，侦破难度很大。

侦查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代号“1·17”案。由于这次任务非同寻常，总队指定王婷在此次侦查活动中扮演主角，任务就是利用化装等侦查手段密切掌握犯罪团伙的动向。

为了尽快破案，王婷先后化装成酒店工作人员、干洗店店员，或在明处，或在暗处进行密切监视。

一次，王婷化装成干洗店的店员，给贩毒分子送衣服时，几名主要疑犯正在房间里袒胸露背地打牌，房间里弥漫着呛鼻的烟味、酒味，并发出阵阵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面对这种场面和毒贩凶狠的目光，王婷深吸一口气，镇定地扫了这伙人一眼，记下了这4人的相貌特征。

此时，王婷脑海里又闪过一个念头：除了这4人，还有没有其他同伙呢？当其中一个人递过一百元付干洗费时，她灵机一动，说自己忘记带零钱，给钱的人转头问了一下其他3人，结果都没有凑够，并没有再问其他人了，她

马上意识到屋里可能没有其他人了。为了进一步得到证实，王婷说钱不够下次再补上，并顺口问了一句还有没有衣服要洗，边说边探身偷偷环视了一下里间，她灵巧的举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最终确定房间里没有别的同伙，就这样，她机智地掌握了这个团伙主要成员的情况。

王婷将掌握的情况不断传给侦查队，很快这个团伙成员的行动就被侦查队顺藤摸瓜全部摸清了。王婷的这次深入毒穴侦查为震惊海南的“1·17”案侦破立下了汗马功劳。

卧底被认出巧脱险

众所周知，贩毒分子个个都是穷凶极恶，卧底毒穴，无异于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卧底露馅，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最能考验侦查员的时刻，不仅要有敢于孤身犯险的胆色，更要有滴水不漏的机警。

“4·19”案件是海南建省以来破获的首宗贩卖毒品种类最多的特大贩毒案，案中的海南本地毒贩党羽众多，对周边地区的情况十分熟悉，要想实施有效地打击，难度很大。侦查队充分利用主犯刘某社会交往糜烂的弱点，让王婷和另外一名女侦查人员化装卧底成曾与刘某一起吸食过摇头丸的朋友，引蛇出洞。

2005年4月29日，王婷两人主动与刘某联系，刘某心花怒放，并邀请两人到文昌一起吃摇头丸，到了文昌，刘某派弟兄来接王婷两人。但当她俩一上车，王婷顿时惊呆了：开车的司机竟是与自己同一个村的徐某。

徐某一看是王婷，十分惊疑地问：“你不是在当兵吗，怎么会在这里?”危机关头，王婷很快镇定住了自己。她急中生智，反客为主上前打招呼说：“徐哥，亏咱们还是同村的，我退伍在海口打工一年多了你竟然还不知道!”徐某被王婷这么一反问，就没有再追问了。

接下来，意外情况又发生了。狡猾的毒贩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路线行驶，王婷与接应的同志失去了联系。究竟要到哪里去，毒贩是不是闻到了什么风声？王婷二人一路忐忑，并想尽办法向司机询问。可司机受了刘某的指使就是不说。终于快到目的地时，王婷才在与徐某的对话中套出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并快速编辑短信告知了接应的队友。



在进了 KTV 包厢，见到了刘某等人后，王婷两人又几次险象环生。刘某两次要王婷跟他一起吃摇头丸，都被王婷以倒酒、含在嘴里假吞等方式，巧妙避过。正当刘某再次要求王婷用吸管吸食 K 粉时，王婷借吸烟推托后，侦查队的同志破门而入，将正在包厢吸食毒品毫不设防的刘某等十几名毒贩一举抓获。至此，海南自建省以来贩卖毒品种类最多的团伙被一网打尽，震惊海南的“1·17”毒品案圆满画上了句号。

7、毒枭的子弹已上膛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及危险性，缉毒警通常被人誉为“刀尖上的舞者”。

在电影电视里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从事毒品交易的人都携带枪支，碰到警察后就展开枪战，每个警察都会面对生死考验。这些场景不仅仅出现在电影里，现实中的禁毒工作就是这样，因为贩毒大多面临杀头的危险，那些毒贩子也知道，只要被抓住，他们就完了，所以碰到警察后，他们会丧心病狂地拼个鱼死网破，所以，每个禁毒警察都要面对这种危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张川（化名）的话来说，碰到带刀的是正常不过，带枪的更是司空见惯。

因为在每一个毒贩看来，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断头路，求生的欲望让他们随时都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张川就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张川和战友在一起围剿一毒枭的战斗中发生的。当时警方在工作中通过调查发现，银川地下毒品市场有一个大毒枭名叫刘会桥，绰号“猴子”。此人控制了银川地下毒品市场的 50% 份额，连他手下的“马仔”在每次出货时也绝对不会低于 5 克，是典型的“批发商”。“猴子”为人行踪不定，联系方式绝对机密，他用贩毒赚的钱购置了一辆高档轿车和一处房产，还包养了多个情妇，此外，他还在市区多处租了房子，没人知道他每天在哪里过夜。

在经过大量的调查以后，警方终于掌握到一条重要线索，“猴子”要去成

都进货。警方当即决定在其回来的路上，在国道入银川收费站设卡拦截。同时警方还了解到他随身带有枪支，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防止其冲卡和开枪拒捕。

果然不出所料，“猴子”的车辆如期出现在银川收费站，但是他并没有停车，因为当时“猴子”看到有两个人站在前面，尽管穿着便衣，他还是有了警觉。他掏出10元钱，不要票据就加速过卡，而此时，就在他减速交钱的那一瞬间，守候在前面的民警迅速架设阻车钉，将其去路拦住。几乎就在同时，躲在后面的民警冲上前去，拉开车门，数支枪管同时顶到了他的头上。张川看到，在“猴子”的右手边，放着一把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8、与绑匪生死鏖战的310分钟

莫继东没有想到，平常经常从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一幕会真真切切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只是这一幕更加惊心动魄：锋利的尖刀架在两岁小孩的后背上，劫匪劫持人质达13个小时，由于人质年龄太小，加之高度紧张，人质时而啼哭，时而昏睡，几近虚脱，劫匪还是一名吸毒成瘾人员，毒瘾发作的他随时都有可能对人质下手……

莫继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教导员。他没有退让，因为他是一名缉毒警，家属揪心的呼恸，群众期盼的眼神，战友信任的目光，让他觉得天职与使命的份量。

2011年9月8日凌晨的惠农城区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前显得很静寂，而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当天，莫继东在区公安分局值总班，根据带班长的安排，他从7日晚上10点30分开始到分局各实战部门督查值班情况。8日凌晨1时许，疲惫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值班室，在整理好督查记录正准备休息时，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警察的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这个时候来电话，一定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是带班长石慧萍打来的，听筒里传来石慧萍急促的声音：“时代商贸城发生恶性劫持人质案件，听说绑架者是个吸毒的……”

放下电话，莫继东的脑海中马上想到商贸城在惠农区南街社区，那是一个较繁华的闹市区。来不及细想，莫继东立即开车和值班领导公安分局副政委石慧萍赶到了现场，边开车莫继东还在想，绑架者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实施绑架？绑架者想得到什么？

就在边开车边思索的过程中，莫继东和副政委石慧萍很快到达事发现场。虽说只是凌晨一点多钟，但在绑架现场四周已经围了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最初赶到的警察已经在劫持现场四周设置了警戒线，由于身处黎明前的黑暗，加之现场紧张的气氛，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似的。

据随同绑匪一同赶到的内蒙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叫王玉新，原籍石嘴山市惠农区人，9 月 7 日流窜到内蒙古乌海市，在乌海市海渤湾区获取毒品后，找了一个小旅馆进行吸食，随后出现幻觉，当晚 7 时左右，王玉新在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从一个修鞋的摊子上抢了一把割皮革的尖刀，见一年轻妇女骑着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一名小女孩，他不由分说冲了上去……

由于犯罪嫌疑人手持割胶皮革的尖刀，并且尖刀始终对着小孩的脖子，警方未敢贸然行动，并且在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下，警方载着他回到了离乌海四十多分钟的惠农区……

“王玉新？”当莫继东一听到这个名字后，他显得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种兴奋如同警察冲锋前的本能。“那个人我打过交道！”在听完内蒙警方的介绍后，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让他几乎脱口而出。

话音刚落，现场的战友眼光一下子投向了他，仿佛看到了救兵。莫继东简单向战友介绍王玉新的情况，曾经与他交往的一幕幕急速在脑海中显现：王玉新自从 2003 年开始吸贩毒后，他先后与其打过 10 余次交道，今年的 2 月，王玉新 70 多岁的母亲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还找过他，当时，他从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的角度出发，经多次协调社区和街道，终于为王玉新和其母亲解决了低保救助，领到低保救助款，王玉新非常感激，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感谢他，均被拒绝。

后来，在莫继东的协调下，王玉新参加了社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没

有想到，一个靠盗窃维持吸毒生活的“瘾君子”在沉寂半年多后，突然制造了横跨两省的绑架人质案……

没有过多地细想，莫继东主动向早已赶到现场的现场总指挥的区委常委孙远志请战，而请战最大的理由是与王玉新很熟悉，并且对方一直对自己心存感激……最终莫继东的请求被批准了。

莫继东有一种临战前莫名的兴奋，此时，绑匪与人质处在一汽车的后排座处，莫继东靠近车体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小玉新”时，王玉新立即答应：“是莫教来了。”“有戏!”莫继东内心一阵窃喜，在继续劝说后，王玉新同意莫继东和另一位民警进入车内，此时，莫继东意识到犯罪嫌疑人警惕性已经有所放松，坐进劫持人质的车里，莫继东和另一位与犯罪嫌疑人比较熟悉的民警共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劝说。

此时，也许是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6 个多小时，王玉新的情绪越发紧张，在车内大喊大叫：“内蒙的警察快滚开!”并叫喊着千万别硬来，否则鱼死网破……

莫继东明白，透着车窗，王玉新大致看到窗外发生的一切。“不能再对他进行刺激。”莫继东示意让车上面的狙击手离开，并请示让内蒙的警察暂时离开现场。

看到昔日的恩人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刚才一直在叫嚣的王玉新显得安静了许多，莫继东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对其讲述法律知识，同时告诉他没有安排狙击手击毙他，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严重后果……试图从对方害怕受到法律惩处的角度安抚他。

另一方面，莫继东利用其感激的心理进行引导，利用其正义的一面进行开导，利用其自身的利弊进行劝导，但尚有吸毒后幻觉的王玉新反复很大。在和战友交替劝说的过程中，莫继东仔细观察了犯罪嫌疑人的动作特点，并悄悄地打开了犯罪嫌疑人从车内关闭的后车门，为下一套方案做准备。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对于莫继东和他的战友显得那样漫长，由于长时间哭泣，被劫持的小女孩的声音变得嘶哑，并且明显有虚脱的症状，加之劫持人质不远处小女孩的亲人撕心裂肺地哭喊，莫继东和战友的压力越来越大，责任和天职让他和战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较长时间的劝说和一定的信



任度，使犯罪嫌疑人几度放松警惕，提出吸烟，并且双手离开了被劫持的孩子。莫继东假装离开吸烟，立即将此情况反馈到指挥部，并提出伺机实施抓捕的计划，指挥部考虑强行抓捕会危及孩子，指示继续劝说，等候命令。

8 日凌晨 5 时 40 分，对吸毒人员很有经验的莫继东感觉其毒瘾兴奋、幻觉期渐过时，心理压力加大时，他再次加大了心理攻势，明确告诉王玉新，如果此时将孩子主动交出来，他会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法律的宽恕……

此时，王玉新提出吸食毒品海洛因的要求，被现场最高指挥员孙远志拒绝。莫继东有意将话题引到可以抑制毒瘾的美沙酮上，犯罪嫌疑人提出喝美沙酮也行，见对方的条件有些松动，莫继东再次晓之以理，告诉王玉新过去自己是如何不计任何回报帮助他和其母亲的，促使其信任民警……也许是莫继东的话语击中了其心灵的最柔软处，王玉新告诉莫继东愿意交出孩子，莫继东内心一阵狂喜，当看到战友从王玉新手中接过小女孩时，他明白自己不仅超越了自我，更是用温情、亲情征服了一个瘾君子……

当王玉新主动扔出手中的尖刀，举着双手走出车厢时，现场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在没有动用武器弹药的情况下，在被劫持的孩子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莫继东和战友圆满地完成解救人质的重大任务。

看着小女孩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看着那位几近崩溃的母亲和其家人的那份欣喜，莫继东笑了，此时他始觉好累好累，紧绷 5 个多小时 310 分钟加上一夜没睡的他有一种如负重释般的轻松……

此时天已经大亮，莫继东和战友又将投入新的战斗！

……

缉毒警被人们誉为“刀尖上的舞者”，蹲守、卧底、抓捕……支撑他们的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信念和忠诚，尤其是在面对那些“武装到牙齿”涉枪、涉黑大毒枭时，除了一腔热血，更需要超凡的智谋、过人的胆识，唯如此，才能荡涤污秽与邪恶，铲除暴孽，还百姓一片和谐宁静的晴空。

在和平年代，他们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第七章 “防艾”与“禁娼”难题

引言——“黄”、“毒”不分家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吸毒人群为主体，而吸毒人群恰恰又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吸毒的青年男女均处于性萌动期与旺盛期，他们的性乱行为容易导致感染性病，性病的传播又作为吸毒与艾滋病的中介而存在，一旦染毒后，他们就会生活在无尽的绝望中。

1、怎一个乱字了得，戒毒者所内染艾滋

53岁的李安桦没有想到，与儿子的重逢会是这样。

两年没有见过面了，当母亲就要见到儿子时，心里既惊又喜。几天前，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击碎了她对不争气儿子发下的毒誓：“你不戒断毒瘾，我们就永远不要见面。”

陌生人在电话里告诉她，她的儿子——32岁的赵峰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他在戒毒所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阿姨，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你不去，恐



怕以后就没机会见你的儿子了。”这个自称是和赵峰一起戒毒，刚刚期满释放的年轻人急切地说。

电话那头的李安桦六神无主，“一下子感觉天都塌了。”

“我只想早点见到儿子，虽说这些年他吸毒伤我太深，但始终无法割舍母子情深。”几天后，她见到戒毒所管教干部。但对她儿子的病情，所有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她心怀侥幸，穿过两道铁门，终于见到儿子时，儿子的表情让她的侥幸心理即刻烟消云散：“儿子不说一句话，低着头，他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一个月内，至少20个家庭在福建省强制隔离戒毒所经历了类似的不幸遭遇。据调查，自2004年4月，该戒毒所内至少有39名戒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据该所的上级部门——福建省司法厅的内部文件显示，至少有43名戒毒者被发现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准确的感染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据感染者介绍，在2004年9月，全部戒毒人员接受检查之前，有些戒毒者已经出所，或者被转送到其它戒毒所，而这些人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让家属感到吃惊的是，无论是他们的家人，还是福建省司法厅都承认，戒毒者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是这次艾滋病病毒快速、集中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戒备森严、管理相对严格的戒毒所内，为何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件？只要一触及这一话题，所有的人都三缄其口。

艾滋病在戒毒所爆发

抽检查出6例阳性3个月后，1000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80多人接受复检，但依然没有人告诉他们，结果是什么。

感染者们都不能确认，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戒毒所里出现这种病。

记者采访的十几名感染者中，最早被确认感染的是梁灿迪和另外5名戒毒者。

2004年6月上旬，戒毒所从11个中队共1000多人中，每队抽2－4人接受血液检查。梁灿迪和其他20多人一起接受了检查。

20几天后，梁和另外5人被通知接受复检。医生又到戒毒所里，从每人身上抽走了一针筒血液。梁悄悄问给他抽血的省防疫站医生，检查什么内容，医生回答他："查艾滋病。"

梁灿迪说，他问医生，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医生让他问管教干部，因为这次检查是由戒毒所委托的，他们只能将把结果通知给戒毒所。

对这次检查的起因，戒毒者和戒毒所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这次抽检是在专家建议下开展的，因为近几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逐渐增加，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检查。

时任戒毒所所长的俞宏秋承认，在这起事件之前，全所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几乎是"无知"，对入所人员，从来没有检查HIV，只有当个别人出现奇怪的症状后，才会请专业人员前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人吃惊，在20多人中，发现有6例抗体呈阳性。

实际上，在2004年3月，就有多名戒毒者发现自己身体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他们都到戒毒所的医务室看过病，医生的回答总是："没事，没事。"

一直到9月22日，福建省防疫站的医生再次光临戒毒所，与以往不同，这次光拉医生的车就来了好几辆。戒毒者被通知，这一次，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

从早上9点开始，医生们连午休也没停下，一直到下午4点，终于给一千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其间有人偷偷问医生检查什么，医生回答："查艾滋病。"

8天后，医生再次来到戒毒所，80多个人接受复检，在检查的同时，医生还向他们提问最后一次性活动是在什么时间，是否有同性性伙伴，近期是否注射过毒品等问题。

俞宏秋2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他们得知抽查结果后，立即向省司法厅汇报，于是组织了这次普检。

检查结束后，依然没有人告诉戒毒者，结果是什么。

但有细心的人发现，一些改变悄悄出现了。

以前，每个中队的一百多人共用一把电动剃头刀，现在增加了三四把，其中的一把专门给参加复检的人用，甚至几个要好的也可以出钱合买，自己



保管；医务室的注射器从以前的玻璃针筒换成了一次性针筒，而且打针的人也从戒毒者变成了正式的穿白大褂的人；两栋以前做医务室的三层楼房，正在粉刷，床和家具一天天搬进去……

感染者被巧立病名保外就医

在打发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出所的5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这一次“保外”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

复检结束后，戒毒所表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

10月1日，已经是第二次进戒毒所的张铁发起了高烧。在被送进医院治疗10多天后，戒毒所通知家属，因肺结核病情严重，即刻接他回家治疗。张铁的母亲第二天把他接回家。据张铁介绍，回家时他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不知道是期满解教还是保外就医。

2002年12月，张铁刚进戒毒所一周，就发现有人吸毒，他免费“扎了一针”。张铁说，这是他第一次注射吸毒，所内“货”少且贵，用烫吸方法太浪费。2004年6月起，张铁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些小指肚大的淋巴结，一直发低烧，医务室开了两次药，但都无效。

2004年9月普检与复检的名单上，张铁都榜上有名。从10月离开，张铁回家3个多月了，还没人告诉他，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当记者向戒毒所询问张铁的情况时，一名负责人询问工作人员：“他死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这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张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张铁病重回家治疗的同时，2004年10月10日，厦门市同安区防疫站及当地居委会给钱飞的姐姐打电话，让她去一趟。在防疫站，钱飞的姐姐看到一份由福建省防疫站发的传真，称钱飞和另外3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钱飞的妻子和女儿应尽快检查。

一周后，钱飞的姐姐去看望弟弟，管教干部说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钱飞病情的通知，还叮嘱她，见面的时候不要提艾滋病的事情，以免刺激钱飞。

10月中旬，袁健强的母亲、姐姐和妹妹到福建省建新医院（福建省监狱

管理局中心医院)，陪他体检。袁健强干咳、低热的症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交了800元后，做了胸透、B超和血检3项检查，前两项结果很快出来，都正常，验血要等到下午才出结果。

检查期间，姐姐看见弟弟下巴下有个肿块，用手摸，有黄豆大。袁健强对姐姐说，在腋下和大腿根还有很多这样的肿块。弟弟悄悄对姐姐说："让姐夫和妹夫来看我，有些话不方便对妈妈和你们讲。"

母亲和姐妹没有等血检的结果，中午就回了福清。临别前和管教约好，第二天她们打电话问结果。回家后，姐姐把弟弟的症状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姐姐与管教通电话，"对方说仪器坏了，结果还没出来。"姐夫回家后脸色沉重，他上网查询过，很严肃地对妻子说："问题大了，可能很严重，我马上去福州。"姐姐一听吓得呆若木鸡。

袁健强见到姐夫，告诉他自己确实得了这个病，他没有其它要求，只让他们千万不要告诉患有高血压而且已经56岁的母亲。

感染者吞异物求解脱

进入11月，越来越多的家属获悉消息，而感染者们，发现他们的症状日益严重。

11月11日中午，戒毒者吃过饭回宿舍休息。梁灿迪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下颌、后脑和大腿内侧的淋巴结已经连成一片，抽了几次血却都没结果，"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不仅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和以往一样出工'上班'，我越想越气。"

他抓起67厘米长的指甲剪吞进嘴里，"开始卡在喉咙里，然后'咔吧'一声，感觉掉下去了。"随即，他被送到了建新医院。

梁灿迪说，11月里，像他这样吞异物以求住医院的戒毒者还有78个。

两天后，家住福州的郑明文被解教。17日，他到福建省防疫站查询9月复检结果，医生答复他，复检名单上确实有他的名字，但不能告诉他结果。郑明文想重新做次检查，要收500元检查费，他的口袋里只装了78元，只好回家。

两个月后，郑明文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再次被警察抓获，郑对警察说自



己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警察送他到防疫站检验，检查结果为阳性，这时，郑明文才第一次被正式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被放了出来，他的朋友则被送进了戒毒所。

从2004年11月底至2005年1月，戒毒所先后有6名确诊感染者因咽喉炎、皮肤病、吞异物被送进福建省建新医院。

1月24日，管教干部到病房里，告诉梁灿迪和其他5名住院的感染者，他们可以回家了。其中只有一人是期满解教，另外5人都是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被放了出来。

在5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证明上盖有“福建省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公章，但是文件上都没有填文件号。

这一次“保外就医”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这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在放行前，6个人都签了一份这样的“告知书”：“你在健康体检中，经卫生部门确认，你的血液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我所根据司法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规定，现向你告知。希望你出所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加强自我医疗保健。”告知单位是“福建省强制隔离戒毒所”。

据称，这是戒毒所第一次正式告知戒毒者，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其后解教的感染者，都会收到这样一份告知书。

所方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医务室的玻璃针筒和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共用的剃头刀以及自制的文身机也成了戒毒者质疑的对象。

戒毒者感染途径成谜团

获得消息后，家属们都想弄清楚，在高高的围墙里，他们的亲人如何能够偷吸毒品，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

回到家里的感染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家属们大吃一惊。通过他们的描述，家属们发现以往印象里的戒毒所和现实中的戒毒大不相同。

2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福州市马尾区儒江村内的戒毒所。这里高墙、铁门与警察随处可见，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戒毒者把质疑集中在医务室的针筒和剃头刀上。戒毒者说，医务室一直

使用玻璃针筒，而且打针的人都是与他们一样的戒毒者，打完针，很少消毒，导致艾滋病病毒通过针头传染。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玻璃针筒，而且医疗室消毒比较严格，“绝对有保障”。至于戒毒者给戒毒者打针，这也“并不奇怪，为一千多人看病，医生数量跟不上。所以戒毒人员里表现不错、懂得一点卫生常识的人，在医生的指导下协助医疗所的工作。”

俞宏秋说，自从 9 月检查后，这些“协助员”都被下课，全部由医生打针。

感染者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电动剃头刀，他们说，每个中队只有一把，一百多人共用，理光头很容易划破头皮，导致感染。

俞宏秋并不排除电动推头刀传染的可能，“但这种传播的几率很小，我们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偷吸毒品，感染者主要出现在平时联系紧密的小团体内。”

所内管教成了戒毒人员中转提款机

毒品如何流入戒毒所内？戒毒者们向记者描述了此事件的全过程。

要买到毒品，首先要有现金。在戒毒所内，每名戒毒者有一张类似储蓄卡的磁卡，家属把生活费直接打到每张卡的账户里，消费只能刷卡。

“和管教干部关系熟，就可以让家属把钱打进管教的银行卡，他们取了钱，再把现金交给我们。这样‘转账’一次，管教要按汇款总数 20% 至 30% 收‘手续费’。”几名戒毒者都说出了弄到现金的办法。

俞宏秋表示，目前还没发现有民警有上述行为，“照规定是要被开除的。”但他也不排除，可能有个别民警，在不知情下帮戒毒者传递物品，导致毒品流入戒毒所。

拿到了现金，把钱交给即将解教的毒友，由他们出去后购买毒品，再想办法送给委托的人。

毒品流入戒毒所的途径五花八门。

“我们这里有拉泔水的杂工，他们通过解教的人员，一点一点弄进来的。”时任戒毒所副所长刘登铭介绍，“有从后面的围墙，把绳子扔出去，外面的人



绑上毒品，‘钓鱼’钓进来；用弹弓将钓鱼的尼龙丝打出去，晚上还绑上一个会发光的二极管，外面的人找到二极管，就把毒品捆在尼龙丝上拉进来。”

刘登铭介绍，戒毒所的管理逐步完善，当发现现金不易管理后，改用磁卡消费；以前见面可以送物品，完善管理后规定不能再送任何物品给所内的戒毒者，“有人甚至把毒品装在信封里，邮寄进来。”

在戒毒所，毒品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十几倍。

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用50元可以买到“一分半”（一分为0.1克）白粉，在里面“一分”毒品分成5针，每针的价格是150元。“还要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

刘登铭掌握的所内毒品价格是：0.01克毒品价格为145元。“这么高的价格正能说明我们打击毒品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否则，价格不会那么高。”他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种莫名的讽刺。

感染途径五花八门

注射器比白粉体积大，更难偷带进戒毒所，所以就特别珍贵。“几个、十几个人轮流用，用完用热水烫一下就算消过毒了。”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注射，一块钱就能买到，每次只用自己的注射器，在里面只好共用。通常是好几个人围在一起等一支针头，针头弯了还要反复修理，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有一次看见垃圾桶里丢了一根，偷偷地捡回去，放到床铺下。”

钱飞提出了另一条传染途径。在戒毒所里，曾经学美术的他给别人文身。他说，生意非常好，要文身的人得排队、托熟人才轮得上。每月他有四五千元收入，这些钱最终都被他吸毒用掉。两年多时间里，他自称给两百多名戒毒者文过身。

钱飞向记者展示了他用圆珠笔和电动剃须刀改造的文身机。接通四节电池电源，马达就带动针头上下缩动。“文身出血，有时候不小心扎到自己手，很容易就感染了。针钝了磨一磨接着用。”钱飞说，他当时一点都不懂预防艾滋病的相关常识，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么多单活。

家属渴望获得真相

俞宏秋介绍，在2004年6月抽检发现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该戒毒

所向福建省司法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决定组织普检，把感染者的伙食标准从每月 115 元提高到 200 元，为民警配发防护器材，请专家讲课培训，以及改造隔离室，对所有的感染者进行集中管理。

家属们却并不满意，在频繁的地跑动中，他们慢慢熟悉起来，互相联系，商量对策。

12 月 15 日，一名感染者和家属见面时，要求家属们“一定要在外面告状，让更多的人知道”。

“家属要求知道真相，但没人告诉我们。”袁健强的姐姐对记者说。

戒毒所的做法被家属指责为封锁消息。副所长刘登铭告诉记者，戒毒所按规定办事，只能在感染者离开戒毒所时通知本人，感染者的家属由各地防疫站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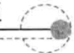
“既不告诉我们真相，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每个人都很害怕。”一名解教人员对记者说。家属们更迫切地要知道实情，包括亲属有没有得到治疗，每顿饭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戒毒所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只能靠他们用上访、吵架，托关系，甚至发脾气才能一点一点得到答复，但更多的疑问都像泥牛入海。

1 月 17 日，7 名家属一起到戒毒所。一名家属说，他们从 10 点等到 11 点，终于有一名干部出面和他们谈话，家属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1. 为什么不通知他们？2. 要求公布应对措施，限期明确答复。这名干部回答，两个月前就已经开会讨论，还没结果。

回到家后，失望的家属们决定给有关部门写信。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家属请了一名高手代写，写好后打印 120 封，在 1 月 19 日寄了出去。这封信发给了中央和福建有关部门及他们所能想到的媒体，因为担心别人知道亲人得了这种病，信上没有署名。

3 天后，一名感染者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说隔离房盖好了，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

不放心的家属们约好一起到实地探望他们的新环境。这一次戒毒所颇为配合，派人带他们参观了新的隔离生活区，“两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活动室，二、三层住人，每间宿舍有 3 张架子床，每层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



室。”一名家属说，当时里面总共住了19个人。

就在参观前一天，家属们刚去过福建省信访局、公安厅、省委、司法厅上访，除了在一个部门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月29日，家属们第二次到福建省有关部门上访。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边打扫雷游戏，边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名家属询问接待人的姓名和职务，被轰出了办公室。但上访也有些收获，家属见到了司法厅一名副厅长，家属要求尽快治疗，副厅长告诉他们，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实名举报只求真相

在上访失望之余，2月2日，家属们打印了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在信的末尾，12名勇敢的家属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两天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都是寄给媒体的。

几天后，一名负责人承诺，家属可以随时进大门，任何时候找他都一定热情接待。但家属们关心的治疗等问题，还是没有答复。

家属介绍，包括所长在内的四名管教干部曾亲自到福清市，住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与部分家属“沟通”了两天。

一名参加过“沟通”的家属回忆，“沟通”时戒毒所的民警们要求每次只和一名家属谈，但7名家属要求一起谈，最终“沟通”没有任何结果。

对家属的怒气，戒毒所的负责人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无法接受，“他们究竟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最终要由专家鉴定。如果因偷吸毒品而感染，责任主要在当事人自身。我们依法办事，继续做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向人大、政府、政协、媒体等单位说明情况。”

“在这件事之前，感觉艾滋病离我们很远，对它我们几乎是无知的，也没有明确的防范措施。”接受采访时，俞宏秋反复说这句话。“每名看押感染者的民警很担心被感染，我们让每个人写决心书，后来才知道即使一起吃饭都不会传染。”

福建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的戒毒者，都是有6年以上吸毒史的吸毒者。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戒毒所例行的体检项目里却没有HIV

检测。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一名愤怒的家属说。在他们看来，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

戒毒者把戒毒所比作是“工厂”，他们就是“工人”，每天超时“上班”。

多名感染者介绍，每个中队有大体分工，其中一中队主要生产镜框，二中队生产织带，三中队和七中队组装、包装钟表，四中队操作电动缝纫机，五、六、八中队生产手表和电子表。实际的生产情况经常改变，“所里联系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戒毒所负责人承认，每名戒毒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矫治一切恶习的重要手段。”戒毒所专设负责联系生产的部门，从附近的工厂联系生产活动，但劳动强度适度。

戒毒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去了哪里？

戒毒者说，他们享受的额外福利是，每月可以从戒毒所领到8元钱，以购买日用品。

对此，俞宏秋介绍了“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补贴戒毒者的伙食花费，“国家规定每人每月标准是115元，但财政拨款每人只有90元”。其次，给劳动的戒毒者发放适当的工资，幅度从5元至1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再次，经费还用于戒毒所场所建设和发放编制外人员工资，如水电工人、厨师、驾驶员等。

管理混乱成乱源

生产也成为毒品的通道之一。

每家厂家都会安排技术指导员在戒毒所里指导戒毒者生产，他们自由出入高墙内外，戒毒者买通他们，捎带毒品。运输原料的汽车也变成毒品流入的渠道，藏在汽车隐蔽部位，就可能随车进入戒毒所。

俞宏秋说，去年抓获了5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对这次事件，福建省监狱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戒毒所在管理上确实负有责任，将加强管理、加大硬件建设，掐断毒源。



头脑“一片空白”的还有其他感染者。

出所没几天，罗红发现身上长出了一片一片的红色斑点。自从解教后，他住在老房子里，只有母亲来看望他，经过一段调养，他的体重增加了7斤，但昨天突然出现的红斑点又让他感到了绝望。

梁灿迪回到家里，没有人欢迎他。几天后，父母搬家只剩他一个人。“他跑到亲戚家要‘收埋费’，堂姐给了2000元，堂哥给了3000元，他一个月就用光了，现在又向大家要。”梁的父亲说，他还看见儿子常领女孩子回家。

钱飞靠做装修生意，曾经也是百万富翁。现在他回到厦门，一个人住在一栋即将拆迁的房子里，骨瘦如柴，每天姐姐给他送一点稀饭。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四肢哆嗦：“走到大街上，看到繁华的城市和身边的人群，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无关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28岁的彭路从1996年开始吸毒，每天要花300元买毒品。为了戒毒，他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自愿到戒毒所戒毒。

2002年2月和11月，他的母亲看他毒瘾难戒，主动报警，两次把他送进了戒毒所。2004年3月5日，彭路获得3个月的自由后，他的母亲再次报警，第3次主动把他送进戒毒所，这一次，他的劳教期为两年。

彭路的母亲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儿子送进戒毒所，一时成了中央、地方众多媒体描述的英雄。

但这一次，彭路只呆了不到一年就被保外就医。

他的母亲说，每次儿子被送进戒毒所后，自己一边上电视，一边流泪，同时也期待着儿子健康地走出戒毒所。没想到毒瘾没戒掉，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2、他们的孤独、绝望与恐惧

近几年来，如此近距离得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笔者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几年先后数十次对这一特殊群体采访下来，心中的感觉是：这个群体需要足够多的阳光，需要足够多的温暖。笔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生命的脆

弱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对他们而言，阳光下的生活，竟然成了一种奢侈，是那样遥不可及。

吸毒者与艾滋病患者，让很多人除了思想上避而远之的恐惧，还有道德上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吸毒、艾滋病似乎与生活不检点息息相关。头顶着这些可怕的字眼，他们不得不远离正常生活的人群，独自躲在黑暗处舐伤。这也注定，走入人们视野中的他们，只能是——背影。

佳佳妈妈的话语中透着明显的无奈："我只能对外人说儿子得的是脑瘤，根本不敢说真话呀。"2007 年 7 月 29 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疾控中心的小楼里，我们碰到了前来领取治疗艾滋病免费药物的佳佳母子俩。在得到不说出儿子真实姓名跟家庭住址，以及不拍儿子正面照的保证后，年逾六旬的佳佳妈深叹了一口气。29 岁的佳佳举着右手，斜靠在一旁的长椅上，表情呆滞地看着我们对话。

在半个多小时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地交谈中，我们得知，佳佳是因为注射毒品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第一次染上毒品，是在 1997 年。那一年，佳佳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是贩卖毒品的，在这位"好同学"的怂恿下，佳佳踏上了吸毒的第一步。最初是不要钱白吸，上瘾后，开始掏钱。那时，佳佳在南站开了个茶馆。因为有茶馆的收入做毒资，他没从家里拿过钱，所以，家人一直都蒙在鼓里。可等家人知道的时候，佳佳已无法自拔。茶馆的生意因为没有打理变得一落千丈，最后被迫关张。少了经济来源，有钱的时候就吸一点，实在没钱了，就靠服安眠药解解瘾。

1998 年、1999 年，佳佳先后被两次强制隔离戒毒。2006 年 11 月，由于连续 3 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佳佳被判劳教一年半。第二年 9 月底，因视力模糊、右手瘫痪、走路不稳，佳佳被家人从戒毒所接回家，经市第二人民医院初步诊断为脑瘤。当年 10 月中旬，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复诊时，医生怀疑他是因长期服用安眠药物损伤大脑，随之出来的血液化验结果显示 HIV 初筛呈阳性。经市疾控中心初筛中心实验室检验，仍呈阳性。11 月初，经自治区疾控中心最后确认，佳佳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佳佳一直在想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在他过往将近十年的吸毒日子里，他曾多次与他人共用过针具，他想也许就在那个时候，让他感染



了艾滋病病毒。

知道结果后，死亡的恐惧和高额治疗费用，让佳佳和妈妈抱头痛哭。全家的生活仅靠继父每月 800 元退休费和 300 多元低保费、再加上妈妈养猪和种小菜的收入来维持。一年多来，为佳佳治病欠下的近两万元欠债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所幸的是，从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现在，除了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外，佳佳的身体状况并没恶化，但怕邻居、亲戚知道儿子的病情的念头却无时不在折磨着佳佳妈。

医生进来询问佳佳服药后的反应时，笔者举起照相机。一旁佳佳的母亲不停地让儿子把头背过去，再背过去……

也许，作为一位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饱受病魔折磨的儿子再去承受舆论的压力。

3、“我基本上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刘平选并没有一种天崩地裂的绝望感，至少在与笔者的对话与相处不长的时间里，他的表现令人刮目。

“我今天跟过年过节一样的开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疾控中心的小会议室里，当医生把笔者的来意告诉刘平选时，这位 51 岁的农村汉子的态度让笔者大感意外：“没关系，你们想怎么问就怎么问，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刘平选的淡定让人的内心感到格外沉重。

2003 年 4 月，曾在河南卖过血的刘妻在住院 16 天后死在医院，临死前做的验血报告显示 HIV 呈阳性。随后，刘平选所在的村民小组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血液检查，结果出来后，刘平选被告知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怕，当然怕，怕得要命呢。”问及拿到结果那一刻的感觉，刘平选坦承了内心的恐惧。但随之而来的遭遇，让刘平选深深体会到了人言可畏、孤独的可怕。“从知道结果的那天起，我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说

这话时，刘平选脸上刚刚露出的笑意顿时不见了。

妻子死后，家里就剩下老刘一个人。外嫁的女儿从此不敢登门，在外打工的儿子过年总会找借口不回家，亲戚朋友们更不用说。四周的乡邻也不敢靠近他，他也很知趣，从此改了爱热闹爱串门的习惯，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间房转到那间房，转累了就这里躺会儿那里坐会儿，实在无聊了就自己跟自己说说话。

一个人的孤独是痛苦的。但更可怕的是，唯一的经济来源——自己辛苦种下的桔子没人肯要，自己想买的生活用品没人肯卖。说起卖桔子的事，老刘满脸的无奈，本来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能卖出去，讲了一箩筐好话托了别人去卖，回来还得给人好处费，七折腾八折腾就等于白卖了。没办法，老刘又想起拾废品维持生计，可是，用三轮车拉着一堆破铜烂铁得走上好远的路，只有去没人认识他的废品站才能卖掉，不然来来回回也是白忙活。

现在，老刘只能靠种几分薄田，种一点小菜度日子，可就这样，他已觉得很幸福了，那是因为，他所受到的待遇正在开始慢慢变好。随着国家、省、市的专家、领导的造访、探望、宣传，乡亲们开始不那么疏远他了，而且政府免费为他安了自来水，免收了电费、电话座机费和有线电视收视费，国家还免费提供治疗药品。这一切，让他感到知足。

说起这些，久违的笑容又重新爬上了老刘的脸。我忍不住举起相机，老刘马上对着镜头咧着大嘴笑得更欢了："只管拍只管拍，我今天跟过年一样开心呢……"送走老刘，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笔者依然能读到他内心的那份孤独和寂寞。

4、"我天天在担心儿子会被退回来"

"我最担心儿子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没有学校愿意接受他。"袁欣话语中满是凄凉，随后有四五分钟的时间一直定定地望着窗外过往的行人不出一声。

袁欣是被丈夫感染上的。去年底，在外跑运输的丈夫突然发起高烧，并



伴有腹泻，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在某乡镇卫生院工作的袁欣将丈夫安排在单位治疗。因高烧持续不退，丈夫被转到县人民医院，血检报告显示 HIV 呈阳性。作为配偶，和丈夫一起被送往县疾控部门检查，也呈阳性。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检查结果，两人 HIV 均呈阳性。2006 年 2 月，丈夫死了。

在收到结果的那一刻，巨大的恐惧和自卑让 31 岁的袁欣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可望着年幼的儿子，她只能打消死的念头。而比那些感染者幸运的是，袁欣的亲友邻居一点没有嫌弃她，生活还跟以前一样。不同的是，身为护士的袁欣被安排在家休息，每月拿 600 元生活费。这个袁欣能够接受，也可以理解。让她痛苦的是儿子的入学成了大问题。

2005 年 2 月，上幼儿园的儿子在入园 3 天后被退了回来。那天，正是丈夫去世的日子，理由不言而喻。后来，儿子被送到奶奶家，才得以在另一家幼儿园继续上学。2006 年“六一”儿童节，家长们都来看孩子表演，唯独儿子的父母没来。七嘴八舌间，秘密被公开，儿子再次面临退学的遭遇。奶奶苦苦哀求说孩子没跟着袁欣，园方才勉强将孩子留下。可是 9 月开学时，园方又改变主意不肯收留孩子，后在县疾控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帮助下，孩子才得以留下来。为了不被发现孩子是由她带着的，每天都是由爷爷奶奶接孩子放学，然后送回家来。

采访结束时，袁欣说、一年多来，她一直坚持按时去省城专门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很好，没有发病迹象，甚至连一次小小的感冒都没得过。

“但是，我天天都在担心儿子会被退回家来。”说这话时，袁欣转过身去，再次望着窗外。那个背影有些哽咽，有些绝望，更有着一份强烈的渴望。

5、惊人秘闻：毒品掺有吸毒致死者尸骨粉

因到金三角贩毒而判刑出狱多年的倪军（化名）揭露惊天秘闻：很多毒品中均掺有吸毒致死者的尸骨粉。

倪军家住沙坪坝双碑松江村，2010 年时，正值 53 岁。据他介绍，1990 年春节时他认识了一个贵州的姓黄的毒贩，急需一笔钱的倪军在对方的利诱下，鬼使神差地丢下妻子和才 10 个月大的女儿跟随对方到“金三角”贩毒。他们在云南德宏州潞西县买了 13 千克鸦片，翻过几座大山准备过怒江时被当地缉毒警抓获。

其后，倪军被判刑 5 年。倪军说，要是按现行的法律，他早就掉脑袋了。就在倪军服刑时，他的妻子因为苦闷也到云南吸上了毒。

“都是我害了她!”出狱后倪军发现妻子已陷入毒潭不可自拔，没钱买毒品，就将头痛粉几包几包地吞食。后来妻子实在忍受不了毒瘾的煎熬，于 1995 年在家上吊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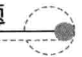
“毒品毁了我的一切幸福!”倪军几年来一直以打工维持生活，但看到毒品如洪水猛兽般呈愈发蔓延之势，想到自己的遭遇就不寒而栗。“我想自己应该站出来。”倪军说，“我应该告诉那些对毒品痴狂的人，在他们用于吸食或注射的毒品里，可能就有吸毒致死者的尸骨粉!”

倪军称，据他以前贩毒时了解，金三角地区特别是境外加工的毒品中，凡二、三、四号毒品（分别为吗啡、黄皮、海洛因）都会掺进死人的尸骨粉。在边境地区，他就亲眼目睹过吸毒致死者的尸骨被挖出，然后磨成粉末掺进毒品原料中，进行提炼，增量重复利用。盗挖、收购吸毒者尸体在当地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制毒者为了利润，也不会管这些“四号鬼”（指吸海洛因致死的人）有没有患艾滋病或者其它疾病。

“当时我知晓这些后头皮都麻了，联想到吸毒者美滋滋地吸食和注射，简直太恐怖了！现在我之所以要把这些讲出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远离毒品这个害人恶魔!”

6、采访中遭遇“性服务”

2006 年 7 月 9 日，笔者不敢再呆下去，第二天一吃完早饭，就坐上了从



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结束了首次广东采访之行。

此前，当波音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天空正下着小雨，坐上广东省第二戒毒所专门来接记者的警车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到了有着“动感之都”美誉的广东了。

广州市的采访不到两天就结束了，第二天下午 3 点钟左右，采访对象的专车接着把笔者送往下一个目的地——惠州。

惠州，一个美丽的城市，随着大亚湾核电站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上马开工建设，仿佛为惠州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经济的飞速发展，惠州城内一栋栋酒店式公寓，各种星级休闲会所拔地而起，一位网名叫“曾经最美”的女孩就在一家叫做“大森林酒店”里做“小姐”。

在笔者入住酒店前台办手续时，前台的一位女士低声对正在为笔者办理入住手续的接待方说：“我们最近来了几位年轻漂亮的模特，要不要晚上开开心?”虽然声音很低，但笔者还是听得真真切切，当时还以为是演艺之类什么的，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忙碌一天的采访后，洗漱完毕的笔者身围一条浴巾正悠闲地坐在床上看第 26 届世界杯足球赛，晚上十一点多钟，正在笔者有些睡意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站在门外，她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打扰您了，我能为您服务吗?”“服务?”笔者有些莫名其妙，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姑娘一下子挤了进来，并随手关上了房门。仅穿一条内裤、身围一条浴巾身体有些暴露的笔者在深夜与一个陌生姑娘独处时，一种莫名的紧张让人不知所措，看着笔者慌张找衣服的样子，姑娘窃笑了。在笔者躲进卫生间穿衣服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几乎瞬间在脑海中闪现：何不利用此机会，了解一下这些“小姐”吸食合成毒品的情况，为正在创作的报告文学充实一些真实的内容?想到此，笔者变得异常镇定。后来才知道，姑娘的网名叫“曾经最美”。

“今天比较累，我们先聊聊好吗?”笔者大大方方地说，并趁女孩不注意时，按下了采访机。

以下是笔者与她的对话：

“你这是做什么服务?”我故作不懂地问。“就是你们男人都喜欢做的那个。”女孩放下手里的红色小箱子，把披肩的长发向后拢了拢。“怎么个服务

法?”我依然装迷糊。“今晚两个小时我是属于你的，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姑娘说得很露骨。“两个小时?”“是的。”“两个钟点多少钱?”“400元。”“不贵嘛。生意好吗?”“还行，像我这样年轻身材好的，点的要多一些。”“一晚上有几单生意?”“生意最好时我一天被客人点过5次。”“那收入挺高的嘛。”“哪里，像400元钱酒店要抽走150元。还要花钱买药，主要是治妇科病的药。”“容易得病?”“得病的多呢，得妇科病还是好的，最可怕的是得艾滋病。”“你们可以用安全套呀。”“你们男人有的嫌不舒服不用呀，还有的嫖客故意不用。”“得病的走的多吗?”“每个月都有十多人。”“那么多?你们总共有多少个小姐?”“有70个，我们叫保健中心。”“得的都是什么病?”“性病是常见病，走的得什么病的都有。”“怎么知道谁得了病?”“我们每两个月体检一次。”“由于人员流失得快，老板就与院方的人勾结，好多时候走过场，不认真检查。”“你们害怕吗?”“肯定害怕，但也只能凭运气。”“我们是尽量让客人带套，但他不带或者中途取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在一个男人的面前只能屈服。”“酒店为你们做主吗?”“做主?他们才不管你的死活呢，他们告诉我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尽量让客人高兴。”“你们有休息天吗?”“没有，我们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只有例假来的那几天才能休息，但妈咪还要脱裤子检查。”“为什么?”“是怕我们私自出台。”“就是与相识的嫖客约好出去过夜，这样酒店就抽不到头了。”“你们懂得怎样防止艾滋病吗?”“知道一些，但很多时候是凭直觉，那些穿戴整齐，皮肤白晰的，文质彬彬的我们就觉得是干净的，卫生些。”“这些人要求不戴套你们就不戴?”“是的，如果不按客人的要求去做，他们打电话到前台，妈咪会打电话过来骂我们的。”“还有再就是客人给我们小费，谁不喜欢钱呀，给我们钱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好几个姐妹都是这样染上病的。”“走了的姐妹还有联系吗?”“有的还在联系，有的联系不上了，可能不在人世，因为好多得的是艾滋病。”“知道得这个病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绝望、愤怒，再就是报复可恶的男人们。”“不戴安全套，或者提前把安全套扎破。”“因为好多姐妹是被一些男人恶意传染上的。”

沉默，十几分钟的沉默。

“你们是怎么步入这一行当的?”“都是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什么时



候出来的?""高中一毕业就出来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当时表姐对我家里说在这做保健，工作很轻松，收入还挺高，就这样家里让我来了。""来了你就做?""没有，是表姐她们帮我'洗脑'""洗脑?""表姐和那些姐妹整天给我讲男欢女爱的事，再就是让我看各种黄色片子。最重要的那些培训，就是让我们去掉羞涩感，让我们敢脱，第一次被妈咪带着几个姐妹扒光衣服时，当时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你就没想到过离开?""由于当时年龄小，只有好奇。""你后悔吗?""也谈不上后悔，就像当初表姐劝我的那样，是女人总要经历这个过程，又不损失什么，挣钱还相对容易一些。""家里知道吗?""哪能让家里知道，就说在厂子里上班，主要是我打电话回家，每月寄些钱回去。""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事?""我们学历又不高，加之没有一技之长，谁要我们呀?""可以学呀!""多累呀，还是这样挣钱容易些。"

这次，轮到笔者沉默了。

"你们有娱乐活动吗?""很少，因为我们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都做什么?""男人在我们身上发泄，我们也出去发泄。""到歌厅舞厅去嗑药和买醉。""吸粉和喝酒来麻醉自己。""不知道吧，K粉和摇头丸能让人忘掉忧愁和烦恼。""吸这个的多吗?""多，我们这70个里就有50个吸，相互影响呗。"

笔者还了解到，姑娘来自惠东县一个偏远农村，她现在最怕的是上街买东西，有一次她上街时，一个男人死死地盯着她，她回望对方一眼时，觉得有些眼熟，可能是自己曾经服务过的一个人，吓得她低着头飞也似的跑开了。她说，自从做这事以后，她把自己的网名改为"曾经最美"，她说她特别留念原来的自己，她觉得自己现在不干净。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临走时，她主动给笔者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和QQ。

返京后，我两次在她的QQ里留言，希望她能早日结束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2007年7月28日，她高兴地告诉笔者她已经在3个月前离开了"大森林酒店"，现在老家，并且已经交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朋友，正在谈婚论嫁。笔者在心里默默祝愿："曾经最美"，祝你一切幸福，一切安康。

7、破案压力下艾滋病防治困局

6月3日，昆明市人民东路一座三层小楼里，围坐着3名穿白大褂的大夫、7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和5名体形消瘦、手臂布满针眼的男子。

粉刷一新的三层小楼是昆明市首家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点大树营门诊所在地，也是国家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第二批试点之一。自2006年5月17日挂牌接诊以来，包括肖军（化名）在内的数十名吸毒人员每天来这里接受国家免费的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当天下午，门诊大夫与病人及家属间关于治疗情况的交流会谈正在这里进行。

“我儿子一米七八的大个子，因为吸毒成瘾感到非常自卑，整天低着头、驼着背，也不愿出去见人，如今接受治疗已有半个月，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孩子们也喊叫着‘舅舅长高了’。”69岁的阮凤英第一个发言。

阮的儿子肖军已经36岁，吸毒史长达10年，曾先后接受警方强制隔离戒毒5次，劳动教养两年，但每次从高墙内走出后，他很快又复吸了。

“以前他吸毒，家里不但要负担极大的经济支出，更重要的是整天承受提心吊胆的精神压力。现在，他终于有救了。”阮凤英说。

实际上，在昆明，大多数吸毒人员并不能像肖军这样轻松地接受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由于这种治疗要求的条件较高，还有云南警方在“全员收戒”的口号下加大了对吸毒人员的打击力度，他们往往在得到类似治疗前就被警方强制收戒了。

这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因为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70%都为吸毒人员，如果戒毒所不具备分离收戒的条件，吸毒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同时艾滋病病毒很容易在人群密集的戒毒所内爆发，类似的情况不仅仅体现在云南，在广西南宁、四川西昌等地，均有发生，药物维持治疗的入组率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多数戒毒所均不愿承认与公开的事实是，在戒人员中有不在少数的同性恋，在



身体接受生理脱毒后，身体的肌能得以恢复，对性的需求恢复到吸毒前，当这些同性恋重燃对性的渴求后，那些被一同收戒的同性恋及其他的弱势同性戒毒者，则成为他们泄欲的对象，这无形中又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机率。一方面是破案的压力，一方面是药物维持治疗，很多时候警方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前来门诊点服药的戒毒人员。

目前，国家已下拨款项，帮助云南省对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改建扩容，以专门隔离戒毒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对其进行治疗。但由此带来的医务人员短缺和治疗资金仍是难题。

门槛过高的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在昆明将有越来越多的治疗点相继挂牌营业，与已经挂牌接诊的大树营诊所一样，这些治疗点都属于国家批准的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试点。

但当地医务人员表示，除了大树营治疗点有数十名吸毒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外，其他的治疗点的现状都并不乐观。按照计划，位于昆明西坝的第二门诊将很快挂牌营业，但目前报名且符合条件的只有一名吸毒人员，而且手续至今还在审批之中；距离昆明市区 40 公里外的晋城治疗点也将挂牌营业，但至今还没有找到一名符合条件的吸毒人员。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一位工作人员对此很无奈，“要知道，设计之初，每个治疗点的接诊人数都能达到 200 人。”他说。距离大树营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40 米远，临街有一处大树营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门诊。据该门诊大夫介绍，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与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都属于脱毒治疗，但方法有所不同，前者的治疗时间相比较短，而且属于收费治疗。

这位大夫说，门诊是 4 年前开设的，原来每天前来就诊的吸毒人员能达到四五十名，但如今每天前来就诊的吸毒人员只有四五名了。据了解，昆明市原有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门诊 78 家，如今已经关闭了两家，而且未关闭的多数在勉强维持。

“目前制约维持治疗的最大瓶颈是来自自身的高门槛。”大树营门诊主任姬红瑞介绍说，个人申请免费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需要具备 5 个条件：海洛因成瘾未脱瘾者；强制隔离戒毒两次或以上者；20 周岁以上者；昆明市户口且有固定住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但如果是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海

洛因依赖者，只要具有昆明市户口，就可以获得免费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

姬红瑞介绍，符合条件的吸毒人员在治疗门诊填写申请表后，还要将其送到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审批。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多数吸毒人员虽然符合条件，但却很难提供出公安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

“他们命都不要了，谁还会留心保存通知书。”姬红瑞说，没有通知书，只能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去开具强戒证明。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吸毒人员因惧怕“自投罗网”，往往对公安部门望而却步。

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打击处理过的吸毒人员，他们是不会主动到公安机关去“备案”的。

HIV 阳性检测报告是吸毒者申请美沙酮药物维持免费治疗的一个绿色通道。虽然 2006 年云南省对高危人群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但由于其中绝大多数吸毒人员流动性大、不愿暴露真实身份，即便自愿接受检测，也因谎报姓名和住址而无法告知、随访和进一步的确认检测。

张瑞敏，国家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培训中心培训部主任、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主任，是国内最早提倡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专家之一。

张瑞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话语中充满着忧虑：“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其实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间的快速传播。但现实处境却使该目的大打折扣。”

“对于门槛过高的困境，我们已向中央多次反映，目前公安部、卫生部和药监局三部门对这个问题已开始关注，并考虑适当降低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门槛，但新的标准什么时候出台目前还不知晓。”

“全员收戒”除了条件过高的原因外，一些医务人员和吸毒者则认为，公安机关近年来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打击力度，实行“全员收戒”是影响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另一重要原因。

一名吸毒人员告诉笔者，正是在“全员收戒”的政策下，吸毒人员很难去进行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他说，对吸毒者，警方见一个抓一个，特别是在破案任务的“指挥棒”下，不在少数的公安人员为了图省事，甚至蹲守在针具交换点和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门诊附近抓捕吸毒人员。

但公安机关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笔者得到的信息是，警方曾承诺，只



要持有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卡的吸毒人员，公安人员是不抓的。

话虽如此，但卫生部门人士担忧的是，毕竟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试点工作有其特殊性，如果警方将社会上的吸毒人员都抓光了，寻找符合治疗条件的吸毒人员将变得异常困难，由此投入巨资和人力的治疗试点将失去最终实验和推广的目的。

“云南要想搞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必须要加强沟通。”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在对云南进行了多次的调研后，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云南、四川、广东等省市公安部门提出全员收戒，欲将所有的吸毒人员都关进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办法是不现实的，毕竟戒毒所是有限的，不可能天天扩容，而开展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脱毒办法，更重要的是对吸毒人员之间艾滋病病毒的防治非常有效，公安和卫生两方在这方面应加强合作。”

张可说，种种迹象表明，公安部门欲对戒毒所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毒人员进行抗病毒治疗，这同样需要和卫生部门的合作。抗病毒治疗需要持续性，走出高墙，公安部门应将戒毒人员转交给卫生部门跟进治疗，一旦中断，再进行抗病毒治疗则很容易产生耐药性，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张瑞敏认为，对吸毒人员进行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审批权应该从公安部门转交给卫生部门，即符合条件的吸毒人员在门诊报名申请，只要卫生部门通过，然后报公安部门备案即可。这样将大大减少审批的时间，也更有利于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的顺利开展。

可喜的情况是，2011 年 6 月 26 日正式颁布实施的《戒毒条例》的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局。

8、北京防艾难题待解

警察有时即使明知某人有卖淫嫖娼、吸毒等行为，如果没有当场抓获，

就没有对该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即使娱乐场所安装安全套自动售卖机，也不会成为警方破案线索。

目前最经济，也最符合使用者隐蔽心理的手段是在性行为高危人群经常活动的宾馆饭店、酒吧夜总会、工地、大专院校中安放安全套自动销售机。目前，安全套销售机除在大学校园里受阻外，在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推广也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娱乐场所的业主认为，安装了安全套销售机，等于向打击卖淫嫖娼的公安人员暗示自己这里有“小姐”或色情服务，因此对此举非常犹豫，从心理上不愿接纳。

女性性服务人群、大学生、外来打工者、男同性恋者，都是易通过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不安全性行为不可能被禁止，而安全套的使用已被多个国家证实是阻止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

有12年静脉吸毒经历的小于是北京第一位尝试为自己和吸毒同伴到疾控中心交换清洁针具的志愿者。几天后，他又在自己的同伴中推荐了第二位清洁针具交换者“小丽”（化名）。小于告诉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防艾人员，他的8个吸毒同伴里至今还有几位不愿到朝阳区疾控中心接受VCT（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因为他们认为，“疾控中心那里不安全”。

使用清洁针具，不共用针具是避免静脉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现实和有效的方法，但这与公安的打击职责冲突，因为到疾控部门交换针具的吸毒者很可能就是缉毒人员破获吸毒团伙的线索。目前，在四川省西昌市等一些地方，已由卫生、公安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保证吸毒人员交换清洁针具的行为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在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清洁针具吸毒。目前，北京推进防艾的针具交换工程，需要有一个更加宽松和安全的政策法规支持。

为了普及安全性行为及安全吸毒行为的知识，北京市朝阳区的防艾工作者走进辖区的“路边店”和“按摩发廊”，向那里的潜在的女性性服务人群推广使用安全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时发现，很多女性性服务人群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防艾，而是治疗性病。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帮助她们解决，就很难走进这个人群，开展高危行为干预。而目前疾控部门只有防病职责，没有救治机构和能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好防艾工作，急需建立起与医



疗机构的性病诊疗科室畅通的转诊通道。

目前，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已初步与区内一家医院的性病门诊达成协议，在高危行为人群的干预进程中，鼓励高危性行为者接受性病检测，并为她们提供安全的治疗。同时，在另一家社区医院开设了 VCT 门诊，将艾滋病病毒自愿咨询检测机构搬离容易被误解为“政府部门”的疾控中心，方便高危行为者接受艾滋病病毒的咨询和检测。

尽管疾控中心在做着努力，但由于暗娼的盛行，此项工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艾滋病防治工作形势仍不乐观。

9、游走在防艾与禁娼的灰色地带

不久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组织的一次针对 CSW（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其舆论的焦点在于这次活动中接受防艾宣教的是一群特殊“学员”，即报道中所指的那些“一向被公安机关严打、被世人指责甚至唾弃的娱乐场所从业的‘小姐’”，她们“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在公开自己身份、公开自己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这一由疾控部门组织给“小姐”办班学习的举动，引发了社会各方议论纷纷，争论不休。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争议在我国防治艾滋病政策演化的进程中一直未曾间断过，特别是在早期国家对于艾滋病防控的思路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开展这类针对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我国防艾策略日益务实理性，在“四免一关怀”、《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政策法律保障日益完善的今天，由此引发的争议依然如此巨大真的让业内专家也有些“看不懂”。

卫生部控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张孔来教授是我国防治艾滋病政策

演化进程的亲历者。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的专家之一，早在 1991 年他就在海南开始了对长途卡车司机、性工作者等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相关宣传教育。在当时艾滋病、性等字眼尚相当敏感的社会氛围下，他们的工作在理念和实践中都经受了不少磨砺，甚至在同行中也每每引起非议。“我们那时更多的只能在路边进行拦截式的访问和教育，哪能像现在一样完全可以把宣教工作、把 100% 安全套项目等直接推广到娱乐场所里去，不仅是性工作者甚至连老板也可以成为我们防艾知识宣传的对象。”10 多年的历史跨度和前后反差让这位专家相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春天的确已经到来了”。

有专家介绍，在当前国家积极推进防艾工作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遇到艾滋病防治与打击卖淫、吸毒相交叉的情况时，一般会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卫生靠前、公安靠后”。比如，在卫生部门设立的清洁针具交换点，那些来参与针具交换的瘾君子通常就不会有被当场带走送去强制隔离戒毒的危险，从而能够保障艾滋病防治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当然这也要视当地卫生与公安、禁毒等部门协作的密切程度而定。事实上，据媒体披露，早在 2006 年 6 月，此次新闻的主角——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就已经在当地的五常市和木兰县成功举办了两次“小姐学习班”，这意味着当地相关部门的协作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

张孔来教授分析认为，尽管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少地方均有着类似“卫生靠前、公安靠后”这样心照不宣的约定，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卫生部门在对女性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进行宣教时，一般不会用“小姐”、“CSW”等敏感字眼，而通常会以“娱乐场所工作人员”这样的统称来代替，在具体实践中也常常注意尽量低调。而此次培训活动经过媒体大肆报道，甚至还被直接冠以“小姐学习班”的标签，的确容易引发争议，公安部门对此反应颇为强烈也不难理解。

张孔来教授表示，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当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所谓“治本”就包括通过经济发展尽量消除贫困和卖淫嫖娼的社会基础，开展性道德教育，打击卖淫、吸毒等行为，救助社会边缘人群等；而“治标”则包括实施 100% 安全套项目、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等已被证明有助于遏制艾滋病扩散的措施。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面对艾滋病流行的严峻态势，“治



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治本”，因此对于高危人群的干预和宣教等工作也理应得到社会和有关部门的认同。然而，尽管在实践操作中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灰区”问题的权宜之计，但是张孔来教授更希望类似这样的灰色地带能够在法律上得到澄清。

那么，其争议从法律角度审视究竟意味着什么？著名艾滋病问题法律专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从法律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一番剖析：“我国立法一方面存在着不同政府部门各自制定相关法律的现状，另一方面还面临着计划经济年代与改革开放后不同立法理念间的冲突，因此当法律制定涉及一些交叉问题时，就很可能出现‘灰区’或矛盾。”

李楯教授告诉记者，《艾滋病防治条例》是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同一天生效的，但问世之初两者之间就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之处——“比如说，同样面对一名吸毒者，疾控人员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可以给他提供清洁针具供其吸食毒品海洛因，但警方则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马上对吸毒者手中的这一针具予以没收。而这就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法律困境，在相关法律修改得更为协调之前，在实践中探索相关方面均可接受的方案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李楯教授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认可卖淫这种行为，主流社会也为此制定了相关法律对此进行禁止，然而一般却难以做到完全彻底地禁娼。因为在开放的社会按法治的原则办事，具体到每一个案件，警方必须要同时掌握性行为与金钱交易这两个关键要素证据才能处罚，但在实践中同时拿到这两个证据的执法成本相当高昂，加之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卖淫嫖娼现象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禁绝。

在主流社会对该现象不认可的情况下，政府的价值取向应是非常明确的（即反对和禁止），因此政府和政府属下的机构不应参与和国家立场不一致的活动，哪怕站在防艾立场上看被认为是有益的。因为一旦政府参与进去就容易使人产生对政府立场的质疑。而在承认社会多元的前提下，在社会空间足够大的时候，这些与边缘人群有关的活动如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教、100%安全套等，就可以由非政府的民间机构参与开展，而合法的非政府组织从事防艾工作甚至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的支持，由此就构成了一个缓冲地带，

从而可以很方便地去涉足政府难于介入的诸多领域，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毕竟在法治社会，凡法律未授权的政府就不可以做，这限制了政府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方式；而凡法律未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做，这也就给了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以拓展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空间。有些事，政府、企业、非政府的和非营利的组织以及社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推进，对社会的整体发展反而有利。

“在我国，疾控中心常被视作准政府机构，其一举一动被认为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而此次媒体高调宣传哈尔滨疾控部门为‘小姐’办班，自然就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政府已经默认其存在，甚至由此引来‘办性工作者培训班引发暗娼合法化之争’这样的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设想一下，这样的事如果是一个纯粹的非政府组织去做也许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的社会改革仍有待推进。”李楯教授说。

可喜的是，2010 年公安部专门出台规定，对于那些查获的涉嫌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改称为失足妇女，看似称呼上的变化，却彰显执法将更加人性化，同时透着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改造的期望。而这也正昭示着禁娼、禁毒防艾的春天正一步步来临。

……

吸毒与卖淫是一对孪生姐妹，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它又会引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如何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与打击吸毒卖淫统筹兼顾，不仅考验着公安、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将树立怎样的政绩观，是否真正把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一把标尺进行很好地落实，只有这样，我国的禁毒、防艾、禁娼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多赢。



从士兵到作家

——作家郭毅小记

读郭毅的作品，有一种越读越冷，又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品他的文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是为文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所动容：因为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说，无论是吸贩毒者，还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为它涉及这样一部分人生活的灰色地带；二则更多的是有感于作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成功升级而感慨万千。

我与作者相识于身穿绿军装、紧握手中枪的士兵生涯，距今已近二十载。记得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满怀七十年代十七八岁时的那种有点青涩的戎马梦想，凭借一腔热血毅然投笔从戎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因为工作性质（我们都在各自的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们的相识许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同时被部队送往同一家报社——中国社会报社实习（实则干点分捡来稿，初选后供编辑再次筛选，并送文印部打成电子文档，排版后初步校对等“边缘性”的文字工作）。那时他在社会部，而我在副刊。正因为在副刊，我受几位编辑老师教导，在专业上只会弄些风花雪月之类的小诗和散文；而他则擅长采写报告文学。不过，那时他的文字普通、平凡，甚至还有点生涩，一如他的人。然而18年弹指一挥间，也许在很久前的某个时刻，他已经完成了质的飞跃：文字生动、活泼，又力透纸背。如《毒殇》。

“这是首部家庭、学校开展禁毒防艾教育的故事读物”

“这是首部来自戒毒康复一线特殊人群的心灵独白”

“这是首部深入剖析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心历程的纪实文学”

“这是首部改变你我对毒品、艾滋病认知和对待问题的现实指导”

……

好评如潮的著作完全可以在郭毅的头上加一个光环：作家。何为作家？作家是以写作为工作者，从事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就的人。如果说作者以前每年在全国各大新闻报刊杂志社等发表多少“豆腐块”，仅只能算是文字工作者或略带贬义的“码字匠”；而今读着他的数十万字的大部头《毒殇》和《毒孽》，让我在读完后心灵震撼之余不得不以一种向上的目光迎向他。

是什么让他似乎很轻松地完成了从士兵到作家的华丽转身？

成功属于全身心投入的人。据作者介绍，《毒殇》著作的完成，几乎耗尽他近年来全部的心血：他放下了个人，放下了家庭，长时间不间断地全身心投入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的采写。每个故事全程体验式采访，要时间，要耐心，要感同身受，要慢慢去打开每位被采访者正在疗治中的伤疤，还原那些人过去的生活，并与现在形成尖锐的对比……他完全沉溺于一个个案之中，甚至于几近崩溃。而他在创作《毒雾·毒幕》时，先后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走访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

这是一种心灵炼狱。我就有过类似的情感煎熬过程，个衷的痛苦不言尽说。

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事实证明，每个在专业上取得骄人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机遇。这种机遇看似是偶然的，其实也是必然的。它必然会落在你的身上但却并不一定能被你驾驭，被你驾驭但你并不一定会持之以恒，这个连续的过程非常重要。我们太多的人总在抱怨生活对自己有多么的不公，从而怨天尤人，其实最应该反思的是自己。作者是从士兵开始起步的，当初对他来说，机遇就是他当年在特警部队里因为过人的文笔而被大队报道组录用，因为他的好学和上进并随后被送进报社实习。不但如此，他自此机遇后，持之以恒地紧握手中的笔，一路写来，写到今天，并一举取得《毒殇》、《毒孽》等著作的完成。清·曾国藩《家训喻纪泽》：“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不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郭毅执著地坚持到了他的成功。

成功属于人格高尚的人。作者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作者常与我进行交流，其中提得最多的词汇就是人格魅力。多年的文字炼狱，让郭毅练就了高纯度的人格魅力。他出身贫农，很小的时候就接受着穷苦孩子坚韧自强勤劳无私的现实教育。从军的经历，历炼了他宁折不弯的气质和能为理想献身的高贵品质；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一家杂志社和现在的报社工作，记者生涯让他学会了用事实说话的工作作风。这些年，他经常外出采访，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每去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受访单位，总会得到热心的帮助：能及时全面地得到他想要的采访素材，并最终和其中一些人成为知心朋友。我就曾傻傻地问过他为什么，他总笑而不语。今天作为不成功商人的我总算明白了：朋友就是人生的财富。作者正是在那些朋友的真诚帮助下，屡屡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采访，写就最接近真实最接近完美的新闻作品或报告文学。他在《毒殇》后记里提及的很多友人，正是他依靠自己人格魅力得来的。也正是那些人，为他成就今天作家的地位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成功属于永远怀揣梦想的人。一个人的成功不只在于他能多吃苦多好学，待人有多真诚，还在于他的志向。作者紧握手中笔，一直以“为人民鼓与呼，为正义鼓与呼，忠实地记录下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伟大变革，才能不负这个时代，不负我的亲人和朋友”为志向。他写字是为了彰显公平正义、公正记录，所以，他没有杂念，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他相对单纯。他只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从而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尽管他在工作中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贪点小利，可以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充实粮仓。他没有象我们太多的俗人一样“人生熙熙皆为利来，人生攘攘皆为利往”。他所写的新闻也好，报告文学也好，不加修饰，忠实记述是他的原则。

郭毅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朴实厚道，坚强无私。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养育着五个兄妹。郭毅参军前他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放弃了落榜后继续复读的机会，在铁路上以 17 岁稚嫩的身体干着高强度的修铁路工作。生活在农村，他自幼就综合了父母的优秀品质，自小就意志坚强，勤劳上进。虽然他错过了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娃继续冲击“鲤鱼跳农门”步入高等学府神圣殿堂的机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走到哪里都带着书和笔，一直到今天。他始终都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现今太多的孩子不明

白。（至少，他的著作里的事例就能说明这个道理。）然而他做到了。他从小的志向在他坎坷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实现并取得了成功。作为他的朋友，我替他高兴和感到骄傲。

当代著名作家莫应丰说：“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于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作者把写作当作毕生事业，在写作中实现自己专业水平增长的同时为社会鼓与呼，《毒殇》体现了他作为记者的良知他做到了这点。他就是镜子，就是良友，就是尖刀，就是雄鸡。他用文字记述实践他的“为人民鼓与呼，为正义鼓与呼”理想，这也是他值得敬佩之处。

成功属于爱情甜密的人。俗语说每个成功男士的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还有人将此戏说成“每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其实，并不是每个男人走向成功都需要女人，也并不是每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都需要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男人也好，女人或小怪兽也罢，在生活中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思想，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一个男人即使身边没有女人也能成功。一个女人，她也未必为成功男人做出过点什么事。但就作者而言，作为相对了解他的最忠实、最好的的朋友之一，我要说他今天的成功 80% 以上得益于他的夫人燕子的全力支持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在大家都还是士兵的 1993 年，我就曾作过小文《真爱一种》来记述他们的感情。燕子和他之间的真爱，夯实了作者的心灵，并让作者始终安心不断学习，不断码字写作。时光流转经年，如今他们互望的眼眸依然深情款款；风雨经年，燕子从未束缚他，放心地放飞他，忠实坚贞地打造着他们幸福的港湾。我在想，作者在埋头码字提升自己之余，偶尔落在爱妻身上的眼光，是否有种晕晕的潮湿？他们在感情上互相爱恋与执著，正是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基石。一个不执著的人也许会小有成功，但会在人生不断消逝的进程中惶惑、彷徨，走冤枉路，走弯路，从而成不了真正的大气候：在自己善长的领域里游刃有余。尽管作者还不能算完全成功，可是他到现在并没有放弃，并没有想停下来歇息，而是更执著更坚定地朝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行。



成功属于时刻准备的人。当然，就算是作家但毕竟是个人，不是圣人，也不是腐儒。仅仅有高尚的人格还不能成为成功的作家。郭毅的人格只是他成功的起点，他的成功更多的是靠后天的勤能补拙。17 岁高考落榜，为了贫苦的家庭放弃复读但并未放弃大学梦，他的背包里永远都有学习的书本。从当兵开始，他开始发奋读书，复习高中课本，在第三年以 3 分之差与军校失之交臂后并未气馁，又开始新闻大专的自学考试。14 门功课，硬考三年全部毕业。专科毕业的第二年，又考上了武警工程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本科学习。服役期间还先后被部队选派到《中国社会报》、《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实习。正是这样，他一步步完善了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为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成功属于永不满足的人。一个人的成功，不仅在于达到了事业上的什么顶点，还在于他如何达到这个顶点，以及达到这个顶点后是高枕无忧还是继续前行。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他会继续写下去，除了报告文学，还想搞话剧、电影剧本等。我知道，这就是他，一个永不停息的人。

祝福你，好兄弟，我会在南方静静期待。

（徐能文，青年诗人，代表作为《乘坐玫瑰的歌谣去远方》）

后记

写毒品与写人生

坚持8年去做一件事情，除了写这本书，再没有其他什么能让我如此痴迷。

走上禁毒宣传这条路，纯属偶然，在此之前，在我的印象里，对于与毒品有关的东西，我觉得距自己很遥远。

当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在册吸毒人员及其背后的隐性吸毒人员数量时，除了震惊就是后怕，而当我深入到收戒吸贩毒人员的戒毒所、劳教所、监狱（看守所）采访时，我发现，他们的人生发生裂变，皆是因为毒品。

因为毒品，他们从“好人”变成了“坏人”；因为毒品，他们陷入困顿、迷茫与绝望；因为毒品，他们丧失人性，用无知扼杀亲情，用贪欲践踏法律，直至走上“断头台”……

打工仔、工人、明星、白领甚至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人生，因为毒品而改写；他们的人生，因为毒品而起浮、沉沦……

探究真相的执著让我走近他们，用心去倾听和记录，在我还原他们踏入地狱之门的人生轨迹时发现，除了他们自身的人性弱点外，所有导致他们人性改变的皆是毒品。

毒品——万恶之源。

探究过程伴着揪心与无奈。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心底泛起同情之余，更多的是道义与责任。

走近、走近、再走近，直抵他们的灵魂，我一直信奉唯有感悟到他们生命的热度，才能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被毒品控制后他们的黑色心智，清

醒后的泣血忏悔。

写因为毒品让他们身陷囹圄的故事，他们的灰色人生让人沉重和压抑。我只是希望那份警醒能带给更多的人深思，无数个案告诉人们，有毒品相伴的人生，是生不如死的人生，注定充满凄风苦雨！

生命不可以娱乐和游戏，欲壑岂有填平的那一刻？

我的老家湖北省大悟县，她不仅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而且民风淳朴。在我20年前参军入伍时，对于故乡的记忆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而纯真，而近些年，无论是从父母及同学那里，我都能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诸如哪家的孩子因为吸贩毒进去了，而更多的是在得知我从事禁毒宣传，经常与公检法司打交道，请我去帮他们从戒毒所或监狱里“捞人”，对于那些饱含乡情、亲情的不请之请，我也只能告诉他此事不好办，也许他们不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涉毒违法犯罪，一向是铁律。

在毒品面前，故乡的乡邻、亲朋都不能幸免，让我明白了责任和坚守。

当我把这些故事形成文字与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时，众多出版社由于对这一领域的陌生和担心出版后不佳的经济效益而放弃时，中央编译出版社果断决定出版此书，“此书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哪怕亏本也要出”，社领导朴实无华的话语里透着一份社会责任，而这份责任在当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我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邓永标老师，他为此书的精心编辑和打磨付出了诸多艰辛。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向读者捧出更多更好的新闻、文学作品。我并不奢望的自己的作品能百分之百地让读者满意，如果有百分之一的读者能从中读出这些吸贩毒者粗重的喘息声、悲愤的呐喊、悔恨的泪水，他和他们家人悲怆的泪水，读者和他的亲人一生都不去触碰那个白色的恶魔，我就很欣慰，因为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没有什么能让我停下手中的笔，唯有生命的停止。

没有什么能让我停止探究的脚步，唯有梦想的破灭。

没有什么能让我停下记录时代，唯有信仰的改变。

作者

（2014年5月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毒雾　毒幕
作者=郭毅著
页数=271
SS号=13578131
DX号=
出版日期=2014.07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